

ISSN 2223-7461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第六卷第一期 2012 年 1 月

◎ 研究論文

內聖外王：儒家教育理想對當代教育的意義／王振輝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監督管理制度之問題與改革／郭冠甫

論佛教二十二根／張慧芳

災難新聞報導分析：現代風險社會的建構／鄭志文

從社區機構觀點探討大專校院服務學習之督導功能／胡憶蓓

試析幼兒園教育評量之現象／陳姿蘭、廖鳳瑞

性別主流化：反思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教育／廖美蓮

從華人社會「自立」與「泛家族」之概念論少年自立生活方案之設計
／林秉賢

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開案與結案狀態之因素：從個人人口特徵與服
務輸送的探討／趙善如、許玢妃、王仕圖、何華欽

社會排除觀點在原住民族相對弱勢處境分析上的侷限性
／劉鶴群、侯念祖、陳芝瑜

高齡者生活的數位落差與科技近用／蘇健華

「男性養家模式」？從女性作為「照顧者」的勞動參與經驗檢視其意
涵／洪惠芬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出版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唐傳義校長

總編輯 王振輝院長

編輯委員 郭冠甫 郭俊巖 鄭志文 藍建春

執行編輯 郭俊巖

編輯助理 賴秦瑩

出版者 靜宜大學

地址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 200 號

電話 04-26328001 # 17001~17003

E-mail pu20600@pu.edu.tw

網址 <http://www.huso.pu.edu.tw/puchess/index.htm>

本期售價：新台幣 320 元；美金 11 元整。

ISSN 2223-7461

目 錄

研究論文

內聖外王：儒家教育理想對當代教育的意義

王振輝.....1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監督管理制度之問題與改革

郭冠甫.....33

論佛教二十二根

張慧芳.....63

災難新聞報導分析：現代風險社會的建構

鄭志文.....85

從社區機構觀點探討大專校院服務學習之督導功能

胡憶蓓.....113

試析幼兒園教育評量之現象

陳姿蘭、廖鳳瑞.....151

性別主流化：反思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教育

廖美蓮.....177

從華人社會「自立」與「泛家族」之概念論少年自立生活方案之設計

林秉賢.....227

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開案與結案狀態之因素：從個人人口特徵與服務輸送的探討

趙善如、許玢妃、王仕圖、何華欽.....271

社會排除觀點在原住民族相對弱勢處境分析上的侷限性

劉鶴群、侯念祖、陳芝瑜.....313

高齡者生活的數位落差與科技近用

蘇健華.....343

「男性養家模式」？從女性作為「照顧者」的勞動參與經驗檢視其意
涵

洪惠芬.....379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6, No.1, January 2012

◎ Research Articles

Inner sage, outer k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education ideal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Chen-Hui Wang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National Pension Fund in Taiwan-Problems and Reforms／Kuan-fu Kuo

The Concept of 22-faculty in Buddhism／Huey-Fang Chang
An Analysis of Disaster News: Towards a Construction of Risk Society／Chih-Wen Cheng

A Study of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s of Servic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Perspectives
／Yih-Pei Hu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Practic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grams／Tze-Lan Chen, Fong-ruey Liaw

Gender Mainstreaming: Reflec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Miriam Mei Lin Liu

A culturally Programming of the 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Self- supporting and Pan-Familism perspective
／Ping-Hsien Lin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dividu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ce Delivery to Discuss the Factors of Influencing the Opening and Termination Status of a Marital Violence Reporting Case
／Shan-Ru Chao, Fen-Fei Hsu ,Shu-Twu Wang, Hua-Chin Ho

The Limitations of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s in Analysing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Disadvantages
／He-chiun Liou ,Nien-tsu Hou ,Chih-yu Chen

Digital Divides and Technology Access of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People
／Chien-Hua Su

An Examination of 'Male Breadwinner Model':
On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s as 'Caregivers'／Huifen Hung

研究論文

內聖外王：儒家教育理想對當代教育的 意義^{*}

王振輝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收稿日期：2011 年 6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1 年 10 月 28 日。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我國教育部在2009年計劃花十二億元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推動「台灣有品運動」，也就是所謂的「三品教育」，指的是：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針對台灣目前這種品德低落普遍景況，本文認為好好地來檢視一下傳統儒家教育理想—內聖外王，以及它在台灣實施的情況，可以為當代教育帶來許多省思。

關鍵字：儒家教育、內聖外王、當代教育

Inner sage, outer k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education ideal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Chen-Hui Wang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2009,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had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promote the Taiwan Character-Building Movement in 1.5 years, and which cost NT\$1.2 billion for its implementation. This movement, so-called "Three Characters Education", including morality of personality, quality of work, and taste of life. For the moral decline in , current Taiwan, I think that we should review seriously the ideal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ducation –“ inner sage, outer king”,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Taiwan. I hope it could bring many reflecti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education.

Keywords: Confucian education, inner sage, outer king, contemporary education

壹、前言

據報導，我國教育部在2009年計劃花十二億元推動「台灣有品運動」，就是所謂的「三品教育」，指的是：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這也許正是天下父母及學子們對「全人教育」的憧憬，為此，教育部提出四項計畫：品德教育、終身閱讀、藝術扎根、環境永續；有品運動包括推動「品德伍佰：新世紀品德教育策略聯盟中心學校」三年計畫，第一年補助五百所學校推動品德教育，每校補助四十萬元，第二年擴大為一千五百所學校，第三年推廣到所有學校。

事實上，近幾十年，台灣社會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型為現代工業化社會，面對傳統價值的失落所造成的社會混亂，有許多人衷心地期待這樣的有品運動的推展。¹

這裡所說的「傳統價值」在一般的意義上，我認為可以用傳統中國文化來加以概括，特別是儒家思想，因為依牟宗三的觀點，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儒家思想。²有人也主張：「台灣社會不只在社會地理位置上處於東方，深植人們心中的道德標準，也同樣是屬於東方的，這些來自儒家思想系統的教誨，經過千百年的代代傳遞，成為社會中難以動搖的核心價值」。³

台灣長期以來也是以儒家思想做為中小學生的文化教育的素材，因此，也有學者對台灣品德教育很有信心，他說道：「總的來說，台灣的品德教育是以儒家思想為本、重視身體力行的教育，而且是自幼兒起，吾道一以貫之。又因為國民義務教育的普及，它扎根得既深且廣」。

然而，事實真的如學者所云，台灣的品德教育因為普遍推行儒家教育所以真的做到了「既深且廣」的「難以動搖的核心價值」嗎？我們暫且來看看一些

¹ 社論，〈認識三品教育〉，《聯合報》2009年8月29日。

² 牟宗三，〈新版序—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載《政道與治道》，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20。

³ 林宜慧，〈淺談儒家思想對隱私權的影響〉，2008年2月16日，引自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hre.pro.edu.tw/zh.php?m=16&c=344

事實吧：

我任職安親班已經八年多，當初帶的第一批孩子現在已經國三了，其中一個學生阿鵬小一、小二時，成績都是名列前茅，但是到了小三時卻大幅退步，因為他的父母離異。阿鵬的父親一喝醉就會家暴，爺爺奶奶對媳婦很挑剔，導致夫妻倆終於離婚。

父母離婚後，少了母親教導的阿鵬，成績開始下滑，他回家後就是吃喝玩樂，我經常苦口婆心教他，但他不敵電動的誘惑力，讓我有著無力感。阿鵬的母親在剛離婚的前半年，時常打電話來安親班跟孩子說說話，因為她放不下孩子，但阿鵬後來都不接了，他氣憤的說：「奶奶說我媽是壞女人，我不要接壞女人的電話！」我委婉的說：「你媽那麼愛你，不是壞女人，老師不清楚你們家發生什麼事，但我相信你媽很愛你。」後來一段時間，阿鵬的媽媽沒再來電了，那一學期結束後，阿鵬世故的說：「奶奶說我沒錢補習，也不需要補了，我要去幫忙做資源回收賺錢。」後來，輾轉從其他來補習的學生口中聽說，阿鵬的媽媽改嫁了，而他的爸爸也再娶了一個印尼新娘，並生了個兒子。家裡沒人管阿鵬，所以他在學校很叛逆，抽菸打架樣樣來。

日前我在一個偶然機會下經過了他的學校，剛好放學時間，我看到染了髮的阿鵬一臉不馴，口裡嚼著口香糖，走路姿態像個小混混，並對我視若無睹。親眼看著一個品德兼優的好學生因為家庭的因素而變成了師長眼中的頭痛人物，讓我很憂心。⁴

以上是一個安親班老師所講的故事。以下是另一篇報導：

台灣高等教育近幾年來急速擴張的結果，導致台灣碩博士滿街跑，高學歷高失業的問題，加上社會只重視升學與考試，忽略年輕學子的生命與

⁴ 尹蕙，〈被犧牲的孩子〉，《聯合報》2010年4月3日。

品德教育，所以學生們常只知功利，不重視對社會的服務與責任，更不知對生命與動物尊重與保護的重要性。台灣從小學到大學都有開設：倫理道德、公民教育、生命教育、博雅教育等課程，但大多只重視講授或考試，缺少實踐。⁵

如果是像學者所說的那樣，教育部似乎不用再推什麼「三品教育」了。

實際上，台灣的品德教育之不彰不只是我們學生有這種問題，甚至連老師都出現了品德操守的問題了，近日看到一篇名為〈台灣正在向下沉淪〉的評論，作者是這樣寫的：

最近國內大學教授A研究費的事情一再爆發，問題相當嚴重，能不能這樣做其理至明且法有明文規定，沒有灰色模糊空間，不信可以問問坊間庶民。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從當事人、台大、成大、國科會到教育部，竟然沒有人有認錯的勇氣，不僅沒有因未予嚴格把關而感到慚愧，還幫當事人圓謊，難道A錢後只要說我不知道，再把錢還回去就沒事了嗎？這些受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其言行讓許多庶民看不下去，紛紛上網留言痛罵，完全沒有是非對錯。另考試洩題、性騷擾與護航等等爭議在大學仍時有所聞。這樣的言行要如何為人師表，要如何推動品德教育，能怪現在大學水準低落嗎？難道我們花五年五百億人民辛苦納稅錢只是要培養一些只顧私利卻沒有是非道德的社會中堅嗎？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看到學界發出自省的行為與聲音！⁶

針對這種品德低落普遍景況，我認為好好地來檢視一下傳統儒家教育理想，以及它在台灣實施的情況，可以給當代教育參考。

⁵ 謝國榮，〈如果我們傾聽動物的聲音〉，《中國時報》2010年4月1日。

⁶ 杜宇，〈台灣正在向下沉淪〉，2010年4月13日，引自<http://www.nownews.com/2010/04/13/301-2590723.htm>

貳、學聖人運動：儒家的品德教育

儒家的品德教育可以從其經典《大學》的開篇名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窺知，這裡的意思是說，做大學問，關鍵在於彰顯人所固有的光明磊落之德性，使人人有新的精神面貌，保持至善的境界。

在《大學》中的另一段名言概括成「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是說，對於事物要進行調查研究和探討，才能對事物有所認識，但是要「真正」認識事物是和人的「品德」即誠心誠意分不開的。事物的真，能引導心意的誠，但若沒有心意的誠，事物的真則不易真正實現。意誠是一種道德態度，在其引導下，心思就能用對地方。心思用對了地方，就能處理好自我和他人的關係，而在這種關係中，每個人的自我修養十分重要，每個人自我修養好了，同他人自然也就能和睦相處。大家都有自己的家，一個人的自我修養好不好，檢驗他的第一實踐便是看他能不能處理好自己家裡的關係，接下來還有家與家的關係。至於「治國，平天下」，則儒家教育的終極目標，即每一個知識分子都要把國家的治理和天下的太平、公平視為己任，儒家賦予知識分子相當重大的歷史使命，期望經由他們教育的知識分子每個人都是國家社會的棟樑之才。

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教育目標？傳統儒家的答案就是：學習師長。

儒家傳統中「教育」就是指受教育者經由學習典範而自我提昇。這種「典範」最具體而直接的就是師長。先秦儒家孔孟荀都強調師長在教育過程中所發揮的典範的作用。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他很重視老師在教育過程中的角色。孟子（371-289 B.C.）也主張所謂教育就是一種典範的學習的過程，如以下各段所呈現的意思：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孟子·盡心下》）

不只孟子，荀子（約298-238B.C.）也認為親近師友是最好的求學方法。荀子說：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荀子·勸學》）

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惡》）

《論語·學而》「學而時習之」一語中的「學」字，從漢代以降一直是解為「覺」，《說文》：「學，覺悟也。從教，從門。門尙朦也。臼聲。學，篆文『斆』省。」⁷《白虎通·辟雍》：「學之爲言，覺也，已覺悟所未知也。」⁸梁代皇侃（A.D.488-545）疏解這句話，也引《白虎通》的說法：「《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⁹

到了南宋朱子（晦庵，1130-1200）撰《論語集註》，才提出新的詮釋，朱子說：「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¹⁰

⁷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63），頁128-128。

⁸ 陳立：《白虎通疏證等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73），頁85。

⁹ 《十三經注疏》（下）（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頁2457。

¹⁰ 朱熹：《論語集註》，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47。

朱子將「學」詮釋為「效」，事實上是宋朝理學思想下的產物，因為理學認為教育的理想就是期望教導學生成為聖人，教育的方法就是「學聖人」即「效法聖人」。

理學乃源起於宋初儒家學者周濂溪的思想運動。¹¹一般而言，北宋理學乃是在傳統儒家經學、道家和外來的佛學結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思維。

12

按照張立文的理解，北宋理學的興起乃是在回應價值理想、外來文明與理論形態等新時代的三大挑戰；¹³張立文將北宋理學定位為「新儒學」，¹⁴依其看法，北宋理學所以是一種新儒學，是因為它在外來印度佛教文化哲學與本土道教文化哲學以及價值理想、理想形態的挑戰下，把原始儒家學說仍滯留在倫理

¹¹ 學者馮炳奎將宋明理學十大家的思想作了一個概括：「周濂溪先創太極圖的本體論，而提出人極，標明人人可以學為聖。邵康節亦有其象數的宇宙論，以充實濂溪的人極，而創為『以物觀物』可以做到聖人。張橫渠將這『人』而宇宙化，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的宇宙人。明道首先提出天理為人極的本源，為理學的首創。伊川將天理形上化，而提出雙軌存天理的方法。朱子集北宋理學的大成，以伊川為中心，一方面由禪宗的『無記的心』，從知方面轉落人倫日用，而成為理（即天理）；一方面補救儒家在後的不重知，而提出格物窮理（天理），豁然貫通這理。即天命之謂性，成為大系統之性即理。陸象山覺其支離，直接由禪宗無記的心，從德性方面而後歸到孟子，故主心即理，無形上意義。陳白沙解決朱程問題，由心而實理，心理二而為一；非性即理，心即理的本為一。王陽明異軍突起，簡易直捷，將佛家的無記的心，轉到精微簡易的良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而事事物物得其理。湛甘泉本白沙之旨，隨處體認天理。以王陽明的天理在胸子裡，容易偏差（王學末流就是偏差），即將心擴張到宇宙。心不踰矩，即隨處體認天理之實，較為接近孔子，而為心學的結束」。見馮炳奎，〈宋明理學主流〉，載馮炳奎主編，《宋明理學研究論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頁5。理學之名始之南宋，明之後就一直延用至今。又因為在北宋諸子那裡，如張載於《答范巽之書》中、程頤在《又上太皇太后》一文、朱熹更反復在《論語集注》和《答張欽夫》等文中也都自稱「道學」，所以也有將宋明理學稱為「道學」者，如陳少峰，《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頁2，以及許總，〈論宋明理學的形成及其歷史必然性〉，《齊魯學刊》2000年第5期，頁58；高建立，〈簡析宋明理學的發展特點〉，載《洛陽大學學報》2000年第15卷第1期，頁19；唐輝，〈二程理學的基本理路〉，載《學術論壇》1995年第5期，頁57。

¹² 侯外廬等編，《宋明理學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9；以及李禹階，〈理學與經學〉，《電慶師範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1期，頁1；以及高建立，〈簡析宋明理學的發展特點〉，載《瀋陽大學學報》2000年第15卷第1期，頁19。John Winthrop Haeger,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Neo-Confucian Syncret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1, No.3, May 1972, pp.499-513.

¹³ 關於理學興起的原因還可參閱許總，〈論宋明理學的形成及其歷史必然性〉，頁60-62。

¹⁴ 另外像李傳印也認為宋明理是「新儒學」，見李傳印，〈略論宋明理學家的理想人格設計〉，載《江漢論壇》1997年第8期，頁14；以及祁潤興、李繼勝，〈論宋明理學和傳統儒學的邏輯終結——現代新儒學思潮的歷史反思與學術批評〉，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頁97；以及章啓輝，《曠世大師——王夫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61。不過，還是有極少數的學者認為宋明理學其實已不是儒家學說，義理之學乃襲自韓非，而理學的經典《四書集注》更不代表儒學思想而是盜版的《韓非子》，例如，孫景壇，〈宋明理學非儒家論〉，載《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頁29。

道德層次和心性之學，從形上學本體論的高度予以重新詮釋，讓以心性為核心的倫理道德之傳統儒學，轉變為一種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學本體論的新儒學，這種新儒學通過詮釋心性與本性、倫理與天道之聯接以及人與生存世界、意義世界、可能世界的關係，使儒家道德學說獲得形上學的意義與整體性的詮釋；而傳統儒學內部的邏輯結構、價值結構、道德結構等經此調整，也獲得了嶄新的生命。¹⁵重新建構的理學在現實世界之外建構起一個無所不包、至高無上的理性實體，它是絕對的、自因的、自足的價值之源。¹⁶在此意義下，理學家所強調的三綱五常的倫常秩序與君臣之義都只是此一理性實體在現實世界的具體化而已。¹⁷

因此，如果從政治與歷史的角度來看理學的興起，事實上宋明理學所扮演的角色依然與傳統儒學一樣，也就是作為依附者的士大夫為絕對王權所作的意識型態辯護。¹⁸關於這一點，朱熹講得最清楚不過了，他說：「安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朱子語類》)，在理學家言，「理」雖是抽象的、超越的，但它所要維護的卻是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級制的三綱五常倫理道德秩序。理學的此一內在矛盾，造成了學者所指責的普遍存在於中國社會的「非理性文化」。¹⁹

無論如何，北宋理學不僅在思想上統合佛、道、儒三種不同思想體系蔚為一股氣勢磅礴的思潮，更在政治上與絕對王權結為一體，以致此一思潮沿襲至南宋、元、明、清，是中國思想史罕見的、前後長達六百餘年的思想運動，一般統稱為「宋明理學」。²⁰

然而，事實上，在學術上使用宋明理學是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的；所謂狹

¹⁵ 張立文，〈程朱思想的時代精神〉，載楊曉塘主編，《程朱思想新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

¹⁶ 陳廷湘，〈論理學的道德理想主義〉，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頁31。

¹⁷ 史革新，〈理學與晚清社會〉，頁47。

¹⁸ 唐輝，〈二程理學的基本理路〉，頁57-58。

¹⁹ 王勤，〈以理性面目出現的非理性現象—淺析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非理性特點〉，載《江淮論壇》1999年第1期，頁75。

²⁰ 高建立，〈簡析宋明理學的發展特點〉，頁19。

義理學指的是性理之學，它著重探討理、氣、心、性之類的學問，所以有時它也被稱為「心性之學」；而廣義的理學則指義理之學，它有別於漢唐儒生治經所注重的章句訓詁之學，理學目的在求儒家經典中所蘊涵的大義和道理的學問。²¹

由於理學發展橫跨宋、元、明、清數代前後長達六百餘年，學者眾多、意見紛歧，所以有學者甚至認為理學根本不是一個學派，從而也不是一個完整的哲學思想，它只是在特定時期的「哲學史斷代統稱」。²²

然而，即便如此，許多學者還是認為理學有其一定的思想核心：即它們的共同思想都在探討「理」是什麼以及如何達到這樣的「理」的境界；有學者研究宋初理學家對「理」運用的涵義，認為「理」有二義：其一是物的紋路、條理，引申為規律、原則，其二是對玉石的琢磨，引申為治理、整理或按某種規律行事。²³

事實上，理學家所謂的「理」便是宇宙、社會與生命運行的道理和義理，而只有聖人能通達此「理」；也因為如此，戴季賢認為理學是一種「窮理之學」，而這個「理」乃是聖人之道的意思。²⁴有學者稱它是一種「學為人」的思想，這裡的「人」指的是「做到了與宇宙合一的人，也就是成功的與天地萬物相溝通的人，亦即是達成了與天地萬物相和諧、相契合的人」。²⁵

其實不論是「窮理之學」或是「學為人」，都指向追求一個完美的理想人格，所以有學者簡單地將宋明理學稱為一種「學聖人」的思想運動，²⁶這種概括其實是相當準確地把握了宋明理學的思想實質；在宋明理學來說，「聖人」是一種學習的過程，因為，在宋明理學的學者認為，萬物都是生生變化而來的，

²¹ 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展過程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相對於徐洪興，陳少峰則將狹義的理學稱為「心學派」，將廣義的理學稱為「理學派」；見陳少峰，《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頁2。而鄧克銘則將宋明理學的「理」分為事理、性命之學、性理三個層次，見氏著，《宋代理概念之開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5。

²² 任繼愈，《中國哲學史》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頁158。

²³ 唐輝，〈二程理學的基本理路〉，頁57。

²⁴ 戴季賢，《北宋周張二程思想之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79年，頁2。

²⁵ 李日章，《宋明理學研究》，台北，復文圖書出版社，1979年，頁2。

²⁶ 馮炳奎，〈宋明理學主流〉，頁5。

²⁷聖人也不是人天生的本性，就如同北宋名家周敦頤那裡賦予宇宙的本源（無極—太極）既無任何既定性也無任何確定性一般，「聖賢非性生」的觀點可以說是理學家的共同觀點。²⁸這裡所謂的「聖人」，指的是「道德與智慧最完美的典型」，在此一理解下，理學就是一種「貫徹一切的道德價值體系」。

然而，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理學不僅追求內聖的功夫，事實上它也追求以理治天下的「外王」境界，也就是說，它不僅是要求自己有一個完美的理想人格，而且也要求每個人都能努力地「學聖人」；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學者將理學稱為「新儒學」其根本意義就在於，理學繼承了儒學原本探討如何培養人、造就人、完善人的學問之精神。²⁹

所以，從整體而言，理學追求孟子所謂「仁且智」的理想人格，並透過「經且權」的倫理策略有效地落實在社會生活中，最後以「士則仕」從政治層面推行聖人之道治理天下建立理想的國家，也就是德治主義，此為學者所稱的「道德理想主義」(moral idealism)。³⁰依牟宗三先生所說，儒學的理想乃奠基於「吾人當下反歸於己之主體以親證」的「怵惕惻隱之仁心」，此一「怵惕惻隱之仁心」乃「價值之根源」，也是「理想之源」，站在此一基礎上，儒者再進一步去實踐、推展「仁」，「由此而有家、國、天下（大同）之重新肯定，其極則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³¹從政治社會哲學來說，道德理想主義就是一種烏托邦(Utopia)思想。³²

²⁷ 侯外廬等編，《宋明理學史》（上），頁61。

²⁸ 馮達文，《宋明新儒學略論》，乳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59-60。

²⁹ 李義凡、唐明勇，〈延安整風運動與儒家思想〉，載《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6卷第3期，頁32。

³⁰ G. Santayana, 'Lotze's Moral Idealism,' *Mind*, Vol. 15, No. 58, April. 1890, pp. 191-212; C. E. Ayres, 'Moral Confusion in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45, No. 2, Jan. 1935, pp.170-199. 姜廣輝，《理學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6-7；以及楊海文，〈先秦禮樂文明與孔孟道德理想主義〉，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0卷第3期，頁76；以及啓良，〈走出道德理想主義〉，載《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6年第11卷第2期，頁10。

³¹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4-5、15。

³² 我認為，「烏托邦」是一種理想社會的建構，在此一定義下，「烏托邦思想」指的則是有關於建構一個理想社會的思想、觀點。參閱王振輝，《青年毛澤東救國烏托邦之研究》，第二章；以及陳廷湘，《宋代理學家的義利觀》，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年，頁205-219。關於烏托邦思想請參考以下諸學者的著作，Doyné Dawson, *Cities of the Gods: Communist Utopias in Greek*

從整體上看，宋明理學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不過如果進一步仔細地分析，人們又會發現，在理學的道德理想之中，又因其思想的內向性和外向性而有所謂的內域與外域之分，³³所謂的「內域」指的是「修己之學」，也就是一種個人「成德之學」，在以內聖之學為主流的宋明理學中，因為以心、性為主體來發揮此一修己成德之學，也因此牟宗三先生曾將宋明理學定義「心性成德之學」；³⁴在內域之外，之所以還會有所謂的「外域」的存在，「乃是因為儒家本就以世界為終極關懷，而非一己之個人」，這種道德理想的外域之學就是「教化」，即「理學家們終於在內聖之學中開拓了它的新領域，依舊為人而落實在這個世界中，這便是『師儒式』的『教化』」，³⁵也就是透過教育讓每個人都像儒者一樣成聖成賢，如果用古老儒家的說法，這就是「人人皆為堯舜」的理想境界。

除此之外，理學還有一個必須加以分辨的重要特徵，也可以說是二派不同的思維理路，它們是理學整體的兩個重要側面，³⁶一般將它們簡稱為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

前者即程朱一派主張客觀唯心主義，³⁷他們相信「在客觀物質世界之外存在著無限神秘的力量」，³⁸也就是所謂的「天理」，這個天理「是超越天地萬物之上的實體」、超越自然超越時空的實體，它「又是其奉行的現實性的道德踐履的終極尺度，人們的一切欲望、追求和行為，甚至隱秘的『一念發動處』，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3-14; Frank E. Manuel, *Utopias and Utopian Thought*, Boston, 1966, p.70;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Harvest Books, 1936;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W. Nelson ed., *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Utopia*, N.J.: Prentice-Hall, Inc., 1968.;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New York & London: Philip Allan, 1990; J. C. Davis, *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³³ 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1。

³⁴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台北，正中書局，1968年，頁4-7。

³⁵ 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頁2。

³⁶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1971年，頁48。

³⁷ 范世珍，〈朱熹和柏拉圖：「理學」和「理念論」思想比較〉，《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頁21。

³⁸ 皆勇，〈簡論宋明理學與傳統思維模式〉，《山東電大學報》2001年第3期，頁29。

都必須在天理的法庭上接受檢驗和裁決」，³⁹可以說「自然界以及整個人類社會不過是這種『理』的表現」。⁴⁰

後者即陸王一派主張的是主觀唯心主義，⁴¹他們強調生命感受、內心體驗、血肉之軀以及生活情調，⁴²主張「心即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在此，「理」不是什麼先驗性的實體，而是「眼前道理」，是「未嘗有所隱遁」的明白之理，是「天下所共由」的「道」和「公理」；⁴³如此，心學一派不僅把客觀存在的萬事萬物及其聲色視為主觀作用的現象，也斷定一切倫理道德觀念和價值都可以在此心找到依據，⁴⁴主體只要充拓其良知，自覺地實踐道德義務，自能達到「孔顏樂處」，⁴⁵藉此，陸王心學將被朱熹「形而上」化的「理」重新拉回人間，並以此突顯人在宇宙、社會中的能動性。⁴⁶

參、傳統教育目標：淑世濟世

一般人都為把理想主義與經世務實取向看成是對立矛盾的，這樣的看法事實上是一種誤解，如同劉廣京所說的：

經世的概念含有理想主義的成分，要求知識分子對實際事務有貢獻。晚清經世之學的一個特點是不避諱談富強。所講求的雖然偏重政府的富強，但認為富強應與仁政同時實現。⁴⁷

³⁹ 吳培顯、劉長欣，〈宋明理學對儒學精神的發展及其局限〉，載《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6卷第3期，頁73。

⁴⁰ 范世珍，〈朱熹和柏拉圖：「理學」和「理念論」思想比較〉，頁21。

⁴¹ 荒木見悟，〈心學與理學〉，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頁76。

⁴² 史炳軍，〈陽明心學的意義〉，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7卷第3期，頁99。

⁴³ 劉宗賢，〈試論王陽明心學的聖凡平等觀〉，載《哲學研究》1999年第11期，頁70。

⁴⁴ 楊柱才，〈陸九淵心學的兩個根本觀念〉，載《江西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頁18。

⁴⁵ 張家成，〈論陽明心學的人格理想〉，載《浙江大學學報》1994年第8卷第3期，頁24-25。

⁴⁶ 劉宗賢，〈試論王陽明心學的聖凡平等觀〉，頁70。

⁴⁷ 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

事實上，在傳統儒學那裡，上面引述《大學》裡的八目就是從「格物」開始，最後要達到的是「治國、平天下」，易言之，理想人格的造就，它的目的乃在於經世應用，所以在原始儒家中就相當重視淑世之道，並視之為士大夫的天職，如學者所云：

儒家的人格理想則反映了積極的入世精神。無論君子、豪杰、聖人，都具有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品格，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把經邦濟世、建功之業作為自己的終生追求，把個人的完善與人類的福祉聯繫在一起。⁴⁸

據學者考察，宋學之初也講求「明體達用」之學，這當然也是拜北宋積弱不振所致，⁴⁹即便在二程與朱熹那裡也都曾抨擊佛老「說空說妙」對於「世事」則完全「不曉」之弊。⁵⁰所以知識分子應鼓勵經國濟世之學，這種思想的政治表現當屬王安石的變法，不過，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也使得宋朝儒學的發展迅速地朝向心性之學發展。⁵¹宋學後來發展成強調為聖的心性之學，致使經世致用的傳統精神受到嚴重的排擠。但儒者的淑世傾向並沒有因而消失，一旦有外在條件的刺激，經世致用總是重新成為時代的主題。

明清經世致用之學的興起有幾個條件促成之，據學者研究，它們有：王陽明心學末期之流弊，明末頹廢士風之整飾，東林講學之啟發，復社治學的影響，新興考證學的刺激，劉戡山思想的啟發，以及自然科學發展的衝擊。⁵²

根據梁啟超的觀點，晚明致世之學始自顧炎武（亭林），他說：

⁴⁸ 唐凱麟、張懷承，《成人與成型：儒家倫理道德精神》，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13。

⁴⁹ 蕭永明，〈北宋理學諸子的經世追求〉，載《湖湘論壇》2000年第2期，頁55。

⁵⁰ 沈艷，〈理學經世路線與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頁70。

⁵¹ 章啟輝，《曠世大師—王夫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60。

⁵² 詹海雲，〈清初實學思潮〉，載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清代學術研討會—思想與文學—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出版，1989年，頁13～17。

凡一新學派初立，對於舊學派，非持絕對嚴正的攻擊態度，不足以摧毀故鋒而張新軍；炎武之排斥晚明學風，其鋒芒峻露，大率類是。自茲以後，王學遂衰熄；清代猶有襲理學以為名高者，則皆自託於程朱之徒也；雖曰王學末流極敝，使人心厭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勢；然大聲疾呼以促思潮之轉換，則炎武最有力焉...要之其標『實用主義』以為鵠，務使學問與社會之關係增加密度，此實對晚明之帖括派清談施一大針砭；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於文人，實炎武啟之；最近數十年以經術而影響於政體，亦遠紹炎武之精神。⁵³

而明清經世致用之學影響後世最大者應屬湖湘學派大師王夫之。

王夫之與宋儒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先肯定「形器」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並因而肯定實踐的優位。他說：「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無其器則無其道，人類能言之」（《周易外傳》卷五：25）王氏的觀點非常明白，也就道總是透過器來表現才可能存在，在這個意義下，器才是首要的，而道是依附在器在之下的，所以他說：「古之聖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則謂之道」（《周易外傳》卷五：25）。

然而，王夫之在論述道與器的關係上，有時卻說二者是一體的，如在在《周易內傳》裡是強調道器不相離的觀點，王夫之說：

形而上之道，隱矣，乃必有其形，而後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者，後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謂之形而上而不離乎形。道與器不相離，故卦也、辭也、象也，皆書之所著也，器也；變通以成象辭者，道也。民用器也；鼓舞以興事業者，道也。聖人之意所藏也。合道器而盡上下之理，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周易內傳》卷五：34～35）。

無論是器優先於道，還是道器不離，王夫之無疑強調現實、實踐的重要性，

⁵³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81年，頁18-23。

若沒有器，則道無法得以呈顯。王夫之改造宋明理學之偏重心性之內聖功夫，恢復傳統儒家內聖、外王兼顧之論極為明顯。

另外，也有學者從王夫之的宇宙本體論來說明王夫之內聖外王之說，夫之改造自宋儒的「虛空即氣」的思想，強調不斷運動的「氣」構成了宇宙的實體，並且認為一切的變化都是氣屈伸、聚散之表現而已。學者認為：

船山必將心、性、天、理與氣綰合在一起，可見他相當重視這些概念的存在面意義，亦即道德實踐必須結合人生，展現於繁富萬有的世界中才有意義，而不只是體證內在的靈明即告了事。⁵⁴

也就是說，內聖不止於有個人的修為而已，它必須結合、透過外王的事功推展於世界，才更具意義。王夫之的氣理理論實際上是與道器之說相互呼應的。

除了王夫之的影響之外，當世經世救國的典型莫過於湖湘理學特有的經世致用學說，其中特別是曾國藩與譚嗣同。

事實上，湖湘理學原本像原始儒家那樣就強烈入世性格，一個懷抱入世情懷的人一定在某種程度有想要經緯天下的企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入世者在適當的時機特別是國家民族遭逢災厄時他會挺身而出。這種湖湘理學的特點表露在王夫之身上，也感染了後世知識分子形成特有的士風。⁵⁵

例如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當時便有一批知識分子掘起，像陶澍、魏源、賀長齡、賀熙齡等人，他們也身受明清實學的影響，即顧炎武所謂求實理、重實踐，務實用，敢於面對現實、探求解決現實的學問。

⁵⁶

據學者研究，鴉片戰爭之後這批理學學者有些從政、有些著述，他們「一方面，既在治學時重實證，講實用；另一方面，又在從政實踐中大膽改革，並

⁵⁴ 林聰舜，《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頁157～58。

⁵⁵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試探〉，載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編，《麓山論史萃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6。

⁵⁶ 見王興國、聶榮華主編，《湖湘文化縱橫談》，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13。

取得『治水利、漕運，垂百年之利』的實質性成果」，而賀長齡更在其江蘇布政史任內，主持並聘請魏源編撰《皇朝經世文編》計一百二十卷，三百多萬字，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⁵⁷

曾國藩則屬於第二代理學學人在政治、軍事上有相當成就的人，在他的周圍也形成了另一個群體，他們包括左宗棠、胡林翼等人。

在當時知識分子心目中，曾國藩的重要性，不光是其收拾洪揚動亂，穩定江山之功業，而在於他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⁵⁸所謂「辦事」之人，就是能經國濟世之人，如「諸葛武侯范希文」等人；所謂「傳教」之人，就是能為往聖繼絕學之人，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人，⁵⁹一個人能辦事又能傳教，則近乎完人了，在後人看來，曾國藩便是掌握了「大本大源」的完人。

曾國藩既是能「辦事」又是能「傳教」之完人，便是值得後人仿效學習的楷模。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曾國藩的思想揉合了程朱陸王的義理之學和王夫之的經世致用之學之故。

從整體來看，曾國藩的經世思想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禮治思想，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秉之以禮，對己要求「以禮自治」，對人要求「以禮治人」，這種禮治事實上就是一種德治主義；所以從第一方面的德治主義出發，我們看到曾國藩經世思想的第二方面便是培養實才，提拔賢能，曾氏要求「人須學，學須識」，他善於教誨、甄別、保舉賢能，他考核部屬不僅聽其言，更觀其行，堅持德才兼備，更注重品德，即體現德治主義的「有德者在位」的理想；所謂「有德者」的條件是指其第三方面的經世思想，曾氏堅持生活必須儉樸以養廉，勤勞以盡職，要求部屬為官必須身、眼、手、口、心皆勤。⁶⁰簡言之，曾國藩的德治主義要求聖賢在位，並據以推行禮治於天下。

理學影響後世經世救國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的人物，也是被視為時代典範的人，就是戊戌政變犧牲的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⁵⁷ 歐陽斌，〈曾國藩與同代湖湘學人關係論述〉，載《求索》1998年第4期，頁118。

⁵⁸ 毛澤東，《講堂錄》（1913年10至12月），《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91。

⁵⁹ 同前註。

⁶⁰ 宋偉良，〈談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載《社科縱橫》1995年第1期，頁91。

在清末，譚嗣同猛烈批判傳統綱常對婦女的摧殘，婦女在傳統社會中受到多方的限制與束縛，身心極不自由，如被迫纏足，戕害身體，限制人身之自由，婚姻大事更無自主權，婦女地位更是卑賤；這種嚴重不平等的社會對人性的傷害極大，所以有「中國雖亡而罪猶有餘」之慨。按譚嗣同批判傳統等級綱常十分激烈，他指出：「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因此他主張：「舉凡獨夫民賊所爲一切箝制束縛之名，皆無得而加諸」。⁶¹因此，譚嗣同在批判傳統名教之餘，更融合儒、釋思想積極提倡「仁—通—平等」的新道德觀。⁶²

譚嗣同此等融會佛教平等和儒學仁愛的道德觀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經世思想的鮮明特色，其目的當然就是想要摧毀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等級制度和觀念；⁶³這種講求平等的新道德觀對當時教育者有頗深的啓發，如學者稱：「余習聞儒者之言，頗不甚滿意於佛說，譚瀏陽乃重佛若此，使我意爲之一轉」。

64

最後，關於譚嗣同爲國捐軀的爲國爲民的大義與精神，學者說：

吾觀世之君子，有殺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實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後世。...夫人誰不愛其生，然而甘死者何也！不忍不死也。毒蛇螫手，壯士斷腕，非不愛腕，非去腕不足以全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世為身，而以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⁶⁵

經邦濟世的最高境界就是譚嗣同的「以天下萬世為身」精神。在譚嗣同這個案例上，集中體現了儒家把個人品德的完善和天下命運聯結起來的教育理想，所以學者稱頌他「身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⁶¹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頁325。

⁶² 蕭致治、劉振華，〈評戊戌維新中的譚嗣同〉，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頁106。

⁶³ 陳立忠、胡維革，〈論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佛學經世思想〉，載《東北師範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頁12-13。

⁶⁴ 楊昌濟，《達化齋日記》，頁97、46、79、66。

⁶⁵ 楊昌濟，《楊昌濟文集》，頁74。

肆、台灣儒家教育的反思

綜合以上所論，傳統儒家的教育理想—內聖外王，從教育哲學來看，有其普世的價值，畢竟每一個社會都會要求良善的風俗和習性的養成，而這成了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從這一點上來看，有學者指出傳統儒家思想固然有其現代困境，⁶⁶但我認為，儒家文化中的「智仁雙修」、「義利統一」、「天人合一」，以及培育「仁且智」的理想人格，並透過「經且權」的倫理策略落實在現實社會等思想對於人的現代性的培養，仍具有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其教育理想仍有其當代的價值和意義。⁶⁷

其實台灣教育裡頭是不乏儒家文化的教材的，就以國民中學和高中為例，我記得我當年念國中、高中時，除了國文科之外，還有一堂課叫「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這兩門課裡頭所選的教材幾乎都是儒家經典或其演譯者作品。

有些學者就認為，像台灣這種國語文教育和儒家思想教育對台灣是相當重要的，特別是在道德、情意教育上，它是教育成敗的關鍵，據學者指出：

我們不能不承認，各級學校的國語文教學，向來就扮演著思想啟迪、文化薰陶和人文教育的重要角色，而高中高職尤其如此，於是筆者現在就要誠懇呼籲：中學生的國文教學應更強調儒學的道理以便兼及生命教育的提升。或許有人會質疑此將不免使得學習情境流於枯燥和嚴肅，唯筆者並不以為然。蓋儒學本是性情之教與通識之學，其道理亦多的是生活世界中的磨鍊而能使人感同身受，所以講明儒家道理，其實就是親切地進行著人生的經驗對話和心得分享，在《論語》中孔子不就如此生香活意地示現嗎？再說，歷代頗多博雅君子並不乏寫景抒情之佳作，其中並

⁶⁶ 顧紅亮，〈賀麟的儒家思想現代性話語〉，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3卷第3期。

⁶⁷ 楊莉、王進，〈論儒家思想與人的現代性的培養〉，載《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能寓之以高明悠遠之理趣者，譬如范仲淹〈岳陽樓記〉、蘇轍〈黃州快哉亭記〉等，其鍛字鍊句工夫本為一流，謀篇架構亦屬善巧，但它之所以能夠引動共鳴，卻是個中的人生哲理，例如前者可以興發吾人「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的使命自覺和仁者胸懷，後者則不乏「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的雅意，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凡此都可證明儒學的施授傳承本是道藝兼顧而能生動有餘韻的。⁶⁸

然而，如果台灣的教育當真能像學者所說的那樣「道藝兼顧而能生動有餘韻的」，那麼，現今我們也不會有道德淪喪之嘆了，台灣的儒學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的觀點是，問題不在於台灣的教育內容有無儒家思想，而是受到我們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政策的錯誤引導，讓儒家教育流於形式，這集中表現在升學主義這種社會文化上。⁶⁹台灣升學主義的教育傾向於把教育變成一種「知識教育」，就是把任何學問都當作一種知識，一種考試的知識來傳授與學習。於是乎，關於情意與道德的儒家文化也在這種以考試引導教學的知識教育底下成了背誦的知識、成了一種與生命、生活完全脫節的知識而已。因此，在台灣教育，對一項學問懂不懂，它的判準在於學生會不會，即考試考出來會不會寫。如學者所指出的，在讀書為考試與考試為升學的大前提下，各級學校從教材的準備到教學方法的設計與釐訂，莫不以考試為依歸，凡考試之所及，即教學之所及，從而考試主宰了教學；⁷⁰所以，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他腦海中肯定有一大堆儒家文化的知識庫存，在需要時他隨時可以旁徵博引，但是，這些「知識」與他的生命和生活是完全無關的。

如此，傳統儒家所重視的人格的陶冶與道德的薰習，在當代的教育中完全失去其意義。特別是過去聯考制度下教育重在學習內容的記憶，缺乏知識的活

⁶⁸ 陳德和，〈國文教學與生命教育的銜接——兼為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存廢進一言〉，引自 www.jwsh.tp.edu.tw/pages/jwsh/admin/library/lib-f/950221.htm

⁶⁹ 黃春木，〈戰後台灣社會升學主義之形成與發展〉，〈《建中學報》2004年第十卷。

⁷⁰ 陳健民，〈這不是考不考作文的問〉，引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評論》2002年6月8日，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1/CL-C-091-271.htm

用，且由於一試定終身，這也進一步造成升學主義盛行。所以這樣的學生即使考上了令人稱羨的科系，他也不知為什麼選擇這樣的系所，這種背誦教育令許多人感到憂心，如一些人就說：「台灣的教育過分強調升學主義，偏重記憶的考試，以致於學生缺乏邏輯思考，主動求知的精神，而這些能力卻是做為一名稱職的醫師術所特別必須具備的。這樣的高中教育，讓我們很難想像，在沒有經過面談，就要一位學生莽莽撞撞地進入醫學院，將會造成怎樣的後果」。⁷¹

即便到了現在，這樣升學主義的社會文化所塑造的思維仍舊是大部分人的習性，像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翟本瑞教授就講到當前教育部要把「公民與社會」列為大學指考科目，他就道出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

聽到教育部計畫將「公民與社會」加入大學指考考科，我的頭皮開始發麻，也為女兒和兒子將來要繼續受到荼毒感到憂心。...大學時代對經濟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會思想史最感興趣，並主動研讀許多思想家。有一天找到高中時代的公民課本，著實把我嚇了一跳。書中從重農學派、亞當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到凱恩斯都談，從馬基維利、盧梭、孟德斯鳩、洛克到傑佛遜學說無所不包，從孔德、涂爾幹、馬克斯、韋伯全都交代了。原來我們高中時讀的公民，是將西洋經濟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會思想史全都包括在內，再加上中國思想史合為一體。簡單說來，是將社會科學全部學科合在一起，讓高中生具有全人素養。這是何其龐大的工程，可是，重要的是，為什麼我連一點印象都沒有？讀完就全忘記了？有時在送小孩上學途中，會和他們談些時事、社會現象及國際趨勢，培養他們基本的社會科學素養，即使如此，他們總告訴我，考試時社會科好難，不管小學、初中都一樣，我知道，他們的生命感受還不到那個階段。我回想高中以前的社會科教育，自己也同意這點，社會科學是要有生命體驗和成長歷練才會感受的，憑空讓孩童在考試壓力下學習

⁷¹ 賴其萬，〈孩子，你心裡在想什麼？〉，賴其萬教授輔仁大學醫學院演講，2004年5月13日，引自www.kfsyscc.org

社會科學，只會產生反效果，認為社會科學只是背誦的學科。⁷²

對台灣教育的扭曲，中央研究院的黃俊傑則有更深刻的觀點，他指出，台灣教育的問題在於教育部門—學校本身的異化，他以大學教育為例，作出如下的論證：

首先，他指出，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變遷，教育部門也伴隨著巨大的變化，其中最為根本而關鍵的就是，作為教育的建制化機構的學校發生了「自我異化」的現象。所謂「自我異化」，是指學校通過教育的活動及其過程，而疏離於或對立於學校設立之原始目的，亦即，現代教育違背了教育的本質。由於現代學校常不能免於「自我異化」，所以，現代學校常常淪為教育以外其他的社會、政治、經濟部門的附庸，成為完成教育以外其他部門的目的之工具。

73

其次，在台灣社會中各級學校「自我異化」的現象，就中以大學表現得最為深刻而明顯。黃俊傑在另一篇文章中歸納現代大學的「自我異化」，可區分為三種類型：⁷⁴（1）現代大學常「自我異化」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的百貨公司。在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社會分工日趨細密，大學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潮流中，其性質逐漸從追求真理的知識殿堂，而被扭曲為知識的百貨公司。舉例言之，數年前台灣的殯葬業者曾經在報紙刊登巨幅廣告對教育部施壓，要求教育部指示大學設置殯葬學系，以提供該行業所急需的人才。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在資本主義高度分工的經濟結構中，大學常常會受到經濟部門的壓力，而淪為知識的百貨公司的角色，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各行各業的需求，而生產各行業所需之勞動力。（2）現代大學也常「自我異化」而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生產工廠。所謂「大學成為國家意識型態工廠」，是指在近代世界教育史上左右各派的集權政府，常常透過各種機制要求大學為國家意識型態背書，並且生產國家意識型態的代言人。現代國家要求大學延續並生產國家

⁷² 翟本瑞，〈考公民...他們的生命還感受不到〉，2006年3月22日，引自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29975

⁷³ 黃俊傑，〈傳統儒家教育與現代大學〉，引自www.ntnu.edu.tw/aa/aa5/92.1.2article.doc

⁷⁴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探索：台灣經驗與啟示》，台北，通識教育學會，2002年，頁49-53。

意識型態，主要是通過由國家設立特定系所，或制定共同必修科目而實施。(3)現代大學也常「自我異化」而成爲職業訓練中心。大學所創造的知識常常可以發揮巨大的邊際效益，其中最爲顯著的就是使大學的畢業生獲得求職的基本能力，而在社會的分工體系中很快的找到自我定位，加入生產與再生產的行列，尤其是大學中的各種熱門科系的邊際效用尤爲明顯，於是，流風所及，在許多家長以及大學生的心目中，大學教育就變成職前訓練，而大學也就與職業訓練中心毫無二致。許多大學的領導人常常也以畢業生高就業率而沾沾自喜，使大學淪爲職訓中心，這是大學的「異化」的第三種類型。

最後，依上述，當代學校教育所扮演的乃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角色，學生因而喪失了主體性，成了「會思想的蘆葦」；黃政傑認爲，大學之所以不是知識百貨公司、意識形態生產工廠或職業訓練中心，乃是因爲意識形態生產工廠或職業訓練中心所提供的教育，著重於開發受教育者的某一種特定的面向或能力，以便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的或物質的生產能力。但是大學教育的本質則不是如此，意識形態生產工廠或職業訓練中心的教育並不涉及受教育者主體性的覺醒之問題，但是學校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喚醒受教育者的主體性，使他能夠成爲一個西方諺語所謂的「會思想的蘆葦」。所以，當大學自我定位爲職業中心以後，學校教育實際上已經從最重要的「喚醒主體性」這個教育功能中逸脫而自我「異化」。⁷⁵

伍、小結

其實許多人心中都有這個疑問：二千多年前儒家先師孔子提出他的教育理想固然是好的，但這種古老農業社會時期所提出來的教育理想到底能不能適用當代工業化社會呢？或許用再多的理論與說辭都比不上一點點事實，我們可以來看看在現實社會中，到底能不能把儒家的教育理想落實。

⁷⁵ 黃俊傑，〈傳統儒家教育與現代大學〉，引自 www.ntnu.edu.tw/aa/aa5/92.1.2article.doc

關於這點，最近有人提倡將傳統儒家思想落實到現實生活裡，他就是國際聞名的淨空法師，據報導：

淨空老法師在安徽省廬江縣湯池鎮實驗的和諧示範鎮，以中國儒家傳統的《弟子規》，來教育小鎮上的居民，才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就讓整個小鎮上的風氣完全改善，商店不再掉東西、夫妻父子鄰居不再吵架、計程車司機會把掉的東西送回、當地居民不管是大人小孩，見面都向你九十度鞠躬，讓參觀的人無不感動的掉下眼淚。⁷⁶

在中國大陸推行的成功經驗讓淨空法師信心倍增，在 2009 年，淨空法師還訪問台灣屏東，希望在屏東縣選定一個人口約二、三萬的鄉鎮，要在台灣複製這種充滿儒家理想的和諧示範鎮，法師更親自拜訪屏東縣長曹啓鴻，曹啓鴻感謝淨空法師對屏東縣的肯定，請教育處、民政處、社會處首長與會聽傳統文化教育學會工作人員簡報，並將進一步邀集退休校長、老師等教育工作者和淨空法師帶領的工作人員研商示範鎮的各種細節。⁷⁷

當然一時一地的成功並不代儒家文化真的就能落實在當代社會中，但是淨空法師的經驗至少告訴人們一項事實：作為一種人格教育，儒家文化不是死板的知識，不是課本裡的知識而已，它可以落實在生活中，它應該落實在生活中，它更應該落實在教育生活中。

這令我想到最近給學生讀一篇關於在海軍官校建構道德教育的潛在課程研究的論文，⁷⁸作者在該論文的摘要裡把道德教育的要旨寫得很透徹，他說：

道德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透過教育的力量，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與道德實

⁷⁶ 〈淨空老法師用儒家《弟子規》在安徽廬江湯池推動和諧示範鎮〉，引自 blog.udn.com/bluest1937/3061755

⁷⁷ 中央社訊息，〈淨空法師訪屏東縣長曹啓鴻，要選定屏東一個鄉推動和諧示範城鎮〉，《中央社》2009年5月4日。

⁷⁸ 王順合，〈海軍官校道德教育的潛在課程研究〉，《第一屆德行教育與軍事專業倫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頁97-113。

踐的能力，而這股教育的力量，經常來自於非正式的潛在課程，因為藉由潛移默化的課程方式，最能深遠的影響學生的行為、觀念和思考架構，並建立道德的價值與規範。⁷⁹

沒錯，道德教育應該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潛在課程，而非僅僅是知識的認知，在這潛移默化的過程裡，作為師長的人有著示範效應，所以在前面我說傳統儒家內聖理論中，除了要求從內在的格物誠心正意做起外，最重要的是「學聖人」，也就是學習典範人物的一種運動，學生在師長的人品道德耳濡目染下不知不覺地薰習了為人處事之道；在學校教育場域中，活生生的、在學生眼皮底下的典範人物正是老師，因而，就傳統儒家來說，老師不僅是經師的角色，他最主要、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人師，他的一舉一動，不管是學生看得到、還是看不到，都在影響著學生。

相反的，如果像以往那樣把道德教育僅僅作為認知的對象，甚至作為一個考科要求學生背誦下來，這種做法不只無益於學生的品德增進，更可能導致學習的反感，變成一種反教育，特別是當那些為人師表者行為背離他所教授的道德信念時，更增添道德教育的荒謬與可笑。可悲的是，這卻也是台灣教育的普遍現象。

簡單地說，品德教育乃是一種情意教育、潛在課程，它在意的是學習者的生命的體悟、感動並因而起而效尤，只有當學生能做好自治、自律、自主這些「內聖」的主體性功夫練好之後，才能據此推而「外王」即治理天下大事。在此意義上，儒家道德理想特別有其現代意義，特別針對當代因高度知識分工而養成一些知識專業「經師」卻並不必然是人格道德上的「人師」的教育體制而言，儒家的道德理想似是暮鼓晨鐘。

⁷⁹ 同前註，頁97。

參考文獻

- 中央社訊息（2009）。〈淨空法師訪屏東縣長曹啓鴻，要選定屏東一個鄉推動和諧示範城鎮〉，《中央社》。2009年5月4日。
- 尹蕙（2010）。〈被犧牲的孩子〉。《聯合報》。2010年4月3日。
- 毛澤東（1990）。《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
- 王振輝（2000）。《青年毛澤東救國烏托邦之研究》。台中：自刊行。
- 王順合（2003）。〈海軍官校道德教育的潛在課程研究〉。《第一屆德行教育與軍事專業倫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王勤（1999）。〈以理性面目出現的非理性現象—淺析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非理性特點〉。《江淮論壇》，第1期。
- 王興國、聶榮華主編（1996）。《湖湘文化縱橫談》。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 史炳軍（1997）。〈陽明心學的意義〉。《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3期。
- 史革新（1998）。〈理學與晚清社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
- 任繼愈（1964）。《中國哲學史》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朱熹（1982）。《論語集註》，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 牟宗三（1968）。《心體與性體》。台北：正中書局。
- 牟宗三（1992）。《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牟宗三（2003）。《政道與治道》。台北：聯經出版社。
- 吳培顯、劉長欣（2000）。〈宋明理學對儒學精神的發展及其局限〉。《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3期。
- 宋偉良（1995）。〈談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社科縱橫》，第1期。
- 李日章（1979）。《宋明理學研究》。台北：復文圖書出版社。
- 李建興（2010）。〈儒家品德教育在台灣〉，2010年3月30日。引

自www.npf.org.tw/post/3/7227

李禹階（1995）。〈理學與經學〉。《電慶師範學報哲社版》，第1期。

李紀祥（1992）。《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台北：文津出版社。

李傳印（1997）。〈略論宋明理學家的理想人格設計〉。《江漢論壇》，第8期。

李義凡、唐明勇（1996）。〈延安整風運動與儒家思想〉。《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3期。

杜宇（2010）。〈台灣正在向下沉淪〉，2010年4月13日，引自：
<http://www.nownews.com/2010/04/13/301-2590723.htm>

沈艷（1998）。〈理學經世路線與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

林宜慧（2008）。〈淺談儒家思想對隱私權的影響〉，2008年2月16日，引自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hre.pro.edu.tw/zh.php?m=16&c=344

林聰舜（1990）。《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社論（2009）。〈認識三品教育〉。《聯合報》，2009年8月29日。

祁潤興、李繼勝（1997）。〈論宋明理學和傳統儒學的邏輯終結—現代新儒學思潮的歷史反思與學術批評〉。《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期。

侯外廬等編（1987）。《宋明理學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姜廣輝（1994）。《理學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段玉裁（1963）。《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

范世珍（2001）。〈朱熹和柏拉圖：「理學」和「理念論」思想比較〉。《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唐凱麟、張懷承（1999）。《成人與成聖：儒家倫理道德精神》。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唐輝（1995）。〈二程理學的基本理路〉。《學術論壇》，第5期。

孫景壇（1996）。〈宋明理學非儒家論〉。《南京社會科學》，第4期。

徐洪興（1996）。《思想的轉型—理學發展過程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荒木見悟（1998）。〈心學與理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
- 高建立（2000）。〈簡析宋明理學的發展特點〉。《洛陽大學學報》，第15卷第1期。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編（1989）。《清代學術研討會—思想與文學—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出版。
- 張家成（1994）。〈論陽明心學的人格理想〉。《浙江大學學報》，第8卷第3期。
- 啓良（1996）。〈走出道德理想主義〉。《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第11卷第2期。
- 梁啓超（1981）。《清代學術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
- 淨空法師（2009）。〈淨空老法師用儒家《弟子規》在安徽廬江湯池推動和諧示範鎮〉，引自 log.udn.com/bluest1937/3061755
- 許總（2000）。〈論宋明理學的形成及其歷史必然性〉。《齊魯學刊》，第5期。
- 陳少峰（2001）。《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 陳立（1973）。《白虎通疏證等二種》。台北：鼎文書局。
- 陳立忠、胡維革（1995）。〈論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佛學經世思想〉。《東北師範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
- 陳廷湘（1996）。〈論理學的道德理想主義〉。《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
- 陳廷湘（1999）。《宋代理學家的義利觀》。北京：團結出版社。
- 陳健民（2002）。〈這不是考不考作文的問〉，引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評論》2002年6月8日，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1/CL-C-091-271.htm
- 陳德和，〈國文教學與生命教育的銜接—兼為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存廢進一言〉，引自 www.jwsh.tp.edu.tw/pages/jwsh/admin/library/lib-f/950221.htm
- 章啓輝（2001）。《曠世大師—王夫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編（1988）。《麓山論史萃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社。

馮炳奎主編（1983）。《宋明理學研究論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馮達文（1997）。《宋明新儒學略論》。乳源：廣東人民出版社。

黃俊傑（2002）。《大學通識教育探索：台灣經驗與啓示》。台北：通識教育學會。

黃俊傑，〈傳統儒家教育與現代大學〉，引自 www.ntnu.edu.tw/aa/aa5/92.1.2article.doc

黃春木（2004）。〈戰後台灣社會升學主義之形成與發展〉。《建中學報》，第10卷。

楊昌濟（1983）。《楊昌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楊柱才（2000）。〈陸九淵心學的兩個根本觀念〉。《江西社會科學》，第5期。

楊海文（2000）。〈先秦禮樂文明與孔孟道德理想主義〉。《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3期。

楊莉、王進（2008）。〈論儒家思想與人的現代性的培養〉。《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

楊曉塘主編（1999）。《程朱思想新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訾勇（2001）。〈簡論宋明理學與傳統思維模式〉。《山東電大學報》，第3期。

翟本瑞（2006）。〈考公民...他們的生命還感受不到〉，2006年3月22日，引自 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29975

劉宗賢（1999）。〈試論王陽明心學的聖凡平等觀〉。《哲學研究》，第11期。

劉廣京（1990）。《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歐陽斌（1998）。〈曾國藩與同代湖湘學人關係論述〉。《求索》，第4期。

鄭玄注、孔穎達疏（1970）。《十三經注疏》（下）。台北：文化圖書公司。

鄧克銘（1993）。《宋代理概念之開展》。台北：文津出版社。

蕭永明（2000）。〈北宋理學諸子的經世追求〉。《湖湘論壇》，第2期。

蕭致治、劉振華（1998）。〈評戊戌維新中的譚嗣同〉。《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

- 賴其萬（2004）。〈孩子，你心裡在想什麼？〉，賴其萬教授輔仁大學醫學院演講，2004年5月13日，引自www.kfsyscc.org
- 錢穆（1971）。《朱子新學案》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
- 戴季賢（1979）。《北宋周張二程思想之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
- 謝國榮（2004）。〈如果我們傾聽動物的聲音〉。《中國時報》，2010年4月1日。
- 譚嗣同（1981）。《譚嗣同全集》。台北：中華書局。
- 顧紅亮（2005）。〈賀麟的儒家思想現代性話語〉。《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3卷第3期。
- Ayres, C. E.(1935). "Moral Confusion in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45, No. 2, Jan.
- Davis, J. C.(1981). *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wson, D. (1992) . *Cities of the Gods: Communist Utopias in Greek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 Winthrop Haeger(1972).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Neo-Confucian Syncret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1, No.3, May.
- Levitas,R.(1990). *The Concept of Utopia*. New York & London: Philip Allan.
- Mannheim, K.(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Harvest Books.
- Manuel, F. E.(1966). *Utopias and Utopian Thought*. Boston.
- Nelson, W. ed.(1968).*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Utopia*, N.J.: Prentice-Hall, Inc.
- Santayana, G.(1890). "Lotze's Moral Idealism," *Mind*, Vol. 15, No. 58, April.
- Stites, R.(1989).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研究論文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監督管理制度之問
題與改革^{*}

郭冠甫

靜宜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1 年 6 月 15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1 年 10 月 28 日。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我國憲法將社會安全列為基本國策之一，與國防、外交、國民經濟、教育文化等並列國家最重要的基本政策。國家負有建立社會安全機制的義務，而各項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與社會津貼制度的施行，即為落實上開憲法規範的具體表現。我國基本的社會保險制度，自政府遷台後即開始實施，以職業別區分的各項計畫中，不乏老年給付或養老金的設置，但 2008 起年實施的「國民年金制度」，則是跨越職業別的社會保險措施，企圖補足非就業或自雇人民的基本保障，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邁向全面性與完整性的目標。如此的規畫理論上應可滿足大部份國民退休所需；然因人口迅速老化與經濟發展趨緩的影響，各類退休基金正面臨著許多潛在的經營危機，同時也擔負龐大的潛藏債務，而有必要進行制度面的改變。職故，本文以「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監督管理制度為中心，探討在制度面上所遭遇的困境，並嘗試提出改革之建議。

關鍵詞：公共退休基金、國民年金、國保基金、基金治理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National Pension Fund in Taiwan-Problems and Reforms

Kuan-fu Ku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Social Security along with National Defense, Diplomacy, National Economy, and Education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nation's fundamental policies, and specifically st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social security frameworks; numerous mechanisms relating to social insurance and social aid applied since 1949 are helping the state to fulfill it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Almost all social insurances are occupational related, therefore self-employed, housewives or people without employers are excluded from this system. However, the unfairness has been wiped ou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National Pension system in 2008. Theoretically, the safety net may be strong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in fact the system is facing certain serious problems, and reform is the only option. This article is tend to pinpoint problems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National Pension Fund, and tries to search for solutions which are feasible and workable.

Keywords: Public Pension Fund, National Pension, National Pension Fund, Fund Governance

壹、前言

受惠於應用科學與生產方式的創新，以及醫療技術的突飛猛進，人類在過去的一百年間，造就史上最輝煌的經濟成果，也連帶使得國民生命預期不斷的延長。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雖然代表生活品質的提升，但相對的，高齡福利的保障亦顯得日趨重要。社會福利政策關乎全體國民的基本權利，一個現代國家應如何回應這些需求，實乃為政者必須審慎思考的重大議題。我國憲法將社會安全列為基本國策之一，與國防、外交、國民經濟、教育文化等並列國家最重要的基本政策。憲法第 155 條明文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患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憲法修正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亦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因此國家負有建立社會安全機制的義務，而各項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與社會津貼制度的施行，即為落實上開憲法規範的具體表現。我國基本的社會保險制度，自政府遷台後即開始實施，以職業別區分的各項計畫中，不乏老年給付或養老金的設置，包括採確定給付制的「勞工保險基金」、「舊制勞工退休基金」、「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等，以及屬確定提撥制的「新制勞工退休基金」；2008 起年實施的「國民年金制度」，則是勞動市場就業以外的社會保險措施，企圖補足非就業或自雇人民的基本保障，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邁向全面性與完整性的目標。如此的規畫理論上應可滿足大部份國民退休所需；然因人口迅速老化與經濟發展趨緩的影響，各類退休基金正面臨著許多潛在的經營危機，同時也擔負龐大的潛藏債務，而有必要進行制度面的改變。職故，本文以「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監督管理制度為中心，探討在制度面上所遭遇的困境，並嘗試提出改革之建議。

貳、國民年金現況

我國自 1994 年起便積極研擬開辦國民年金的相關事宜，原訂於 2000 年正式實施，卻因各種經濟、財政甚至意識形態因素的羈絆，「國民年金法」延遲至 2008 年 8 月公布，並於同年 10 月實施¹。設立國民年金的目的是，依國民年金法第 1 條所示，乃在國民因老年、身心殘障、死亡等保險事故發生時，國家給予經濟安全保障的一種社會保險。國民年金的涵蓋面並非擴及所有的中華民國國民，而是針對 2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且未參加軍、公教、勞、農保的國民（以下稱被保險人）及其遺屬所提供的保障²，包括退休勞工、自由業者、攤販、家庭主婦、學生等，在老年、身心障礙甚至死亡後，都可以由其本人或遺屬按月領取年金，並獲得適足的基本經濟生活保障。國民年金係以確定給付制作為年金給付的方式，由政府精算給付係數（1.3%）後，訂出老年年金、身心障礙年金及遺屬年金等的給付計算公式³。至於國民年金的財務處理模式，則是採儲金制，政府為此特別設立所謂的「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簡稱為國保基金），並將之歸類為預算法中所謂的「特種基金」⁴。

依「國民年金法」第 45 條規定，國保基金的來源有六，分別是設立時中央政府一次撥入之款項、保險費收入、中央主管機關依法負擔及中央政府責任準備款項、利息及罰鍰收入、基金孳息及運用之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其中有

¹ 國民年金法第 59 條。

² 國民年金法第 7 條：未滿六十五歲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應參加或已參加相關社會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年滿二十五歲，且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二、本法施行前，除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外，未領取其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三、本法施行後十五年內，其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年資未達十五年，且未領取其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但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實施前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者，不受年資之限制。

³ 依國民年金法第 30 條、34 條及 42 規定目前設定的給付係數為 1.3%，即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每月可領取的國民年金為：月投保金額×1.3%×投保年資。老年年金亦可選擇適用另一公式，即（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0.65%）+3000 元。

⁴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第 2 條。所謂「特種基金」，依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的規定，係指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包括分為營業基金、債務基金、信託基金、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國保基金的設立目的屬於「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利益，依所定條件管理或處分」，故應為「信託基金」的一種。（同條項第 3 目）

關保險費的部分，是由政府與被保險人共同負擔；被保險人的自付比例，原則上是 60%，其餘的 40%由政府負擔，但對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之被保險人，國民年金法則提供不同額度的保險費減免優惠⁵。中央應負擔的部分，包括設立基金時所撥入的款項及保險費負擔部分等，則由供國民年金之用的公益彩券盈餘，以及調增營業稅徵收率 1%（調高營業稅的實施範圍及期間，授權行政院以命令定之）等來源支應；如有不足，亦無法由中央政府責任準備支應時，則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補⁶。

根據政府的相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約在 400 萬人左右，每年可累積的基金約在 650 億元之譜⁷；該基金累積的速度雖不如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每年約 800 億元）迅速，但仍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字，且其攸關全國 1/6 人口的基本保障，故對於基金的管理與監督不可不慎。再者，政府對於國民年金的給付，依「國民年金法」第 49 條的規定，負擔最後支付的責任；換言之，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的年金給付權，政府負最後的保證責任，故倘若基金的管理未受到妥善的規劃，國民年金支付的風險將由全民承擔。因此，應如何有效管理國保基金，實為主管機關內政部⁸無可推諉的重要任務。依現行規劃的制度觀之，內政部雖然名義上負責國保基金的一切事務，但實際上有關基金的管理與監督事務，則分別委由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及新成立的「國民年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專責辦理⁹；此一安排類似勞工保險基金的管理模式¹⁰，而有別於勞工退休基金由單一的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統籌所有監

⁵ 依國民年金法第 12 條規定，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者，免繳保險費；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一倍者，自付 30%；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1.5 倍，未達 2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 倍者，自付 45%。另外，對於被保險人為極重度及重度身心障礙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負擔、中度身心障礙者自付 30%、輕度身心障礙者自付 45%。其餘保險人之自負額為 60%。

⁶ 國民年金法第 47 條。

⁷ 資料摘自勞工保險局，〈98 年度國民年金工作總報告〉，2010 年 4 月，頁 1、2。

⁸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第 2 條規定，國保基金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⁹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第 3 條。

¹⁰ 勞工保險基金管理及運用辦法第 2 條：「勞工保險基金之管理及運用，由勞工保險局辦理，其運用並得委託專業投資機構經營之。本基金之投資運用及前項委託有關事項，由勞保局擬訂，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理與經營運用業務的型態¹¹。

國保基金的運用係採「定量管制」原則辦理。目前政府認可合格之投資標的羅列於「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中，包括：國內外的定存、債券、權益證券、受益憑證、基金、資產證券化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有價證券出借、國家經濟建設貸款等，而其他監理會審議通過，並經內政部核准之金融商品，亦得作為投資的標的¹²。該辦法中亦依投資標的之風險程度，詳盡規定國保基金投資國內外金融商品的總額比例，甚至為風險相對較高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訂定投資準則¹³。

依規定勞保局必須在兼顧安全性、收益性、流動性及公益性的原則下，負責國保基金的管理與運用¹⁴。於每年會計年度開始時，勞保局須向監理會提報國保基金管理與運用計畫，其中應包括國保基金未來一年的財務收支預估，同時亦應參考經濟發展趨勢、金融市場利率走向、產業營運前景等因素，並諮詢專家學者意見後，將其所擬訂的基金投資組合納入計畫。管理運用計畫經監理會審議通過，方可報請內政部核定¹⁵。此外，勞保局為穩健運用其所管理的社會保險基金，設有「勞保局經營基金投資及放款審議小組」，國保基金的運用亦須經該小組審議通過方可為之¹⁶。

至於監理會的職責，除前述審議勞保局所提之基金收支預估及管理運計畫外，尚包括國保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的審議、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監理，以及國民年金財務帳務的檢查及考核、爭議的審議、法規及業務興革之研究建議審議事項，及其他有關國民年金業務監理事項等¹⁷。監理會為中央三級行政機關，隸屬於內政部，採委員制，分別由專家、被保險人代表及政府機關代表等 15 至 17 人組成，由內政部政務次長兼任主任委員¹⁸，委員均為無給職¹⁹。委

¹¹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4 條。

¹²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第 6 條。

¹³ 詳見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第 7-10 條。

¹⁴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與運用作業要點第 2 點。

¹⁵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與運用作業要點第 3 點。

¹⁶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與運用作業要點第 4 點。

¹⁷ 內政部國民年金監理會設置要點第 2 點。

¹⁸ 內政部國民年金監理會設置要點第 3 點。

員會下設業務監理組、財務監理組及爭議審議組等三處業務單位²⁰，並置執行秘書 1 人，由內政部參事無給兼任，負責處理日常事務²¹。

參、國保基金遭遇的潛在問題

一、國保基金的監管機構獨立性不足

社會保險基金設立專門機構的目的，係冀望該機構能發揮專業管理、獨立運作的功能，最重要的是能避免不當的政治干預。所謂不受政治干預或影響，非指完全不受政府社福部門或國會的監督，亦非不理會國會所確立的立法目的或政府的既定政策，也不是拒絕就管理相關問題與國會、政府官員或行政組織進行磋商，而是專門機構依法定權限決定管理政策之際，可排除政府不當的政治介入²²。公共退休基金與一般的民間共同基金不同，其所牽涉的利害關係，並非如私人基金僅單純的存在參與者（委託人）與管理者（受託人）間的權義關係，而是更深一層的攸關社會福利與國家利益等公益議題，因此要完全排除政治干預，絕非易事。事實上許多國家的公共退休基金績效不佳，與政府的不當運用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性；國內股市屢聞四大基金（勞工保險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公教人員退撫恤基金、郵局儲金基金）護盤的說法，儘管各該管單位極力撇清，但輿論對於金融危機時以公共基金救市，或是在大選前拉抬股市行情以營造繁榮假象的作法，撻伐之聲從未間斷。公共退休基金原為人民之私有財產，透過法律擬制的方式強制交由特別設立之公法人管理，而非為國庫所有，因此政府無權干預基金的正常運用，更不得將之用於其他非公共退休基金法定目的之用途。再者，人民將所得的部分繳納公共退休金保費，在退休

¹⁹ 內政部國民年金監理會設置要點第 10 點。

²⁰ 內政部國民年金監理會設置要點第 5 點。

²¹ 內政部國民年金監理會設置要點第 6 點。

²² Issa, Guideline for the Inves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Funds, Issa Technical Report 13, 2004, p.3.

前並無法領回，因此不同意基金遭挪用的被保險人並無法採取任何預護措施，若基金遭政府移為護盤工具，則其權利難以獲致適當的保障。²³所以在制度設計上，應儘量避免給予政府方便介入公共退休基金運作的空間，並積極的建立專門機構的獨立性，俾利確保設立公共退休金計畫之宗旨得以達成，更以之杜悠悠之口。

國外公共退休基金的管理規範中，多會明文規定其監管組織的獨立性，並以此作為維護利害關係人（特別是受益人與繳費者）最佳利益的宣示；例如「加拿大退休計畫投資委員會法」（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Act 以下簡稱為CPPIB Act）的規定，負責監管「加拿大退休投資計畫」（CPP）的委員會獨立於一般的公務體系，以國營企業（federal Crown corporation）的形態存在，具有完全獨立且專業的性質²⁴；但類似的規範並未見於「國民年金法」或「國民年金監理會設置要點」。監理會屬於三級行政機關，並非如「獨立機關」般具有獨立行使職權的能力²⁵，也不若「行政法人」般擁有獨立的人事權與財政權，以及避免行政、立法不當干預的特質²⁶。現制的監理會仍受限於科層組織，而具有行政一體之上下監督關係。基於此強大的隸屬關係，監理會的政策形成均須受到上級機關內政部，以及更上級行政院의 監督，因而並不具備政策決定或政策執行的獨立性，其行政的重點即是以執行上級機關所指定的行政任務為目的。監理會的法定義務為辦理國保基金之審議、監督、考核等任務，參加人依法與監理會成立「法律擬制」之信託關係，監理會對受託人負有信託義務，必須以委託人的利益為唯一的考量，亦即須盡到信託法上所謂的受託人的忠實責任，不得與之有利益衝突或制意義務的違反²⁷。然而在行政一體的組

²³ 林志鴻、鄭清霞、鄭文輝，〈社會保險基金做為構成國家安定基金成員正當性之商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12期，2005年，頁210-211。

²⁴ CPPIB Act Section 3.

²⁵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2款規定：「獨立機關：只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

²⁶ 行政法人之相關討論參見廖欽福，〈財政投融资管理運用組織型態選擇之研究-以勞工退休基金監理委員會為例〉，《財稅研究》，第40卷，第5期，頁139-141，2008。

²⁷ 王琬，〈退休基金管理人責任之研究-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28-29。

織架構下，監理會並無法完全走向獨立性，而須接受上級的指揮監督，因此對監督基金的管理，有時可能必須配合政府的政策，在政治力的干預之下，參加人的權益極有可能遭到犧牲。

獨立性的達成並不能僅靠單一法條的規定，真正的獨立尚須有其他配套制度的相襯，才能賦予其實質上的意義。而監管組織獨立性的體現，最直接明顯的即為管理委員的選任。傳統上公共退休基金係以代表性考量委員席次的分配，故多以三方代表制為其選任的依據。所謂的三方代表委員會（tripartite board）係指公共退休金管理委員會的委員，由利害關係人的代表組成，以彰顯其代表性，通常成員包括被保險人、雇主，及政府（勞、資、政）等，例如南韓的「國民年金基金」（National Pension Fund）管理委員會、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管理委員會，以及印度的「受雇人公積金」（Employee Provident Fund）管理委員會均採此一模式²⁸。國民年金監理會的組成雖與傳統的三方代表制不完全相同，但委員產生的過程與方式，與三方代表制的精神卻十分接近；目前監理會（第二屆）的委員中被保險人與政府代表占 2/3，其餘席次才由專業人士擔任。（見表一）主任委員不經選任，直接指派內政部政次出任；其他政府代表則分配給相關部會正副主管或專門委員。部會代表因其原職位任期的影響勢必發生屢屢更迭的現象，所以是否會以此兼任職務當作公務員生涯中重要的經歷而全力以赴，不無疑問。再者，官派委員的本質學養能否承擔監督管理國保基金的重責大任，在詭譎多變的財經環境中為基金求取最大的報酬，或是僅能針對與其業務相關的技術性問題提出意見，對基金發展的願景難有貢獻，頗令人好奇。²⁹而政府官員出任公共退休基金監督或管理委員，因仍存在公務員上下層級間之倫理觀念及同層級相互尊重的特性，

²⁸ *Supra* note 22, at p.3.

²⁹ 以「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第 36 次會議紀錄」為例，該次會議報告事項 5 案，均為執行或業務報告，討論事項一案，雖是針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收支、管理與運用情形進行討論，但討論主軸卻集中在增加該會人力資源部分，有關基金運用僅專家委員提出應增加自營部分。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第 36 次會議紀錄，國民年金監理會網站，2011 年 9 月 30 日，[http://www.moi.gov.tw/files/download8_file/1000930_第 36 次會議紀錄_經委員確認發言摘要_%20_2_.pdf](http://www.moi.gov.tw/files/download8_file/1000930_第36次會議紀錄_經委員確認發言摘要_%20_2_.pdf)。（最後造訪日 10/19/2011）

如此亦可能影響其職權之行使。另外被保險人的代表有四人，分別代表老人團體、婦女團體及殘障團體。然該類團體為數眾多，主管機關內政部如何在其中選任特定的機構及人選，資訊似乎不夠透明，一般的參加人無法探知選任的程序與標準，而容易對內政部的作業欠缺信心，進而產生獲選者是否傾向保障政府利益，而非參加人利益之疑慮。

表一：國民年金監理會第 2 屆監理委員名冊

（任期自 99 年 10 月 1 日至 101 年 9 月 30 日）

姓名	委員代表屬性	現職
簡太郎	主任委員	內政部政務次長
陳素春	政府代表	內政部社會司副司長
石發基	政府代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處處長
王美蘋	政府代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處長
潘清鴻	政府代表	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編審
鄭文惠	政府代表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專門委員
林玲如	被保險人代表	中華民國老人福祉協會理事
吳玉琴	被保險人代表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秘書長
范國勇	被保險人代表	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
楊憲忠	被保險人代表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理事長
王儷玲	學者專家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副院長
郝充仁	學者專家	淡江大學保險系副教授
林盈課	學者專家	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詹火生	學者專家	財團法人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兼任教授
江朝國	學者專家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資料來源：國民年金監理會網站

以三方代表的方式形塑監理會的成員結構，儘管在代表性方面具實質的意義，但基金管理與監督首重專業，三方代表制在此方面仍嫌不足，故三方代表型態可能陷入代表性有餘，但專業性不足的困境。公共退休基金多非由專業人士負責管理，反觀私人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的委員，皆由極富基金管理經驗之投資或理財專家出任。這也許是公共退休基金的經營績效遠遠落後私人退休基金的原因。再者，三方代表的產生雖是委由各利害關係人團體遴選產生，但主要還是由政府官員擔任中堅的角色，所以基金的管理重心仍可能向政府政策偏移，而非專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利益設想。如此將有違公共退休基金設立的初衷。

二、監管機構委員的專業性尚待提升

監理會的組成分子中，約有 1/3 的委員是以專業委員的身分進入監理會，理論上應能彌補三方代表制的不足；但以現任委員的名單觀之，專業委員雖均為保險、財金、社工及法律的著名教授，專業學識涵養無庸置疑，但畢竟屬於學界人士，並非基金管理與投資的專業人員，對於基金的長程目標的整體規劃或可提供卓見，但對短期資產配置的敏銳度，可能稍嫌不足。目前監理會的層級太低，僅能依政府政策對勞保局所受委託的國民年金保險業務加以監督考核審議，類似外部監督機制，因此現制下專家人數占全體委員數約僅 3 成，專業管理意見亦僅能在預設框架下發揮有限的影響力；然而專業意見理應是國保基金管理上最重要的資源，如此的委員配置是否真能滿足參加人所期待的妥善管理與監督國保基金，有待進一步觀察。為提升公共退休基金的績效，監督管理委員以有經驗的專業人員，具備金融市場、風險管理及精算等專業能力者出任為佳；委員應對公共退休基金的給付義務及設立目的充分了解，認知並避免本身可能發生的利害衝突；其主要的任務在於戮力追求計畫受益人的最大利益，

以及確實遵守行為規範及忠實義務（Fiduciary Responsibilities）³⁰。如此方能為基金謀得最大的利益。

目前國保基金之收支、管理、運用等工作乃由勞工保險局（以下稱勞保局）負責，勞保局隸屬於勞委會，依「勞工保險局組織條例」觀之，現行勞保局的性質屬於類似國營事業的事業機關，其主要業務似乎圍繞著社會保險的一般性業務，並非專注於基金的經營管理。而在國保基金的實際運用上，約 1/2 的基金投資在固定收益的金融商品，約 4 成基金全權委託國內代操機構代為投資，自行操作權益證券的部分僅占 2.64%³¹；此一現況在相當程度上也說明了勞保局本身的任務，並不以積極運用國保基金為主。未來勞保局運用國保基金的任務可能歸於即將設立的「國民年金局」，但其性質與功能應與勞保局相當類似，其作為也不至於有太大的變化。國民年金局將設在行政院組織改造後之「衛生福利部」之下，新設的國民年金局並非全新機構，在人事不增的情形下，事實上是將勞保局一分為二，國民年金局自勞保局中分割獨立。計畫中國民年金局將來可能擔負其他社會保險業務，故非專為國保基金而設。因此在實質面上，國民年金局的設立，與現行勞保局管理的現狀，差別十分有限³²。此一現狀對國保基金的成長產生一定的阻力，有必要進行更深思熟慮的組織改造計畫。

三、監理會委員之義務未明確規範

監理會委員在現制下所負的責任有限，導因於其所能發揮的功能亦相對有限。日常業務的管理多由主任委員負責，其他委員均為領取車馬費之無給職職務，但主任委員也是由部會首長兼任；基金操作績效的良莠對委員並無實質

³⁰ Gregorio Impavido, O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Pension Fund Managemen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878, Aug., 2002, pp. 13-15.

³¹ 依據國保基金民國 100 年 3 月份的投資運用表中顯示，定期存款及債券部位占基金的 46.7%，委外經營占 39.6%。詳見勞保局，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投資運用表，100 年 3 月，<http://www.bli.gov.tw/sub.aspx?a=HoL%2bhH%2fYjHw%3d>。（最後造訪日 6/7/2011）

³² 陳洛薇、李光儀、李承宇，〈研考會：合署辦公 不必跑遠〉，《聯合報》，2010 年 8 月 9 日。

的影響，也無任何激勵的機制。但為追求國保基金的永續經營，未來如果將現制的監理會加以擴編，則委員所應負的責任將遠超過目前的範圍，故其所應負的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應較現況為高。「國民年金監理會組織要點」並未規範監理會委員所應負的投資忠實義務，而信託法第 22 條³³所規定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實質內涵未臻明確，欠缺完整之操作標準，勢必難以因應現今複雜多樣化的投資工具。關於受託人投資處分信託財產的注意義務內涵，美國法也歷經多次演變，發展成為「謹慎投資人原則」；其對於忠誠義務內涵之詮釋也朝向精緻類型化。然而有關投資忠實義務之一般規定，在我國信託法上卻付之闕如。

謹慎投資人原則規範設立之目的，在為受託投資之人確立投資行為的客觀標準，引導受託人重視報酬率的提升，而非僅是專注資金的維持。換言之，受託人的責任應是運用各種積極的投資作為，為基金收益創造長期穩定的成長，而非僅是消極的投資在風險及收益極低的投資工具之上。因此，投資受託人基本上應具備受託投資他人財產之經驗、才智，以及誠信，進行投資行為時必須認真考量投資標的之管理、信譽、穩定度，以及該金融商品的特性，在盡到專家之注意義務（非注意程度較低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下判斷投資行為的風險程度，如此才能符合謹慎投資人之標準。目前監理會委員之忠實義務規範實有模糊之處，有待進一步的釐清；更甚者，法規中並未賦予利害關係人，特別是國保基金的受益人與繳費者，任何請求損害賠償的基礎，如此可能造成監理委員有權無責的不合理現象。事實上，利害關係人若有權對未能善盡投資忠實義務的委員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應是對委員會最有利的監督方式；此舉不但可保障受害者合法利益的返還，同時亦可對其他委員產生警惕的作用，不失為內外部監督機制外，又一防堵弊端的利器³⁴。國外先進國家的立法例多已將此類規範納入，我國政府如有計畫提高監理會的層級，使之肩負更大的投資義務時，則有必要參考國外經驗，訂定更為詳盡且完善的準則，俾令監理會委

³³ 信託法第 22 條：「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

³⁴ 陳俊仁，〈論我國勞工退休金條例忠實義務規範之缺失〉，《台灣勞動法學會學報》第 5 期，2006 年，頁 30-31。

員的義務更臻明確。

四、投資績效欠佳資產配置妥適性不足

國保基金之管理運用重點，在於同時兼顧收益性與安全性，如何取得此二項原則的平衡點，有賴短期資產配置的妥適性與長期投資目標的前瞻性相互配合，使基金運用效益發揮至極致。在不悖國民年金設立目的之原則下，國保基金應邀集專家學者共同討論長期投資目標的設定，在考量基金規模以及可容忍的投資風險範圍內，訂定年度目標報酬率的準則，並以此規劃適當的資產配置。有關投資金融商品的比例以及合格投資標的之訂定規則應儘量放寬，朝向「謹慎投資人」的原則發展，不以法律的規範加以限制，而是由監理會委員依其專業判斷，以其所認定的最佳組合擬定基金的資產配置，以期增加基金運用的彈性，有效因應瞬息萬變之資本市場的波動。

現階段之國保基金資產配置多集中在國內投資，占基金總金額的 9 成，海外投資所占比例極低，且幾乎全為債權證券的投資³⁵，以國內資本市場規模與波動性衡量，其風險似乎過於集中。國內投資工具暴露在本國特有的經濟衝擊中，任何分散風險的措施必定徒勞無功，而各國的景氣循環以及可能引發金融危機的因子不同，因此如果將部分的資金投入外國市場，則可有效規避非系統性（非全球性）的市場風險。再以獲利的考量論之，國內經濟成長已近成熟，GDP 成長速度明顯趨緩，經濟狀況亦面臨低利率投資環境，致使退休基金無法在國內資本市場期待亮麗的獲利；相反的，新興市場（Emerging Markets）因處於積極發展的階段，金融市場的表現時常吸引外來投資者的目光。國保基金應考慮增加海外投資的部位，藉由全球化布局，有效達到分散風險及強化獲利能力的效果。

目前國保基金是以定期存款與權益證券投資為主，比例約為 1：1，各占

³⁵ 國民年金 100 年 3 月份投資運用表中顯示，國外投資項目在約當現金的部分占基金規模的 0.01%，債券證券占 10.09%，計共占基金金額的 10.10%。見前揭註 29。

基金金額的四成左右，權益證券的比例已具相當的規模，但與國外經營績效卓著的大型公共退休基金相比，似乎仍有成長的空間。國外公共退休基金如加拿大的CPP（Canadian Pension Plan，加拿大退休金計畫）、美國的CalPERS（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以及紐西蘭的NZSF（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Fund，紐西蘭老年退休基金），除以優越的基金治理、社會責任投資及股東行動主義著稱外，其資產配置的妥適性也是造就其高成長的重要因素。2010年CPP投資股票等權益證券的投資約為55%（其中65%投資在海外市場），固定收益資產占三成，其他為不動產或國內外公共建設等隨通貨膨脹波動（inflation-sensitive）之投資工具；該年的報酬率為14.9%³⁶。CalPERS也將投資的中心放在全球布局的權益證券之上，依據2011年2月份的統計，CalPERS投資在此金融商品的比例為63%，而固定收益投資工具的部位僅有兩成³⁷，2010投資報酬率的表現為13.3%。而在紐西蘭方面，根據今（2011）年3月的統計數字，NZSF投資在權益證券的比例約為68%，其中以海外投資為大宗，約占基金總額的61.2%，固定收益資產僅占11.4%，而2009/2010的年度投資報酬率高達15.45%，預估2010/2011報酬率將突破20%，達到23.04%³⁸。由此觀之，投資組合中權益證券的比例似乎以超過6成為佳，而固定收益資產的比例最好控制在2至3成，而其他的部分則可彈性運用在風險較高或與通膨連結的投資工具上，利用多元投資調整基金風險與收益的平衡。而權益證券的投資也不應集中在國內市場，而應積極朝向海外投資發展，藉以免除風險過度集中的疑慮，並搭上新興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的列車，利用其資本市場爆發性崛起的契機，為國保基金累積可觀的獲利。

³⁶ 數據來源參見CPPIB, 2010 Annual Report, p.10, available at http://www.cpplib.ca/files/PDF/CPPIB_AR_2010_EN_Online.pdf. (最後造訪日 6/7/2011)

³⁷ 數據來源參見CalPERS, Asset Alloc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calpers.ca.gov/index.jsp?bc=/investments/assets/assetallocation.xml>. (最後造訪日 6/7/2011)

³⁸ 數據來源參見NZSF, Performance and Portfolio Update to 31 March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zsuperfund.co.nz/files/Fund_performance_to_31_March_2011.pdf. (latest visit 6/7/2011)

肆、改革建議

一、組織變更朝向獨立性與專業性發展

爲使監理會具高度的獨立性與專業性，筆者建議可考慮將監理會朝向行政法人化的方向變革。獨立行政法人的特色在於將原屬行政官僚體制層級節制之監督與指揮樣態，轉換爲類似民間企業經營管理之模式。將部分原本應由行政機關負責的公共事務自政府部門移出，改由獨立的行政法人處理，如此不但能夠達到精簡政府組織之目的，更重要的是，透過企業經營精神的引入，使此業務之運作更符合專業，也更講求效率³⁹。此外，行政法人通常擁有獨立的人事權，不受公務體系人才選任的限制，不具公務員身分者亦可服務於行政法人，因此選才與人員賞罰的標準不再僵化的必須依照公務員進用、任免、陞遷及薪給等規定辦理，而是重視績效管理，設立績效目標，依施政成果決定升遷或獎懲，並以組織的實際需要彈性調整人事規模⁴⁰。再加以財政及預算上的獨立，行政法人能擁有更多的彈性，改善政府行政效率低落的弊病，也較具能回應人民之真正的需求。因此許多國家在專業、效率及避免政治操弄的考量下，獨立的行政法人組織便成爲管理公共退休基金的首選。

依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爲執行特定公共任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前項特定公共任務須符合下列規定：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依此原則檢視監理會性質，監理會之專業需求性高，且其任務在於確保國民年金之財務健全，有能力負擔其

³⁹ 賴森本，許哲源，〈行政法人監督機制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116 期，2005 年 1 月，頁 79。

⁴⁰ 黃錦堂，〈行政法人建制之基本方向〉，發表於《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法人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主辦，2005。

法定的支付義務；若由政府主導則國民年金易遭濫用，但如完全由民間管理，其安全性亦同等堪憂；國保基金的收支、管理、運用、監督等任務，民間金融機構亦有能力承擔，其所涉公權力的程度相對較低。是故監理會理應符合行政法人的設立原則。勞保局或國民年金局可規劃成單純的業務單位，僅負責辦理類似收支、保管、滯納金加徵、行政處分及強制執行等一般性管理業務，至於基金的投資與運用則由監理會負責。監理會遵行治理原則監管國保基金的運作，具備內部的管理業務部門或附屬投資委員會，以監理會所訂定之原則及所規劃的長短程目標執行其職務；意即將所有有關國保基金的管理與監督事項，由單一的機關全權負責，避免監管分立可能發生的衝突與摩擦。監理會對內部業務單位或附屬委員會負有監督稽核的義務，而監理會本身亦應受到中央主管機關及立法院的外部監督。主管機關應聘請獨立的稽核及精算機構⁴¹，定期對監理會職務的執行提出報告，以建立有效的外部監督機制。然外部監督以事後、成果導向監督為佳，儘量減少事前監督以尊重專業的決定。

此外，目前監理會各業務單位的人員均須擁有公務人員進用資格，且受憲法與法律的保障，除有重大執行職務上的瑕疵，不得任意去職，而每年的考績多不至於被列為丙等以下，自然欠缺動機追求績效⁴²。監理會如能以行政法人的組織形態存在，以健全的公共退休基金治理制度為基礎，在財務自主之下，可自訂員工薪資，不受公務員任用規定限制，此對人員徵聘的來源可有效的擴大，有利網羅優秀人才，無需侷限於以公務員作為唯一的選擇。如此將可突破公務機關缺乏誘因羅制優秀專業人才的困境，更可以優渥的人員待遇及獎金制度，或是比照民間金融人員薪資及福利，防止人才的流失。若由精簡人事的面向切入，如果民間優秀人才能夠反向回流到政府機關，基於其在民間機構養成之效率管理能力，應可有效提升基金運作的績效，政府自然無須聘雇大批生產力較弱的員工，可精簡組織與人員，進而樽節政府的支出，使其更具競爭

⁴¹ 有關精算部分，現行法已有規範，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財務，保險人應至少每二年精算一次，每次精算四十年。前項保險財務，由中央主管機關聘請精算師、保險財務專家、經濟學者、社會學者及有關機關代表十五人至二十一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之。」

⁴² 前揭註 25，頁 138。

力。

至於監理會委員的選任方面，筆者傾向以「加拿大退休金計畫投資委員會」（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以下簡稱為CPPIB）的委員遴聘模式作為藍本。依據「加拿大退休計畫投資委員會法」（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Act）的規定，CPPIB 12 名委員的產生捨棄傳統的三方代表制，而是基於專業的考量。加拿大政府並非直接由利害關係團體中遴選，而是採二階程序辦理委員的選任；首先政府必須成立所謂的提名委員會（nominating committee）進行基金管理委員的提名作業（一階），提名委員會係由聯邦政府與各省政府組成，其成員包括各省政府的官方代表一名，以及私人企業的代表。提名委員會的主席由私人企業代表出任，並經聯邦政府正式任命。至於CPPIB委員候選人的資格，依法必須具有財務金融的專業背景，或相關的工作經驗，且其能力足堪完成基金之目的，此乃積極資格之規定。在消極資格的限制上，不得擔任委員的情形除未成年（未滿 18 歲）、精神障礙、破產、非自然人以及非加拿大居民等基本限制外，行政、立法機關代表或外國政府代表也在排除之列。由此積極與消極資格的規定中不難看出CPPIB將專業經營管理列為第一要務，且在定位上極力擺脫政府的干預⁴³。提名名單完成後旋即提交聯邦財務部長，由其在諮詢各省財政部長後自名單中挑選適當人員進行任命（二階）。委員的任期為三年，並得連任二次，因此最長任期為九年⁴⁴。CPPIB可解任委員，惟依CPPIB Act的規定，必須提出正當理由⁴⁵。由於CPPIB並非行政機關，所以委員的解任相對於公務員而言，應有較大的彈性；因此如果委員的表現無法使基金達到既定的目標，或是不當的決策造成基金的收益不如預期時，委員將遭到撤換。此與民間企業的經營模式十分類似。

筆者建議，政府各社福相關部會及社會團體以利害關係人的身分組成提名及遴選委員會，候選人以具基金管理或金融事業從業經驗之專家為主，另輔

⁴³ Section 10 (4)(9), CPPIB Act available at http://www.lois.justice.gc.ca/eng/C-8.3/page-4.html#anchorbo-ga:s_7. (latest visit 6/7/2011)

⁴⁴ See CPPIB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www.cppib.ca/About_Us/. (latest visit 6/7/2011)

⁴⁵ Section 10 (6), CPPIB Act, available at http://www.lois.justice.gc.ca/eng/C-8.3/page-4.html#anchorbo-ga:s_7. (latest visit 6/7/2011)

以具備財經法律背景之實務界人士，以及專精會計、統計或精算之會計師或精算師等。換言之，監理會的委員應以其專業性作為聘任的指標，利害關係人之代表性應表現在遴選權的行使，否則空有代表性卻無法就專業的角度訂定政策及監督績效的表現，最後可能只是淪為橡皮圖章，徒具形式意義而缺乏實質意義，對國保基金的受益人及參加人而言，絕非最佳的安排。為達到基金成長的最大化，國保基金的運籌者須具備高度的金融專業性，亦即投資判斷能力及風險控管能力，因此必須由具有長期經營與投資共同基金之經驗者出任為佳，否則僅能定訂出所謂的績效目標，卻無法根據現實資本市場的變化進行有效的調整。

二、立法強化監理委員忠實義務

監理會如能變更組織，擴大其權限與堅持其獨立及專業性，此時對委員忠實義務的規範便需要進行積極的調整。筆者建議行政與立法機關似可參照其他先進國家的立法例，修正目前過於簡化的條文。有關此部分，建議參考美國ERISA(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 受雇人退休所得保障法)的規範，確實定位受託人的義務。ERISA對負有忠實義務之受託人定義為：(1) 對基金管理有裁量權或控制權或對資產有控制權者 (2) 對資金資產提供投資建議而直接間接受有報酬者 (3) 在資金行政上有任何裁量或控制權者⁴⁶。受託人必須以利害關係人的利益為唯一之考量（忠誠義務）⁴⁷；必須使用注意、技能、謹慎與勤勉善盡其義務，其行為需與在當時一個處於類似地位、熟識該項事務之謹慎的人，從事性質與目的相類似事業時相同（謹慎義務）⁴⁸；必須分散投資以求降低造成重大損失之風險，除非依當時狀況以不分散為符合

⁴⁶ ERISA Section 404-12.

⁴⁷ ERISA 404(a)(1)(A).

⁴⁸ ERISA 404(a)(1)(B).

謹慎義務（分散義務）⁴⁹；也必須遵守計畫文件之規定⁵⁰。為防止受託人或其他管理基金者利用職務之便營私，ERISA亦規範類似避免利益衝突的條款。ERISA第 406 條禁止基金計畫與其利害關係人（包括受託人、服務提供者、受雇人組織、關係人之親屬，以及直接或間接持有雇主公司投票權五成者等）從事特定交易，但若法律或行政上有豁免規定者，則不在此限⁵¹。第 406 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不得從事計畫與利害關係人間有關財產之買賣、互易或租賃、資金之貸放或信用授與、產品、服務或設備之提供，以及資產之移轉或使用等。同條第二項禁止受託人為私利而與其所執行的計畫從事資產交易，或是代理與計畫利益衝突之人和計畫交易。受託人亦不得由他人與計畫之交易中收取回扣⁵²。

此外，ERISA賦予勞工、遺屬或其指定請領人賠償請求權，得對違反忠實義務之受託人請求損害賠償及利益的返還⁵³。法院在認定受託人是否違反法定義務時，係以被告是否已盡謹慎投資人義務為歸責的標準。亦即受託人作出投資決定之前，是否審慎考量所有可能影響投資成效的因素，並採用適當的方式調查、評估與建構投資組合。受託人尚須與其他處於相同地位與熟知相同事務之人行使同一注意義務，且其投資決定必須是獨立判斷下之產物⁵⁴。換言之，裁量的標準是以整體投資組合為觀察基礎，同時審查受託人之決策過程的合理性，以確定受託人是否達到「謹慎投資人」的標準。由此觀之，「謹慎投資人」原則所重視的是受託人的行為而非投資工具的實際表現，受託人是否盡其最大努力為受益人牟取利益，乃是決定受託人符合「謹慎投資人」原則與否的重要關鍵。是故，評斷受託人的成敗並非根據其投資決策是否成功，而是檢驗其決策過程是否依循合理的程序。受託人如果已經展現妥善管理風險的能力，即便其投資標的之潛在風險極高，亦不可因而斷定受託人未盡忠實義務。

⁴⁹ ERISA 404(a)(1)(C).

⁵⁰ ERISA 404(a)(1)(D).

⁵¹ 余雪明，《比較退休基金法》，元照出版社，2001 年，頁 109。

⁵² 同上。

⁵³ ERISA 409(a)

⁵⁴ 29 US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2550.404a-1.

事實上，沒有一項投資工具是完全不具風險的，所以絕對安全的金融商品是不存在的；只要確定受託人所運用的投資技巧與決策過程是謹慎的，則其所投資的項目不論是非傳統的新興工具，甚或是市場上評價風險極高者（如衍生性金融商品），該投資行為可視為符合「謹慎投資人原則」；反之，倘若受託人的行為違反合理程序時，即使投資極端保守與傳統之標的，亦不符合標準⁵⁵。

除法律所規定的義務之外，監理會亦應自訂行為規範（Code of Conduct），也就是內部的自律守則，以便向管理監督國保基金的相關人員說明善盡其義務的程序與作法。行為規範的訂定應以瞭解義務內容與實踐方法、避免利益衝突、恪遵保密義務等為規範的重點，並告知違反規範時所將面臨的處罰規定。有義務的付出及責任的負擔，自應有相對之權利與利益的取得，因此現制監理會委員為無給職的規定，有必要加以修正。監理會若能走向獨立，改制為行政法人，財政部份即可鬆綁，不再受到公務人員待遇法令的約制，因而可從經營績效中給予國保基金監管人員實質的鼓勵，將超出年度目標報酬率以上的獲利取出部分作為獎勵有功人員之用。當然在法源上應修正相關規定，並訂定獎勵辦法因應之。

三、投資準則應納入股東行主義及企業社會責任

除在資產配置上追求最妥適的安排外，國保基金的投資亦應體認「股東行動主義」（shareholder activism）的重要性。優質的公司治理是現代企業得以追求企業價值極大化的重要磐石，公司的經營者在完善且嚴謹的監督機制下，專注經營的改善及提高經營的成果，以提升公司的價值、厚植公司永續經營，建立長期發展的基礎，進而達到公司治理的最終目的⁵⁶。然而公司規模日益膨脹，股東人數眾多，意見紛雜，且大股東或公司派掌握高額持股以控制公司決

⁵⁵ Bevis Longstreth, *Modern Investment Management Theory and the Prudent Man Rule*, p. 7 (1986).

⁵⁶ 柯承恩，〈我國公司監理體系之問題與改進建議（上）〉，《會計研究季刊》第 173 期，2000 年 3 月，頁 75。

策與經營，小股東除在股東會抒發己見外，對公司的經營事務遍尋不著置喙的餘地。於是在對經營成果失望之際，小股東僅能消極的採取「用腳投票」(vote with feet)即所謂的「華爾街準則」(Wall Street Rule)，以出脫手中持股作為其管理資產的方式。但對於機構投資人而言(institutional investors)，斷然的出脫持股轉向其他公司投資，並非最佳的選擇，因機構投資人持股通常較高，全數賣出持股非但不易，也會使該公司股票迅速下滑，對機構投資人不見得有利；而頻繁的短線交易未必較追求長期投資績效為佳。再者，當一個基本面良好的公司因董事會監控失效而造成營運績效下滑時，適當的介入公司治理，也就是「用手投票」(voting by hand)，踐行「股東行動主義」，應可藉此提升公司經營績效，進而增進股東投資價值，營造機構投資人與被投資公司雙贏的局面⁵⁷。至於檢測公司治理法規與管制的參考架構，最廣泛使用者，莫過於OECD所公布的「OECD公司治理原則」(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其中揭櫫六項種重要原則，分別是：(1) 建置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架構；(2) 協助及保護股東權利的行使；(3) 貫徹股東平等原則；(4) 尊重依法或經協議所創設之利害關係人的權益；(5) 揭露及透明化公司財務狀況、績效、股權與治理等重大事件，以及(6) 確認董事會的職責等⁵⁸。公共退休基金的管理機構如能以此六項作為選擇被投資公司之基本方針，至少可確保投資組合中的標的不悖公司治理的原則。

因此，國保基金應對持股占已發行股份達相當比例以上之國內公司，在發生重大涉及勞工權益、環境保護與公司治理案件時，有效運用其大股東的影響力，利用與董事會的對話或參加股東會、表決權的行使等方式，促使被投資公司進行符合公司治理原則的改革。相較於國外公共退休基金對於推動被投資公司完善公司治理之努力與關注，國內退休基金在在此議題的著力顯然較為消極被動。惟公共退休基金性質上屬於中長期投資者，且為社會福利機制的一環，應可導引其在推動公司治理上發揮力量。國保基金進行股東行動主義在策

⁵⁷ 陳茵琦，〈機構投資人與公司治理〉，《證券櫃檯月刊》第111期，2005年，頁62。

⁵⁸ OECD,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 p. 20-25,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32/18/31557724.pdf>. (latest visit 6/7/2011)

略上應發布其公司治理政策及投票指引，並使利害關係人瞭解公司治理指標係基金選股之重要參考指標，同時也應重視內部之教育訓練，指導退休基金相關人員持續關注公司治理。

至於作法上，可由下列幾種方式進行；首先，監理會如發現被投資公司的某些作為似有影響股東重要權益或甚至涉及違法情事時，應立即發函該公司或其監察人要求提出說明，揭露相關資訊，監理會亦應透過各種管道主動蒐集相關資訊，以確定該公司的經營是否已傷及基金的利益。如查證屬實，監理會應即通報檢調單位及金管會、證期局等單位處理。再者，國保基金亦應積極參與股東會，針對社會矚目且有重大影響股東權益事件之被投資公司行使股東權，並對議事內容或涉有爭議之事項提出書面及口頭質詢；如有必要，也需依公司法賦予股東的權利，適時制止公司繼續執行危害行為；對於股東會違法的決議，國保基金的代表可依公司法向法院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程序違法）⁵⁹，或提起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之訴（內容違法）⁶⁰。而在董監事選任方面，國保基金基於保障利害關係人權益的考量，防止公司遭到少數董事的把持，應適時參與公司之董監選舉，或是向股東會推薦有利公司發展之外部董事人選；對董監事任期屆滿未改選之公司，國保基金應促請主管機關限期令其改選，並依公司法的規定聲請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⁶¹。國保基金亦可號召其他股東行使股東權利，例如依公司法的規定，對董事違反競業禁止之所得行使歸入權⁶²，甚或是對公司損害股東權益之事件提起團體訴訟。

此外，國保基金的投資亦應重視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因素，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RS）納入投資股票之選股原則，

⁵⁹ 公司法第 189 條：「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

⁶⁰ 公司法第 191 條：「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

⁶¹ 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

⁶² 公司法第 209 條：「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董事違反第一項之規定，為自己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但自所得產生後逾一年者，不在此限。」

以合乎當前世界的主流價值。現代社會期待企業經營者除有為企業創造利潤的經濟責任外，在倫理責任（力求公平正義及避免傷害之責任）及慈善責任（貢獻社區服務及改善生活品質之責任），亦即企業社會責任（CSR）上應有更深著力之處⁶³。企業的責任除在追求股東之最大利益外，亦應負有相當程度的社會責任，企業非僅對股東負責，亦對利害關係人負責；也

就是企業的經營，應對整體社會可持續發展作出相當的努力。國保基金的投資應兼顧收益性、安全性及公益性等目的，因此在選擇被投資公司時，不僅需以獲利能力與公司治理作為評審的依據，也應同時觀察被投資公司積極主動擔負CRS的情形，並將之納入投資決策的考量。國保基金須以跨國性的責任投資與環保組織所樹立的原則為基礎，擬定「國保基金社會責任投資準則」，以國際認同的標準充作檢視的依據進行基金的投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金融業與永續發展專案（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s Finance Initiative, 簡稱UNEP FI）負責起草，於2006年公布的「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簡稱為PRI），即為國際間相當推崇的社會責任投資標準。PRI在其前言中強調機構投資人雖應善盡其忠實義務，追求信託人長期最大利益，但由於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ESG）等議題對投資組合績效表現會產生相當的影響，故需將社會目標與投資行為結合，意即機構投資人的信託責任應包含社會責任。因此PRI所揭示的原則即圍繞著ESG的相關議題。PRI共有6大項原則及35項行動，主要原則建議機構投資人：(1) 應將ESG議題納入其投資分析及決策制定過程；(2) 積極所有權的行使（意即參與被投資公司決策的制定或表決權的行使），將ESG議題整合至所有權政策與實務；(3) 對所委託的投資機構要求適當揭露ESG相關之資訊；(4) 促進投資業界接受及執行PRI，包括納入為投資指令或監督程序；(5) 建立合作機制強化PRI執行之效能，包括建立網絡與資訊平台、分享共同經營資源（pool resource），及利用投資人報告作為學習

⁶³ 楊君仁，〈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德國法的觀點〉，《台灣法學》109期，2008年8月1日，頁71-72。

之資源等，以及(6) 個別揭露執行PRI之活動與進度等⁶⁴。

爲使所有的利害關係人瞭解有關責任投資的表現，監理會應定期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責任投資報告，並要求受託代操機構報告社會責任投資現況，藉此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國保基金之投資符合社會責任投資準則的要求。目前國內的公共退休基金如勞保基金與勞退基金已將CRS列爲選股的指標，並在其研擬之「投資政策書」中明確納入社會責任投資。以CRS作爲選擇投資標的之原則，需有一定的明確標準，爲此，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於2010年共同制定「上市上櫃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⁶⁵提供上市上櫃公司參照，以訂定公司本身之CRS守則，國內大型企業業已定期公告CRS報告書，國保基金可將此守則作爲標準，以踐行CRS程度選擇適當的被投資公司，並排除不願揭露CRS報告書，或是明確違反守則之公司。國內也有民間機構辦理CRS的評鑑，並定期公布表現優良的企業，例如遠見雜誌舉辦的「企業社會責任獎」、天下雜誌辦理的「最佳企業公民」，以及中華公司治理協會以公司治理執行狀況與成效進行評量所辦理之「公司治理制度評量」⁶⁶，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也建置「資訊揭露評鑑」⁶⁷，對全體上市櫃公司之資訊揭露透明度作系統化的評比。國保基金可將以上各企業評量名單列入參考指標，藉此檢視比對現有投資組合中的被投資公司，以資作爲監理會討論增減修正股票投資之依據。

伍、結論

國民年金從民國97年開辦以來，根據規定第一年費率爲6.5%，第

⁶⁴ 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available at <http://www.unpri.org/principles/>. (latest visit 6/7/2011)

⁶⁵ 「上市上櫃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之詳細內容，參見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告，2010年2月8日，http://www.twse.com.tw/docs1/data01/set/public_html/0990003814.htm。(最後造訪日 6/7/2011)

⁶⁶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評量簡介，<http://www.cga.org.tw/index.php?content=eval&type=intro>。(最後訪日 6/7/2011)

⁶⁷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http://www.sfi.org.tw/EDIS/>。

三年得調漲費率 0.5%，之後每二年皆調高 0.5% 至上限 12% 為止。然而內政部表示，根據勞保局委外辦理的精算結果顯示，國民年金最適的保險費率其實是 18.97%⁶⁸。因此法定與實際的差距勢必造成國民年金負擔龐大的潛藏債務，可能會重蹈退撫基金及勞保基金的覆轍⁶⁹，最後也只有不斷的增加保費、降低保障內容，或是由國庫全數吸收因應；但無論運用其中任一方式，似乎都很難完全解決潛藏債務的問題。我國人口老化快速，扶養比急速降低，國民年金支出勢必日益龐大，未來費率必定需要調漲一至二倍，否則國民年金保險僅能走向宣告破產一途。基此潛在的財務危機，國保基金的經營管理便顯得格外的重要，報酬率的持續提升才是解決潛藏債務的有效方案。目前國保基金的報酬率為-0.13%⁷⁰，表現不盡人意，長此以往，對所有的利害關係人都可能造成相當程度的傷害。國保基金的管理監督架構及投資組合的樣態與現有的其他社會保險基金差別有限，未來國保基金的發展是否絕不會遭遇到類似其他基金所面對的困境，並非無疑。再者，國民年金制度規劃期間，本規劃將農保、勞保、公保及國保全納入成四合一，結合成為所謂的「大國民年金」制度，惟因時間耗費過長，為及早保障未參加其他社會保險之弱勢族群的基本經濟安全，故改採現行小國民年金制度。目前行政院經建會業已啟動大國民年金制度研議規劃小組⁷¹，將來果真實施，國保基金的規模將遠大於現制，屆時基金管理得當與否所造成的影響層面亦將更廣。職是之故，國保基金的監督管理絕不得有所疏懈，否則將造成社會弱勢族群的重大損失，國家所需付出的有形或無形的代價勢必難以估算。

⁶⁸ 內政部，國民年金費率調整說帖 每日多付 1.7 元，確保一輩子的經濟安全--依法調整國民年金保險費率說明，2011 年 2 月 9 日，http://www.moi.gov.tw/files/news_file/國民年金費率調整說帖.doc。(最後訪日 6/7/2011)

⁶⁹ 行政院估算，政府 2011 年度潛藏債務預估達 13.3 兆餘元，其中因軍公教退休金、勞保造成的潛藏債務有 13.1 兆餘元，占九成八。陳洛薇，〈潛藏債務 13.3 兆 退撫基金、勞保 9 成 8〉，《聯合報》，2010 年 9 月 1 日，A4 版。

⁷⁰ 前揭註 29。

⁷¹ 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第 18 次會議紀錄，2010 年 3 月 26 日，http://www.moi.gov.tw/files/download8_file/%E7%AC%AC18%E6%AC%A1%E6%9C%83%E8%AD%B0%E7%B4%80%E9%8C%84%E7%BC%88%E5%85%AC%E9%96%8B%E7%89%88%E7%BC%89_1.pdf。(最後訪日 6/7/2011)

無論是公共或是民間的退休基金，其設立之目的無非在追求參加者利益的極大化，也就是追求利益與扣除風險的最大總和，政府是公共退休基金的重要出資人，但仍應以受益人與繳費者的最大利益為其作為贊助者的唯一目的，因國家負有構築健全之社會保險的憲法義務，不得利用基金從事與設立意旨相違背的行為。成功的基金管理必須將風險管控置於優先的地位，而健全的基金治理，藉由內部與外部稽核控管機制的建立，可營造出高透明度且具課責性的管理監督體制，有效降低風險至可控制的範圍內。風險管控得宜並無法直接增加基金的報酬，而僅是編織完成堅固的保護網；至於績效的提升，則有賴優越投資策略的擬訂。現代的投資策略已非一味的追求缺乏責任意識的急功近利，邊沁的死忠信徒不見得見容於現代社會，因此基金的投資組合除以趨利避險作為資產配置的原則外，其注意力也應集中在被投資公司的公司治理與經營政策，將符合國際公認的 ESG 標準之公司列為投資的首選。投資的考量層面必須擴及社會責任，如此方有利於公共退休基金的永續經營。

本文藉由國際間表現較為成功之公共退休基金的管理制度為例，試圖指出現代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趨勢。未來國保基金的角色將因社會結構轉變、老齡化時代的快速逼近而益顯其重要性，主政者與握有決策權者更應體認此一無法逆轉的事實，因此唯有不斷的改革，才能調整出真正符合人民需求的國保基金監管體制。

參考文獻

- 王琬（2009）。《退休基金管理人責任之研究-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為例》。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余雪明（2001）。《比較退休基金法》。台北：元照出版社。
- 林志鴻、鄭清霞、鄭文輝（2005）。〈社會保險基金做為構成國家安定基金成員
正當性之商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2。
- 柯承恩（2000）。〈我國公司監理體系之問題與改進建議（上）〉。《會計
研究月刊》，173。
- 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2010）。《第18次會議紀錄》。
- 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2011）。《第36次會議紀錄》。
- 陳俊仁（2006）。〈論我國勞工退休金條例忠實義務規範之缺失〉。《台灣勞動
法學會學報》，5。
- 陳洛薇（2010）。〈潛藏債務 13.3 兆 退撫基金、勞保 9 成 8〉。《聯合報》。
- 陳洛薇、李光儀、李承宇（2010）。〈研考會：合署辦公 不必跑遠〉。《聯合報》。
- 陳茵琦（2005）。〈機構投資人與公司治理〉。《證券櫃檯月刊》，111。
- 勞工保險局（2010）。《98 年度國民年金工作總報告》。
- 黃錦堂（2005）。〈行政法人建制之基本方向〉。《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法人理
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市：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 楊君仁（2008）。〈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德國法的觀點〉。《台灣法學》，109。
- 廖欽福（2008）。〈財政投融资管理運用組織型態選擇之研究-以勞工退休基金
監理委員會為例〉。《財稅研究》，40（5）。
- 賴森本、許哲源（2005）。〈行政法人監督機制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116。
- Bevis Longstreth(1986). *Modern Investment Management Theory and the Prudent
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lPERS. Asset Allocation. From [http://www.calpers.ca.gov/index.jsp?bc=/
investments/assets/assetallocation.xml](http://www.calpers.ca.gov/index.jsp?bc=/investments/assets/assetallocation.xml).
- CPPIB(2010). *Annual Report*. from http://www.cppib.ca/files/PDF/CPPIB_AR

2010_EN Online.pdf.

Gregorio Impavido (2004). O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Pension Fund Managemen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878*.

Issa (2004). Guideline for the Inves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Funds. *Issa Technical Report 13*.

NZSF. Performance and Portfolio Update to 31 March 2011. from http://www.nzsuperfund.co.nz/files/Fund_performance_to_31_March_2011.pdf.

OECD (2004).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aris: OECD.

OECD (2010). *Pension Market in Focus. Issue 7*.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46/46/45637367.pdf>.

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from <http://www.unpri.org/principles/>.

研究論文

論佛教二十二根^{*}

張慧芳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收稿日期：2011 年 5 月 1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1 年 10 月 31 日。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本論文探討部派佛教中根的觀念。根共有二十二種，論文中先比對相關文獻，證實二十二根的觀念是各部派所共有的，因此可推知二十二根是源自原始佛教；復從靜態結構與動態結構兩種觀點，探討二十二根間的關聯；最後從生命的觀點探究二十二根在生命的流轉與還滅所扮演的重要性，並指出：佛以生死還滅，故說二十二根。

關鍵詞：部派佛教、二十二根、流轉、還滅

The Concept of 22-faculty in Buddhism

Huey-Fang Ch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faculty is discussed from the viewpoints of different Buddhism Schools. There are 22 faculties. It is shown that the concept of 22-faculty existed in every school,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ncept of 22-faculty originates from Buddha. Then, a static structure and a dynamic structure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ose 22 faculties.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nd 22-faculty is discussed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Buddha gave the teaching of 22-faculty for explaining the rebirth of life and the extinction of life.

Keywords: Buddhism Schools, 22-faculty, rebirth, extinction

壹、序論

印順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指出：

流傳世間的一切佛法，可分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類。「佛法」是：在聖典中，還沒有大乘與小乘的對立；在佛教史上，是佛滅後初五百年的佛教。對於這一階段的「佛法」，近代學者每分為：「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我以為，佛陀時代，四五(或說四九)年的教化活動，是「根本佛教」，是一切佛法的根源。大眾部與上座部分立以後，是「部派佛教」。佛滅後，到還沒有部派對立的那個時期，是一味的「原始佛教」。¹

就佛教分期而說，佛滅即進入「原始佛教」。當其初，五百弟子聚集，共同背誦佛陀教導，結集三藏。弟子於各地所傳，概依結集內容，彼此無諍。佛滅百年後，爭議漸起，雖有第二次結集，再度確認第一次結集內容，然而上座部與大眾部對結集內容的解釋差異，已無法調停回轉，遂隨著歷史的演變而逐漸進入「部派佛教」。

唯根本佛教及原始佛教內容皆是口傳，其原貌目前無法得知。現存最早文字記錄的經論，均屬部派佛教時期所留，例如與《雜阿含經》相關的部分，目前保留的部派誦本包括：

- 1.漢譯《雜阿含經》為說一切有部誦本²。
- 2.漢譯《別譯雜阿含經》為飲光部誦本³。

¹ 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1 頁。

² 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97 頁。

³ 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98 頁。

3.南傳巴利文《相應部》為銅鑠部⁴誦本⁵及其英譯⁶。

上列誦本雖是部派所傳，但實為最接近佛陀教導之文字記載。其中《別譯雜阿含經》因譯本不全，僅與南傳《相應部》的有偈品相當⁷，故本論文不參考。因此，以《雜阿含經》而言，現存最古的佛教文字記載且可供參考者，僅餘漢譯說一切有部相關經藏及銅鑠部巴利藏。

本論文擬依據《雜阿含經》、《相應部》及部派佛教時期之相關阿毗達磨論，來探究「根」的意義。依據的原則是：漢譯經論與巴利藏間，若內容相同，即為不同部派之共同內容，推測為原始佛教之內容，因係經過認證，可再往上推測為根本佛教之內容；漢譯經論與巴利藏間，若內容不同，則應是部派所傳的差異。如圖 1-1 所示：

⁴ 阿育王（佛滅後 240-275 年）舉行第三次結集，後其子、女出家，並攜經藏前往斯里蘭卡，是為銅鑠部，目前流傳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地。

⁵ 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90 頁。

⁶ 《相應部》英譯由菩提(Bhikkhu Bodhi)完成，菩提係美國比丘，於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時出家，並自 1972 年起長住錫蘭，2002 年遷回美國紐約，現經常駐於仁俊所建之菩提寺。

⁷ 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46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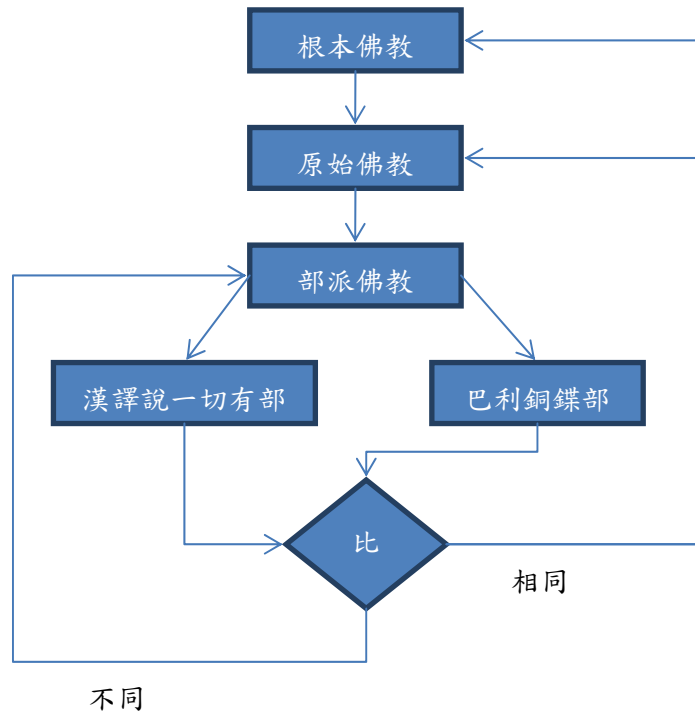


圖 1-1 內容推測

楊郁文⁸依據《望月佛教大辭典》，將佛法三階段的時間，研判如下：

根本佛教，西元前 530 年---西元前 486 年，合計 85 年。

原始佛教，西元前 485 年---西元前 251 年，合計 235 年。

部派佛教，西元前 250 年---西元前 41 年，合計 210 年。

印順以佛陀教化的四五十年為「根本佛教」期，楊郁文以佛陀在世的八十五年為「根本佛教」期，然均判斷部派佛教結束於西元初。但現實上，一個宗教時代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結束，許多重要的部派佛教著作，是在西元五世紀左右才全部完成，例如：

⁸ 見楊郁文，雜阿含經題解，佛光版《雜阿含經》，2-3 頁。

- 1.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以下簡稱《婆沙論》)，完成於迦膩色迦王時期，時間約在西元二世紀(西元 100—150 年)。
- 2.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俱舍論》(以下簡稱《俱舍論》)，完成於西元五世紀(西元 450 年)。
- 3.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順正理論》(以下簡稱《順正理論》)，完成時間略晚於《俱舍論》。
- 4.經量部《成實論》，完成於西元四---五世紀。
- 5.銅鑠部《清淨道論》，完成於西元五世紀。

可知，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間，是經過了大約五百年的時間，才完成轉換。本論文所採用的經論，涵蓋範圍至西元五世紀左右的相關論著，不受印順、楊郁文所推定的部派佛教的年代之限制。

貳、根的意義

根的觀念，普遍出現在各部派現存經論中，相關經論如下列：

- 1.《雜阿含經》卷 26⁹。
- 2.《相應部》 V.48。
- 3.《阿毘達磨法蘊足論》根品¹⁰。
- 4.《阿毗達磨發智論》根蘊¹¹。
- 5.《眾事分阿毗曇論》分別諸入品¹²。

⁹ 見《雜阿含經》，395 頁。

¹⁰ 見《阿毘達磨法蘊足論》，71 頁。

¹¹ 見《阿毗達磨發智論》，112 頁。

6. 《阿毘達磨品類足論》辯諸處品¹³。
7. 《婆沙論》根蘊品¹⁴。
8.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¹⁵。
9. 《俱舍論》分別根品¹⁶。
10. 《清淨道論》慧地品¹⁷。

一、根的意義

《俱舍論》分別根品¹⁸謂：「根是何義？最勝、自在、光顯名根，由此總成根增上義。」《俱舍論記》¹⁹：「根體勝故名爲最勝，根用勝故名爲自在，體用勝故名爲光顯。」根的意義是增上。增上之巴利文爲 *adhipati*。*adhipati* 有君主、統治、主權之意²⁰。依《佛光大辭典》增上有增勝上進之意，亦即加強力量以助長進展作用，令事物更形強大²¹。根的巴利文爲 *indriya*，英譯爲 *faculty*，或 *controlling faculty*²²；*faculty* 意爲功能、官能，*controlling faculty* 則爲具有控制力的功能。漢譯及巴利文對於根的意義解說相同，都是指具備控制力、推動力的功能，是生命中最重要(最勝)的功能。

英譯《相應部》第 48 章根相應²³中，於不同經文分別提到各種的根，包

¹² 見《眾事分阿毗曇論》，10 頁。

¹³ 見《阿毘達磨品類足論》，7 頁。

¹⁴ 見《婆沙論》，1006 頁。

¹⁵ 見《瑜伽師地論》，480 頁。

¹⁶ 見《俱舍論》，21 頁。

¹⁷ 見《清淨道論》第三冊，97 頁。

¹⁸ 見《俱舍論》，21 頁。

¹⁹ 見《俱舍論記》，80 頁。

²⁰ 見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

²¹ 見《佛光大辭典》。

²² 見 *Buddhist Dictionary*, 129 頁。

²³ 『相應』巴利文爲 *Saṃyutta*，英文義譯爲 *yoked together*。中文相應義爲同時出現。因此，*Saṃyutta* 可理解爲結繫在一起同時出現。*Saṃyutta* 在巴利文《相應部》中有兩種意義：1. 指《相應部》整體；2. 指《相應部》內所包含之 56 個 *saṃyutta*，菩提將此譯爲 Chapter。

括：

- 1.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第 1677 頁。
- 2.女、男、命三根：第 1677 頁。
- 3.喜、憂、苦、樂、捨五根：第 1679 頁。
- 4.信、精進、念、定、慧五根：第 1668 頁。
- 5.未知當知、已知、俱知三根：第 1677 頁。

合計二十二根。

相較於《相應部》，《雜阿含經》所提及的根的數量，明顯少了許多。印順考據現本《雜阿含經》有錯亂與佚失的情況，將錯亂部分重新排列後，可判定佚失的兩卷分別是 22 卷、25 卷，現有「根相應」排在 26 卷，屬於根相應的下部，佚失的 25 卷應包含了根相應的上部。印順的《雜阿含經論會編》²⁴（簡稱《會編》），根相應為第十個相應²⁵，共包含 27 經，其中敘述了八根，分別是：信、精進、念、定、慧等五力根，以及未知當知、已知、俱知等三無漏根。雖然《雜阿含經》僅列出八根，但攝事分對根的敘述則包含了二十二根：

問何等是根義。答增上義是根義。問為顯何義。答為顯於彼彼事彼彼法最勝義。云何建立二十二根。謂能取境增上義故建立六根。安立家族相續不斷增上義故建立二根。為活性命事業方便增上義故建立一根。受用業果增上義故建立五根。世間清淨增上義故建立五根。出世清淨增上義故建立三根。²⁶

²⁴ 《瑜伽師地論》的攝事分是《雜阿含經》的綜合性解說，推測其解說次第應與《雜阿含經》的原始次第相符，印順依據攝事分的次第，將《雜阿含經》重編，並將重編後的《雜阿含經》與攝事分合編成《雜阿含經論會編》。

²⁵ 見《雜阿含經論會編》中冊，291 頁。

²⁶ 見《瑜伽師地論》，480 頁。

與《雜阿含經》同屬說一切有部的《婆沙論》及《俱舍論》均列出二十二根，可以推論說一切有部奉持二十二根的說法。經量部的《成實論》也對二十二根有論述。因此，本論文推斷二十二根的教導應是源自佛陀。

二、名稱與次序比對

《清淨道論》列出的二十二根包括：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女根、男根、命根、樂根、苦根、喜根、憂根、捨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未知當知根、已知根、俱知根。

《眾事分阿毗曇論》卷六列出二十二根：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男根、女根、命根、意根、樂根、苦根、喜根、憂根、捨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未知當知根、已知根、無知根。²⁷

《眾事分阿毗曇論》與《清淨道論》的差異有三：

1. 意根的位置由六調至九。
2. 女根男根對調。

3. 俱知根換為無知根。其後之釋文曰：「云何無知根？所謂阿羅漢，盡諸漏結，若無學慧根，謂彼根慧解脫俱解脫，現法樂住，增上無間生，是名無知根。」無知係指無學，無學意為完全解脫之人，無復修學。故其義與俱

²⁷ 見《眾事分阿毗曇論》，31 頁。

知根相同。

《雜阿含》642 經：

世尊告諸比丘。有三根。未知當知根・知根・無知根。²⁸

已知根換成知根，俱知根換成無知根。

《俱舍論》及《成實論》二十二根的次序及名稱與《清淨道論》同。由以上比對，本論文採《清淨道論》之名稱與順序。

參、二十二根的結構分析

一、靜態結構

《俱舍論》以及《清淨道論》均將二十二根分群，分群是將功能相近的諸根列為一組，以便了解共同的特性。《俱舍論》和《清淨道論》的分群完全相同，解釋上雖有文字之參差與切入點之不同，但基本意旨是一樣的。為便於對照認識，因擷取整理兩論所述分群名稱及解釋文字，如表 3-1 所示：

²⁸ 見《雜阿含經》，395 頁。

表 3-1、二十二根的分群

根之分群	俱舍論	清淨道論
入處根	了自境增上： 眼等五根於能了別各別境識有增上用； 第六意根於能了別一切境識有增上用。	前五根的功用，是讓於其後升起的諸法受其影響；意根是把俱生的諸法置於自己的勢力之下。
女男根	從身根別立為二，形類、音聲、作業、志樂不同。	處置男女的形狀、相貌、態度、及行動的方式。
命根	於眾生同分安住增上。	保護俱生的(色、心、心所)諸法。
五受根	於三界有情雜染增上 ²⁹ 。	樂苦喜憂根是克服俱生的諸法，並使獲得如同自己的粗顯的行相；捨根使獲得寂靜、勝、中庸的行相。
五力根	於三界有情清淨增上 ³⁰ 。	克服其反對的，並使其相應的諸法獲得信樂等行相的狀態。
三無漏根	於得後後道、涅槃等有增上用。	未知當知根是斷除三結；已知根是減少及捨斷欲貪與瞋恚；俱知根是捨斷對一切作用的熱望。

《清淨道論》與《俱舍論》對二十二根的分群沒有差異，但對部分群組

²⁹ 《俱舍論》分別根品第二之一，頌曰：五八染淨中，各別為增上。... 論曰：樂等五受、信等八根，於染淨中如次增上。樂等五受染增上者，貪等隨眠所隨增故。信等八根淨增上者，諸清淨法隨生長故。見《俱舍論》，21頁。

³⁰ 同註 29。

的解釋，《俱舍論》比較偏重整體性的歸納，《清淨道論》則偏重個別有情的狀態。例如：《俱舍論》對命根的解釋從眾生生命的共同成分切入，《清淨道論》則是從維繫一個生命現象切入，但命根維繫有情生命，此一核心說解，兩者是一致的。可見不同部派之間，對根的基本定義與分類相同。

二、動態結構

動態結構是指二十二根間互相的影響。從動態的結構上來看，二十二根可分成兩群，前十四根為一群，後八根為一群。前十四根稱為流轉群，後八根稱為還滅群。

1. 流轉群

流轉群包括三個部分：六入處根、性命根、受根。其中性命根是維持生命的繁衍，並決定生命外形與行動的特性，是出生時就決定的，無法在今生改變。動態關係中最重要的是六入處根及五受根。

入處根是心與外境的接口，《攝事分》所謂「取境增上」；受根共有五種，樂、苦、喜、憂、捨，喜憂二受屬心受，苦樂二受屬身受，捨受又稱不苦不樂受，兼屬身受與心受。《雜阿含經》常僅舉苦、樂、不苦不樂（捨）三種受，以三種受代表五種受。

六入處與三受間有動態的生成關係，例如《雜阿含經》201 經：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當正觀無常。何等法無常。謂眼無常。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當觀無常。耳·鼻·舌·身·意當觀無常。若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無常。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次第盡有漏。³¹

³¹ 見《雜阿含經》，114 頁。

以眼根爲例，說明動態生成的基本模式：

（眼+色）生成眼識。

（眼+色+眼識）形成眼觸。

眼觸生成受。

更普遍的說，動態的模式爲：

（處+所緣）生成識。

（處+所緣+識）形成觸。

觸生成受。

受（特別是身受）正是生命一切痛苦的起源，《雜阿含經》470 經：

佛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身觸生諸受。苦痛逼迫。乃至奪命。憂愁啼哭。稱怨號呼。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身觸生諸受。增長苦痛。乃至奪命。愁憂稱怨。啼哭號呼。心生狂亂。當於爾時。增長二受。若身受。若心受。譬如士夫身被雙毒箭。極生苦痛。愚癡無聞凡夫亦復如是。增長二受。身受。心受。極生苦痛。所以者何。以彼愚癡無聞凡夫不了知故。於諸五欲生樂受觸。受五欲樂。受五欲樂故。為貪使所使。苦受觸故。則生瞋恚。生瞋恚故。為恚使所使。於此二受。若集。若滅。若味。若患。若離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生不苦不樂受。為癡使所使。為樂受所繫終不離。苦受所繫終不離。不苦不樂受所繫終不離。云何繫。謂為貪。恚。癡所繫。為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所繫。多聞聖弟子身觸生苦受。大苦逼迫。乃至奪命。不起憂悲稱怨。啼哭號呼。心亂發狂。當於爾時。唯生一受。所謂

身受。不生心受。³²

由觸而生受，或因樂受而生貪，或因苦受而生瞋，由貪瞋而生憂悲惱苦、逼迫奪命，關鍵在受不在觸。更準確的說，是因為身受的苦樂，而生出心受的喜憂。

凡夫與聖弟子的差別在於：凡夫因身受而生心受，於此身心二受而生種種苦；聖弟子唯生一受（身受），不生心受生命中，入處根（眼耳鼻舌身意）不可避免的與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接觸，而生出身受。解脫之道的源頭，就是面對身受而不生心受。

2.還滅群

還滅群包括兩部分：信、進、念、定、慧五力根，未知當知、已知、俱知三無漏根。《雜阿含經》647 經解釋五根：

何等為五。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何等為信根。若比丘於如來所起淨信心。根本堅固...無能沮壞其心者。是名信根。何等為精進根。已生惡不善法令斷...未生惡不善法不起...未生善法令起...已生善法住不忘...是名精進根。何等為念根。若比丘...身觀住...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如是說。是名念根。何等為定根。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至第四禪具足住。是名定根。何等為慧根。若比丘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是名慧根。³³

《雜阿含經》644經說明五根的功用：

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五。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

³² 見《雜阿含經》，262 頁。

³³ 見《雜阿含經》，396 頁。

根。若比丘於此五根如實善觀察。如實善觀察者。於三結斷知。謂身見・戒取・疑。是名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於正覺。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³⁴

人若如實善觀察五根，則能究竟苦邊，依序啟動三無漏根獲得解脫。因此，此八根可視為尋求離苦、滅除流轉的力量。

肆、根與生命

佛法將生命現象分為兩大類：流轉與還滅。六入根、女男根、命根不斷作用，再加上五受根的執著，此十四根形成流轉的機制；信、進、念、定、慧及未知當知、已知、俱知八根，則是止息生死，導向還滅。

《順正理論》云：

生死相續。是流轉義。流轉所依。謂六內處。眼等定是彼自性故。生由男女。二根為緣。彼得生故。住由命根。是彼相續不斷因故。受用由受。五受為緣。損益轉故。於流轉中。約此四種勝作用故。立十四根。還滅位中。亦約此四勝作用故。立餘八根。生死止息。是還滅義。即是六處。畢竟斷滅。³⁵

《俱舍論》也有相似的說法：

約流轉還滅立二十二根。流轉所依謂眼等六。生由女男從彼生故。住由命根仗彼住故。受用由五受因彼領納故。約此建立前十四根。還滅位中

³⁴ 見《雜阿含經》，395頁。

³⁵ 見《順正理論》，76頁。

即約此四義類別故立後八根。還滅所依謂信等五。於三無漏由初故生。由次故住。由後受用。根量由此無減無增。³⁶

流轉是心識流轉，心識流轉有今生的流轉與輪迴的流轉：

- 1.在一世生命中，心識不斷變換流轉。心識的升起是由於入處六根，藉六根了解各別及一切現象，影響並決定了俱生與後生的身心現象(諸法)。
- 2.在轉世輪迴中，仍是心識流轉，只是新生命由女男根決定差別，並由命根維持一世的生命。

流轉由入處六根啟動，五受根可以讓心領納六根門之所緣，並隨對五受的貪愛或瞋恨，而生出生命之雜染。若不對五受起貪愛瞋恨，轉依五力根，則成為清淨資糧，而導向涅槃解脫。

二十二根推動了生命的流轉或還滅，沒有其他的生命現象，能與二十二根相匹配。

《成實論》明確指出：佛陀因生死還滅，故說二十二根。

又為生死往來還滅。故說二十二根。一切眾生初受身時以識為本。是識六種。從眼等生故說六根。所謂眼根乃至意根。能生六識故名六根。可以分別男女相故名男女根。有人名為身根少分。此六根或名六入。從是六事生六種識故名為壽。所以者何。是六入六識得相續生故名為壽。是相續斷故名為死。是故此事名之曰命。是中何等是根。所謂業也。以因業故六入六識得相續生。是命中業名為命根。是業從諸受生。諸受即名樂等五根。從此五根生貪愛等一切煩惱及身口業。此業因緣還受生死。是為垢法。能令生死因緣相續。以何因緣能生淨法。必因信等。信等四法因緣成慧。慧有三時。謂未知·欲知·知己。修習所作辦時。此根皆

³⁶ 見《俱舍論》，22頁。

是智慧差別。佛以生死往來還滅垢淨故說二十二根。³⁷

此段經文依序解說：

- 1.生命初始：六識是生命的初始，六識由六根所生。
- 2.生命延續與結束：六根生六識相續不斷是為壽，相續斷名為死，是為命根。
- 3.生命的動力：業是生命的動力，命根是因為業，在一世生命中，六根六識相觸生五受，五受根生貪愛煩惱及身口業，使生命輪迴（還受生死），是為垢法。
- 4.生命的淨化：因信等五根使生命淨化過程啟動不懈。
- 5.生命的解脫：因淨化導致智慧升起，終於進入俱知的解脫智慧。

綜合來看，二十二根可以圖 4-1 及圖 4-2 表示其間的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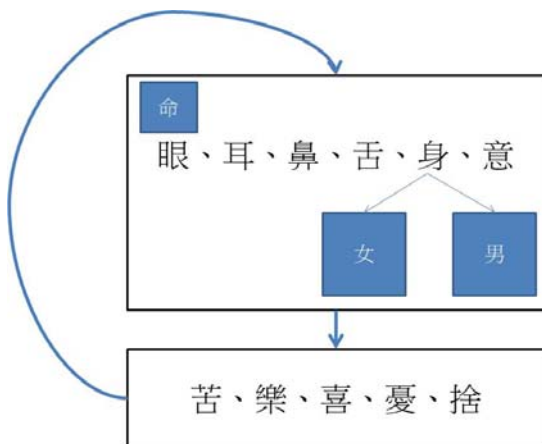


圖 4-1 流轉十四根的靜態與動態關係

在圖 4-1 中，六根中的身根再分女根、男根，這八根由命根維持一世的

³⁷ 見《成實論》，18 頁。

生命，故此九根是指生命及生命中的基本活動。這些活動由六根為發動點，當六根入處與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接觸時，就啟動了生命中的各種活動。六根所啟動的活動，會在我們的身體上產生苦樂的感受，或在我們的心中產生喜憂的感受，對這些感受的好惡，產生業力產生行動，行動又讓六根有更多的接觸，造成更多的受，無終止的流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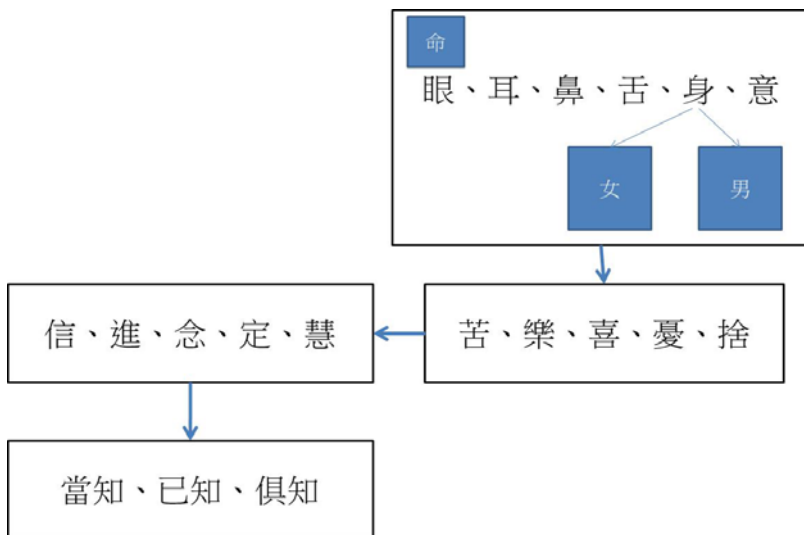


圖 4-2 二十二根的還滅結構

在圖 4-2 中，以信進念定慧五力根面對各種感受，不對感受升起貪愛或瞋恨，截斷行動與造業，逐漸累積，終於達到一個階段：未知當知根被啟動了，逐步進入已知、俱知。

二十二根的流轉還滅、靜態動態等關係，在圖 4-1 與圖 4-2 中，可以充分表達出來。

伍、結論

二十二根是佛陀對生命完整的敘述，這個敘述是一個高度抽象化的敘述，其中沒有常識性的生命描述：沒有性別、沒有強弱、沒有膚色、沒有四肢五臟、沒有呼吸血液，只有生命推動力的結構性的敘述。

在推動生命的力量中，「受」是所有痛苦喜悅的源頭。受來自六根，對受的好惡、追求，形成了生命的輪迴動力；另一方面，生命中也有逆轉的力量，五力根可以使人擺脫受的纏縛，持續產生淨化心靈的動力，長期累積之後，啟動三無漏根，而導致解脫。

這個簡要而又充滿動態變化的生命敘述中，沒有外力、沒有神祉、沒有祈求、沒有恩典、沒有僥倖。不盡的輪迴或淨化解脫，完全來自自己的力量，無從推卸與假藉。

佛陀以二十二根開示：生命一方面是苦樂受及貪瞋執著的無盡流轉，另一方面是根本斷除貪瞋的還滅及最終的俱知。二十二根可視為佛陀教導的核心綱要。

參考文獻

- 宋求那跋陀羅譯（2007）。《雜阿含經》。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宋求那跋陀羅譯（1983）。漢譯《雜阿含經》。佛光出版社。
- 佚譯人名（2009）。漢譯《別譯雜阿含經》。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大目犍連著，唐玄奘譯（2009）。《阿毘達磨法蘊足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迦多衍尼子著，唐玄奘譯（2009）。《阿毗達磨發智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世友著 唐玄奘譯（2009）。《阿毘達磨品類足論》辯諸處品，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世友著，宋求那跋陀羅、菩提耶舍合譯（2009）。漢譯《眾事分阿毗曇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五百比丘述，世友編，唐玄奘譯（2006）。《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訶梨跋摩著，姚秦鳩摩羅什譯（2009）。《成實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彌勒說，無著撰，唐玄奘譯（2006）。《瑜伽師地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世親著，唐玄奘譯（2006）。《阿毘達磨俱舍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眾賢著，唐玄奘譯（2009）。《阿毘達磨順正理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覺音著，葉均譯（1980）。《清淨道論》。華宇出版社。
- 唐 普光撰（2006）。《俱舍論記》。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印順（1971）。《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正聞出版社。
- 印順（1983）。《雜阿含經論會編》。正聞出版社。
- 印順（1988）。《印度佛教思想史》。正聞出版社。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1988）。《佛光大辭典》。佛光出版社。
- 楊郁文（1988）。《佛光大藏經雜阿含經》題解。佛光出版社。

望月信亨編（1936）。《望月佛教大辭典》第一冊至第六冊。世界聖典刊行協會。

望月信亨、塚本善隆合編（1963）。《望月佛教大辭典》第八冊至第十冊。世界聖典刊行協會。

日本 水野弘元（2005）。《パーリ語辭典》。2005 增補版。

Bhikkhu Bodhi，〈相應部〉英譯，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 2000.

Bhikkhu Nyanatiloka, Buddhist Dictionar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Sri Lanka, 1988.

研究論文

災難新聞報導分析：
現代風險社會的建構^{*}

鄭志文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11 年 3 月 23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1 年 11 月 14 日。

^{*}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本文由風險社會的角度切入，以八八風災的新聞報導為分析對象，試圖理解並詮釋媒體與新聞報導在風險社會中的角色與意義。本文認為，八八風災是個災難，但並不是風險，而是經由媒體與訊息的生產，才成為具體風險，因此新聞報導和媒體內容的生產與現代社會及現代性息息相關。透過 Giddens, Luhmann 與 Beck 的鉅觀風險社會輪廓，災難報導連結社會結構與行動演化，創造媒體巨怪卻生產不確定，並透過知識的支配而取代過去生產關係，成為社會的動力來源。於是，未來被納入現在，成為時間上恆久的風險；空間被跨越而成為全球的風險；而階級因生產關係的被取代而消逝，使風險脫離階級，任意蔓延。然而，它不僅是第二現代中脫離理性的巨怪，更重要的是批判媒體成為內在扭曲且不斷再製的封閉系統，但卻掌握知識與定義權力，而對社會世界產生威脅。

關鍵詞：風險社會、反思性、雙重偶然性、定義關係

An Analysis of Disaster News: Towards a Construction of Risk Society

Chih-Wen C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king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role of media and news reporting in risk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88 Typhoons”. By standing up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we argue “88 Typhoons” shouldn’t be recognized as a disaster onl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media and message, it has transformed to be (a form of) substantial risk. Moreover, it simply validates the argument that the news reporting, the production of media content, modern society and modernity are indeed inseparable. With Giddens, Luhmann and Beck who had already provided a macroscop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isk society, it is argued disaster reporting connects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s to create the so called ‘media juggernaut’ and continuously produces uncertainty. In their defense, knowledge control has become the new resource for social movement which raises the possibility of overtaking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Marx’s traditional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is regard, future is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and has become a perpetual global risk across time and space. Class is dissolved because of the collapse of Marx’s production relation. Risk can therefore depart from social classes and expand itself that constructs and consolidates the reflective society within second modernity.

Keywords: risk society, reflexivity, double contingency, relation of definition

壹、從危險到風險社會

人類社會自古至今，危機從來沒有間斷過，然而早期社會的危機並未能構成風險社會，而是以危險的形式出現，故更像是一種危險社會。這種早期的危險與當代的風險社會區別，可以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的差異來認知。在前現代社會中，人類面對的危險其實是來自大自然的威脅，於是火山、地震與風雨等天災，及盜賊、戰爭等人禍，都在某一空間範圍內影響著某一群人。由於對這種天災人禍的認知與控制能力非常有限，也使得訴諸「命運」與鬼神之說成為前現代歸因危險的理解主軸。

爲了不斷地解決過去命運造成的危機，人類試圖透過理性一步步控制天災與人禍，也因此展現了現代的力量，而構成「現代性」的特徵。然而，理性化的現代社會並未因此而進入的安全之境，相對於早期命運，現代社會的確較為遠離傳統災難，但現代社會卻也因自身理性化高度的發展而造成了高度的當代危機。亦即，早期人類不斷尋求能源開發以提高生產，到了現代卻成為污染與全球暖化危機；同樣的，爲了抵禦侵略而發展的現代武器系統，也成了現代社會聞之色變的核彈危機。由於這種危機來自於現代制度的應用與擴散，是現代社會自己生產的產物，也就是現代性的後果，因此使得風險社會產生前現代所未有的弔詭性。

一方面，現代社會不僅無法完全解除早期的天然災難，反而創造了當代社會的原生風險，這使得在時間的序列上，「現在」從未比「過去」安全，並以威脅恐懼而非幸福期待去連繫了「未來」，現代以降的時間全面風險化成為社會的特徵。另一方面，過去的危險多集中在某個地域，成為特定空間的巨大危機，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小範圍的，然而當代的風險通常是跨越疆域與國界，快速地普遍化或在社會中橫向擴散，這使得空間上的風險全球化成為另一個現代特徵。由於風險的時間與空間運作，風險也因此產生史無前例的巨大作用，並透過風險具體化，不斷實際地改變著

社會形貌與行動條件，因而促使當代社會成為難以捉摸、變幻不定的生活世界。

在全球風險的擴散上，媒體建構的符號世界無疑地成為人類社會感官的延伸，促使風險的事實與知識以電磁波的速度穿越距離，因而使人們會直覺地認為媒體扮演著傳播中介的角色。不過，這似乎意味媒體的作用僅在告知與聯繫，反映的是現代社會的媒體「功能」，這就忽略了媒體與符號體系在後現代論述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說，這種看法跳過了媒體主動構成的表意與分類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其實對於決定生活世界的重要影響性。因此，如果風險社會是本質上變遷的時空結構，則如何理解大眾傳播與媒體在其中的積極地位，事實上應是風險社會的核心議題。

2009年8月8日，台灣由於「莫拉克」颱風侵襲而造成極大傷亡，是近年來僅次於921地震的最大災害。在現實社會上，小林村一夕滅村；在政治上，劉兆玄內閣下台；而在媒體上，連續數週的新聞飽和報導，於是構成了災難、脫序、報導與政治行動的社會場景。因此，本文即以八八風災的災難報導為對象，由風險社會出發，試圖以鉅觀的理論視野，切入現代社會中充斥的災害風險與災難新聞傳播，從中理解並詮釋媒體與新聞報導如何成為風險社會中現代性的後果？其次，討論災難報導所引發的社會連鎖反應，如何成為社會對抗或行動的可能性？最後，討論媒體或新聞產製在風險社會中成為動力的意義？

貳、風險社會的輪廓

風險不同於前現代社會具有宿命觀的危險，風險社會的風險不同於命運的擺佈，而是現代展演控制與計算決心之後的產物。事實上，Marx Weber在對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中，即說明了現代資本主義透過精密計算的理性

化方式，以「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等特徵重新格式化了社會運作的結構條件，其中，Weber 更對現代性中「理性化」寄予悲觀評價，並直言理性化勢必構成對人們行動的「鐵牢」（iron cage）（Ritzer, 1993）。雖然在 Weber 的概念中，重點不在討論風險，但他的論述對風險社會的理解卻提供了線索。一方面，儘管 Weber 對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發展具獨到的診斷，但現代社會的發展並不像他所謂的可計算性一般，真的達到控制工業主義生產的每一步細節；另一方面，所謂的可預測性也留下了無法百分之百預測的空隙，也就是說，反而透露出「意外」發生的可能性。結果，Weber 所提到的理性化所造成的去人性化牢籠的確成為工業主義中，工具理性之負面結果，但是可計算性與可預測性並未展現控制力量，反倒凸顯出人類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無力感，而製造了現代社會不確定性的風險危機。

在論及現代危機時，Anthony Giddens, Niklas Luhmann 與 Ulrich Beck 三位學者對風險社會的形成與內涵皆有獨特見解。對 Giddens 而言，現代風險與 Weber 的理性化危機有著直接的關係，風險相對於早期的命運，乃是人們自身的行動或決策之後果，而且是「非預期」的後果（1990: 30）。因此，風險使得人類身陷「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世界中，在眾多行動者、組織、國家機器裡，各在不同的行動意圖中競爭抗衡，而風險即是其評估結構與做出決策之憑藉。Giddens 於是區分出了前現代與現代時期的風險環境，具體的指出了兩個階段的不同風險特質（如表 1）。整體而言，Giddens 是以現代抽象系統（abstract system）與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的出現，來描述現代風險，並指出風險乃在跨越時間、抽離空間的運作下，改變地方與全球的關係形式。

表 1：前現代與現代之風險環境

前現代	現代
(1) 威脅與危險來自自然形式，例如傳染病、氣候變化或洪水雷電等。	(1) 威脅與危險來自現代性的反思性。
(2) 威脅與危險來自人類暴力形式，例如軍隊、軍閥、土匪或強盜等。	(2) 威脅與危險來自戰爭工業主義式的人為暴力。
(3) 危險是失去宗教恩寵，或是遭受惡魔之影響。	(3) 現代反思性在自我身上引發的個人無意義之威脅。

資料來源：*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p102), by A. Giddens, 1990, London: Polity.

這種專家系統的重要性與弔詭性就在於，它一方面要解決社會的危機，但另一方面卻生產了社會的危機。為了解決前現代時期的災難，專家系統以跨越地域的方式，建立起政治、經濟、國防、醫療及其它各式的社會制度，而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控制前現代的天災與人禍，使得「過去」的危險得以逐步消除。然而，這個賴以解除危險的抽象與專家系統，其運作的方式不在於一成不變的公式理性，而是藉由在社會生活的實踐活動中，不斷新進的資訊與回饋而修正社會實踐的特性，因此，知識運作的「反思性」遂成為構成社會結構變化的內在特質，不是創新求變，而是整體的反思性（Giddens, 1990: 39），不但自然化了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更因此而進一步地成為了現代社會的風險來源。

同樣關注社會的結構化樣貌，Luhmann 的社會系統理論也給予風險社會不同的內涵。Luhmann 深受 Talcott Parsons 系統功能論的影響，也就是 Parsons 的社會行動理論（the social system）與一般行動（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理論，不僅銜接了古典社會學到當代社會學，其系統的觀點也給了

Luhmann 不同的啓示。因此，Luhmann 關切社會系統、社會演化及溝通的理論；尤有甚者，他又與 Parsons 不同，他的現代社會呈現的是更高度分化、象徵化、技術化、全球化與多元化的樣貌。這使得 Luhmann 的社會分析具有特殊的含義，一方面他也談「合理性」，但由於他所看見的社會屬高度偶然性與分化，因此其合理性並非傳統的理性觀，而是充滿著高度風險性的可能性綜合體（高宣揚，2002:285）。與 Giddens 同樣重視時間的社會作用，Luhmann 指出當代社會的制度與法規不斷分化的結果，越來越多的看似理性的原則，將「未來」納入並依賴「現在」的決策與選擇（1993: 118）。

現代社會的危機，是社會不斷自我分化而產生的嚴重風險性，關鍵就在社會越理性化，人們面臨越多新危險事物的威脅。其中，人類社會知識、制度與科技的不斷自由發展，將使人們「知道」越來越多不可預測的未知，而陷入更大的不確定性，也就面臨更大的風險。如此一來，現代性結構的極度複雜化造成現代化分化，而風險社會是社會現代化必然之後果，也成為文明社會的常態。既然風險是現代性常態，因此如何觀察現代性也就決定社會反思性的程度。結合反思性與觀察，Luhmann 提出風險社會中「二階觀察」的重要性，亦即，觀察者不只觀察社會的變化，也必須認真觀察自己，以反思社會與觀察者自身，這種現代社會的反思性，點出了每個觀察往往都只是為自身的權力和立場的操作，而與其它社會操作一樣都不免盲目（高宣揚，2002: 291-292）。

Giddens 與 Luhmann 對風險社會的觀點展現了他們對現代性的觀察，同時，也在現代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之間做出看法。Giddens（1984: 25）以「結構／行動的二元性」（structure-agent duality）強調社會變遷與行動者反思間相互作用的動態關係，而兩者之間並非社會絕對決定行動（施為），或行動完全決定結構，使得反思與不確定性成為社會的特徵。同樣對風險社會中宏觀與微觀層次的觀注，Luhmann 則以「雙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解釋社會分化後的後果，行動者一方面依賴那些可能發生或不發生的特殊事件的出現，一方面又受這些事件偶然性的影響（高宣揚，

1998: 721-723)。因此，社會系統的構成，乃由於個人行動不斷遭遇雙重偶然性的不確定性，為了解決這個困境，社會有必要建立各種「溝通系統」來處理該不確定的可能危機，以重構與簡化世界的複雜性，使得世界成為擁有秩序的系統。

相較於 Luhmann, Giddens 對現代風險社會的解讀較呼應 Beck 的概念。首先，Giddens 擅長以結構化理論探討現代社會的變化，因此他的風險社會非常強調制度化與組織化的風險。Beck 同樣認為現代風險的來源，起因於理性化的現代性技術，因此制度與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邏輯造就了現代風險。其次，Giddens 所強調的專家系統的反思性，證明了專家知識的有限及不可信賴，也使得專家失靈成為現代常態。專家失靈點出了 Beck 論述中「非知識」的重要性，它遠比知識來得更為具體，並說明了在現代化的制度中，各種風險更依賴知識來鑑定，但各種專業知識的不確定或無知，不但使專家系統的作用一再失效，更造成了現代社會自我對質的困境，這種自我對質也內在化於現代性內，而成為 Beck 觀念中的現代反思性。

Beck 把風險定義為「處理因現代化自身而引起危險（hazards）與不安全感（insecurity）的一套系統方法」（1992: 21）。現代反思性有助於釐清風險的輪廓，並使得 Beck 區分了前現代與現代的現代化差異。早期的現代化乃由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工業社會的「古典現代化」，或稱之為「第一現代」（first modern）而現代的現代化則是由工業社會轉型到風險社會的「反思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或稱之為「第二現代」（second modern）。第一現代是「財富」生產與分配的邏輯支配社會的運作，而第二現代則是「風險」生產與分配的事實決定社會實踐，這也就是說，第一現代中追求飽暖與平等的目標，在第二現代中被要求安全與防衛的聲音所取代，這種社會轉型使得政治行動成為取得安全的必要手段，因此 Beck 非常強調風險分配對政治層面的影響，這也使得風險社會將成為行動社會，而內藏著社會行動的潛能。

參、新聞報導與符號系統的角色

由於對現代社會制度的關注，Giddens 的分析焦點之一在於抽象系統對構成現代性時空結構的影響，這種抽象系統的作用在於「象徵性符號」的廣泛運用，象徵性符號成爲一種相互交換的媒介，無關乎使用這些媒介的個人或團體的特質，也無需考慮場合的特殊性，而能廣泛地流通使用（1990: 22）。事實上，如同 Georg Simmel 在《貨幣哲學》中對金錢制度的分析，Giddens 同樣強調金錢與時間抽象系統在象徵符號的跨時空流動中，對現代性的抽離化（disembedding）與時空分延（distanciation）的作用。不僅金錢與時間，媒體作爲現代社會的制度，同樣發揮穿越時空與抽離在地的力量，然而這不僅是因爲媒體科技的速度與影像流通的特性，更是由於媒體作爲現代性中的專家系統，擁有橫行現代社會的能力。

當現代社會一旦發生災難，事件、人民、政府之間即進入了緊張狀態，災難對現代社會系統即開始提出挑戰，而媒體則成爲被依賴的專家。社會的不穩定狀態升高，人民因此依賴媒體得到資訊，依賴政府得到救援行動。2009 年八八風災發生，當日行政院長劉兆玄視察災害應變中心，認爲災害救援速度緩慢乃因中央與地方溝通不良，因此要求中央與地方的雙向聯繫必須加強，因此「所有中央與地方間溝通，一律透過媒體」，這也使得反對黨得到批評政府「看電視在救災，看電視溝通災情的協調」的合理性（自由時報，2009 年 8 月 10 日）。事實上，八八「風災」是一天然災害，在這層次上，風災並不構成風險社會的風險，風險在於媒體做爲一個專家系統，並帶有普遍令人「信賴」（trust）的符號流通能力，但事實媒體系統本身卻帶高度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這才真正導致社會的風險。

依照 Luhmann 的風險社會概念，社會越不穩定或複雜性越高，則越依賴簡化複雜性的高度分化次系統來穩固，如同 Giddens 對專家系統的強調，這種說法合理化了媒體作爲專家系統，而正當化其成爲現代性各種制度之

一。因此，人民依賴媒體資訊以理解事件，而政府依賴媒體以作為跨時空掌握災情，並據以合理化判斷的正當性。然而當重大災難發生，當天即時的新聞報導事實上只是新聞媒體一時生產線的產品，媒體第一時間並非全然意識到風災所意味的社會意義，因此關於風災的前因後果的連結論述並不存在，儘管如此，大多數人仍往往把各種專業的資訊製造與告知責任賦予媒體，而且採取近乎盲目的信任態度。對新聞報導的盲目依賴使得當代媒體再現的「媒介真實」或「符號真實」，與真正的「客觀真實」或「社會真實」差距越來越大。事實上這代表著媒介做為現代性的機構，不但加速讓時空分延成為現代特徵，也因時空分延而賦予新聞報導更多力量。一方面，生活在台灣各角落的公民，甚至全球各地方的人民，並不需要認識或面對面地了解媒體的專家運作過程，只要新聞是由知名媒體所報導，便值得相信，因而使得媒體制度與力量，可以驚人的速度在時空分延的風險社會中（全球）擴散，並深具說服力。下述這則新聞在災難發生後，使多數大眾均意外並深表同情於八八風災中小林村的災難，展現了媒體與新聞報導做為跨越時空的力量。

世界末日到了！」八日下午近五時，在小林村遭滅村前一刻，旗山溪上游的那瑪夏鄉民族村突傳巨響，瞬間山崩地裂，一至三鄰整排住家慘遭滅頂，10 秒鐘迅速活埋 25 人，民族村長劉金和昨證實悲劇，痛哭說：「我們的家園毀滅了，未來該如何是好？」。（〈中央與地方間溝通，一律透過媒體...〉，自由時報，2009 年 8 月 15 日）

另一方面，這種新聞擴散造就的是更顯著的抽離化作用，因此大眾也無需親臨觀察災難現場，新聞報導的災難報導成為如同 Simmel 所關注的現代性的體驗（experience），是時間、空間與偶然的因果性，是不斷消逝的片刻與當下的聚合、是遠距與鄰近的辯證，更是偶然而任意的因果組合（Firsby, 1992: 163-164），不僅受惠於時空分延，同時也在實踐中，反過

來也更強化了時空分延的現代性動力。因此，新聞報導藉由媒體科技與專業技術抽象系統的廣泛流通，在當前微波、衛星，甚至是網際網路的建立下，不斷深化媒體專家系統的存在與發展。

專家系統的生產與橫行因此成為現代性的產品，並轉而也成為現代化的動力，而它的力量就來自於其所標榜的現代「知識」系統，也就是知識的生產與教育。例如，同樣在上述這則新聞中包含了二個子標題，第一個子標題為「土石流直撲民族村，三百村民驚慌逃竄高處」，形成事件描述；而第二個子標題則是「越域引水工程奪命？楊秋興稱可爭取國賠」，於是在已知的小林村滅村事件中，延伸了事件的知識與因果關係，使得越域引水成為新的知識判別。儘管 Giddens 並未對現代社會文化生產與再生產機制有更多的討論，但媒介制度與新聞報導，正透過知識而組織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物質和社會環境。因此，風災不再只是天然災害，透過媒介的報導邏輯而使天災找到了人為的可能原因，一方面使得另一段時間與空間的意義滲透進原本認為單純的天災，而重組了事件的時空與因果性。二則重新歸因了事件與災難並生產出應負擔的責任歸屬，這使得既有穩定的社會結構開始產生動態的不確定性，並注入影響災難事件的能量，而限制、影響或促發了各行動者應立即採取的反應，這也就是說，它賦予了社會行動中，各方角力的潛在政治力量。

肆、雙重偶然性的行動與政治潛能

媒體對越域引水的報導，成功的將八八風災的議題從天災危險導向人為風險化，換言之，新聞報導凸顯了「風險」與危機的不同。Luhmann 特別強調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指的是「社會脫序的人為性」，也就代表著「社會思想對自由和諧的社會秩序所負有的責任義務」（高宣揚，2002: 294）。對災難新聞報導而言，這代表了兩層意涵。首先，新聞報導事實上

是風險社會的觀察與詮釋者。八八風災的救災與小林村的滅村帶有高度的社會複雜性，這表明了天災威脅社會系統的穩定性，而迫使社會必須發展出更高度分化與健全的次系統，以利在未來應付類似事件。八八風災後，媒體的主要報導內容如表 2 所示。

表 2：八八風災後一個月內媒體主要報導

日期	複雜性升高	複雜性簡化
2009.08.10	綠批馬劉假勘災真輔選。	
2009.08.12	未發緊急命令，馬認為效力重複。 行政、立法院決暫不編特別預算。	
2009.08.13	前陸軍副司令批救災亂，馬須負最大責任。 南韓表達援助意願，馬政府婉拒。 美國願伸援，政府不開門。	馬英九否認拒絕國際援助。
2009.08.14		政策急轉，政院將編預算。 馬召府院黨擴大會議，商討救災。
2009.08.15	拒絕外援，外交部：公文漏寫。	失業災民，可登記臨時工。 「頭七」之際，馬宣示求災總動員。
2009.08.16	求災不力，「內閣應改組」。 原青（原住民青年學子）發動府前抗議。	
2009.08.18	前環評委員：越域引水是幫凶。 官員不適任，監院不排除要求下台。	重建，馬下令 9.8 交成績單
2009.08.20		馬：越域引水工程已停止。
2009.08.22	立院彈劾馬？監院將送關鍵報告。	馬保劉揆，綠營促倒閣。
2009.08.24		「國土復育條例」立法有共識。 災區重建政院規劃，政府出地， 企業認養地上物。
2009.08.25	倒扁副總指揮，號召 9 月 9 日倒馬。	

續上表

2009.08.26	災民拒滅村式安遷。	王金平：擴大公建預算，可移緩濟急。 歐鴻鍊請辭？外交部：僅表負責。
2009.08.27	綠邀達賴 31 日來台。	
2009.08.28	八八水災，沖垮消費者信心。	監院查扣預報資料，將約詢氣象局長。
2009.08.29		廠商僱災民，每人每月補助萬元。
2009.08.30		達賴訪台，藍營避見。
2009.09.02		氣象局失職，監委不排除彈劾。
2009.09.04	總統府前抗議，民間團體要劉兆玄下台。	
2009.09.07	綠營要求內閣總辭。	劉揆請辭獲准。

說明：2009 年 8 月 8 日-2009 年 9 月 7 日。

根據表 2，在八八風災後，災難報導經統整後可概略包含下列重點議題：

- (1) 越域引水成幫兇，水利署有官商勾結之嫌。
- (2) 政府未發佈緊急命令，錯失救災先機。
- (3) 國軍救災動作慢。
- (4) 國際援助意願，遭政府拒絕。
- (5) 官員救災無力，不適任。
- (6) 氣象預報錯判，氣象局失職。

上述議題顯示媒體透過新聞採訪和報導不斷挖掘新的人為原因，這使得當知識、法制與科技等層面越是自由發展，則人們將越知道更多過去所不可預測的未知事物，而掉入更大的不確定性、更複雜的可能性與更多的風險。這種風險事實上透過媒體與報導不斷自我「論題」化，並且與社會

不斷分化，而不斷普遍化並且逐漸存在於日常現象之中。於是，原本定調的天災再也不是天災，天災有了人爲知識的理由，同時，天災也是社會制度性脫序的後果。再加上由於現代性與分化是必然伴隨發展的，由於越域引水作為系統分化的措施之一，因此，八八風災必然也必須與越域引水有關，同樣的，也與政府、軍方危機處理能力、官員個人能力及氣象預報相關。由是，專業與理性化的新聞媒體報導，事實上是透過知識帶來了更多分化的風險。

除了由觀察與詮釋而創造了風險，災難報導的第二個意涵強調媒體在風險社會中有其正面的積極意義。由於 Luhmann 強調的風險是人爲的社會脫序性，社會分化是必然的方向，但分化的終點卻沒有固定的目標，換言之，並不存在絕對的真理觀。這使系統理解到由於理論思維的有限性與不確定性，風險的概念是相對被比較出來，而非「絕對」真理的存在。因此，對新聞媒體而言，不斷小心翼翼地反思，使在新聞自由思想下，達到促進社會變革或實現社會理想，也成了風險社會中媒體的責任與正面力量。這說明了由於過去對類似八八風災事件缺乏足夠的理論與認識，於是藉由媒體報導，除了使上述的政策制定、水土保持、施政效率、官員能力與氣象報告等層面均風險化，它們也同時扮演反思與改進的力量。一方面，這些反思的力量在創造分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成為降低社會複雜性的必要途徑，新聞報導因而弔詭地「既是創造風險，也是解決社會風險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風險的不確定性，使得媒體的重點不在宣導絕對真理觀，因此左派人士與右派學者的終極真理信仰，都將被風險社會所超越，並使風險社會理論不循左右傾激進理論途徑，風險社會理論成為是一種為應付高度複雜的社會所建立的實際標準或價值。

媒體報導作用在於簡化社會複雜性，對 Luhmann 而言，社會系統就是雙重偶然性的產品，因此，降低社會複雜性旨在降低雙重偶然性的危機，而建立雙重偶然性的避免機制就有賴社會系統中的意義與溝通系統發生作用。亦即，由於社會中相遭遇的行動者所產生的相互期待和互動反應的不

可完全預測性，而產生社會系統中行動脈絡的複雜性，使行動者之間反思性的溝通與協調成為必要。因此，行動者對雙重偶然性的不同「理解」程度和期待，就構成社會系統的基礎，於是社會系統中的「心理系統」與「符號系統」扮演重要角色，心理系統解決預期和期待，而符號系統牽涉到社會中溝通和意義傳播的必要性，均建立在現代社會之不完全理解和預測的這種雙重偶然性上。

再回到上表 2 所列舉的八八風災發生後一個月內，媒體對政黨行動者的報導。八八風災造成了台灣嚴重的死傷與財物損失，更導致社會的恐慌。較傳統社會而言，現代社會對人的控制力越來越低，因此當災難發生，容易產生整體社會的結構失序。在失序與秩序之間存在的即是雙重偶然性的心理期待經驗，媒體透過提供資訊與平台，提供各個不同利益的行動者，不斷地以反思性的溝通，而逐漸減少和排斥任何不利於行動實現，或不利於行動者利益的消極因素。這也就是說，與利益相關或行動實現的有利因素，會利用媒體不斷發展和穩固，新聞報導因此不僅提供個人反思性的選擇，更促成了兩個行動者之間的溝通與協調。

八八風災發生後的二週內，社會秩序渾沌未明，個人社會不僅面對有機社會的連帶耗弱，又同時面對因災難導致快速重新凝結的集體意識，兩者難免產生社會文化失調。此時，政黨做為社會行動者，被期待必須迅速解決社會系統危機，媒體系統頓成政府釐清事件的指引之一，但同時，媒體系統同樣也是在野論述與溝通的場域，因此也成為在野行動快速滲透執政黨的途徑，迫使執政者必須實現「逐漸減少複雜性」的行動。於是，執政者在媒體系統遭遇「救災失序」、「災民安置」、「官員無能」、「拒絕外援」、「越域引水」、「達賴來訪」及「倒馬」等指控與行動，必須不斷以「擴編預算」、「安置災民」、「外長辭職」、「劉揆下台」及「拒見達賴」作為選擇行動，並重啟外援合作、重審越域引水工程，以減少由他者（在野或人民）行動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不僅如此，如同 921 地震翻

版，風災過後亦程序化《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與《國土復育條例》等法規，成為政黨行動遭遇對抗及社會繼續分化的結果。

立法院今將協商攸關八八水災災後重建經費法源的重建特別條例草案，可望就朝野最大歧異的特別預算規模與舉債議題達成共識。立法院長王金平昨呼籲，舉債涉國際債信評等問題，四年五千億擴大公建經費中，今年度與明年度均有可調度應急的空間，政院應考量如何「移緩濟急」！。（〈王金平：擴大公建預算，可移緩濟急〉，自由時報，2009年8月26日）

簡言之，由於社會的雙重偶然與複雜性的不可預測，使得媒體與其它社會制度擔負起幫助人類或政黨行動者適應社會，使人們在事件或災難中得以更有能力應付新生的問題，這一方面似乎呼應了傳統「制度理論」（theory of institution）的論調，也就是在制度建構中以完成自我組織化，以達到使個人行動可以更放心的效果。然而，社會系統不只是依賴制度分化就可滿足所有不確定性。制度嚴格來說只是社會系統的一個面向，社會系統比制度更加複雜，因此不只是制度協助個人或政黨適應社會，社會系統的分化更應是一種為了符合行動實現的目標，而建立的多樣化世界。這個系統的建立需要制度，也需要媒體連結各個分化的制度與人們，才能達到多樣化人們的滿足。也就是說，媒體作為意義與傳播系統，將與大眾心理系統交互作用，使社會中人們與政黨的行動，會與社會關係及其它行動者相互作用。亦即，行動者將不只是依賴自己的決策而已，更依賴自己與週遭的複雜關係，同時也受牽制於系統中其它行動者的行動實現程度，如何影響自己的行動。

因此藉由媒體報導，人民與在野黨皆作為各自獨立的行動者，不論其行動如何影響或滲透到執政黨的自我意識中，也不論執政者如何透過媒體而在意識層面中，理解或掌握其人民與在野行動者的行動期望與計畫，在雙重偶然下，人民與在野行動者的行動皆在執政者的自我與行動邊界之

外，以獨立的運作邏輯而產生執政黨所無法控制的影響力。於是，儘管執政者掌握行政資源優勢，但卻無法控制在野與人民，所以八八風災擊倒了一個內閣，並將國民黨總統的施政滿意度沖刷至歷史低點，不僅如此，監察院與立法院聯合提出糾正，甚至連獨立於前二陣營行動之外的氣象預報中心，都因為氣象預報準確率（原本的科學問題），而成另一個自己未意識到會遭受他者行動襲擊的額外受創者。媒體因此在 Luhmann 的風險社會中，不僅中介，並積極參與了行動本身。人們在社會生活上的媒體與知識，因此決定了人們理解程度的多寡，也就決定了政治行動的能量與壓力，啟動社會系統的變化，弔詭的是，一則簡化社會，二則繼續分化社會，而取得社會的秩序重整。

伍、媒體與報導的定義關係

媒體作為一個符號系統，在社會系統與行動發展中不斷演化，而符號本身的分化卻又導致了社會系統與行動的分化。媒體與知識所啟動的政治與行動，不僅是現代性之結果，也是風險社會的關鍵力量，而這個關鍵就在 Beck 所強調的對於「知識」的重視。Beck 認為的風險社會其實就是所謂「非知識」存在的狀況，而產生自我對質的矛盾情勢。如同 Giddens 認為風險是現代性的後果，同時也是第二現代性的原因，也類似 Luhmann 所指的雙重偶然性同時是造成現代社會複雜化與秩序化的弔詭位置，Beck（1999）深具自我質疑的反思性，說明了一種對自己所處位置「安全」與否的不再信任，而風險則成為介於「安全」與「破壞」之間的中介狀態。換言之，對風險態度的是否感知或意識，才是決定風險存在的關鍵，這使得上文中媒體所構成的溝通與意義系統，對 Beck 所指的風險社會具有新的意涵，亦即透過媒體產生的文化認識與定義才是真正形成的風險。

這種對風險的認識更進一步深化了媒體在風險社會的重要性。在 Luhmann 的雙重偶然性與二階觀察中，媒體報導不但是世界的觀察者，媒體本身也是被自己觀察的反思對象，結合 Beck 的論點，反思媒體的參與和觀察世界的方式，就在於因為媒體代表一種「定義」社會與文化的制度化力量，而也內蘊啟動現代社會結構變遷與行動的力量。在現實社會實踐中，媒體直接連結了政治、科學與大眾文化，媒體報導的聚光燈效果焦點化了原本隱蔽的事件，並定義了文化認識的框架，而使得媒體本身就成為建構風險的場域。Beck (1999) 在風險社會中稱這種影響文化認識的因素為「定義關係」(relation of definition)，這種定義關係意指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形成風險識別與評估的特定規範、制度及能力 (Cottle, 1998)，這使定義關係成為隱含著認識論的、因文化而別的，且帶有權力與規矩的概念。媒體存在的重要性不只是單純的報導與資訊提供，也就是說不僅是在認知層次上提出什麼是危險的警告，而是媒體系統或制度的存在預表了提出警告的可能性，而造成了一種心理上的期待，並導致一種有條件的準備狀態，提供了一個被期待的狀況中建立一個系統的機會。這個機會的可能性在媒體科技、現代化與制度化的發展下，全面演變成現代性的特徵，然而，卻也在同樣過程中不斷重申人們對於非知識——也就是無知——的無知。

馬政府處理八八水災不力引發民怨，馬英九總統昨在南投公開道歉，但朝野要求內閣改組聲浪高漲，行政院長劉兆玄、經濟部長尹啟銘、國防部長陳肇敏和農委會主委陳武雄等昨都被點名下台；國民黨立委邱毅直言：「救災告一段落後，最遲年底，內閣一定要改組。」（〈救災不力「內閣應改組」〉，蘋果日報，2009 年 8 月 16 日）

據此，媒介系統的存在因而具有下述兩個層面的意義。首先，媒體報導在制度上建立了人們隨時面對意外的意識，並內化成個人心理系統的一部分。因此，當一個預料中的颱風災害，加上部分超越過去知識範圍的意

外狀況發生時，結果並非是一般人意外於災害的可怕，而是吾人將意外視為幾乎必然，並自然地預期媒介論述將生產人們尚未得知的知識，並創造不穩定的知識與危險的文化知覺能力。於是八八風災中，人們預知「有人」要下台、「有人」要負責，只是不曉得（即無知於）這次要「懲罰」的範圍與程度？也不清楚（無知於）如何生產合理論述以正當化懲罰行動？因此，也許行政院成為媒體攻擊的目標不令人意外，但氣象預報中心受到波及倒是少見；同樣的，內政部受到責難可以預期，但外交部長先行下台則屬「預料中」的意外。現代性已反思性地、預期性地由新聞媒體系統演化成內在心理系統，而集體心理系統將是改變社會系統，特別是政治系統的前提。

第二，定義關係乃是媒體報導中連結「預期心理」與「社會系統」的核心。依 Beck 所言，知識生產越多只會導致對非知識狀況的意識增強，而風險即在非知識的不斷上升。因此，當媒體「定義」的能力越高，在 Luhmann 的風險社會中表示的是符號做為社會分化系統的能力越強，因而一則發揮穩定社會秩序的力量，二則繼續分化社會。而在 Beck 的風險世界中，則意味著新聞報導決定風險的能力越積極，也越強大。因此，媒體報導成為定義關係的一環，建立了風險存在的知識，使危險具像化而轉成風險，結果，颱風是危險，但「越域引水」是新的風險，並使得山坡地開發、國土復育等議題都有了新的風險意涵。同樣的，氣象預報技術的準確率是科學上可能的缺點，但從未如此具體化為社會秩序與制度上的不確定性，並將社會制度的質疑直接連結到人們心理系統，而成為日常生活的風險。

八八水災讓高雄縣成全台受災最慘重的縣市，特別是將高屏流域的荖濃溪、旗山溪水引入曾文水庫的越域引水工程，所經的桃源鄉、那瑪夏鄉及荖濃溪及旗山溪下游的寶來村、小林村，都是重災區，災民直指該工程是「禍首」；馬英九昨面對小林災民陳情時強調：「工程已停止！」但《壹週刊》昨披露，該工程包商之母即是水利署長陳仲賢的乾媽，質疑該案還

涉官商勾結。(〈災民：越域引水滅村禍首，水利署被質疑官商勾結〉，蘋果日報，2009年8月20日)

媒體報導不斷改變社會並使之風險化，並且，如果百年來媒體與新聞發展是跳躍式的，則風險社會也幾乎是革命式地變遷。例如，儘管颱風造成的災害是客觀的事實，但一旦社會制度介入，則只剩下社會式的現實，換言之，儘管歷歷在目的媒體報導表面看似不斷再現風災事件，但媒體的報導，事實上正在改變事件的原始面貌與本質。在傳統新聞學或傳播理論中，這種再現的觀點往往以「框架」(frame) (Gitlin, 1980) 或「媒體包裹」(media package) (Gamson & Modigliani, 1989) 來解讀，如果更進一步，則通常會構連「權力」的作用，而使媒介報導的行動與影響，有效地嵌入社會與文化脈絡而情境化事件。然而在風險社會中，媒介報導不僅是框架或權力的作用如何扭曲了再現的事件，媒體報導的本身就是社會行動，藉由提供知識和支配知識，重組了任何事件的物質與非物質技術，使事件發生或被生產過程中，其過去賴以理解或運作的專業分工理性產生自我對質與批評。

因此，媒體的定義關係的支配能力重構了風災、山坡地保持、國土開發、官商勾結、監察系統、民主政治與社會行動，而使得過去講究效率與理性的政治、商業、工業建設與社會運動陷入再一次的混亂危機。同樣的，媒體對救災步調的論述也造成了內政、外交、軍方，甚至是立法系統的新關係。它們共同的特色有二，一方面，儘管似乎每一次的風險皆有辦法尋求到事件的解決之道或安置手段，然而期望建立出全新的、具有永恆的、普遍性的合理性，以作為之後的日後長久的解決之道，卻是不可能。因此風險的意識在於提醒行動者，任何事物的本質皆須不斷面對下一次的新挑戰，而下一回合卻往往未必合於當前理性價值的共識。另一方面，這些新的社會關係皆含有新知識、新定義，並有社會行動與政治行動，這也就是說，風險社會中媒介的定義關係具有賦予政治與社會行動的能量。因此，

媒體報導的關鍵不在於表面地刻意混淆或釐清事物，媒體存在的內涵便是建構風險，並擁有推動風險社會普遍化與流動的動力。

風險因此說明了「知識」決定「定義關係」，而定義關係產生作用或影響行動的動能，接合了風險社會中的從「知識」到「影響」的關係。這種關係代表了兩個意義，首先，它重申了 Beck 上述的論點，風險的影響受限於知識的存在與解釋。然而不只於此，「影響」的本身不能跨越知識的範圍，也就是說，媒體有能力決定社會影響的範圍。因此，覺得水土保持很重要，與人們正在承受官商勾結或土石流的巨大風險是兩回事，當然與社會行動的產生仍有一定的距離，但新聞報導擁有接合它們的能力。這也就意味著「知識」得到了決定結構與行動的主權，並成為了風險社會的結構與動力基礎。

原住民青年學子透過網路發起「八八水災臨時抗議集體行動」，以控訴政府救災不力，活動發起人東華大學學生胡哲豪昨說，等災民情緒稍微平復後，將到總統府、行政院或災區現場抗議，為族人發聲，現已有近 50 人響應。（〈原青發動 府前抗議〉，蘋果日報，2009 年 8 月 16 日）

其次，媒體報導或其它知識的來源有效地、並必要地做為接合的手段，連接不確定的社會氛圍並做出文化解釋，這種文化解釋將在電視、電影，甚至到網路的或資訊社會裡得到擴張的可能。任何事件若沒有媒體的中介，則意味失去重要的一個途徑來具體化文化現象，則其影響就無法被認知與討論。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意味著媒體報導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有各有其義，因此媒體所推動的風險意識在不同的脈絡中將有不同的情境解釋。甚至，不同立場的「專家」與不同立場的科學研究都成了風險社會中不同陣營的使用工具，以競爭知識與科學詮釋的正確性。於是，對執政黨媒體而言，八八風災的傷亡慘重，一方面是災民面對突如其來的龐大災害，沒有做好充份的準備所致，二方面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溝通管道未

暢通。但對在野黨媒體而言，則是執政效率不彰，政府麻木不仁。雙方定義的差異不但導致執政與在野政權的衝突，也提高了政府與人民的緊張關係。

衝突的表面化正說明媒體的內在潛能在於決定行動與影響，媒體在風險社會中的地位，於是有凌駕於其它政治或經濟等制度之上的可能。在傳統馬克斯主義的左派論調中，經濟構築的下層結構決定著其它社會制度的運作與地位，而經濟關係則是由生產關係的本質所決定，因此由物質、生產關係、經濟結構，與媒體或其它次系統的線性決定關係，也大致決定了當代的批判邏輯。然而在風險社會中，社會真正存在的特徵是風險、不確定性與反思性，因而媒體或文化機構、定義關係、風險意識、行動與結構的作用，才是世界風險社會的動力關係。事實上，媒體的文化敏感度與定義關係，常構成真實危機存在、風險意識產生以及處理的時間差，這又往往造成經濟上的龐大收益或重大災難，因此當第一現代開始的技術風險，轉向經濟風險、健康風險或政治風險的自我轉變時，往往是整個世界社會結構的巨變。

因此，在風險社會中，定義關係有了取代生產關係，而成為現代社會的結構基礎的理由。然而如果生產關係不是這個風險社會的結構基礎，則媒體推波助瀾的社會變遷到底所指為何？回到風險的最早論述中，媒體所揭露的風險是普遍性的，因此突破階級與國家，然而事實上最重要的部份在於打破 20 世紀之前，傳統現代主義所建構的二元論社會區隔，其中包含了人與動物、自然與文化、身與心、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等（Haraway, 1991）。這使得媒體建構的社會已帶有「混合」的色彩，混合了物質真實（現實）與想像真實（真實存在的未來）。換言之，風險社會成為混合了媒介與認識的混合物，並不斷生成文化定義與政治潛能而繼續混合文化與政治，也因此，媒介就是風險的一部份，而且也是風險中用來觀察、評估與批評自身的結構。

陸、結論與批判

不論是 Giddens, Luhmann 或是 Beck 的看法，風險社會皆為現代性的產物，他們三者都對傳統現代性計劃提出不同的批判，認為這種計劃實乃阻礙了對現代社會變遷的理解，他們三者又同時展現了觀察社會結構與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Luhmann 觀察到了社會在結構功能分化之後的高度複雜性以及雙重偶然性之下，創造的風險社會，透過八八風災個案，新聞媒體成為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制度，不但觀察報導社會事件，同時也必須是被觀察反思的對象，這也說明了風險社會中反思性的「二階觀察」的重要性。根據這種看法，媒體將不斷分化，並透過溝通與傳播系統之姿，連結社會的行動者與社會系統，而產生推動高度分化社會的能力，與簡化社會複雜性的使命。

從 Luhmann 高度分化的社會結構來觀察，媒體的各部門運作其實與其它社會系統無異，皆為一種封閉的自我生產系統。換言之，新聞媒體的生產其實在大部份的情況下，與外在環境保持著微妙的區隔關係。如同上述各學者所意指，新聞因而不會是反映外在社會真實的系統。透過新聞編、採、寫與內容篩選過濾的守門過程，新聞服膺於媒介邏輯而非道德邏輯，於是分線、截稿制度決定了新聞的核心生產要素，新聞因而建立了屬於自己利益的基本元素，自我組織成是為了市場而運作的符號再現體系，這使得分辨新聞良窳的方式不在其是否適切的再現社會，新聞系統內在邏輯之首在於市場經濟，而經濟也順勢地商品化了所有的新聞內在，因此任何災難新聞的報導，看的不外乎是衝突、奇異與誇張，為的是市場價值。

除了市場導向，由災難新聞中，可發現新聞作為一系統的第二個特徵是政治立場，儘管在本文中聚焦於媒體制度化或結構化地製造不確定感與風險，但事實上媒體由「認知」到促成社會行動中，媒體對特定議題（例如政府救災等）的強調多因政治立場而有其強弱不等。據此，新聞系統弔

詭地由應該是扮演一個社會中傳遞知的角色，成為市場的追逐者與政治意識的機器，因而在這個封閉的系統中，透過媒體善良報導而認識新聞是極端不易，而新聞系統也演化成透過媒介邏輯、市場導向與政治傾向以自我指涉。因此，新聞系統成為了內在扭曲，但卻充滿效率的封閉系統，並且持續自我封閉，不斷自我再製地運作，同時也切開了新聞與環境之間的直接連結。換言之，新聞媒體的風險建構，儘管是制度性的事實，但卻是社會系統承受了媒體組織惡化的後果。

新聞媒體在 Beck 與 Giddens 的風險世界中，有不一樣的意涵。原因在於這兩位學者不是看到了現代社會高度分化的必然性，而是高度理性的危機，因此，現代性將由內而外產生質變，也就是所謂反思型的現代性或第二現代性。媒體是為現代專家系統，不僅專業運作的理性邏輯已經是超越時空而存在的標準化，因而帶有抽象系統的符號意義，媒體與新聞報導本身更是產製符號的社會制度，於是任何一則報導、一個影像，都促使並強化了時空分延與抽離化的效果，使得人們對於媒體與新聞只能寄予全然的信賴。然而媒介制度不僅發展快速，而且導致的社會脫序常構成現代社會中「非意圖的結果」，媒體報導往往有假新聞自由之名，而行攻擊對手之實，新聞媒體於是走入自己的運作邏輯，卻也脫離人類理性的控制，媒體制度因此構成 Giddens 口中「現代性巨怪」的一部份，成就人們心理系統中的焦慮與反思，並由反思打開第二現代之門。

同樣在災難報導中，不但看到媒體成為橫行的專家系統，也意識到了人們對新聞報導失控的擔憂，並且，當新聞的內容越多，則人們意識到 Beck 所強調的無知也越多。是理性化專業分工導致現代人在越高度現代性下，越失去理解其它知識的能力，而使媒體從中找到填補人們知識的缺口。於是，不僅是媒體的專家結構構成風險，每一則新聞片段皆代表一種知識的力量而支配「定義關係」，並決定了社會影響的程度，也就是決定了政治與行動的能量。媒體於是成為一種力量——一種形成風險社會的基礎，也是一種驅動現代性的力量。由於這種現代性的動力在於反思性，因此脫離了

傳統馬克斯理論中的生產關係的機械決定論，於是透過媒體，知識構成風險社會的新動力，也使得任何的媒體、新聞與內容，都成為注入風險社會能量的因子。

至此，八八風災是個災難，但並不是風險，是透過媒體、報導，或訊息的生產，才成為具體風險。透過 Giddens, Luhmann 與 Beck 的鉅觀風險社會輪廓，災難報導連結社會結構與行動演化，創造媒體巨怪卻生產不確定，並透過知識的支配而取代過去生產關係，成為社會的動力來源。於是，未來被納入現在，成為時間上恆久的風險；空間被跨越而成為全球的風險；而階級因生產關係的被取代而消逝，使風險脫離階級，任意蔓延。然而在這過程中，風險並不能只是被動地被合理性，媒介與新聞也不能消極的被認定是第二現代必然之產物，本文強調透過災難報導的新聞再現，它不僅是第二現代中脫離理性的巨怪，更重要的是理解到媒體成為內在扭曲的封閉系統，但卻掌握知識與定義權力，而對社會世界產生威脅。因而，對新聞系統性偏差的結構調整，特別是對其來自市場與政治的內在偏差的推翻與不斷批判，即成為矯正媒體系統，以促進社會系統整合與均衡的首要前提。

本文著重於以系統的觀點，從社會鉅觀理論視野切入新聞媒體報導的「結構」性角色，因此援引八八風災為例，著重點在於新聞生產「風險」的社會建構過程。然而若要對媒體的風險定義決策有更深刻的分析，則媒體組織內部的決策與報導方針的研究有其必要，因此，本文建議未來的研究與分析，可以就媒體在風險社會中，其組織決策與影響的內部因素加以討論。

參考文獻

- 高宣揚（2002）。《魯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台北：五南。
- 高宣揚（1998）。《當代社會學理論（下冊）》。台北：五南。
- 陳文嬋、楊菁菁、曾鴻儒與曾慧雯（2009.08.15）〈那瑪夏崩山，10 秒活埋 25 人〉。《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10 年 4 月 25 日，取自「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aug/15/today-fo5.htm>
- 鄭志文（2009）。〈重構媒體全球化：由第二現代看媒體與符號空間經濟〉。《靜宜人文社會學報》，3（1）：55-80。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eck, U. (1999).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ck, U. (2009). Critical theory of world risk society: A cosmopolitan vision. *Constellations*, 16(1), 3-22.
- Boholm, A. (2008). New perspectives on risk communication: uncertainty in a complex society.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1(1), 1-3.
- Boudia, S., & Jas, N. (2007). Introduction: Risk and 'Risk Socie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istory and Technology*, 23(4), 317-331.
- Cottle, S. (1998).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and the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1), 5-32.
- Frisby, D. (1992). *Simmel and since: Essays on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Gamson, W.,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 1-37.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ande, E. (2006). Cosmopolitan political scienc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7(1), 87-111.
-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Jarvis, D. S. L. (2007). Risk,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ate: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Ulrich Beck and the world risk society thesis. *Global Society*, 21(1), 23-46.
- Lash, S. (2003). Reflexivity as non-linear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2), 49-57.
- Luhmann, N. (1993).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Ritzer, G.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 Wimmer, J., & Quandt, T. (2006). Living in the risk society. *Journalism Studies*, 7(2), 336-347.

研究論文

從社區機構觀點探討大專校院服務學習之督導功能^{*}

胡憶蓓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兼服務學習發展中心主任

收稿日期：2011 年 1 月 24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1 年 11 月 28 日。

^{*} 本研究獲靜宜大學 97 學年度教師專題研究經費補助，本篇論文根據該成果報告的部分內容改寫而成，感謝靜宜大學經費補助。研究者在此也感謝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呂文惠教授、吳俊憲教授、王金國教授，以及《靜宜人文社會學報》審稿委員給予之建議與指導。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為主，從已合作過的機構觀點，了解社區機構與靜宜大學合作推動大一服務學習課程之督導功能。研究結果顯示，機構必須認識大學服務學習學生的特質，並耐心面對學生的態度問題。在督導服務學習的歷程中，機構也應提供教育性、行政性、與支持性的功能，給予學生一個學習的機會與經驗。因此，社區機構已逐漸走向教育的第一線，成為大學生的社會教育導師，與大學攜手合作，共同為高等教育貢獻心力。

關鍵字：社區機構、服務學習、大一學生、高等教育、督導功能

A Study of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s of Servic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Perspectives

Yih-Pei Hu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 & Director, Center for Service
Learning Development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by 51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BOs) about how they perceive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s of the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 performed by first-year students in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BOs must be awar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be patient with their attitude problems. And CBOs should also fulfill with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and supportive functions throughout the service learning process by giving students a learning opportunity and experience. CBOs, thus, are coming towards the front line of education, becoming a mentor of students' social education, working with universities, and dedicating themselves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CBO), Service Learning, First-Year Students, Higher Education, Supervision Function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美國一項研究發現，自 1980 年代以來，大學生同理心已喪失四成，2000 年之後更每況愈下，稱現在的年輕人為「唯我世代」(Generation Me) (聯合報，民國 99 年 5 月 30 日)。中原大學程萬里校長也說，現今青年學子個人意識抬頭，只知要求個人權利、卻不願意承擔群體責任；甚至為求個人利益而傷害他人或公眾權益 (2009)。如何拉近學生與社會的距離，激發學生關懷社會的態度，是日漸重視社會責任的高等教育極需關心的議題。哈佛大學負責大學部的哈佛學院前院長 Harry R. Lewis 認為大學教育內涵應該著重公民素養的培養，非一味標榜知識菁英的型塑 (轉引自朱金池，2009：30)。而大學通識教育的目的即戮力提升學生人文涵養、拓展多元文化視野、培養世界公民的素養與能力 (林思伶，2009)。

近年來，台灣大專校院積極推動服務學習課程，即是體現通識教育精神、達成通識教育目標的積極作為之一。例如，台灣大學自 1998 年推動屬勞動服務的全校必修服務學習課程，2006 年修正為更多樣式的服務模式 (馮燕，2009)；輔仁大學於 2001 年推動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再逐步向下延伸至通識課程內涵 (徐明、楊昌裕、葉祥洵，2009)；靜宜大學於 2004 年推動全校性大一服務學習課程 (胡憶蓓，2009)、2008 年逐步建構行動導向的通識課程、2009 年正式將大一服務學習課程納入通識核心課程 (林益仁，2009)。楊昌裕指出 2002 年國內 136 所大專校院有 74 所學校表示正在推動服務學習工作 (轉引自徐明、楊昌裕、葉祥洵，2009)，2008 年教育部督促各大專校院開設服務學習內涵課程 (教育部，2008)，推動學校的比例更大幅增加。以上種種，在在期望學生透過服務學習，與真實社會產生互動連結，藉此更認識自己與世界，涵養全人的生命教育。

然而，殷小平（2009）認為深化通識教育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不在理論的提出，而是理念的落實、課程的設計與教學品質的提升，優秀的師資更是深化通識教育的核心要素。對於服務學習課程來說，其運作模式有別於一般傳統課程，除任課教師之外，還有其他「教師」也深深影響課程品質，那就是督導學生服務歷程的機構人員（本文簡稱機構督導或督導）。曾華源依據社會工作教育者 Towle 的解釋，指出督導工作即是透過行政程序來達成教育性目標的過程（轉引自林勝義，2006：258）。正因為台灣大專校院推廣服務學習，許多社福機構受邀合作，這些「兼職教師」原也都有自己例行工作業務，突然要督導一群大學生，如何督導是一大問題。因為服務學習學生的動機不同，參與和管理的方式也不同，機構往往需要一段磨合期，才能摸索出一套督導大學生的模式。而這樣的教育夥伴觀念與實際方式，是需要時間加以孕育成形（Jacoby, 2003）。

研究者發現社工領域早已深入探討督導社工實習生的歷程，以及督導應扮演的角色和展現的功能，但是在服務學習文獻中卻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即是嘗試透過與靜宜大學大一服務學習課程合作過之社區機構，從過來人的經驗與觀點，分析大學生服務學習的督導功能，期使提供其他欲與大學合作的社區機構快速進入狀況，減少合作初期摸索磨合的時間與挫折感，進而提升服務學習課程品質與通識教育成效。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乃以問卷調查為主，佐以深度訪談，從機構的觀點來探討大一學生進行服務學習時督導應展現的功能：

- （一）探究機構對於大一服務學習課程學生之督導功能。
- （二）了解機構在督導歷程中的行政、教育、和支持功能方面的具體作法與困

境問題。

貳、文獻探討

研究者查閱國外文獻嘗試找出探討機構該如何督導學生從事服務學習的研究。發現有從機構觀點探討推動大學生服務學習遇到的障礙，例如，機構人員時間的投入、訓練與教導學生的能力、學生沒有具備直接服務的能力等（Tryon, et. al, 2008）。但是，尚未發現有關機構應該「如何督導」、督導工作具體內涵的相關研究。反倒是社工專業領域，長久以來對於督導的職責與功能深入探討，包含督導者的教育、行政與支持性的功能，以及如何有效管理志工的方式等皆多所論述。因此，以下文獻探討乃自社工領域之社福機構督導與志工督導定義起始，然後從志願服務與服務學習的差異，轉而了解督導服務學習學生的困難與問題，作為本研究的背景基礎。

一、社福機構之督導與志工督導的定義和工作

督導是一種教育的過程，Kadushin 指出 Virginia Robinson 於 1936 年 *Supervision in Social Case Work* 一書即提出此看法，讓較有知識與技術的人，來訓練較缺乏知識與技術的人（轉引自莫藜藜，2009：255）。廖榮利認為督導亦是透過一種定期與持續的指導，傳授專業服務的知識與技術，以增進受督導者之專業技巧（轉引自莫藜藜，2009：257）。而最常被用以說明督導的種類或功能的則為 Kadushin 於 1992 年所提出之三種類型：教育性、支持性和行政性。教育性功能是指督導應該教導受督導者相關之工作技巧與能力，以增進其專業的成長和發展；行政性功能是指提供缺乏訓練和經驗的受督導者，必要之行政支持、協助與管理；支持性功能則是指提供受督導者心理和人際關係支持的一

種方式（轉引自黃源協，1999：391）。

志工督導，即是以志工為對象的一種督導工作。志工督導的重點工作則包括：（1）安排志工的服務工作；（2）增強志工的服務動機；（3）提供志工的服務諮詢；（4）處理志工的服務問題；（5）落實志工的服務評量；（6）改善志工的服務品質。而志工督導與志工建立良好關係的原則是建立互信的督導關係、及早確認雙方角色的期待、適時提供協助和回饋、做好暢通雙向溝通的橋梁、以及以積極鼓勵代替責備（林勝義，2006）。

丁元亨（2006）認為志工督導在帶領志工相關工作方面，例如，陪伴、訓練、引導志工等，耗費之心力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可惜國內許多社福組織雖多有「志工督導」的職稱，但是，這些督導皆非「專屬」的志工負責人，而是「兼職」的（丁元亨，2006），這些人員往往被指定兼辦志工業務而增加負擔（林勝義，2006）。雖然負擔加重，但是朱永祥（2009）認為督導的能力非常重要，其所做的每一件事和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影響志工。鄭錫鍔（2003）認為一個優秀的志工領導者必須在人格上具備若干重要的特質或條件，包含組織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理性思維能力、服務熱忱、人際關係能力、溝通能力、包容力與高能量（指接受多元、更能忍受異見與挫折等）、對環境的敏感度、圓圈式思考能力（指跳脫線性思考），與專業能力。朱永祥（2009）甚至明白表示，沒有「志工」合適不合適的問題，而是志工督導有「領導」上的問題。

二、志願服務與服務學習的定義及差異

志願服務係指個人或團體依其自由意願與興趣，本著協助他人改善社會之目的，而不求私人財力與報酬的一種社會理念與行動（Elli & Noyes, 1990）。Nabti（2006）認為至少要符合公益服務、自由意願，以及無酬的條件，才能稱之為志工。而服務學習，1990年美國「國家與社區服務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中定義服務學習為一教學方法，學生透過學校與社區

詳細規劃組織的服務活動，既滿足社區的需求，又協助學生培養公民責任，並且結合課程，引導學生深刻反省服務經驗中所學到的功課。Cairn 和 Kielsmeier（1991）則視服務學習為教育哲學與教學方法，因為服務學習反映了透過積極參與民主社會提升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公民養成過程中，應該協助學生發展自我的教育哲學；服務學習也是一個透過積極投入與反省課程中融入的服務活動，以凸顯社區真正需求的教學方法（轉引自 Anderson & Pickeral, 2000）。

Nabti（2006）清楚地指出服務學習不是志願服務，服務學習是一教學方法，學生在其中所從事的服務可能是自願的、也可能不是，端視是否符合志願服務的公益服務、自由意願，以及無酬三個標準。顯然，許多大專校院服務學習學生的參與動機並非自由意願，乃是配合學校或教師的教學安排。從這角度來看，雖然服務學習學生所從事的服務與志工所做的無異，但是它可能產生兩個重要的差異：（1）學生不喜歡被強迫，所以只做到所要求的時數即止；（2）若是機構了解學習目標，他們可能會協助加強學生的學習經驗（Nabti, 2006）。林勝義（2006）認為兩者相同之處包含：皆以「學習」作為服務基礎、服務項目多元化、都以社區為優先考量場所、有專人督導、以及提供相關訓練與成長活動。不過，兩者的差異在於：（1）志願服務成年人居多，雖然逐漸擴及學生；不過，服務學習通常以學生為主；（2）志願服務者出於個人自由意志，但是服務學習則多屬學校課程一部分，或學校規定項目，學生較無自由選擇的餘地；（3）志願服務由機構督導負責，服務學習學生則除了機構督導之外，還包含學校教師協同督導；（4）志願服務歷程有其一定的過程，不過，服務學習為配合課程及目標，更有結構性地帶領學生進行反思、討論等過程，促進學習的效果；（5）服務過程中，兩者皆會有所成長與收穫，不過服務學習強調服務與學習並重，實際上可能是學生受益更多。

三、激勵學生志工的方式

對於大一學生來說，他們被迫從事社區服務，不是志工；但從機構的角度來說，這群大學生提供無償的人力資源，的確屬志工性質，這群學生無疑帶來至少最基本的勞力協助（Worrall, 2007）。而 McCurley 和 Lynch 認為分辨不同類型志工的動機與需求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因為每種類型其實都代表一種可以動員來服務社會的資源，而且每種類型的志工，其相對應之參與和管理方式都不盡相同（McCurley & Lynch, 2000）。他們針對特殊督導狀況中，特別指出「年輕志工」類別，在此除了指青少年志工之外，也特別提及選修學校社會服務課程之學生（McCurley & Lynch, 2000），與本研究指的大一服務學習課程學生年齡和背景較為相似。

McCurley 和 Lynch 認為應該鼓勵年輕志工投入，其關鍵做法包括：（1）設計探索生命經驗與事業的機會讓學生去體驗和服務；（2）必須讓年輕人看到自己對機構的貢獻受到賞識與尊重；（3）鼓勵年輕志工，視他們為負責任的工作夥伴；（4）給予年輕人責任，他們就會學會負責；（5）要讓年輕志工了解到自己可以獲得打工賺錢也得不到的寶貴工作經驗；（6）聽聽年輕人的想法；（7）清楚解釋機構政策和標準程序；（8）更仔細的工作職掌說明，也協助年輕志工了解工作其有趣、重要、與成就感的一面；（9）要尊重他們「從經驗中學習」的需求；（10）給予工作直接相關的訓練；（11）讓年輕志工明白自己同意與人相處時維持高標準的行為；（12）請年輕人提供建議，並嘗試落實（McCurley & Lynch, 2000: 230-233）。丁元亨（2006）也舉例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教授透過非營利機構 Albertina Kerr Center 成功組織 500 位志工的經驗來看，提出有效的留住志工策略必須涵蓋 6 個面向：（1）給予適時及中肯回饋；（2）創造快樂及有趣的工作環境；（3）持續不斷的成長；（4）與志工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5）賦予明確工作事項；（6）發展團隊支持。

四、機構督導帶領大學生從事服務學習所遭遇的困難與問題

上述提及之受督導者皆為社工專業學生或志工，對於配合學校課程之服務學習學生，McCarthy（1996）認為許多專為大一學生設計的一次性或短期的服務活動，其目的是為日後服務學習活動奠定基礎。然而，這種短期的服務學習在施行上有其困境，包含服務時數短、機構督導的時間與能力、學生服務的能力、計畫的時程、及大學課程表等（Tryon, Stoecker, Martin, Seblonka, Hilgendorf, & Nellis, 2008）。研究顯示（Tryon et al., 2008），社區機構遇到的困難與問題包含有些學生的態度不好，一副完成服務時數就走人的模樣。進行課業輔導的大學生，往往因服務時數短、學期課業與活動非常多，例如，期中考、期末考、春假等等，導致服務中斷情況，造成服務無法連貫，機構得想辦法填補空缺時段的需求。學生能力與訓練皆不足，學期結束就離去，也著實讓機構困擾不已。Sandy 與 Holland（2006）提出大學硬性規定服務時數，對大學來說容易追蹤檢核；但對機構來說，時數長短應依據經驗與學習內容而定，因為有些服務必須超過規定時數，學生中途離開，造成計畫銜接上的困難。此外，學生習慣於傳統課室方式，對於校外親身經驗的學習模式顯得較為疑惑與害怕（Whitfield, 2005; Ross & Boyle, 2007）。大一學生比較喜歡集體行動、小組合作，較不喜歡獨自服務。學生有興趣學習去為機構做些事情，但又不期望太特別的挑戰，也不希望太複雜的改變（Ross & Boyle, 2007）。

五、機構持續與大學合作推動服務學習的原因

儘管合作機構督導歷程中遭遇許多困難和障礙。但是，研究顯示多數機構仍然願意與大學持續合作，Worrall（2007）指出學生對機構提供的幫助包括：（1）直接的幫助：例如，直接幫助受服務者，大學生的出現，對高中生來說代表進入大學的可能性。機構人手常不足，學生人力的進駐，有效地協助機構完成計畫。（2）社區增能（enrichment）：因接收新資訊，機構獲得新的想法與發展，增強社區的連結網絡關係與功能。（3）社會正義：機構願意指導學生

服務，完全是因為這是對的事、好的事、也是應該的事。這是一種戮力於建立社會正義與公平、強化普世價值、建造社區、達到更佳境界的事。許多機構起初參與的動機是希望能夠獲得新資源（Worrall, 2007），跨越種族、文化、社經背景界線，亦是機構參與合作的動機之一（Sandy & Holland, 2006; Worrall, 2007）。Miron 與 Moely（2006）認為合作愈久的機構愈懂得怎麼引導學生、了解學生習性，而這樣的認知與理解大大提升服務學習的貢獻與益處；也因著實質的助益，使得機構對於大學的觀感較為正面。Worrall（2007）認為機構意識到自己正提供一種教育的模式（Worrall, 2007）。Sandy 與 Holland（2006）也指出，機構督導將教育學生視為一種回報（give back），經驗愈久，機構督導對學生的學習愈有使命感。甚至有督導表示，不將服務學習視為志工的養成，而視為影響學生生命與未來的機會。

綜合以上文獻所述，大一學生既非社工專業高年級生、亦非志願服務的年輕人，所以，社福機構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針對社工專業知能和實務應用的橋梁功能，亦不是一般志工回饋社會的場域提供者。因此，整個服務歷程考驗著機構督導的領導能力，也檢核課程的品質，更影響全人教育的成效。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採取問卷調查量化研究，佐以訪談質性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的選擇

（一） 量化問卷對象：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採立意取樣，排除初次與靜宜大學合作服務學習課程之機構。由機構督導匿名與自行填寫問卷，總計回收 51 份問卷。51 個機構

之服務類別涵蓋身心障礙、老人、婦女、兒童、諮商、家庭、社區與綜合福利等。

（二）訪談對象：

上述 51 份問卷中，註明願意接受訪談者，共計 22 個機構。但後來督導忙碌或其他因素，有 4 個機構單位督導因此取消訪談，其中一個機構改以書面回覆訪談大綱。因此，最後總計 19 個機構接受一對一訪談（含書面回覆），其中包含兩所醫院、一所國中、一所小學、五個社區福利機構、四個老人福利機構、一個圖書館、三個從事兒童福利機構、一個諮商輔導服務機構單位。

二、研究工具

1. 調查問卷內容總計包含 22 題，第一部份屬基本資訊，計 5 題，包含詢問該機構單位的服務項目，單位成立時間及與靜宜大學合作時間，並請機構督導複選與靜宜合作的原因。第二部份計 17 題，從機構對推動服務學習的學校與學生的認識、督導人格的特質，以及督導的三大功能：教育功能、行政功能、與支持功能（龍紀萱，1997）等相關問題。其中教育功能 4 題，乃是指督導提供學生有關機構歷史、工作技能、服務熱忱與創新計畫之相關認知、技能、與情意方面的功能。行政功能方面 4 題，詢問機構有關事前學生條件之要求、服務工作說明、服務中之檢討、與給予多元學習的機會。支持功能 4 題：詢問機構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面對問題學生的反應、以及是否提供特別支持策略等。選擇題的選項分為：應該、沒必要與看狀況等三項單一選擇題，並給予開放性作答空間。但針對人格特質與學習目標等，為複選題。上述問卷內容並參考服務學習五項特質與美國經驗教育學會十項原則所組成之檢核表內容中（徐明、邱筱琪，2009：93-94），有關機構引導學生進行服務歷程的協助工作項目，和社會工作領域之志工應具備之功能等，摘錄與編製而成。問卷題目曾經經過兩位學者專家之審閱與修訂，一是推動品格教育與服務學習方面的學者、另一是

社會工作領域的學者。

2. 訪談大綱則包含詢問機構對於大一學生和一般志工差異的看法，以及帶領學生從事服務的歷程等半結構式之題綱。其他研究工具包含文獻資料、機構座談會紀錄、督導平時學期回饋資料等，進行三角檢驗工作。

三、 研究步驟

問卷調查時間為 98 年 2 月，於開學初舉辦機構督導座談會。參加的機構數為 60 個單位，與會機構人員共 67 人，當場發放問卷調查，鼓勵其填寫問卷（並非強制性）。凡是機構單位與本校合作超過一學期者，皆可填寫問卷。新合作之機構單位則免填。結果當場回收有效問卷 26 份。當場填寫問卷的回收比例為百分之四十三，回收率低的原因可能包含下列三個因素：（1）由於每學期初皆舉辦督導座談會，有些長期合作之督導因熟稔合作模式，所以沒有出席；（2）機構督導指派其他人員輪流參與座談，以致出席者不便代表督導填寫；（3）社區機構志工督導更換頻繁，出席者可能是新手而未填寫，但是機構卻已是長期合作對象。也因此，本研究特別針對此狀況，做了第二階段的問卷調查：座談會後，本研究根據未出席機構督導座談會的名單，立即寄發問卷給 27 個機構單位，回收 25 份問卷。總計 51 份有效問卷。

訪談工作則於 98 年 3 至 6 月間進行。為整併與對照同一機構之問卷填答內容與訪談內容，特將每一份問卷給予一編號，自 1 號至 51 號，以 N1、N2...N50、N51 代表，並註記機構服務類型。由於問卷末詢問是否願意接受訪談，願意者皆留下姓名、單位及聯絡電話，也因此能夠得知每一位受訪者之問卷編號。訪談紀錄則根據原問卷編號加以註記，例如，某一老人福利類型機構填寫問卷的編號是第 19 號（N19），該訪談紀錄的編碼為「老人福利類型機構 A19_980428」，後面六位數字代表訪談日期 98 年 04 月 28 日。在此期間，並蒐集相關文獻參考資料，加以檢驗與佐證。

四、 研究過程

本研究提升信效度包含：原本在座談會中發放問卷，自由填寫者僅 26 位，但為增加有效樣本數，立即寄發問卷給未出席之機構，回收 25 份。因此總計 51 份有效問卷。問卷採匿名填寫方式，以降低機構不方便直說的困擾。每次訪談皆加以錄音並撰寫逐字稿。若問卷上註明願意接受訪談，則因留下聯繫資訊，也方便根據問卷填答和訪談內容做一對照與交叉檢視，解讀其內在可能意涵。但限制是：若是該機構並未接受訪談，則其量化資料較無法更深入的判讀。此外，本研究亦盡可能將不同意見加以對比，期使呈現真實面貌。

五、 靜宜大學大一「服務學習」課程學生與簡介

為使讀者了解靜宜大學大一服務學習課程，在此簡述課程內容與進行模式。此為大一學生必修課、零學分、單一學期。課程第一至四週，授課教師簡介服務學習理念、介紹機構、提供服務前心理準備；第三週，學生上網路系統選擇一服務機構；第四週確認服務之機構；第五週開始服務，至學期末必須完成18小時服務時數。由於大一學生尚未具備專業知能，因此服務工作乃機構根據實際需求而提出，多屬一般性、基礎性的內容，包含課輔、清潔打掃、整理圖書、說故事、帶活動、陪伴老人等。18小時服務時數可能安排在連續兩天、三個週末、或九週，視機構需求而定。由於機構服務內容多元，因此，待學生確認服務機構，機構督導將到校進行職前說明會，或是學生第一次服務時，機構督導必須介紹機構背景與特色、講解服務內涵、教導相關服務技能。從第五週至期末，學生仍須每週或隔週到班級上課，由授課教師帶領學生分享服務經驗，及教授相關議題內容，啟發學生服務的精神與熱忱。此外，每學期初舉辦督導座談會，互相交流意見。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分爲三大部分闡述。第一部分爲機構的基本資訊。第二部分則是問卷結果，從機構觀點分析以下六個面向：（一）機構對服務學習學生的認識與期待、（二）機構督導人格的特質、（三）機構督導的教育功能、（四）機構督導的行政功能、（五）機構督導的支持功能，以及（六）機構與靜宜合作的原因。第三部分是綜合討論督導歷程中的重要關鍵。

一、基本資訊

（一）與靜宜合作之機構服務涵蓋多元，其主要服務項目如下（表 1）

表 1 機構（單位）主要服務項目（可複選）

選項	項目	次數
1	身心障礙福利	6
2	老人福利	13
3	婦女福利	7
4	兒童福利	16
5	諮商輔導	4
6	家庭福利	6
7	社區福利	10
8	綜合福利	6
9	其它	18

填寫「其他」的機構，其主要服務項目如（1）一個月一次關懷育嬰院、

陪讀班；(2) 文教服務；(3) 生態教育；(4) 系所服務¹；(5) 青少年福利；(6) 校友聯絡及就業輔導；(7) 國民中學；(8) 教育服務；(9) 稅捐稽徵業務；(10) 補習學校；(11) 預防保健、健康促進；(12) 綠美化工作；(13) 衛生保健教育；(14) 學校行政協助；(15) 靜宜資訊學院；(16) 環境教育推廣與實踐；(17) 環境衛生；(18) 讀者借還書、輔導鄉鎮圖書館等。其中，有關(10)「補習學校」，由於問卷乃非記名，因此無法確認是哪個機構單位。不過，經由研究者過濾與刪除其他屬性之機構單位，此補習學校應屬一棋藝推廣協會，而非一般營利為主之補習機構。

學生服務機構包含校內單位，乃因 93 學年度開始推行時，校外名額無法滿足全數學生需求，因此開放校內單位共同合作，後來持續與校內單為合作。一來提供多元選擇；二來許多校內單位之服務場域與對象皆為校外社區。因此，本校對社區的定義乃採廣義社群概念，包含學校、社區、社會、國家等（轉引自黃玉等）而非校園圍籬內外之分。目前學生選擇校內單位比例約佔 35%，但若併入校內單位帶領學生到校外服務，那麼，全體大一學生服務校外人士的比例超過八成。此外，校內單位等同校外機構，合作模式一律比照校外機構辦理。在本研究中，校內單位填寫的問卷為 3 份，僅佔全數 51 份中的（百分之六），因此其填答結果仍併入整體調查。

(二) 機構（單位）負責督導學生的行政人員，多為機構單位主管、社工師、及行政人員（見表 2）

表 2 機構（單位）負責督導學生的行政人員（N=51）

選項	項目	勾選次數
1.	機構（單位）主管兼任	16

¹ 系所服務乃指學生到自己系上進行服務。依靜宜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相關規定，每班僅開放約 5-10 個名額至系所服務，且該系所必須先行繳交服務學習計畫書，通過審核即視同合作機構，列入電腦系統中機構選項之一，供學生多元選擇。

2.	社工員（師）兼任	12
3.	一般支薪員工兼任	18
4.	志工	3
5.	其它	6

「其他」的六位填寫的資料分別為：主任、行政會計人員、股長、教師兼組長、組長、護理師兼護理長。這六位督導職務或亦可屬於第三項「一般支薪員工兼任」。因此第三項的人數可增為 24 位。也就是說，填寫問卷的機構，皆為機構內正職人員協助督導大學生服務，51 個機構中僅有 3 個機構單位是志工負責。換句話說，九成以上的志工督導皆為正職與帶職人員，兼職處理學生服務事務，沒有一位是「專職」的志工督導。這頗符合前述丁元亨等文獻所提及台灣社福機構少有「專職」的志工管理人員，自己本身仍有其他業務。此亦可供大學了解社福機構的處境，服務學習課程固然為機構帶來人力資源，但其實亦增加機構額外的督導負擔。

(三) 機構（單位）成立的時間成立 10 年以下者，近百分之四十；10 至 29 年者，亦約近百分之四十。成立 30 年以上者，近百分之二十。有八個機構沒有填寫成立時間（見表 3）

表 3 機構（單位）成立的時間（N=43）

年	機構數目
1-5 年	6
6-10 年	13
11-20 年	10
21-30 年	5
31 年以上	9

(四) 機構與靜宜合作時間超過一年以上的機構佔百分之七十七；超過兩年者，佔百分之五十三；合作四年以上者約佔百分之三十（見表 4）

表 4 機構與靜宜合作的時間（不含填寫問卷之該學期）（N=47）

累計年數	合作學期次數	機構數目	累計機構數目
1 年以下	1 學期	11	11
1-2 年	2 學期	6	11
	3 學期	5	
2-3 年	4 學期	4	11
	6 學期	7	
4-5 年	8 學期	10	14
	10 學期	4	

二、問卷結果分析

（一）機構對服務學習學生的認識與期待

結果顯示（見表 5），47 位督導（約佔百分之九十五）認為機構應該了解大學推動學生從服務中學習和社會一般熟悉之志工概念，其本質有所差異。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督導認為應該了解這些從事服務的大學生的特質，以避免造成期待落差的挫折感。百分之九十一的督導表示機構應該先行了解合作學校推動服務學習的宗旨、規劃、與狀況，以評估機構本身是否能夠配合。

表 5 機構督導對服務學習學生的認識之數據結果

題目	選項（勾選人數）		
	應該	沒必要	看狀況
我認為機構督導應該了解大學推動學生從服務中學習和社會一般熟悉之志工概念，其本質有所差異。	47	0	2
我認為機構督導應該了解這些從事服務的大學生的特質，以避免造成期待落差的挫折感。	45	0	2
我認為機構督導應該先行了解合作學校推動服務學習的宗旨、規劃、與狀況，以評估機構（單位）本身是否能夠配合。	45	0	4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所有機構督導皆提及大學生普遍性的問題，那就是態度！由於是強制性的社區服務，因此，一般而言，學生顯得較為被動，也因此影響其積極性、主動性與配合度，這是與一般志工最明顯的差異。

我覺得其實是差在主動跟被動的態度而已。（社區服務機構訪談記錄 A20_980428）

意願的不同就會影響到他的主動性，他的積極性。（老人福利機構訪談記錄 A26_980327）

至於，機構期待大學生能從服務學習過程中學到什麼？填答結果如下表（見表 6），下列表格乃根據機構督導選擇次數多寡排列，從次數多者遞減排列。

表 6 機構對服務學習學生的期待之數據結果（可複選）（N=51）

選項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5.	社會服務的熱忱	43	84.3
4.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2	62.7
10	服務利他的價值觀	32	62.7
11	建立自我價值感與自信	31	60.8
8.	問題解決能力	30	58.8
2.	對服務對象族群與機構（單位） 的認識與了解	29	56.9
7.	建立公民責任感	26	51.0
3.	尊重社會不同文化	23	45.1
6.	自我反省能力	23	45.1
9.	人生經驗的傳承	21	41.2
1.	服務工作技能	17	33.3
12	其它	2	3.9

另有2位勾選「其他」，並且加以註記：「負責態度」（文教服務機構，亦勾選5、6、7、10）、「抗壓與調適」（諮商輔導機構，亦勾選5、6、8）

由上表顯示，機構對於服務學習學生最大的期望是能夠培養「社會服務的熱忱」，超過半數的機構亦認為「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服務利他的價值觀」、「建立自我價值感與自信」、「問題解決能力」、「對服務對象族群與機構（單位）的認識與了解」、與「建立公民責任感」這些知能與態度是重要的。然而，「社會服務的熱忱」有百分之八十四的督導勾選，其比例遠遠超過第二、三順位佔六成比例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服務利他的價值觀」、與「建立自我價值感與自信」。此外，資料亦顯示，「服務工作技能」一項，雖有17人勾選，但是僅有三成機構督導勾選是較低的比例。

從訪談內容亦可得知，其實，機構督導透過服務學習給予學生一個可以學習的環境及親身體驗的經歷。

畢竟他們只是大學生，剛大一而已，他們只是來學習怎麼樣去幫助別人。
(諮商輔導機構 A30_980504)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短期，或是其實對他們來講只是要有個經驗。(兒童服務機構 A50_980429)

綜合以上所述，合作機構有必要事先了解大學推動服務學習的理念、以及學生的特質。雖然，他們是學生志工、年輕志工，具備文獻所提及之年輕人特質，但是他們與一般志工最大的差別就在於自由意願與否。這是合作機構一定要事前了解與接納的事實，否則容易造成不切實際的期待。另外，機構最期待服務學習歷程能夠協助學生培養的是社會服務的熱忱（超過八成），而非服務工作技能（約三成），這可能與大一學生皆從事較為基礎、簡單易學、非專業的服務內容有關。因此，服務工作技能不是大一基礎性服務學習課程的重點，服務態度的轉變與關懷社會的啟發才是機構最期待達成的目標。

(二) 機構督導的人格特質

由於大學生服務態度的問題，機構提供了他們對於督導特質的看法（見表 7）。結果乃依照選填次數的多寡，依遞減順序加以排列。

表 7 機構督導人格特質之數據結果（可複選）（N=51）

選項	項目	勾選次數	百分比（%）
1.	耐心	48	94.1
2.	愛心	44	86.3
續上表			
5.	善於溝通	44	86.3
3.	體諒	40	78.4
6.	規劃	40	78.4
7.	彈性	40	78.4
4.	穩定	39	76.5
8.	責任感	38	74.5
9.	其它	3	5.9

有三個機構勾選「其他」，並撰寫其它特質的需求，包含「好脾氣」（諮商輔導機構）、「給予利他的價值觀」（系所服務單位）、「檢討學生反應,適時回應,改善」（綜合福利機構），而這三個機構亦都勾選 1 至 8 所有選項。從上述結果顯示，機構認為與大學合作推動服務學習，機構督導必須具備下列特質（按勾選次數多寡順序排列）：耐心、愛心、善於溝通、體諒、規劃、彈性、穩定、與責任感。其他的還包含：好脾氣、給予利他的價值觀、檢討學生反應、適時會應與改善。不過，佔九成以上的機構認為督導必須具備耐心，而從訪談過程中問及督導態度時，所有督導立即的反應亦是耐心。雖然，耐心是待人處事本該具備的基本特質，但是對大一服務學習學生的機構督導來說，該特質尤顯重要與迫切。以下摘錄數則訪談紀錄，亦可凸顯機構督導需要耐心、體諒學生、以及不斷溝通與教導的特質：

既然這個機構答應給學生來，這個機構來講，也要有點耐心。（老人福利機構 A19_980428）

或許學生一開始非出自自願，是因為課程學分要求，但進入機構以後，學生還是會希望自己的表現，能夠得到機構的肯定，為自己以及學校建立好的口碑，所以，我覺得服務學習的學生比起本會自行招募的志工，更需要鼓勵與肯定。（兒童福利機構 A18_9805）

了解他們的弱點啦，就說，...他可能比較沒有責任感...我們就是沒有關係，原諒他，原諒他，但是我會再提醒、會再提醒，大概就是這樣調適...。（社區服務機構 A51_980505）

亦有機構提及督導本身的理念對學生教育具有重要影響力，她說：

如果就站在孩子，孩子他出去服務，我們當然也希望他真的有收穫，而且孩子能夠被保護到...如果有一些督導，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理念不是很適合，那反而造成很大負面影響。（社區服務機構 A51_980505）

上述從機構觀點來看督導人格特質的期待，不比對大學教授要求來得低。機構督導個人的良莠會影響學生學習過程的品質與成效，這也呼應前述通識教育對教師品質的需求，以及文獻提及志工領導者應具備服務熱忱、包容力等重要特質。

（三）機構督導的教育功能

根據問卷結果顯示（見表 8），百分之七十七的機構認為應該要幫助學生認識機構（單位）的歷史、特色、工作業務與發展等。九個勾選「看狀況」的機構中，加註說明者包括：「要學生有心瞭解」（文教福利機構）、「依學生的服務期待及學生學習態度而定」（老人福利機構）、「視服務學習的內容而定」（系所服務單位）、「學生有無興趣」（老人福利機構）、「服務與學習時段過少，難以全面性介紹」（婦女福利機構）。百分之九十四的機構認為應該教導學生服務

工作之相關知能。有一勾選「看狀況」的機構加註說明：「學生服務時間短，適才適任彼此合作才會愉快，指導服務知能是必要，但不能花太多時間」（文教服務機構）。以及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機構認為應該啟發學生關懷社會與服務之熱忱。兩位填選「看狀況」的機構督導加註說明：「依學生特質予以適性輔助」（老人福利機構）、「視學生狀況及參與度」（身心障礙服務機構）。

表 8 機構督導教育功能之數據結果

題目	選項（勾選次數）		
	應該	沒必要	看狀況
1. 機構督導是否應該要幫助學生認識機構（單位）的歷史、特色、工作業務與發展等？	38	2	9
2. 機構督導應該教導學生服務工作之相關知能。	47	1	2
3. 機構督導應該啟發學生關懷社會與服務之熱忱	44	2	4
4. 機構督導應該指導學生擬定創新服務方案計畫	17	7	26

至於是否應該指導學生擬訂創新服務方案計畫？則結果顯示，百分之三十四的機構勾選「應該」；勾選「看狀況」者計有 26 個機構，佔百分之五十二；另有 7 個勾選「沒必要」，佔百分之十四。換個角度來看，勾選「看狀況」與「沒必要」的機構共計 33 個，佔百分之六十六，超過勾選「應該」的機構一倍數量之多。勾選「看狀況」並加註說明的機構，共計 8 個，包含：「如時間許可的話」（老人福利機構）、「學生有心，機構也願意」（文教服務機構）、「可訂大方向，讓學生自由發揮」（資訊學院）、「依服務內容而訂」（諮商輔導機構）、「服務學習的學生多為不同科系，且服務時間並不長，來機構僅能協助行政庶務及方案海報或其他臨時交辦事項」（諮商輔導機構）、「依學生期許」（綜合福利機構）、「視學生對服務學習的熱忱與心態」（系所服務單位）、「由學校指導學生提出方案，機構評估執行之可能」（兒童福利機構）。

本研究發現，對於是否指導學生擬定創新服務方案的看法，多數機構抱持

保留的態度。透過訪談，有一老人福利類型督導（A26_980327）表示機構最需要的就是行政人力，學生喜歡的活動模式，對機構來說卻很「累」（督導用語）。

以我們機構來出發，我們當然最需要的是行政的人力呀！活動當然是我們最不需要，因為我們很累啊！。（老人福利類型機構 A26_980327）

而且，縱使督導有心刻意安排與教導，但是碰上意願不高的學生，也勉強不來。因此，學生意願與熱忱、督導本身業務與負荷、及學生服務時數受限等，皆可能影響機構的態度與作為。但若由學校或教師指導擬定，機構督導只需審核與評估，則可大大減輕督導的業務負擔。

經交叉比對問卷及訪談內容，本研究發現有幾個特殊之處。第一，有一綜合福利類型機構雖是一個專為社區年長者服務的協會，但是長期投入社區發展，提供多元服務，包含國小課業輔導、老人日托、社區活動等等。針對問卷上所提是否應該要教導學生認識機構歷史等資訊，該督導勾選「看狀況」；但其受訪回應顯示，該督導十分贊成要教導學生，因此不能確定問卷上勾選「看狀況」的原因。其訪談簡要如下：

一定要、一定要認識你那個單位的（各）那個宗旨，或是他們的性質，還是需要了解單位，對！這他感覺會比較好一點，就比較意願比較高，認同度會比較好。（綜合福利機構 A16_980327）

第二，另有一醫院督導對於上述有關機構是否應該教導學生認識單位歷史業務、工作技能、創新方案、及啓發服務熱忱等四項教育功能，皆勾選「沒必要」，且並未加註任何說明。該督導受訪時表示，學生初到時，他會給予一小時的行前教育，並且分析學生特性，給予適當服務工作（醫院機構 A45_980508）。

學生(指非社工系學生)自己對這一塊(指社會服務)認同度不是很高，...要期待他們做出甚麼樣的服務會有困難，就變成說要調整他們的工作。...我們要另外抽時間去了解他，...工作的分配真的要因人而異。...要依個人的特質去分，就是不能是這個學生很害羞，把他往前、太急著往前推，那個也是反效果。(醫院機構 A45_980508)

此看法與其問卷勾選「沒必要」看似矛盾。不過，細察其訪談內容，或可一窺機構督導的為難之處。該督導表示，與大學合作服務學習乃該醫院高層之政策，身為下屬的他必須配合政策。醫院自行招募的志工及其品質，該督導可以掌握，甚至可以拒絕；但是服務學生的品質，他無法掌控，甚至無法拒絕與篩選。學生來自不同科系，其本身對此服務的認同度就有差異，面對認同度不高的學生，督導非得調整或另外安插服務工作不可。此外，他發現學生缺乏應對與溝通技巧，不適合直接與病人接觸互動，於是只能安排在病歷室、圖書館、供應器材室等第二線的協助。而這些行政事務可能比較簡單，沒有深度的相關知能，或許這是他勾選「沒必要」教導服務工作相關知能的原因。他亦表示平日業務繁重，以及學生本身認同度的問題，或許對於此督導勾選「沒必要」啟發學生服務社會熱忱的態度，是可理解的。

綜上所述，就機構督導的教育功能而言：大多數機構都認為應該要幫助學生認識機構單位的歷史、特色、工作業務與發展等。並且應教導學生服務工作之相關知能，以及啟發學生關懷社會與服務之熱忱。至於，是否應該要指導學生擬定創新服務方案計畫？多數機構督導則持保留態度。這也回應Tyron等文獻提及機構督導的時間、機構督導的能力、計畫的時程等等現實困難。

(四) 機構督導的行政功能

就機構提供之行政作業方面的協助，結果分析如下(見表9)。百分之九十二的機構認為應該事先說明清楚期待前來學生之基本條件。或許可因此避免

服務內容與學生能力無法配合的狀況。有一勾選「沒必要」的機構加註說明：「每種特質都有某適合之服務工作」(老人福利機構)。另有一社區福利機構督導持相同的意見，她表示每種特質皆有適合之服務工作，願意根據學生的特質來安排不同的服務內容。

其實我們是提供機會讓他們進來學習，所以我們就不用設限，他一定要什麼性質的人進來…在我來講什麼都不是很大的一個問題，是你〔指機構督導〕怎麼樣來帶這群人。(社區福利機構 A23_980504)

表9 機構督導行政功能之數據結果

題目	選項（勾選人數）		
	應該	沒必要	看狀況
1. 機構督導應該事先說明清楚期待前來服務學生之基本條件	47	2	2
2. 機構督導應該明列服務工作時間、內容、工作技能、期待成果等基本資訊	47	1	3
3. 機構督導應該了解學生的意見，與學生共同檢討服務工作	48	1	2
4. 機構督導應該要多給予學生多元與豐富的學習與服務機會	40	2	9

百分之九十二的機構認為應該明列服務工作時間、內容、工作技能、期待成果等基本資訊。勾選「看狀況」者，有兩個機構加註說明，包含「隨服務機構之工作內容及學生學習狀況適時調整」(系所服務單位)、及「應與學生做直接之調適，溝通」(老人福利機構)。百分之九十四的機構認為應該了解學生的意見，與學生共同檢討服務工作。

一老人福利類型機構督導受訪時表示，由於學生不了解機構的內部作業流

程，容易產生誤會。因此，機構務必了解學生服務過程中的想法與心得，以避免誤解或謠傳，造成雙方困擾。

督導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不要覺得服務完就完了...你永遠都不知道在這些學生服務過程中，他們有甚麼樣的感受，那他們有甚麼負向的情緒...一個澄清的管道真的很重要，不要那麼期待學生可以自己去排解調自己的感受。(老人福利類型機構 A26_980327)

是否應該要多給予學生多元與豐富的學習與服務機會？百分之七十八機構認為「應該」。勾選「看狀況」者，並加以註記說明者有3位，分別為：「視機構當年度活動而訂，但會盡量安排」(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視服務學生之熱忱與心態而定」(系所服務單位)、「視個案服務需求及機構限制」(綜合福利機構)。訪談中，前述一醫院機構督導(A45_980508)已經表示過學生的能力有限，只能做第二線的協助，或許是選擇「沒必要」的原因。

我們後來發現說大部分的學生其實比較不適合直接跟病人接觸的，變成說我們都會把他安排到比如病歷室、圖書館或是我們供應器材的地方去做第二線的協助。...有些學生其實可能比較期待能夠跟病人有直接的互動或是比較有意義、成就感的工作，那這一塊老實說，我們就只有十八小時，那其實我們在跟病人做接觸、做互動的時候，像一般志工都是要經過三個月的實習期，才會比較放心他獨自去做這樣的事情。...第一線運用會比較不敢讓學生直接做接觸，因為學生的應對跟溝通的一個準備還不足，...我們寧可不要讓學生去犯太大的錯誤，影響到自己也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單位，還是選擇比較安全的運用啦，比較不敢冒險。(醫院機構 A45_980508)

但是，另一醫院督導則持不同的看法，他表示學生在醫院的學習重於服

務，他承認學生能力的確有限，但他認為唯有接觸病人，才能讓學生獲得深刻的感受。他非常看重學生的學習與反省歷程，因此刻意安排許多特殊經驗讓學生親身體驗，例如，推著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去探望其他病人、站在植物人旁十分鐘、握著病人的手、坐在飛奔搶救傷患的救護車上等等，讓學生從其中反省與思考人生的問題。此醫院督導受訪時表示，他會對學生說：

我要看的不是你做了多少，我要看的是你感動了多少，你體會了多少。
(醫院機構 A32_980413)

研究者認為上述兩醫院督導對「接觸」病人的觀點，實質上並無衝突或矛盾。後者的接觸較從學生角度出發的「體驗型」學習經驗；前者的接觸乃站在醫院/病人角度所需求之長期培訓的照護志工，以至於大一學生無法承擔此服務工作。

綜合以上所述，就機構督導的行政功能而言：絕大多數機構都認同應該事先說明清楚期待前來學生之基本條件，並且明列服務工作時間、內容、工作技能、期待成果等基本資訊。機構督導也應該要了解學生的意見，與學生共同檢討服務工作，以及給予學生多元與豐富的學習與服務機會。當然，督導也必須保留彈性空間，透過與學生溝通互動，做適性的修正安排。這也回應 McCurley、丁元亨等文獻提及留住年輕志工的重要面向與作法，例如執掌說明、給予適時及中肯回饋、賦予明確工作事項、持續不斷的成長等。

(五) 機構督導的支持功能

機構提供學生之社會性與物質性的支持策略，根據問卷結果顯示（見表 10），幾乎百分之百的機構一致認同「應該」與學生多多友善的互動。至於勾選「沒必要」的前述醫院督導，或許是因為醫院社工業務繁重、志工人數動輒上百人、學生服務人數、類型、與時間皆繁雜，因此沒有時間與學生互動。百分之八十的機構認為應該不斷地運用讚美與鼓勵，激勵學生。其中一位勾選「看

狀況」者，加註「適時給予」之說明。百分之八十四的督導對於表現不佳的學生，都贊成應向學校反應或是適時輔導。其中有一勾選「看狀況」者，加註說明：「若是違反服務倫理才需要透過學校，若非則不必」（老人福利機構）。大多數督導可能會自行處理，包含教導、包容、輔導，不期望透過學校處理，或許覺得事態嚴重再告知學校，否則不必驚動學校。其實，學生表現不佳的行為多為遲到、早退、愛說話、不打招呼、衣著不整等小節，從訪談內容中得知，面對這些小節，督導善加勸導，學生也都能改善，不必刻意告知學校。如遇重大問題則當然必定通知學校共同協商處理。

表 10 機構督導支持功能之數據結果

題目	選項（勾選人數）		
	應該	沒必要	看狀況
1. 機構督導應該與學生多多友善的互動	50	0	1
2. 機構督導應該不斷地運用讚美與鼓勵，激勵學生	41	1	9
3. 對於表現不佳的學生，機構督導應該反映學校或適時輔導學生	43	1	7
4. 貴機構（單位）是否提供學生特別的支持策略？	勾選「有」：11		
備註：改以「有」和「無」兩選項）	勾選「無」：27		

至於機構（單位）是否提供學生特別的支援策略？則顯然大部分的機構皆未提供進一步支援策略。勾選「有」提供特別的支持策略，並加註說明內容包含：「定期舉辦座談茶會或餐會，謝謝服務學習學生的付出並雙向溝通」（生態服務）、「旅遊」（陪讀課業服務）、「特殊活動紀念品，彈性的服務時段」（綜合福利機構）、「1.給予表現優良志工證書 2.代替投稿至服務相關文章」（老人福利機構）、「參與中心成長團體」（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結束贈送學生機構的贈品，如背包、水壺」（綜合福利機構）、「行政支援及猜謎語活動獎勵」（環境服務）等，可以看到這些機構為鼓勵與感謝學生的付出，給予物質和精

神上的獎勵。綜合以上所述，就機構督導的支持功能而言：機構督導皆認為應該與學生多多友善的互動。多鼓勵與激勵學生，給予學生成長的機會與空間。但是較少有機構提供學生特別的支援策略，或許是因為社福機構本身經費有限，額外提供物質獎勵有其困難。

(六) 機構督導與靜宜大學合作的原因

根據結果顯示（見表 11），計 39 個（近八成）機構選填「建立合作互惠機制」選項；33 個機構（佔六成七比例）選填「帶給機構（單位）實質助益」項目；14 個機構，差不多約四分之一的比例，勾選「學生表現優秀」。其他 2 份填寫內容分別如下，「依工作交接」（醫院機構）、「提供貴校學生志工服務」（綜合福利機構），此綜合福利機構亦勾選項#2「帶給機構實質助益」。

表 11 機構願意持續與靜宜大學合作原因之數據結果（可複選）（N=50）

編號	合作原因選項	勾選次數	百分比（％）
1.	學生表現優秀		28.6
2.	帶給機構（單位）實質助益		67.3
3.	建立合作互惠機制		79.6
4.	其它		4.1

前述一醫院督導只填寫「依工作交接」，沒有選擇任一選項。該醫院督導接受訪談時提到（A45_980508），該（醫院）機構負責人樂於與社區之大學建立互惠關係，這是機構的政策，且已持續此關係五年整。然而，醫院本身已有志工隊、醫院員工亦被規定投入志工行列，社工員光是安排這數百人的服務活動已經非常繁忙，再加上大學生的加入，業務負擔沉重，或許這是該機構督導僅填寫「依工作交接」的原因。

既然今天是（醫院）跟學校已經做這樣子的連結和合作的話，...那這一

塊確實是有負擔在啦！但也不至於說比自己原本的工作還重。...能夠跟學校合作，走出醫界跟外界的學校（合作），上級都會認為是好事啦！...其實有年輕人加入我們比較高齡化的志工隊來說，其實是有好處的。（醫院機構 A45_980508）

無論如何，靜宜學生的確帶給機構實質助益，而機構更期望持續建立合作互惠機制。從訪談中，機構督導也多肯定靜宜大學的努力與用心，以及學生的表現。這也回應 Worrall、Sandy、Miron 等文獻提及縱使機構表達推展過程有不少困難與障礙，但是絕大多數的社區機構仍願意與大學合作，期望發展互惠關係與建立永續合作制度。

三、服務學習歷程中的重要關鍵

綜合以上結果分析，研究者從以下三個觀點探討服務學習的重要關鍵。

（一）服務學習課程的督導重點：

研究者根據前述文獻提及社工督導、志工督導、與服務學習，製表比較與分析大一學生、社工實習生、一般志工督導歷程的差異（見表 12）。由於社工實習生的實習時數往往上百小時，機構提供具挑戰性的專案式工作、從嚴格要求服務品質中，期望提升其專業知能。雖然實習是專業之必修課程，但也是職能發展最後的重要關鍵階段，因此這些準社工通常能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學生付出多、挑戰大、成就感也高。對於一般志工來說，既然自願，也多能任勞任怨、盡心竭力。然而，大一服務學習學生，服務時數短、被迫服務、態度較被動。因此，大學及社區機構都必須有一共識：通識的服務學習課程，其目的不在提升特殊知能，而是拓展學生生活經驗與學習面向、著重啟發與體驗。猶如 Anderson 和 Pickeral 文獻提及基礎性服務學習乃是為日後奠基，更是公民涵養教育的起步。有了此共識基礎，才能在課程要求與督導過程中，設定符合

實際狀況與可達成之目標方法。

表 12 大一服務學習學生、社工實習生與一般志工服務的差異比較

	大一服務學習學生	社工實習生	一般志工
服務動機	通識課程要求	專業實習課程要求	出於自願
	強制性	強制性	與學校（或課程）無關
服務時數	服務時數短	服務時數長	視個人狀況而定
	以單一學期為主	寒暑假或數百小時	定期與長期
服務目的	體驗人生多元面向	職涯實務體驗與訓練	回饋社會與終身學習
續上表			
服務工作性質	簡單易學、能力所及	專業知能之應用	專長或能力所及
	基礎服務	專業服務	
督導重點	重啟發	重教導	重關係
	激發服務社會的熱忱	厚實實務技能的養成	維繫持續服務的動機
教育功能	著重態度的萌芽	著重職能的培養	公民素養的體現
教育階段	通識教育的啟蒙階段	專業教育的最後階段	社會教育的體現歷程

(二) 機構督導的人格特質：

本研究發現兩個醫院督導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一個站在服務工作的角度上來看，督導根據學生的態度與能力安排業務；另外一醫院督導則站在學生學習的角度上來看，努力「震撼」與「感動」（該督導用語）學生的態度與看法。前者督導在龐雜沉重的現行業務下，被迫、但也努力地安排合適的服務工作給學生；後者督導則不斷思考如何確保學生學到人生功課的震撼教育。大一學生皆短期服務，來去頻繁，對於前者督導的盡心，已著實令人感恩；對於後者督導的用心，則更是大大感動。督導其實是學生最直接的「老師」，文獻（Worrall, 2007; Sandy & Holland, 2006）亦提及若機構督導能夠了解服務學習目的，那麼他們也能協助加強學生的學習經驗。更何況服務學習課程是一啟蒙的種子，

老師品質深深影響種子生根發芽與茁壯，老師若有「問題」，恐怕種子也不保。因此，大學與機構合作時，對機構督導人格特質的需求，應該清楚地讓機構了解，讓機構自行決定合作與否。在學校任課教師和「兼職教師」齊心努力之下，課程的品質與成效將是可以期待的。

(三) 學生的態度：

研究發現機構督導給予學生的教導，似乎都圍著學生的態度問題打轉，機構督導多根據學生參與程度和特質，加以調整輔助；提供何種相關知能、到何種程度，完全視學生態度和服務內容屬性而定。簡而言之，學生態度影響機構督導的付出和帶領。若是學生願意、熱忱、肯學，機構督導就多多予以指導；若是無意願，機構督導滿懷熱忱也會被澆熄。如前述文獻提及多數社福機構的志工督導皆非專職志工管理人員，學生若不積極參與配合，機構督導也無力負擔。雖說文獻（朱永祥，2009）提及機構領導能力是關鍵之一，但是，站在社福機構立場來看，學生的態度亦是督導投入程度的重要關鍵。因此，雙方應該建立良性的循環，彼此的熱忱相互激勵並發揮最大效用。

伍、結論與建議

總結本研究，研究者提出以下結論和建議。

一、 結論與建議

社區機構在督導服務學習學生過程中，面對的不是準社工或志工，既非訓練社工學生職能、亦非純粹運用人力資源；機構乃是在「教育」學生。更貼切地說，機構必須開始意識到自己將走到教育的第一線，成為學生社會教育的

重要教師；在涵養學生公民素養的通識教育過程中，亦是大學必須仰賴的教育夥伴。雖然，這樣的教育夥伴觀念需要時間加以孕育成形，但期望提升通識「夥伴教師」的能力、確保「教學歷程」的品質，使得通識教育理念得以落實，更有效地培養學生公民素養與能力。

大學也務必了解社區機構的困境，包含督導業務繁重、機構本身資源有限、以及服務時數過短等。因此，在討論服務工作內容與整個執行流程時，大學皆必須顧及機構的狀況，除非能夠提供足以減輕機構額外負擔的合作模式，否則不應過分要求。畢竟是短期服務，要機構改變例行業務或增加服務活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也不是合理的期待。本研究中許多機構督導並非社工背景，本研究結果更顯重要，透過過來人的經驗與建議，提供未來欲與大學合作推動服務學習的機構督導，評估機構之行政負擔，快速了解狀況，也預作心理準備，以降低適應過程中的磨擦，減少落差與挫折感，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及對機構的實質助益。

此外，大學亦應加強學生情意教育，學生的態度也深深影響機構投入的意願和態度。期盼大學與機構站在真誠、互信、互惠的立場上，共同努力為台灣大專青年開創一個深具意義、價值、品質與成效的永續教育環境。

二、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限制包含填寫問卷的比例仍不高，問卷的題目並未先由督導參與設計與修正，未來仍有改進與探究的空間。研究建議未來仍應持續蒐集督導意見，有長期追蹤的必要性。此外，機構類型不同，對學生服務內容與要求亦不同，是否因此而有不同的看法與做法？亦值得分別看待與探討，以提供未來大學與機構合作之參考與借鏡。

參考文獻

- 丁元亨（2006）。〈非營利組織的志工資源管理策略〉。文章發表於《第七屆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會》（2006.6）。嘉義縣：中華非營利組織管理學會、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合辦。
- 朱永祥（2009）。《靜宜大學「服務--學習」機構座談會演講教材》，頁 15-19。
- 朱金池（2009）。〈哈佛大學教育的兩難：知識菁英與公民素養孰重？〉。《通識在線》，22，30-32。
- 林思伶（2009）。〈通識教育為體，服務學習為用〉。《通識在線》，22，10-11。
- 林益仁（2009）。〈價值立基與行動導向的通識教育：靜宜大學的理念與實踐〉。《通識在線》，22，41-45。
- 林勝義（2006）。《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做快樂的志工及管理者》。臺北市：五南。
- 胡憶蓓（2009）。〈服務學習在靜宜—通識核心課程之建構〉。《通識在線》，22，52-54。
- 夏嘉玲（2010）。〈研究：唯我世代 大學生較自私〉。《聯合報》，2010.5.30 A12 版。
- 徐明、邱筱琪（2009）。〈服務-學習方案的實施與夥伴關係的發展〉。載於黃玉主編《從服務中學習：跨領域服務-學習理論與實務（二版）》，頁 89-129。臺北市：洪葉。
- 徐明、楊昌鈺、葉祥洵（2009）。〈服務-學習的歷史展與教育功能〉。載於黃玉總校閱，《從服務中學習：跨領域服務-學習理論與實務（二版）》，57-87 頁。臺北市：洪葉。
- 殷小平（2009）。〈教師是通識教育成敗之關鍵〉。《通識在線》，22，27-29。
- 教育部（2008）。《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作業要點》。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29 日台高通字第 0960206663C 號令。

- 莫藜藜（2009）。〈社會工作督導〉。載於李增錄主編，《社會工作概論》，頁 253-275。臺北市：巨流。
- 程萬里（2009）。〈全人教育、生命關懷、服務學習〉。《通識在線》，22，6-7。
- 馮燕（2009）。〈與品德教育結合的經驗性學習—台灣大學的服務學習課程〉。《通識在線》，22，8-10。
- 黃源協（1999）。《社會工作管理》。臺北市：揚智文化。
- 鄭錫鎔（2003）。〈志工之領導議題〉。載於江明修主編，《志工管理》，頁 23-46。臺北市：智勝文化。
- 龍紀萱（1997）。〈從實務經驗談志工督導的任務與角色〉。《社會福利》，133，46-50。
- Anderson, J. & Pickeral, T. (2000).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Success With Service-Learning 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National Society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Quarterly*, 25(3), 7-22.
- Ellis, S. J., & Noyes, K. K. (1990). *By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American as Volunteers*. San Francisco, C. A.: Jossey-Bass.
- Jacoby B., & Associates. (2003). *Building Partner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McCarthy, M. D. (1996). One-Time and Short-Time Service-Learning Experiences. In B. A. Jacoby (Ed.),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oncepts and Practices* (pp. 113-134).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McCurley, S. & Lynch, R. (原著)，李淑珺（譯）（2000）。《志工實務手冊》（Volunteer Management）。臺北市：張老師文化。
- Miron, D. & Moely, B.E. (2006). Community Agency Voice and Benefit in Service-Learning.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12(2), 27-37.
- Nabti, P. M. (2006). *Learning to CARE: Education, Volunteering, and Community Service*. Beirut, Lebanon: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Services.

- Ross, L., & Boyle, M. (2007). Transitioning from High School Service to College Service-Learning in a First-Year Seminar.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14(1), 53-64.
- Sandy, M. & Holland, B. A. (2006). Different Worlds and Common Ground: Community Partner Perspectives on Campus-Community Partnerships.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13(1), 30-43.
- Tryon, E., Stoecker, R., Martin, A., Seblonka, K., Hilgendorf, A., and Nellis, M. (2008). The Challenge of Short-Term Service-Learning.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14(2), 16-26.
- Whitfield, T. S. (2003). Side of Service-Learning. *Academic Exchange Quarterly*, 9(1), 248-253.
- Worrall, L. (2007). Asking the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Partner Perspectives.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14(1), 5-17.

研究論文

試析幼兒園教育評量之現象^{*}

陳姿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候選人

廖鳳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1 年 3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1 年 12 月 6 日。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本文通訊作者：陳姿蘭，
e-mail：tzelanchen@gmail.com。

中文摘要

本文彙整國內現行幼兒園實施教育評量的資料，針對幼兒園教育評量的運作現況加以分析。本研究發現國內幼兒教師在實施評量時的兩個現象，包括：（1）偏重評量資料的收集，而較少分析與解釋；（2）會考慮家長的感受與想法，而採用家長偏好的評量方式和內容、調高幼兒的評量等第。針對研究發現，本文提出教師的評量專業訓練不足及教師的和諧價值觀兩項因素以爲解釋，並討論其對國內幼兒園教育評量師培及實務運作的啓示。

關鍵詞：幼兒教育、教育評量、和諧、華人文化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Practic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grams

Tze-Lan Che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ong-ruey Liaw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reviews the current practic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grams in Taiwan. The results reveal two phenomena, including (1) preschool teachers practice more of collecting assessment information, less of analyze/interpreting assessment information. (2) preschool teachers tend to take parents' feelings into account and give better ratings for children's performance on the final report. Two factors -- lack of adequate training on assessment and teachers' value of "harmony" -- are provided to explain the above findings.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in the areas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assessment practice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harmony, cultural value

壹、前言

近幾來政府實施的幼稚園與托兒所評鑑，將教育評量列入評鑑項目之一，要求幼兒園提供幼兒學習歷程及結果的評量資料。例如：臺北市 96-100 年度托育機構評鑑手冊中「教保活動」類有「幼兒學習評量」的評鑑項目，要求幼兒園「針對教保活動的計劃目標，定期實施幼兒的學習評量」，且應「以多元化的方式，評量、記錄、比較幼兒不同階段的學習情形」(臺北市府社會局，2010)。政府評鑑的要求使幼教實務界對教育評量投入較多的關注。

關心此領域的研究人員注意到幼兒園對教育評量投注的努力，但也發現一些值得憂心的現象，包括：(1) 幼兒教師會採用多種評量方法收集幼兒的學習經驗，但可惜各種方法之間缺乏系統，使得評量資料有不少重覆性的內容；且教師亦未依教學目標收集與整理評量資料，因而評量與教學之間的關聯低(廖鳳瑞，2005；盧美貴，1998)。(2) 只有少數教師對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使評量未能協助教學與幼兒的學習(黃淑苓，1995；廖鳳瑞，2005；蕭玉佳與吳毓瑩，2006；盧美貴，1999)。(3) 教師認為實施評量最大的困難是教學忙碌，無暇記錄與分析評量資料(李姿慧，2006；陳嘉露，2005)。(4) 仍有不少教師為因為家長對幼兒學習的期待，選擇採用不符合幼兒發展且偏重智識性的評量方式，如紙筆測驗或練習本(李姿慧，2006；李嘉華，2005)。(5) 擔心家長質疑或不滿意教師給幼兒的等第，教師未敢真實呈現幼兒的評量結果，因而提高幼兒的評量等第(李嘉華，2005；張玉佩，2007；黃淑苓，1995)。

針對這些現象，過去的研究大多從教師執行評量的「技術層面」切入，認為之所以產生這些現象，乃因幼兒教師的評量訓練不足，不知評量的意義與目的以及缺乏評量技巧所致，亦即以教師評量知能不足來解釋其評量執行不易的現象(李姿慧，2006；李嘉華，2005；黃淑苓，1995；廖鳳瑞，2005；盧美貴，1999)。一些研究顯示提供評量的專業訓練，確實有助於提昇幼兒教師的評量知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進行評量(呂翠夏，2000；張玉佩，2007；陳姿蘭，

2002)。然而另有研究指出有些受過評量訓練的幼兒教師不見得能將評量理念落實，雖知道紙筆測驗或練習本不符合幼兒發展卻仍採用（李姿慧，2006）。由此看來，「評量訓練不足」或可說明前述評量現象的（1）～（3）項，但無法解釋教師為何採用不符合幼兒發展的評量方式（現象 4），以及不敢向家長真實呈現評量結果的現象（現象 5）。

而有學者指出除了從「技術層面」檢視教師的評量問題之外，還可以從「文化層面」分析文化價值觀對教師評量信念的影響（江文慈，2004；Hargreaves et al., 2002）。因為教師個人的信念影響其對評量的運用與解釋（Messick, 1995），而個人的信念受大文化價值觀的薰陶（楊國樞，1994），因此探究教師執行評量的困難亦可從教師個人的信念及文化價值觀著手。華人文化的一項重要特色是華人十分重視人際關係，「和諧」是華人共同的價值觀（黃曬莉，2006），研究者認為幼兒教師可能受文化中和諧價值觀的影響，為保持與家長和諧關係，在選擇評量方式與呈現評量結果時，在意家長的想法與感受的現象（即前述的現象 4 和 5）。

本文以文獻探討的方式，從教育評量的應然面與實然面呈現臺灣幼兒園教育評量運作的樣態，再從運作現況梳理出國內幼兒園教育評量的特殊現象及其原因，接著提出教師評量訓練及華人和諧價值觀來解釋這些特殊現象。本文提出檢視國內幼兒園教育評量現象的「和諧」視角，提供幼教人員及幼教相關領域的學者，在思索國內幼教評量的運作困境與方向時的一個參考。

貳、 幼兒園教育評量的運作

本節分別從「應然面」及「實然面」兩個層面論述幼兒園教育評量的運作。應然面說明教育評量的意涵以及《幼稚園課程標準》中有關幼兒評量的論述，實然面則呈現幼教人員執行評量的現況。

一、幼兒園教育評量的應然面

（一）教育評量的意義、目的與評鑑

國內外幼教評量專家大約都指出「教育評量」係指運用有系統的方法，收集幼兒學習行為及成就的資料與證據，並依據既定的標準來判斷幼兒的學習結果，繼而做出教育決定的一系列工作（黃政傑，1987；Mindes et al., 1996; NAEYC & NAECS/SDE, 1992; Wortham, 2001）。美國幼教評量學者 McAfee and Leong（2007）清楚地指出，教育評量的目的在於瞭解幼兒在發展、學習或任何面向目前所在的位置，包括他們知道什麼？他們已經能做什麼？他們的想法、興趣、態度、性向、健康又是如何？進而比較每一位幼兒不同時間點的狀況，判斷其進步與改變，並檢視教學步調是否合宜、教學目標是否被達到。而這些評量資訊用來監控學生的發展和學習、規畫教學、向家長或關心學生的人報告。換句話說，教育評量是收集有關幼兒的資料，並加以判斷及做出重要決策，其目的在於瞭解幼兒及改進教學，以進一步協助幼兒成長、進步，並與家長分享其子女發展及學習的狀況。

為達到上述「依據既定的標準來判斷幼兒的學習結果」，教師必須收集幼兒的表現證據，進而依據一套標準評鑑之。但是「標準」可以教師自訂或是採用現有的，例如課程標準或已出版的計分標準。

（二）課程標準對評量的規範模糊

教育部於 1987 年制定《幼稚園課程標準》作為國內幼稚園編制課程的基礎，依此課程標準，幼稚園課程之範圍包括健康、遊戲、音樂、工作、語文及常識等六大學習領域；教學活動進行時不分領域亦不分節（教育部，1987）。

在《幼稚園課程標準》內，每一學習領域下呈現領域目標及範圍，在「範圍」下列出該領域的次領域、次領域內容、次領域的實施方法，最後是該領域的評量。以「健康」領域為例：

1.次領域：健康領域的範圍包括「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及「健康

的生活」三個次領域。

- 2.次領域內容：以條列方式呈現，但未說明細節。如：「健康的生活」的內容為（1）安全的知識，（2）意外事件的預防和處理，（3）靜息與健康。
- 3.實施方法：呈現每一次領域的教材編選（如：「健康的生活」的教材編選之①配合幼兒的身心發展、能力和需求編選教材，實施安全教育）、教學方法（如：「健康的生活」的教學方法之①教師要正確的示範，並指導幼兒使用工具、玩具和運動器具的方法）、以及實施要點（如：「健康的生活」的實施要點之①設置各種工具、器皿、玩具和室內外各項設備時，應注意其安全性，並經常檢查與維護）。
- 4.評量：分為幼兒與教師兩方面，呈現幼兒與教師在該領域應表現的行為。以「健康」領域的幼兒評量為例：「1.表現良好的健康習慣，包括生活習慣、衛生習慣和安全習慣」、「2.喜歡戶內、外的各種運動、遊戲和活動」、「3.能適應環境，做一個活潑、自信、自立的好孩子」。

從上述可見，《幼稚園課程標準》中有關幼兒方面的評量僅提示一般性的參考原則，此種原則性的陳述容易造成不同的解讀，使得幼教人員之間難有共識。而且《幼稚園課程標準》雖是針對四至六歲的幼兒設計，但課程標準中也未因應幼兒的年齡而有深淺區別的表現行為及評量項目。因為未規範各年齡層的具體評量指標，可能使幼教人員對於合宜的評量項目及評鑑標準的概念模糊。

二、幼兒園教育評量的實然面

（一）評量的目的

從上述教育評量的學理可知，評量的目的在於瞭解幼兒在發展和學習上目前所在的位置，評估他們在一段時間或透過教學後的成長和困難，以作為教

師修正課程的參考及與家長報告的資料(McAfee & Leong, 2007; Shepard et al., 1998)。然而幼兒教師對評量目的的看法是否與評量學理所言一致？學者盧美貴(1998)調查 200 位幼兒教師實施評量的目的，教師自陳實施評量的目的包括作為與家長溝通幼兒學習與發展的資訊(93.7%)、提供教師教學省思與檢討(90.9%)、作為輔導幼兒的依據(88.8%)、計畫課程的參考(79%)。李嘉華(2005)訪談 30 位臺北縣幼稚園與托兒所教師，其研究對象表示使用評量的目的為瞭解幼兒學習發展的狀況、瞭解幼兒以介入輔導、向家長報告及檢視教學成果。李姿慧(2006)的調查也發現九成以上的填答者表示，進行評量是為了瞭解幼兒發展與學習情形、與家長溝通及檢討改善教學。

前述三項調查研究都發現，幼兒教師實施評量的主要用意是想瞭解幼兒在發展與學習上目前所處的位置和狀態，瞭解後會進一步與家長溝通分享這些評量資訊以及檢討改進教學。幼兒教師認為的評量目的與學理的建議十分貼近，而且他們也相當重視向家長說明幼兒的表現。

(二) 評量資料的收集

國內幼兒園可以自行選擇要收集哪些資料、何時評量，以及使用坊間或自製版本進行評量。多數的園所在學期開始前就會決定新學期要評量的內容及工具，例如：各單元或主題的評量表、學習區觀察記錄表、或各課程領域要收集的作品、照片和學習單張數。而學期中教師較常透過觀察、作品收集及紙筆評量等多元的方式收集評量資料。以下說明國內幼兒教師經常收集的評量資料。

1. 檢核表與評定量表

檢核表與評定量表是最常用來記錄觀察所得的方式，常見的有：(1) 評鑑幼兒在某特定單元或主題後的學習程度的單元/主題評量表；(2) 呈現幼兒的各領域發展或學習狀況的全面性檢核表，通常在學期中或期末時發給家長；還有(3) 觀察幼兒在學習區的探索情形的學習區記錄表。雖然表格的種類多，但型式上大致雷同，皆是要求教師依據既定的評量項目給予幼兒等第。等第的

形式有檢核方式，達到評量項目者才勾，未達到者不勾；也有按等級分，如：「優、良、可、加強」、「會、大部分會、偶爾會、還不會」、「熟練、發展中、尚未發展」。

2.軼事記錄

有些教師以文字描述觀察所得，比較常見的方式是軼事記錄，重點式、簡短地敘述幼兒的行為。教師通常將記錄記載於教室日誌、聯絡簿或親師手冊，或是事先設計好用來呈現觀察結果的記錄表中。近年來有少數實施表現評量的幼兒園，會有系統且持續地進行軼事記錄，但軼事記錄需花費老師更多的時間和注意力，對於一班只編制一位教師或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而言，是項很大的負擔，因此很少教師能有系統、持續地做。

3.幼兒作品

幼兒經常在教室活動中產生許多作品，因此以作品作為評量資料受到教師的歡迎（盧美貴，1998）。幼兒園的作品種類多，包括幼兒的圖畫、設計圖、立體工、活動過程的相片、錄音及錄影帶等等。

4.學習單

學習單頗受幼兒教師的喜愛，它是依據教學目標及內容而編製，檢視幼兒經過教學活動後完成教學目標的情形，可瞭解幼兒學習及教師教學的成效，因此學習單的內容與課程及教學相關。學習單需要事先規劃與編製，這些評量的來源大致是出版商出版的現成品，或是教師自行構思設計，或參考現成品再依據所需而改編。對教師而言，採用已出版現成品的優點是印刷精美、立即可用，不用自己設計可節省時間，但缺點是評量內容不見得完全符合幼兒園的教育目標或課程，部分教師會加以修改或另外設計。

5.紙筆測驗

測驗是以事先編好的題目，要求幼兒書寫作答，通常有標準答案且全班在同一時間進行的評量方式，如測驗卷、練習本、聽寫測驗。常見的題型是連連看、在幾個選項中將正確答案以圈出或著色表示、或直接書寫答案（如：寫字母、拼注音符號、計算）。紙筆測驗的內容著重認知或是與小學重要學科相

關的領域（國語、數學和美語）。此種類型的評量具有施測省時便利，可供家長和教師立即辨認幼兒學習與吸收情形的優點，但因不符合幼兒的身心發展而遭詬病。然而雖不符合幼兒發展，老師心有不忍，但因投家長所好（對幼兒學習認知的期待），且使用方便省時，仍有五成的幼兒教師會採用練習本或紙筆測驗（李姿慧，2006）。

（三）評量資料的彙整

一般而言，幼兒園會在評量期結束（如每週五、主題結束、學期末）時，將該評量期內收集到的資料整理好，放在聯絡簿、親師手冊、檔案夾或資料袋中，送回家讓幼兒與家長分享。但多數教師僅將幼兒的評量資料全數放入夾子或袋中，依領域或日期排序整理，針對幼兒活動的歷程和學習成果卻少有描述，對資料的分析和研究更是付之闕如（請見李嘉華，2005 整理台北市公私立幼稚園教育評鑑報告）。未分析與詮釋作品，這些資料保留了幼兒的校園生活與學習點滴，有紀念與珍藏的價值，卻未達到幫助教師檢視與反省教學的功能（蕭玉佳與吳毓瑩，2006），因此也無法達到幫助幼兒成長與進步之目的。

（四）評量資料的評鑑

收集到作品、學習單和測驗資料後，教師會記錄觀察所得、簡略介紹幼兒作品的大意、在學習單或測驗上打勾或蓋可愛圖章等方式，表示幼兒已完成、答對。但少有教師將這些學習證據與發展或課程期望相比較，或是將評量結果與課程目標、課程標準對照（盧美貴，1999）。李嘉華（2005）的調查指出雖有九成以上的教師採用形成性觀察及收集作品，但約只有兩成不到的教師會針對資料進行判斷。也就是說教師所實施的評量僅停留在收集階段，並未進一步分析與解釋這些資料。如此一來，教師可能無法瞭解評量資料所顯示的意義，也無從決定下一步的教學規劃。

此外教師經常使用的檢核表及評定量表，多數的表格只列出評量項目，並未明確定義判斷的標準，例如：「對時間有概念」的評量項目，何謂「有概

念」？幼兒應有什麼樣的表現才算是「有概念」，或是達到「良好」的等第。原則上教師在勾選檢核表等第時，應參考日常觀察所得與其他評量資料的分析，但多數的檢核表沒有明確的評量標準，加上前述教師統合及分析評量資料的情形不多見，但卻能在檢核表或給家長的評量報告上給予幼兒等第，不禁令人質疑這些評量等第的依據及客觀性。而且由於這些評量表的主要讀者是幼兒家長，國內一些研究顯示幼兒教師因為相當在意家長閱讀後的反應，而有「加分」提高幼兒的等第的現象（這部分將於下面「參、幼兒園教育評量現象的梳理」中說明）。

（五）重視家長想法的評量

林佩蓉（2009）曾將國內幼兒園依教學品質分為五種等級，此五種等級幼兒園中的課程與評量說明如下：

A 等：課程以幼兒為本位，課程完整而豐富且依幼兒構想彈性調整，提供幼兒日常生活的問題解決情境。教師重視表現評量，會觀察幼兒的表現、記錄幼兒之間的對話、收集並分析他們的作品。

B 等：課程採單元或主題教學，但課程的發展未必符合幼兒探索的邏輯性。教師會安排固定時間讓孩子到學習區探索，並於學習區時間觀察個別幼兒的行為表現後加以引導。教學日誌中能看到一些幼兒學習表現或師生對話記錄。

C 等：以單元教學為主，教室設有學習區，但幼兒探索學習區的時間不長，而且教師未觀察、引導幼兒在學習區的活動。評量多以學習單、單元檢核表為主，而學習單的設計不見得完全符合開放探索的原則。教學日誌很少省思活動是否達成目標。

D 等：課程內容一方面採單元教學，一方面仍強調讀寫算，搭配多種技能訓練的才藝課程，教室中很少規劃學習區。課程的進行完全由教師主導，通常是依據現成教材的內容進行全班性的團體教學，活動內容以教導知識概念和技能訓練為主。教師也很少觀察與注意個別幼兒的表現。

E 等：以讀寫算分科教學為主，作息時間的安排類似小學，教室中僅安排課桌椅及工作櫃，並未安排學習區。課程內容以背誦弟子規、教導數數、數字、國字、注音符號的認識及書寫為主，完全由教師主導，都是單向式的團體教學。會安排很多紙筆練習作業及美勞塗色或半成品的活動，孩子的作品大同小異，缺乏創意。

雖然《幼稚園課程標準》規定教學活動不宜分節分科進行，且課程設計應以幼兒為主體以助其成長，但上述林佩蓉（2009）的分析以及教育部所進行的幼兒教育普查（2002），均發現仍有為數不少的幼兒園安排讀寫算及分科才藝教學，很多幼兒園甚至從小班就安排讀寫算的活動。可是課程標準及幼稚教育的相關法令中均無對不依照標準執行者的懲處規定，因此恐怕難以規範幼教人員。也因為如此，在幼教市場競爭激烈的情形下，幼兒園規劃課程時，比較看重家長的喜好，而非幼兒的發展與需求（鄭婉妮，2002）。此外，林佩蓉的教學品質分類也指出，C 至 E 等的幼兒教師很少觀察幼兒在課程中的行動與表現，尤其 D 及 E 等的教師偏向以紙筆作業來評量幼兒，且評量的內容大多為讀寫算的認知學習。一些調查研究指出，幼教人員雖然認為幼兒教育不太適合過於強調讀寫算、注音符號或分科才藝教學，然幼兒園為了回應家長的期待與需求，卻不得不做此妥協（孫立葳，2000；教育部，2002）；又因為家長想瞭解子女在智識課程上的成就，因此幼兒教師以紙筆作業檢視幼兒在讀寫算上的學習成果（毛連塏等，1994）。由此可見家長對幼兒園課程及評量的影響。

上述幼兒園實施評量的現況指出，教師能說明實施評量之目的，也能在教學活動中或教學後收集多種評量資料，可惜卻未能進一步分析與詮釋資料。少了此關鍵性的步驟，讓評量徒有形而無實，無法達到教師希望藉之瞭解幼兒學習及檢視教學的目的，即使傳達給家長評量結果，家長可能很難從這些評量資料中看出意義。此外為了符應家長的期待與需求，幼兒教師所執行的評量方式及評量內容傾向家長偏好的紙筆測驗與讀寫算內容。

參、 幼兒園教育評量現象的梳理

由前段幼兒園教育評量的運作發現，國內幼兒園評量的實施存在一些特殊現象，本段逐一呈現並嘗試提出造成現象的可能原因。

一、國內幼兒園教育評量的特殊現象

國內幼兒園教育評量的特殊現象包括「偏重資料收集」、「為向家長報告而做的評量」以及「提高幼兒的評量等第」三者，而此三現象彼此相關。

（一）偏重資料收集

評量是收集和解釋資料以幫助教師進行決定的程序（Airasian & Russell, 2008）。教師要解釋評資料，瞭解如何利用收集到的資料協助幼兒發展和學習，否則評量就沒有意義（McAfee & Leong, 2007），然而國內學者發現幼兒教師雖會利用多種評量方式收集各式各樣的資料，但這些評量方式之間不一定具系統性，且教師往往未進一步分析收集到的評量資料（廖鳳瑞，2005；盧美貴，1999）。因為幼兒教師只做到資料的收集，但未解釋資料以瞭解其所代表的意義，教師也不知道這些收到的資料要做何用，因而覺得評量是一份「外加」的工作，認為「評量耗時」、「評量時間不足」是實施評量的最大困難（王正珠，2001；李姿慧，2006；張玉佩，2007；謝佩芳，2009）。看來，幼兒教師似乎認為評量是教學之外「一份多出來的工作」，評量與課程相互獨立，而不是整體課程的一環。

（二）為向家長報告而做的評量

前述提及幾項調查研究顯示，幼兒教師自陳實施評量的目的為：「向家長溝通與報告」、「瞭解幼兒的發展與學習」，及「檢視或修正教學」。但教師實際

的評量是否達到這些目的呢？李嘉華（2005）的受訪教師表示她們採用總結性檢核表之目的在於瞭解幼兒的學習狀況，但又表示在執行此種評量時所遭遇的困難為「無法瞭解幼兒的真實能力」；另有些研究指出一些教師收集評量資料時，並未深思收集的目的，有的不知道要用這些資料來做什麼，有的僅是想收集幼兒在校的點滴記錄（莊雯心，2002；陳姿蘭，2002；陳嘉露，2005）。由於教師不清楚評量的目的，加上只收集資料未加以分析判斷，恐難達到「瞭解幼兒的發展與學習」及「檢視或修正教學」的目的。

而「向家長溝通與報告評量結果」幾乎是上述調查研究中，所有受試教師都勾選的目的，被視為實施評量相當重要的一個目的。李嘉華的訪談指出教師認為「評量幾乎都是做給家長看的」，雖然教師所受的專業訓練不斷提醒她們，應該使用符合幼兒身心發展的評量，但在家長要求之下，仍採用強調智識性的測驗。在乎家長感受的心態也見於張玉珮（2007）的研究，當園方要求教師選擇幾項學習目標深入觀察時，教師傾向選擇家長在意的目標，或是幼兒的弱勢能力，以便日後幼兒有進步，家長會歸功於幼兒園及教師。從張玉珮的研究結果我們看到，家長的想法與感受深深影響著幼兒園的評量。

（三）提高幼兒的評量等第

國內幾篇研究發現教師在評量幼兒等第時會提高等第。張玉珮（2007）在自己的園所進行評量研究，她發現園內教師在給予評量等第時傾向拉高幼兒表現，經過追究才瞭解教師因擔憂家長質疑檢核結果（如：我在家裡看到他已經會了呀），所以多會以等第3（指「在教師引導下可達到學習目標」）取代等第2（指「尚未達到學習目標」），也會避免評出等第1（指「繼續觀察，不確定」）的結果；教師亦擔心家長認為老師都沒有觀察到小孩，而會待幼兒學會後再另找時間評量。李嘉華（2005）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教師運用檢核表向家長報告評量結果時，明明幼兒尚未達到檢核標準，但教師對幼兒的評等卻高於幼兒的真實表現，明顯有「灌水」現象。為什麼要灌水？受訪教師表示：「因為（評量結果會）給家長，所以評量結果大部分都勾『好棒』跟『尚可』」，勾「再

加油」的情況很少。黃淑苓（1995）也發現受訪教師因擔心家長不開心幼兒的低評等，因此會掩飾事實，虛張幼兒的表現。這些現象反映教師在評量時，除了考量幼兒真正的表現外，還會考慮到家長的反應與感受。

此三個特殊的評量現象環環相扣，幼兒教師因缺乏評量的整體概念，而偏重資料的收集卻未解釋分析資料，只做到評量的形式，但未達到實質的效果；但因為必須向家長報告，教師在未分析評量資料、評量結果判斷無紮實的證據基礎的情況下，加上考慮家長的反應與想法，很可能調高幼兒的評量等第。

二、造成幼兒園評量特殊現象的原因

（一）教師的評量訓練不夠

過去研究認為幼兒教師之所以偏重評量資料收集而無評量整體觀，乃因教師缺乏評量訓練（包括職前的評量課程修習、在職的評量研習或輔導），對評量的認知不足所致，紛紛建議師資培育機構開設評量相關課程，或呼籲政府辦理評量研習，提供訓練以提昇教師的評量知能（王正珠，2001；李姿慧，2006；呂翠夏，2000；張玉佩，2007；陳姿蘭，2002；黃淑苓，1995；盧美貴，1999）。

然而過去研究並未說明教師缺乏評量訓練之因。研究者進一步檢視國內幼兒教師於師資培育機構所接受的評量課程，於2010年6月以網路查詢國內41所設有幼兒教保相關科系的大專院校，從其網頁所公告的課程資訊中尋找評量相關科目，包括：「教學評量」、「發展評量」、「學習評量」、「檔案評量」、「教育測驗與評量」等。其中有2所大專院校未上網公告開課課程資訊，故就39所大專院校的課程資訊進行檢視。結果發現，有5所大專院校未開設「評量」課程（佔12.8%），而有23所將之列為專業或專門必修課程（佔59%），其餘11所則設有「評量」課程供學生選修（佔28.2%）。看來似乎有不小比例的師培機構提供評量相關訓練。但根據研究者另一項關於國內幼兒教師評量行為的調查，我們詢問314位受試者「近5年內是否修過幼兒評量的相關課程」及「近

5 年內是否曾參加幼兒評量的研習或輔導」，結果近 5 年未修過幼兒評量課程者有 38.5%，而近 5 年未曾參加幼兒評量研習或輔導者則有 39.5%。也就是說近 5 年內未接受評量課程或研習者各有近四成之多。依據以上的檢索及調查，研究者推測教師缺乏評量訓練的原因可能為：(1) 教師在師培機構時未修習任何評量的相關課程，在職期間又未參與評量的相關研習；(2) 教師雖曾修過評量課程或研習，但接觸的年代較久。誠如 McAfee and Leong (2007) 指出評量是教和學中快速成長與發展的一個層面，許多晚近的評量研究與實務資訊，需要教師更新概念。

一些研究指出透過評量實作過程中與同事、輔導人員及文獻的對話和討論，確實有助教師評量觀念的釐清及技能的提昇(呂翠夏, 2000; 陳姿蘭, 2002; 謝佩芳, 2009)。可是有些研究卻顯示接受評量訓練的幼兒教師不見得能將理念落實。李姿慧 (2006) 的受訪教師多已接受評量的訓練或有閱讀評量文獻的經驗，但教師的評量行為不一定合乎其理念，例如：認為規劃評量時最主要的考量為幼兒發展的教師，有五成仍選用不符合幼兒發展的練習本來評量幼兒。李嘉華 (2005) 的研究則發現曾修過評量相關課程的幼兒教師較不曾修過者更常使用紙筆測驗。

由此看來，評量訓練可以增進幼兒教師的評量概念及技能，因此「訓練不足」或可解釋教師偏重評量資料收集，但缺乏評量整體概念的現象。可是「訓練不足」似乎無法說明曾接受訓練的教師，為何採用不符幼兒發展的評量方式，似乎也無法解釋前述教師因考慮家長感受而「提高幼兒等第」的現象。研究者針對此二現象提出以下可能的因素。

(二) 重視和諧而影響評量的運作

1. 家長意見左右評量的方式與內容

從前述幼兒園評量的運作現況，發現幼兒教師在規劃評量方式與內容時，會考量家長對幼兒認知成就的需求，這樣以家長想法為重要考量的現象，可能不符合幼教以「幼兒為主體」的精神，似乎也不貼近幼稚教育法以健康教育、

生活教育及倫理教育爲主的主張。然而目前臺灣的幼兒園生態中，家長的權力大於教師，家長有決定子女就讀哪家幼稚園的選擇權，爲求招生與經營考量，園所會盡可能與家長保持良好關係（吳珍梅，2007；孫立葳，2000）。家長特別重視智識性成就或與國小重要學科有關的學習表現（教育部，2002；劉慈惠，2006），希望瞭解子女在這些方面的學習成果，而且是「好」的學習成果。爲回應家長的需求，幼兒教師傾向以紙筆測驗評鑑幼兒的學習成果（李嘉華，2005）。也由於評量主要閱讀者（家長）在乎的是「好」的成果，使得幼兒教師的評量重於呈現好的結果，而輕歷程的分析或有拉高等第的現象。

2.在意家長感受而提高幼兒的評量等第

前述幾個幼教評量實務的研究指出教師評定幼兒等第會顧慮家長感受，教師考慮的是避免家長的質疑及產生衝突，盡可能地與家長保持和諧關係。幼兒教師於評量等第時考慮家長感受與和諧而提高等第的現象，突顯教師的評量行爲受和諧價值觀的影響，評量時她們會考量所處的情境，而不單單只是幼兒在評量項目上的表現。教師在實施評量時，她們的考量可能是：這樣做是否有利於促進我和家長之間的和諧關係？用這樣的觀點再回頭看前述的評量現象，或可解釋幼兒教師爲何不重視有系統的評量，因爲教師未系統性執行評量且無暇記錄與分析評量資料的行爲，並不會直接影響她們與家長的和諧關係，但評量報告中的等第如低，有可能引起家長質疑，乃傾向選擇提高幼兒的等第，以求和諧之維持。

廖鳳瑞等人（2006）比較實施與未實施檔案評量的幼兒園，其家長對園所滿意度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研究結果顯示，實施檔案評量（有目的、有系統地實施評量）與否並不直接導致家長對園所及教師的滿意度，而是當家長有幼兒學習問題時，教師樂於進行親師溝通及解惑（親師互動和諧），才是影響家長滿意度的重要因素。既然只要如實地與家長溝通評量結果就好，爲什麼教師還要提高幼兒的等第呢？本文認爲，一方面如果教師不是有系統地實施評量，在對幼兒學習與發展狀況瞭解不確實、信心不足之下，擔心給幼兒較低的等第，家長會來詢問卻無法回答，便可能直接調高幼兒等第；另一方面雖確實知

道幼兒的狀況，但可能害怕破壞與家長的和諧關係，提高幼兒等第似乎可以維持與家長的和諧，減少爭議。

「和諧」在華人的 interpersonal 關係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華人文化的特徵之一（Gao et al., 1996; Yang, 1995），正如《孟子·公孫丑篇》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語道出「人和」在華人心中的重要性。華人與他人互動的原則以和為貴，認為人和能生財添福（「和能生財」、「和氣致祥」）、「家人和和萬事和」，但若「人不和，百事不興」（黃曬莉，2006）。因此為人處事要盡可能地維持與他人的和睦平順，時常留意是否得罪別人，造成別人為難以避免衝突，使別人對自己有好印象。華人「重視和諧」的價值觀反映在生活運作的各個層面。在家庭方面，Shek（2001）的研究指出華人父母及青少年一致認為和諧而沒有衝突是快樂家庭最重要的特性。在 interpersonal 交往方面，「忍」是華人化解 interpersonal 衝突的因應策略，以維護 interpersonal 和諧（吳宗祐等，2002）。在學校師生、同儕方面，Han 等（2005）發現臺灣的大學生面對教授及同儕的請託時，因為考量對方的面子及彼此之間的和諧，即使心裡不願意也通常會接受對方的請託；而吳珍梅（2007）針對幼兒園親師互動的研究發現，幼兒教師面對親師衝突的第一步是「檢討自己」及「向家長道歉」，為的正是保持親師之間的和諧。

為維持親師和諧關係，而採用家長偏好的評量方式、評量內容及提高幼兒的等第是可能的嗎？「和諧」是華人普存的文化價值觀，身處於華人文化的教師很可能具有這項價值觀。重視和諧價值觀的教師可能在課程安排與評量執行時，考量家長的想法與期待。近年來有關幼兒園教師評量實務的相關研究肯定了前述的想法，幾篇探討幼教評量實施的研究發現，教師因家長重視子女的評量結果，有提高幼兒表現等第的傾向（李嘉華，2005；張玉佩，2007；黃淑苓，1995）。教師為的是維護親師和諧關係，避免家長質疑評量結果或不開心，親師和諧是幼兒教師在評量時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研究者認為在幼教重視家園互動及幼教市場化機制的生態下，和諧價值觀對幼兒教師的評量具有重要的影響。一方面，與家長維持良好互動向來是幼

教的重要原則，由於幼兒年紀小，生活自理與表達能力較弱，因此親師之間的配合及傾聽家長聲音向來是幼兒園所強調的（許錦雲，2008）。另一方面，臺灣的幼兒教育非屬義務教育，幼兒園與家長是教育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形成「幼兒園提供服務而家長選擇」的市場機制（陳怡如，2004），近年來少子化現象使幼教市場競爭愈趨激烈（徐聯恩、彭志琦，2006），在經營競爭激烈的情形下，與家長保持良好關係及回應家長的需求，成了幼兒園行銷與經營的重要策略（黃義良，2005）。在重視親師關係、少子化及市場化的脈絡下，不少幼兒園在安排課程時以家長的期望與喜好為主要考量（謝美慧，2007），在評量內容的選擇也順應家長的期待（李姿慧，2006）。華人人際和諧理論指出，華人的行事法則是先判斷彼此的關係，再決定行動方案，面對不同關係的人會有不同的行動（黃曬莉，2006；Hwang, 2000; Leung et al., 2002）。上述指出幼兒園與家長具有合作關係及生產者與消費者關係，為了維持此種關係，教師重視家長的想法與需求，在執行評量時回應家長的教育期待，以盡可能保持親師和諧。再加上臺灣的幼兒教育沒有正式的考試，也無教育部頒訂的評量指標，幼兒園的評量以觀察記錄、檢核表及評定量表等仰賴教師觀察與判斷的評量方式為主，似乎讓「和諧」有了更多運作的空間。

綜合上述，研究者從臺灣幼兒園目前的評量運作狀況，發現國內幼兒園的教育評量有幾項特殊現象，即幼兒教師的評量概念偏重資料收集、評量報告主要為家長而做、給予評量等第時提高幼兒的等第。並提出教師的評量訓練不夠，以及教師的和諧價值觀影響評量的運作，包括家長意見左右幼兒園的評量方式與內容，及在意家長感受而提高幼兒的評量等第，作為解釋為何國內幼兒園較少深入分析評量資料、仍採用智識性的紙筆測驗、評量考慮家長想法與需求等現況。

肆、結語與建議

本文從國內幼兒園的評量運作現況中分析出幾個特殊現象：（一）幼兒教師所實施的評量偏重收集評量資料，但較少分析與解釋這些資料，無法發揮評量的效用。而（二）教師實施評量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向家長報告，因此傾向採用家長偏好的評量方式與評量內容。（三）由於教師未分析評量資料，使得評量結果的判斷缺乏紮實的證據基礎，加上擔心家長質疑或不滿意子女所得到的等第，教師傾向調高幼兒的評量等第。本文認為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為教師的評量專業訓練不足，以及教師的和諧價值觀影響評量運作。教師重視親師和諧的情形，可能受華人文化和諧價值觀的影響，在實施評量時特別在意家長想法與感受。

美國評量學者 Hargreaves 等人（2002）談論評量改革及評量實施困境時提到，有關教師執行評量的技術性問題（如：不會分析、不會執行），大多能藉由時間、培訓及團隊合作解決，然而評量改革及評量困境的解決不能只限於技術層面，若不關注教師在面對評量時，評量理念與教師自身之價值觀所產生的衝突，那麼改革的效果也只有短暫的生命。因此檢視幼兒園教育評量現象時，除了注意教師技術層面的有無外，也應關心教師所持的文化信念與價值觀。由此角度視之，在培訓教師評量概念時，不僅要提供其評量的實施技巧（如：收集與分析評量資料），還應使教師知覺自身的價值觀與評量的契合度、這些價值觀對評量實施的影響，以及提供有效的策略幫助教師和諧地與家長溝通評量理念與評量結果。

本文發現幼兒園教師的評量實務受個人和諧觀的影響，在評量時會考慮家長的想法並提高幼兒的等第。然而本文相信，評量過程中，教師考慮的因素除了親師之間的和諧外，可能還包含其他因素。一些國內外其他教育階段的研究顯示教師在評量及為學生打等第時，會同時考量多種因素，包括學生的努力、能力、態度、品行、進步、年級（如：吳毓瑩，2003；Brookhart, 1993; Cross

& Frary, 1999; McMillan, et al., 2002; Stiggins et al., 1989)。「和諧」只是可能因素之一，因此建議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究影響國內幼兒教師評量的其他因素，以更周全地瞭解其評量實務。

前文提及《幼稚園課程標準》中有關幼兒評量只提示一般性的參考原則，原則性的陳述可能造成教師的不同解讀而難有共識，且課程標準中亦未規範不同年齡層的具體評量指標，可能使教師對合宜的評量項目及評鑑標準的概念模糊。值此之際，教育部正研編《幼兒園教保活動與課程大綱》，建議教育當局於新課程大綱中提供各年齡層幼兒的具體評量項目、評量指標及計分標準，以供教保人員的評量實務所需。

參考文獻

- 毛連塹、吳清山、林佩蓉、幸曼玲、劉春榮（1994）。《當前幼稚園教育問題及意見之調查研究》。台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 王正珠（2001）。《幼稚園教師運用多元智能理論之歷程研究》。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江文慈（2004）。〈教育評量改革的難題分析：技術、文化、政治與後現代觀點〉。《課程與教學》，7（3），1-16。
- 李姿慧（2006）。《幼稚園教師實施幼兒評量之現況調查研究—以桃園地區為例》。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李嘉華（2005）。《台北縣幼兒園教師對於教學評量的實施情況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論文。
- 吳宗祐、徐瑋伶、鄭伯壘（2002）。〈怒不可遏或忍氣吞聲：華人企業主管威權領導與部屬憤怒反應〉。《本土心理學研究》，18，3-49。
- 吳珍梅（2007）。〈學校與家庭之互動：幼兒園親師衝突中性別與權力意涵之分析〉。論文發表於教育部訓委會暨內政部（主辦），《家庭與工作：變遷現象與多元想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0月6日-7日）。舉辦地點：高雄師範大學。
- 吳毓瑩（2003）。〈教學評量之信念探究--松竹梅三個個案詮釋暨啓示〉。《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教育類》，16（1），137-162。
- 呂翠夏（2000）。〈統整課程之評量：運用實作評量於幼稚園的實例〉。《測驗與輔導》，160，3357-3359。
- 林佩蓉（2009）。〈追求教學品質升級之幼稚園輔導〉。論文發表於教育部（主辦），《輔導學習、學習輔導—全國幼教輔導研討》。舉辦地點：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 孫立葳（2000）。〈幼兒教師工作壓力之研究〉。《新竹師院學報》，13，265-279。

- 徐聯恩、彭志琦（2006）。〈我國人口結構變化對幼教環境的影響及其因應之道〉。《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10，123-142。
- 教育部（1987）。《幼稚園課程標準》。台北：正中書局。
- 教育部（2002）。《全國幼兒教育普查計畫》。教育部委託專案計畫成果報告。台北：教育部。
- 張玉佩（2007）。《園所建構幼兒學習檔案之行動研究》。台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碩士論文。
- 陳怡如（2004）。〈我國國小教育及幼兒教育改革初探—行政干預與市場機制比較觀點〉。《新竹師院學報》，19，89-112。
- 陳姿蘭（2002）。〈作品集在幼稚園的實施〉。見廖鳳瑞、陳姿蘭（編譯），《幼兒表現評量—作品取樣系統》，頁255-343。台北：心理出版社。
- 陳嘉露（2005）。《解開「檔案」的秘密——一位幼教老師應用幼兒作品改進教學之行動研究》。台北：臺北市立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雯心（2002）。《多元智能(MI)教學研究—光譜計畫在班級實施歷程分析》。台北：臺北市立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錦雲（2008）。〈幼兒園良好親師關係之探究〉。《幼兒教保研究期刊》，1，13-29。
- 黃政傑（1987）。《課程評鑑》。台北：師大書苑。
- 黃淑苓（1995）。〈幼兒教學評量〉。《嘉義師院學報》，9，667-694。
- 黃義良（2005）。〈幼教機構的行銷策略初探〉。《幼兒教育年刊》，17，35-55。
- 黃曬莉（2006）。《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台北：揚智文化。
- 楊國樞（編）（1994）。《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台北：桂冠圖書。
- 廖鳳瑞（2005）。〈幼稚園的教學評鑑—以檔案為例〉。《幼教簡訊》，28，2-4。
- 廖鳳瑞、陳姿蘭、陳欣希（2006）。〈幼兒檔案評量的成效及其影響因素之研

- 究》。論文發表於信誼基金會（主辦），《2006海峽兩岸幼兒園課程與評量學術交流研討會》（4月26日）。舉辦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
- 臺北市府社會局（2010）。《臺北市99年度托育機構評鑑指標》。資料檢索日期：2010.11.1。網址：http://www.dosw.taipei.gov.tw/i/i0300.asp?fix_code=2703019&group_type=1&l1_code=27&l2_code=03。
- 劉慈惠（2006）。〈學前幼兒被期待學些什麼——以兩所幼稚園家長為例〉。《師大學報：教育類》，51（1），131-158。
- 鄭婉妮（2002）。〈尋回臺灣本土價值的幼兒教育〉。《幼教資訊》，12，2-16。
- 蕭玉佳、吳毓瑩（2006）。〈成長路上話成長：幼稚園學習歷程檔案建構之行動與省思〉。《應用心理研究》，32，217-244。
- 盧美貴（1998）。《開放式幼稚園課程與學習評量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NSC87-2411-H133-001）。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盧美貴（1999）。〈幼稚園的真實性評量：常被忽略的家長參與〉。《教師天地》，99，46-53。
- 謝佩芳（2009）。《園方推動幼兒學習檔案歷程之回溯研究~以一所實施高瞻課程的幼稚園為例》。臺東：國立臺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謝美慧（2007）。〈誰的幼兒教育品質？多元觀點的探討〉。《教育研究月刊》，160，30-39。
- Airasian, P. W., & Russell, M. K. (2008). *Classroom Assessment: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6th Edition).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 Brookhart, S. M. (1993). Teachers' grading practices: Meaning and valu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30(2), 123-142.
- Cross, L. H., & Frary, R. B. (1999). Hodgepodge grading: Endorsed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ike. *Applied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12(1), 53-72.
- Gao, G., Ting-Toomey, S., & Gudykunst, W. (1996).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 M.H.Bond (Eds.),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pp. 280-2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 K. H., Li, M. C., & Hwang, K. K. (2005). Cognitive responses to favor requests from different social targets in a Confucian socie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2(2), 283-294.
- Hargreaves, A., Earl, L., & Schmidt, M. (2002). Perspectives on alternative assessment reform.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9(1), 69-95.
- Hwang, K. K. (2000). Chinese relationalis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30(2), 155-178.
- Leung, K., Koch, P. T., & Lu, L. (2002). A dualistic model of harmon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in Asi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 201-220.
- McAfee, O., & Leong, D. (2007). *Assessing and Guiding You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4th Edition). Boston: Pearson Allyn & Bacon.
- McMillan, J. H., Myran, S., & Workman, D. (2002). Elementary teachers' classroom assessment and grading practices.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95(4), 203-213.
- Messick, S. (1995). Validity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Validation of inferences from persons' responses and performances as scientific inquiry into score mea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9), 741-749.
- Mindes, G., Ireton, H., & Mardell-Czudnowski, C. (1996). *Assessing Young Children*. New York: Delmar Publishers.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Specialists in State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 (1992). Guidelines for appropriat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assessment in programs serving children ages 3 through 8. In Bredekamp, S. & Rosegrant, T. (Eds.), *Reaching Potentials: Appropriate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for Young Children* (pp. 9-27). Washington, DC: Authors.
- Shek, D. T. L. (2001). Perceptions of happy families amongst Chinese ad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therapy. *Family Therapy*, 28, 73-103.

- Shepard, L. A., Kagan, S. L., & Wurtz, E. (Eds.). (1998).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Early Childhood Assessmen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ducational Goals Panel.
- Stiggins, R. J., Frisbie, D. A., & Griswold, P. A. (1989). Inside high school grading practices: Building a research agenda. *Education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8(2), 5-14.
- Wortham, S. C. (2001). *Assessment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3rd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Merrill/Prentice Hall.
- Yang, K. S. (1995).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T. Y. Lin, W. S. Tseng, and Y. K. Yeh (Eds.),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pp. 19-39).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研究論文

性別主流化： 反思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教育^{*}

廖美蓮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11 年 9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1 年 12 月 6 日。

^{*}本研究為國科會研究計畫 NSC 98-2410-H-031 -032-SSS《性別主流化：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教育的反思》成果之一部份，作者感謝國科會研究經費補助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意見與指正，獲益良多，同時感謝所有參與本研究焦點團體的成員。

中文摘要

暴力，是對婦女的偏見和歧視中最極端的一種表現。性暴力行為更反映出男性讓暴力支配女性的主要機制。隨著婦女運動的潮流推演，與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納入決策依據一段時間後，本研究旨在探討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中的執行概況，並檢視社工性別培力的成效，以及社會工作教育走向性別敏感與性別覺醒的反思。本文截取自作者 2009 國科會年補助《性別主流化：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教育的反思》研究計劃中，以實務工作者為主的三次焦點團體資料分析，透過「性別主流化」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概念，期待從實務工作者的觀點，反省並找出提昇具性別意識社工教育的重要要素。因此，根據焦點團體的討論，萃取出成員認為性別主流化在家暴系統內的成效：（一）流於形式、過程生硬（二）定義模糊、執行困難（三）對概念充滿誤解、更形筆路藍縷（四）缺乏具體指標及評估標準（五）上位者不瞭解性別議題、為執行而執行（六）性別培力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雙軌論述。同時提出性別主流化與家暴做結合在臺灣遇到的挑戰：（一）以性別主流化檢視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障礙（二）社工職場性別意識與生活性別實踐之間出現斷裂（三）與男性工作衝撞中的反思。研究者總括社工教育在性別培力所面臨的困難：（一）找不到師資的難題（二）社會工作教育與性別培力的反思：第一性別意識課程設立的必要性，其次是性別意識課程內容缺乏結合生命經驗體察，第三師資的性別意識是性別教育是關鍵角色。最後，研究者強調，在性別光譜上除男女這兩種主流的性別以外，尚有更多獨特的性別，她/他們的需要如何才能不被排除在體制外？如何在多元社會關係脈絡中降低社會區隔、階級分化與性別差異處境，恐怕是接下來不可迴避的重要議題。

關鍵詞：性別主流化、家庭暴力、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性別意識、社工教育

Gender Mainstreaming: Reflec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Miriam Mei Lin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the most extreme practice, for the purpose of prejudicing and oppress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is a major human right problem and stands for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wo sexes throughout the world. Due to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feminist movement,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organizations have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order to fight for the interests and rights of all genders. The Executive Yuan of Taiwan have launched "Ministerial Gender Mainstreaming implementation programme" for years.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assessing the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 to promote gender perspectives into all policies and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gender-sensitive curricula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This paper is the resul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granted project on "Gender mainstreaming: rethink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2009.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re a method for collecting qualitative data. Three of the focus groups were conducted. The finding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applied into the domestic violence system are as follows: (a) it is over-emphasis on the formality (b) it is vaguely defined, difficult to implement (c) the concept is full of misunderstandings, makes the implementation even harder (d) there are lack of specific indicator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e) the hierarchy is lack of gender-sensitivity (f)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ment is a bottom-up process that can be also formulated from top-down.

While there is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of incorporating gender

perspectives into domestic violence practice are found: (a) gender-biased institutional norms, which are embedded in the hierarchies, work practices and beliefs of organizations and constrain efforts to implement gender mainstreaming, often operate below the level of awareness. (b) views on gender-based segmentation in the workplace and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often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s a result of feminist and/or economic influences, result in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gender roles in almost all societies. (c) reflection on the impact of working with men; and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challenge is (d) the author concluded the difficulties in gender education training for social workers, such as (i) lack of teachers with gender background (ii) the reflection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gender-based training. Finally, the researcher stressed that gender is a spectrum; there is a range of gender identities between and outside of the categories of male and female. Therefore, the voices of different genders have to be heard and the priorities and needs expressed hav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Consultation with women as well as men was essential for successful gender mainstreaming.

Keywords: gender mainstreaming, domestic violence, CEDAW, gender-consciousness, social work education

壹、前言

隨著行政院 2005 年 12 月頒佈「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實施計劃」後，中央政府在所有政策、立法與資源配置上都要真實反映出性別平等，並要求各地方政府部門研擬性別機制、性別培力與行動策略以及定期評估執行的成效，其中「性別預算」、「性別分析」與「性別觀點」及至「性別培力」成為實務界與學術界的熱門討論話題以及致力推動的方向。性別主流化目的是促使社會達到性別平等，從目前臺灣社會相關性別法令的實施及性別議題的趨勢，性別人權看似已漸漸邁向平等，然而在真實生活層面上卻仍有相當的差距（陳俐靜，2007；林依依，2008）。臺灣跟隨國際潮流的脈動進入性別主流化的時代，婦女議題因此受到更高度的關注與社會大眾的重視，後又通過外交部所研擬「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簡稱CEDAW）案，我曾於 2008 年 2、3 月間參與聯合國所舉行的第 52 屆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UN NGO-CSW¹）暨其週邊論壇（UN NGO-CSW Panel），其中「對婦女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是當年國際非營利組織婦女團體與婦女運動人士最關切的重要議題。在一個論壇（NGO-CSW panel）中，我也針對臺灣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及民眾的性別概念做了一個關於家庭暴力議題的專題報告²。親密暴力，是對婦女的偏見和歧視中最極端的一種表現（王麗容，2003）。性別暴力（gender violence）行為

¹ 聯合國所屬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CSW）自 1946 年 6 月於經濟社會理事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底下成立以來，長期關注並倡導婦女在政治、經濟、公民、社會與教育領域的權益，每年二至三月間於美國紐約召開會議，與此同時，非營利團體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NGO-CSW）暨其週邊會議（Panel）也召開集會（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會網站）。

² Liu, Miriam M. L. (2008) **Conflict Resolution: Good Practice for Gender Empowerment**. Paper presented in the 52nd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UN(USA), February 25 – March 7, 2008.

更反映出親密關係/兩性之間存在的不平等，施暴者包括婦女的親密伴侶（intimate partner），都屬家庭暴力的一環（UN, 2009）。臺灣隨著實務經驗的發現，於 2007 年重新修訂家暴法，將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一款納入家庭成員範圍內。回觀「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這十多載，確有助於打破這個內隱父權意識之傳統社會的公、私領域界線，因此家庭暴力防治法是臺灣消除對婦女暴力的重要里程碑（王麗容，2003）。

臺灣的家暴防治網絡是一個按照異性戀規格所建置的系統，至今已十三年。服務輸送系統尚稱完善，但是未有任何配套措施來承接同志受暴當事人的出櫃問題，家暴網絡成員除對於同志族群不了解外，亦不乏帶有歧視和偏見者（呂欣潔，2011）。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雖包括男女兩性（近年同志親密暴力也有逐漸升溫的趨勢），但女性社群仍為最主要且最大宗的受害性別，加害人則以男性為多數（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2011）。目前全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從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者的人數約為 639 名，其男女比例約為 1:10（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內部統計資料）。國外文獻指出「社會工作第一線服務」是女性多於男性的工作場域（Balloch, et al, 1995; Christie, 2001; Liu, 2007），因而被視為是一種非屬男性的傳統職業（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學者指出社會工作領域在社會觀感上被視為一種柔性專業（feminine profession）的工作（Williams, 1995），久而久之，所有社工人員與社工學生都認同這種身份（identity）並內化（internalized）了這種性別化的角色期待，而變成一種文化集體生成的主體性，就如同婦女在家庭內所被社會期待與強化的角色功能一般。

性別主流化的願景，不在於高喊簽署的口號，乃在於採取有效的行動落實其「性別平權社會」的核心精神。然而推動性別主流化是否就能解決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問題，以落實政策的完整性，進而達到性別正義，目前此方面的文獻付之闕如，因此更值得探討家庭暴力防治工作者對於性別主流化的概念與實踐概況，本研究檢視分析性別主流化在地化發展脈絡的成效與所延伸的議題，主要從實務專家的觀點檢視家暴防治工作在國家政策推動性別主流化以

來，於工作上的應用性及如何採取有效的行動策略，落實以性別平等為目標的精神，並根據研究結果對照社會工作教育訓練中，家庭暴力相關議題的課程對於性別與權力意識建構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性別主流化的涵意及面向

「性別主流化」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推行的一個概念，旨在要求政府全盤檢討目前勞動、福利、教育、環保、警政、醫療、經濟、國防等所有政策裡，隱藏的性別不平等，藉著修法、立法、制訂政策、改變預算資源的分配等種種工作，打造一個符合性別正義的社會，同時在所有政策活動落實以性別意識為核心，重新配置、改變過去的政策、立法與資源須要，以真正反映性別平等（申蕙秀，2003；王如玄、李晏榕，2007）。1995 年聯合國在北京舉行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中，通過「北京行動綱領」（BPFA）³，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行動策略，要求各國將性別平等作為政策的主流。

將性別觀點納入主流，評估涵蓋立法、政策或方案等任何計畫的行動，在各領域和層次對男女的影響，這種戰略將婦女和男子的關注事項和經驗作為一個整體，於各個領域的政策和方案的設計、落實、監測和評估，監督與鞭策政府公部門在施政過程應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以對女性和男性所

³ 1995 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提出北京行動綱領 BPFA（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其基礎總結了聯合國婦女十年（1976-1988），共 12 項重大的關切領域：1.貧窮、2.教育、3.健康、4.暴力、5.武裝衝突、6.經濟結構及政策、7.權力及決策、8.婦女地位、9.人權、10.通訊系統、11.自然環境、12.女童權利等對婦女的影響，其中大部份對所有婦女都是屬於不平等的狀態。

造成的影響做為前題，分別進行分析研究，使男女能平等受益，終止不平等的現象，實現兩性平等的願景（UN, 2009）。至於實踐「性別主流化」理念的方式有下列五種性別分析工具：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以及組織再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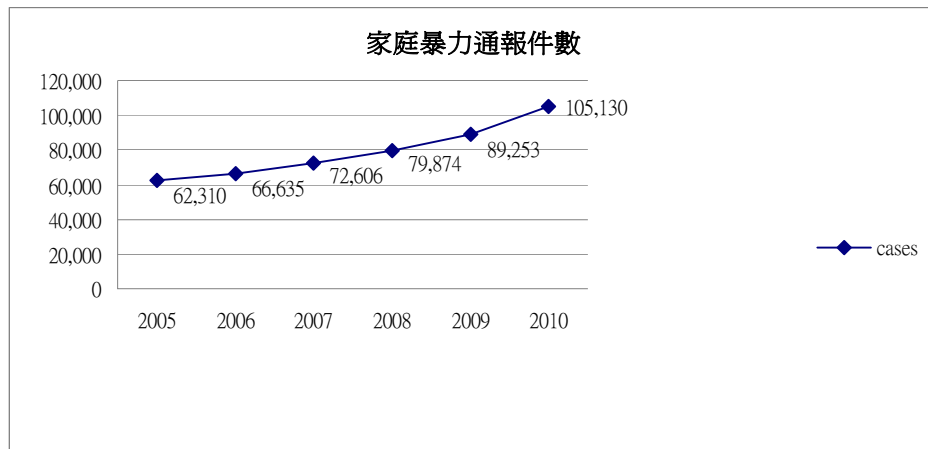
欲達到性別平等，社會上各方面的配合十分重要。學者提出四個方面的培力：一、經濟培力；二、政治培力；三、消除刻板性別角色及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申蕙秀，2003）。前三項的基本核心價值信念與女性主義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及激進女性主義流派所強調的信念及試圖改變的工作目標有相似之處；而最後一點，有關「對婦女的暴力」則是全球的議題，聯合國在 1993 年通過「消除針對婦女暴力宣言」，此宣言認定這種暴力行為「導致男性掌控和歧視女性之不平等權力關係成了一種悠久歷史的彰顯」，並且視之為一種「強迫女性附屬在男性地位之下的主要社會機制」（王如玄、李晏榕，2007），從私領域出發的家務事轉變為一種被社會大眾接受為公領域的暴力行為，此種所謂的「家庭暴力」實係「性別暴力」，隨著性別主流化的概念興起，暴力的本質逐漸地彰顯，如 1998 年 4 月 10 日大法官會議公佈第 452 號解釋，宣告民法第 1002 條的「休妻條款」違憲，至此，兩性平權、婦女人權保障可謂突破性的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黃聖堯，2006）。雖然如此，在婚姻中兩性角色與平權關係，仍然隱藏著濃厚的父權文化色彩，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法並未配合家暴法之施行予以適度修改，使得依附加害者之無業眷屬必須為了每一年度的健保換卡，委曲求全至配偶的工作場所，有些婦女甚至因而被迫放棄使用健保權利，在下一節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現況中可見一斑。

二、臺灣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的現況及探討

婚姻暴力問題由來已久，然而過去由於「法不入家門」，因此政府並不重視，故一直欠缺官方的統計數據；根據民間團體與學術機構，在家庭暴力防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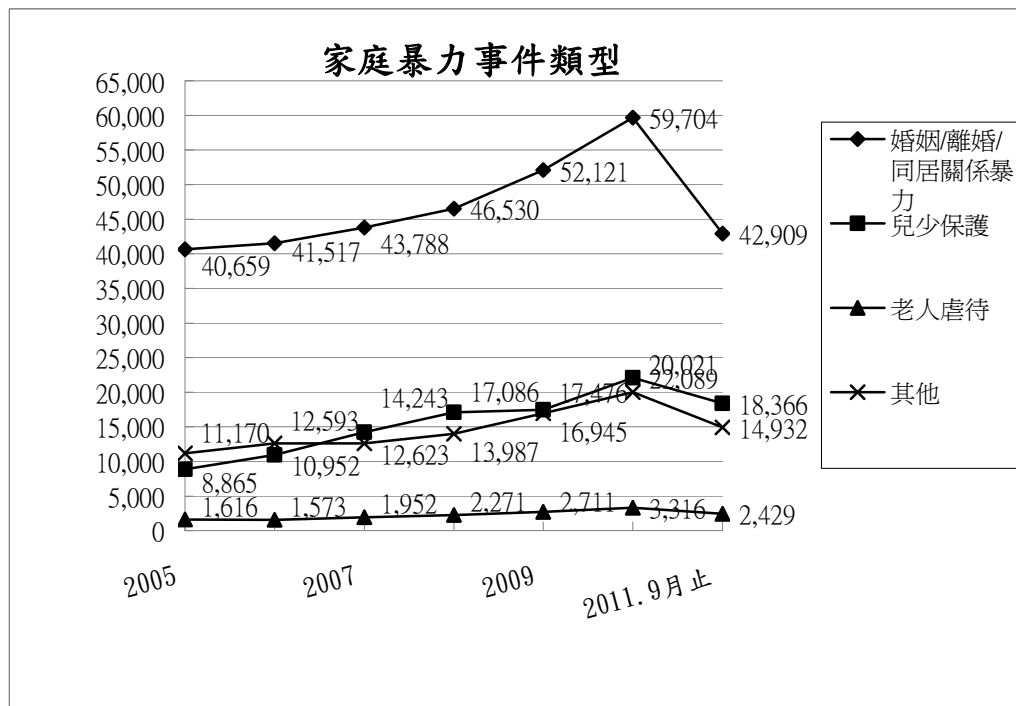
法通過前所做的調查顯示，婦女進入家庭後的受暴比例，約為百分之十二至三十五之間（張錦麗，2002）。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反映出一種社會政治的控制權，父權社會結構是導致女性被各種不同方法控制的最大原因，所以暴力可以說是在父權結構之下一種對女性的控制手法與途徑。對婦女的暴力行為違反婦女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暴力可以是身體、性或是心理層面，可能發生在家內或是社區內，有學者認為對婦女的暴力其實暴露出性別上的不平等（王麗容，2003），性別暴力更嚴重阻礙女性的平等、發展與和平（申蕙秀，2003）。由於臺灣婚姻暴力的官方統計數字內隱藏極高的黑數（黃富源，2000），這個議題或許不容易浮現出來。根據臺北市統計數據顯示，從 1999 年 6 月 24 日到 2000 年 4 月底，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接到 7,967 件家庭暴力案件，其中婚姻暴力有 6,150 件，換句話說，臺北市每天有 16 位婦女打電話向家暴中心求助；而在臺灣，每天約有 25 位婦女向法院申請保護令；每隔 3 小時就有一位婦女因不堪丈夫暴力，忍無可忍，而不得不走上刑事訴訟的途徑。

由 2005 至 2010 年受理家庭暴力通報趨勢圖來看（見圖一），顯示家庭暴力通報件數年年增長，從 2005 年的 62,310 件到 2010 年已增加為 105,130 件；而家庭暴力事件類型中，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事件的嚴重程度遠甚於兒童保護、老人虐待及其他案件（見圖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8 年性別圖像」指出，2006 年通報婚姻暴力被害人數 38,354 人，其中女性 35,612 人（占 92.9%），男性 2,742 人；而 2006 年通報婚姻暴力的兩造關係，施暴者以配偶（含分居）占 85.1% 最多，前同居人或目前同居伴侶等具有實質夫妻關係者占 8.6%，已離婚之前配偶占 5.9% 再次之，離婚程序進行之配偶占 0.4%。此項數據（即受暴婦女人數 38,354 人）與內政部家防會同年度婚姻暴力件數的統計結果 41,517 件有所出入，由於計算之方式不同，因此有待進一步澄清案件數之下的受暴人數才能對其結果下評論。



圖一：2005 至 2010 年受理家庭暴力通報趨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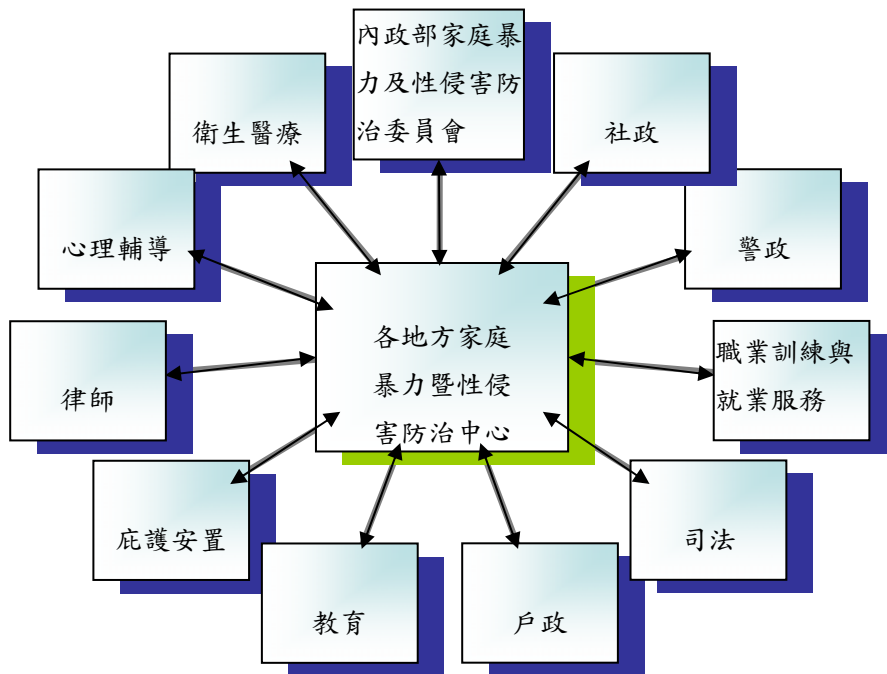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保護資料庫系統



圖二：2005 年到 2011 年 9 月家庭暴力事件類型成長圖

資料來源：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保護資料庫系統

有關兩性人身安全的法律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 年 1 月 22 日公布）、「家庭暴力防治法」（1998 年 6 月 24 日公布）。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明文規定，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4 條）。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整合所屬警政、教育、衛生、社政、民政、戶政、勞工、新聞等機關、單位業務及人力，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第 8 條）。各地方政府的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網絡圖如圖三：



圖三：全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網絡圖

執行家庭暴力防治法最主要的實務運作機關為社政機關、警察機關以及法院。法院係保護令核發、判決離婚之最後決定者，在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法院對婚姻暴力的態度、承辦法官的性別意識與性別偏見等，均可能影響法官對家暴案件的處理，並可能對家暴事件的雙方以及社會產

生正反面教育和提醒的影響（蘇曉純，2006）。學者指出，法官的態度會影響到原、被告的情緒，法官問話的語氣是責備或富有同理心，會影響受暴婦女是否有勇氣出庭。法官與被告的互動與詰問過程，對受暴婦女的安全感及信任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黃心怡，2003）。進一步說，相較於過去「勸合不勸離」、「清官難斷家務事」的保守態度，現在多數的法官傾向站在「打人是不對的」立場與前題來審理家暴事件，另一方面對受害人的態度也較過去友善（黃心怡，2003；蘇曉純，2006）。

研究指出，近年來社政系統和警政系統對於「家庭暴力」議題做較多具體回應與反思，司法系統卻較少有具體回應（黃心怡，2003），黃心怡並針對北臺灣六個地方法院（臺北、士林、板橋、基隆、桃園、新竹）之家事及民事庭法官進行調查他/她們對於法官角色與功能的認知，除審判者外，有 67.5% 的受訪者認為法官是「轉介被害人至其他機關」的角色，60%認為是「協調者」，僅有 35.8%認為法官的角色是「防治婚姻暴力者」。關於法官在審理婚暴案件中所遭遇到的困難（見表一），除了個案量太大和當事人本身的問題外，各系統間的溝通與協調亦是構成困難的關鍵所在，其中最密切接觸社政和警政單位的法官，各有 31.9%和 23.3%感到合作上的困擾。究其原因，其一、法官普遍對社工人員存有過多期待，認為社政單位可以做得更多，包括倡導被害人權益，並協助法官審理；其二、法官忽略本身亦為防治網絡團隊中的一環，在團隊分工的過程中，社政更重要的職掌在於協助受害者，而非配合法官。法官對社工角色的知覺反應是否隱藏一種階層權威意識的投射，也反應出社工的專業角色與專業位置在司法體系中似乎被矮化的不平等處境。

表一：法官審理婚報案件之困難分析表

審理婚暴案件的困難	人數	佔總人次(%)	總人數百分比(%) (N=116)
法官個案量太大	93	13.2	80.2
當事人證據不充分	77	10.9	66.4
當事人不切實際的期待	69	9.8	59.5
法官缺乏轉介的資訊	68	9.6	58.6
法官缺乏與其他單位協調溝通之管道	56	7.9	48.3
當事人不配合傳喚	47	6.7	40.5
當事人不熟悉聲請流程	44	6.2	37.9
缺乏專家證人	40	5.7	34.5
社政單位協助不力	37	5.2	31.9
法令不完整	31	4.4	26.7
警政單位協助不力	27	3.8	23.3
法官在職訓練不足	26	3.7	22.4
教育單位協助不力	18	2.5	15.5
法官感情負荷太重	17	2.4	14.7
法官學校教育養成訓練不足	17	2.4	14.7
衛生單位協助不力	13	1.8	11.2
戶政單位協助不力	10	1.4	8.6
缺乏專庭審理	10	1.4	8.6
法官人士變動太頻繁	5	0.7	4.3
其他	1	0.1	0.9
總人次	706	100.0	608.6

資料來源：黃心怡（2003：105）。

有趣的是，司法是一個男流（male-streaming）的組織文化，相對地社工則是女流（female-streaming）的組織文化。臺灣家庭暴力系統的社會脈絡已存在「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化」的魔咒，不太可能說這是個無性別的體制，因此，在執行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時，系統內的各個專業領域的實務工作者必須

不斷檢視自我的性別概念和對家庭暴力的態度，反思本身的角色及應有的功能，以免「再複製」父權社會中削弱女性權利的扭曲社會價值，以發揮專業工作的正向力量，協助受暴婦女建立其人生及婚姻重新選擇的能力。至於這個「有性別、有差異」的體制，如何才能真正推動性別主流化，即便家暴網絡的各個單位已經在執行，卻仍需努力正視執行上的課題，這個概念涉及性別的建構與權力的關係。因此，加強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工作人員運用 CEDAW 原則，重新檢視及擬訂相關法令及政策，破除性別的魔咒是當務之急（尤美女，2008）。

三、家庭暴力系統中的性別化與社工教育性別意識

性別角色定型、性別偏見或歧視，發生在臺灣每天的新聞事件裡，然而遭受性別歧視的人，不見得覺得受到歧視，或者即使感受到歧視，也不表示其個人「性別意識」的覺醒歷程因此啟動（廖美蓮，2009）。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不到社會結構造成對女性的性別壓迫（gender oppression），是由於性別盲（gender-blinded）所致（Liu, 2007）。因此，專業服務人員也可能會發生將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加諸在女性案主身上的情形。只有當女性辨識到自己之所以無法獲得與男人或其他人相同的發展機會，是由於性別歧視所致，且同時能堅信自己值得（deserve）獲得公平的待遇時，她們才開始有了「性別覺醒」（廖美蓮，2009）。

「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後，某程度代表家庭暴力已不再是家務事，而屬於國家執行公權力的範圍（黃心怡，2003）。然而，或許是女性的性別角色仍被傳統枷鎖定型，又或是刻板性別分工現象仍充斥在社會大眾的腦海，以致於司法體制內的工作人員未能主動積極提供受暴當事人各項服務，令司法系統在救援網絡中未能充分發揮其角色功能，讓當事人感到灰心失望（高鳳仙，1998）。許多相關研究皆提及家暴防治實務工作上之困境，王如玄（2000）指

出各地方政府或囿於經費問題，或主事者未予以重視而沒有另聘專業人員，只能任務編組，以兼職人員負責相關工作，專業人員沒有增加，但接案量卻暴增，致使工作人員疲於奔命，受暴婦女所獲得的服務品質低落。除了以上陳述之外，家庭暴力防治實務工作所面臨的問題及檢討涵蓋：（1）服務據點集中在都市化地區，應增加資源，促使服務社區化、可及化；（2）民間專業團體能量不足，應持續培植，以協助公部門提供充分服務；（3）相關專業人員的性別意識仍待加強，尤其是司法人員及警察；（4）社工人員人身安全保障必須面對；（5）責任通報制度仍待落實；（6）加害人處遇模式及成效評估尚待發展；（7）強制加害人接受處遇計畫之比例有待提高；（8）民眾宣導教育應繼續加強（Liu, 2008）。

另一方面，雖然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依法設立，其功能不彰卻最常遭批評，甚至有專家提出家暴中心是「一個弱勢專業幫忙弱勢婦女的體制」（王增勇，2006）之言論，某程度家暴防治網絡中也存在一般性別化的氛圍。其次，家暴社工人員常常在家暴防治周邊支援系統不足的情況下工作，現有的家庭暴力防治體系資源嚴重缺乏，讓家暴中心的社工人員獨立面對家庭暴力，在同理與接納家庭暴力受害人所經驗到的恐懼與無力經驗的同時，社工人員也成為另一種暴力的受害者，「替代性創傷」成為家暴社工人員的普遍經驗，尤其對於此領域的新進人員更是如此，除了白天需面對的工作壓力之外，夜晚亦飽受失眠、惡夢干擾，致使身心俱疲。邱琇琳（2005）針對各縣市政府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社工人員進行有關「替代性創傷」的調查訪問，受訪的社工人員中，有34.8%屬於嚴重及極嚴重受創者；此外，亦發現直接接觸家暴案主、家暴工作的年資愈淺、家暴工作的認同度愈低者，將經驗到較高的替代性創傷。相關研究指出，臺灣受暴女性的身心創傷，與性別暴力的社會迷思有密切關係：父權體制合理化男性暴力的意識形態，更加複雜化及惡質化臺灣女性的受暴創傷。

在暴力循環的論述中，經常提到女性本身對於暴力的理解與迷思（myth），不難發現性別之間的衝突與窠臼。羅燦煥（1997）檢視父權體制，性別中立原則顯然也可能變成性別歧視，因為性別中立係根據男性的生活型態

為基礎，而未考慮女性的生活經驗（Shapiro, 2008）。因此，家暴防治專業人員必須具備性別敏感度（gender-sensitivity），因為我們的社會文化建構出對兩性不同的道德標準與期望，因此在提供專業服務過程中，能不能察覺個人的「性別意識」（gender consciousness）顯得更為重要，以防在處遇過程落入傳統的泥沼中愈陷愈深。關於「性別意識」的論述眾說紛紜，「性別意識」概念最先由「種族」與「階級」性別意識發展而來，代表著一種「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認知或察覺」的意識（陳凱筑，2003）。當女人認為是性別歧視使得她們無法獲得相同的發展機會，並堅信她們應獲公平待遇時，她們的性別意識於焉而生。接下來，就是性別意識的提升，意識是指對建構自己社會位置的社會制度的批判，各種社會既定的政治認知過程（陳綺媚，2003），個人處境所可能涉及到的壓逼（oppression）等等的醒覺（游美惠，2007），透過觀念顛覆，使得個人重新界定自己的問題與社會位置，進而得到嶄新而有力的處理方法。更重要的是，藉由自我檢視與反思過程，促使性別意識的覺醒 或是經驗到父權意識打壓的個人經驗（Humm, 1992）。

事實上，這個社會處處都存在著性別偏見與不平等，研究指出，教育體制當中也存在著許多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謝小苓，1996；謝卧龍，1997；賴友梅，1998；陳凱筑，2003），驅使我不斷思考與批判在父權體制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身為社工的我們同樣受到父權宰制文化的潛移默化，不免複製了父權的意識，由此可見，教育場域的性別化訓練與規範，可能複製出更多的性別不平等（陳凱筑，2003）。因此，省思社會工作教育中的平權觀念，提昇學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與性別敏感度，對自己所在的社會處境有所洞悉與意識覺醒，以進一步尋求解構這種制度性性別歧視所衍生的性別權力關係。當然，這或許只是一個開始，因為性別角色刻板化仍然不停地滲入我們的生活環境，且深植於人們的價值觀念中，這對受教中的社工系學生而言，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性別議題在社會工作課程的再現需要被重視，檢視教材本身與老師的性別觀念是重要的，因為兩性平權的建構在教師與學生間的教學或日常生活互動裡都會產生相互影響，亦可說是一種「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林昱貞，

2000)。專業養成的過程中甚至還需要一再協助社會工作教育工作者本身，體認到性別刻板化印象與性別歧視無處不在的事實與真相，才有可能透過學校老師自身的生命經驗，幫助學生覺察到性別問題並進而培養出性別意識（廖美蓮，2012），因此分析社工系課程名稱、內容與結構，檢視影響性別意識構成之因素以及其對於學生們未來在實作（practice）上的關聯性相當重要，例如：性別意識不足是否導致專業人員對女性當事人（client）帶有偏頗的社會角色期待，或造成這群社工系學生出現「壓迫女性」的行為與現象等。激進女性主義學者 MacKinnon（1982）主張意識覺醒是第二波女性主義實踐與理論的核心，意味著「覺醒」（awareness）是「實踐」重要而必經的第一步（Noel, 1995），因此社工系學生的「性別覺醒」也是性別主流化與 CEDAW 要推動與落實過程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受暴婦女在對抗「婦女一切形式歧視」之生命歷程中，多少社會工作者能夠看清楚、說明白，原來婦女在離返家庭之間的掙扎與迷思都必須回到父權文化結構的脈絡背景，才能看出原來社會建構形塑婦女為被矮化、歧視、欺壓的主體。遺憾的是，不僅男性壓迫女性，女性社群也常壓迫女性，成為男性的共犯結構。例如：婆婆要求自己的兒子不能幫媳婦做家事，以免成為「妻奴」等普遍的社會現象。這讓我想起前些日子被邀請到外縣市做社福機構家暴業務委外的年度工作評鑑，受評機構是一群女性社工，該縣市家暴中心的婚暴專業團隊多數為女性，普遍是畢業 1~2 年內的社工。

某地方法院家事服務處主要服務對象是以受暴婦女為主。在受託單位的宣導品資料上顯示的服務內容，包括提供『夫妻協談』。瞭解機構提供此項服務背後的規劃構念，以及從他們的實務經驗觀點，通常都是哪一方提出或是哪一方的需求居多？此外，執行面上機構是如何進行？工作人員接著回答說：「因為很多婦女缺乏跟先生協商（negotiation）的能力，甚至有很多婦女是十分害怕與自己的先生或伴侶交涉，由於，在法院的辦公處經常接到先生前來求助，希望透過社工與其太太對話；又或是查

探太太/伴侶的下落，於是，機構認為也許開設一個專門的平台讓加害人（先生）與婦女有機會對話…」聽到這裡，我心裡產生了一連串的問題，例如：此項服務究竟是滿足施暴者的要求抑或是當事人真的沒有能力對話？當「當事人」被專家認為缺乏能力協商或是懼怕先生此種考量之下延伸出的服務型態，其工作核心價值與充權有無違背？究竟社工需不需要為加害人找不到太太一事負責？家事服務處的社工與過去在區公所裡的調解委員會的差別是什麼？就這樣從她們的回答引發出我們更多的問題，到底合不合適提供『夫妻協談』？同時更值得關切的是，機構通常是在什麼階段提供此服務？有沒有考量受暴婦女的狀態？加害人是承認自己的暴力行為而因此希望雙方調整，還是只是一味要求婦女做改變？這樣，會不會更深化工作中的父權意識…。（2008 年 12 月 3 日研究者個人札記）

由上述可見，臺灣社會雖然經歷了九〇年代女權運動、女性主義理論的推動、2005 年全國性別主流化的推動，但是真正採性別、權力觀點來探討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議題之行動研究還是非常稀少（趙雨龍等，2003）。本研究期待能夠引入性別視角（gender perspectives），分析本土社會工作與家暴暨婦女議題，回應當前性別主流化的潮流。社會工作教育是性別意識覺醒的重要場域，在討論社會工作者的性別建構時，男女性別角色的特質不斷在其生活甚至工作場域被強化，在實踐過程中，工作者其性別意識的體察迂迴地滲透其價值信念以及工作方向，由於社會科學領域對性別研究或性別視角的瞭解仍相對有限（林佳，2004），透過社會工作教育提高性別意識與覺醒有其必要（廖美蓮，2009）。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收集方法與對象

本文以質性研究為主，研究者檢視行政院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以來的執行現況與成果，同時評估其執行困境，尤其針對家庭暴力工作人員的性別教育訓練和執行具備性別意識實務行動的水平連結，提出未來社會工作教育訓練之建議，為達此目的，本文截取三次特定對象的專家「焦點團體」（focus group interview）資料，焦點團體的討論大綱依據一次全國家庭暴力防治社工人員問卷調查，瞭解其對於性別主流化與 CEDAW 之認識與理解，以作為焦點團體進行時之對話依據。本研究透過焦點團體方法收搜集資料，在探討個人的主觀經驗與感受時，研究者是重要的工具，訪談的情境場域也是重要的變數，本研究為保留受訪資料的真實性，除了於每次焦點團體訪談進行時同步錄音方式，並將焦點團體訪談的錄音檔轉成文字檔案之後，也在逐字稿中呈現研究者觀察受訪人的非口語表達以及區分研究者的詮釋，並且不斷檢視研究者自己的主觀意識與參與者語言背後的意識形態（Flick, 2007）。研究者詳細閱讀逐字稿，逐句檢視可能與本研究問題相關的內容，然後把訪談的文本資料分析，著重於以議題分析為主軸，針對議題進行異同的比對分析。

本研究共進行三次焦點團體，時間是從 2010 年 3 月至 5 月。由於性別主流化在臺灣的推動模式是從上而下，因此焦點團體的出席主要的邀請對象為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主管以及中層主管等職位的專家參加；亦因此研究者在邀請的過程中遭到受邀者「先答應、後缺席」的情況，即便有一兩位主管人物連續被邀請三次，終究還是不克參加。所以，最後研究者只能順利舉辦三場焦點團體，每次大約兩到三個小時，因邀約過程十分曲折，所以三個月內每月只能各舉辦一場。每次邀請至少八位左右的成員參加，但每次應邀而來的人數，從 4 到 6 位不等。或許，由於家暴領域內的女性佔多數，研究者在邀請的過程中主要是

考量邀請者的工作職務而非考慮其性別，惟最後發現焦點團體受訪者全數為女性，分別任職於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公部門（中央單位與各縣市政府的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管或民間從事婦女工作，及目前有承接政府委託之家暴業務的機構負責人參與討論；並針對性別主流化與 CEDAW 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中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以瞭解目前國內家庭暴力防治領域中性別意識與性別平等的樣貌及執行情況。

表二 參與各次焦點團體成員

場次	參與對象	人數
第一次	家防會主管、社會司婦女科主任、家暴中心主管（獨立單位）、婦權會委員	6 位
第二次	地方政府家暴業務主管、婦女團體或參與 CEDAW 工作	5 位
第三次	NGO、地方政府附屬的家暴中心主管 婦權會相關業務的機構、民間單位（接受政府委託家庭暴力）	4 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資料分析

從參與團體成員的觀點出發，深入瞭解成員對性別主流化推動的看法與體察，質性研究最重要之部份是資料的分析與詮釋，分析是一個持續並反覆與資料彷彿共舞的過程（黃政傑，1996）。本研究採女性主義方法（feminist research approach）分析訪談資料，以及進行研究過程的省思。實務面上，女性主義關注是什麼樣的社會機制導致女性角色被矮化、女性被放在從屬的位置上，然後對這樣的社會機制提出挑戰，從辨識到覺醒，再檢視有沒有鬆動的可能。學術面上，女性主義所關注的「生活」、「主觀經驗」、「主觀經驗之社會反映」，

正是質性研究所關注的面向（胡幼慧，1996）。

三、研究者本身做為工具

研究者的個人特質與能力是質性研究的重要成功因素（Liu, 2007）。研究者帶著屬於自己的背景與脈絡參與研究其中，以自我主觀的價值體系聆聽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與性別意識的內化與覺醒歷程，也是研究者意識形態再現的一部份。然而，做為一個研究者，要注意自己是否能夠隨時自我反省與反思，不斷檢視自己的偏見與刻板化，更重要的是知覺與受訪者之間存在不平等關係（Tang, 2002; Liu, 2007），因此研究者要更敏銳地察覺訪談互動中的權力議題。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節為結果發現，以下將分為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劃」的概況，上位者對性別或性別主流化不了解、為執行而執行，性別主流化與家庭暴力做結合，以及性別培力所面臨的困難等四個部份說明之：

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劃」的概況

（一）流於形式、過程生硬

本研究進行第一次焦點團體時，研究參與者從實務工作者觀點，對行政院2005年所提出『性別主流化實施計劃』熱烈地發表並討論此政策的推動過程與性別主流化核心概念之間的差別，參與者普遍認為政策推動流於形式、過程也很生硬，以下是參與者的看法：

其實我對它的評價會比較是負面的，因為我覺得政府部門做這個，也不

是他們自己突然想通了覺得很重要就做，而是來自於一些外界的壓力說要做，那行政機關很好玩，反正不是他自己想要做的而是加進來要做的，他就可以給你做得有形無體這樣，所以我自己觀察到至少在內政部推動這個部份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做得非常形式化的，一點都沒有回歸到說，當初這個性別主流化的這個概念，是希望做決策或是立法的人要先有一些性別的意識，然後他在規劃任何的法律或是措施的時候，他有考量到性別不平等的部份，他怎麼透過我們法律的機制去做一些修正，基本上在這個部份其實我是沒有看到的，所以雖然有什麼性別預算阿、什麼性別影響評估，那個東西在行政部門操作來看，我覺得都是非常的形式化。

(G1：3)

當我們相關政府部門要把它成為一種說你要去檢視你的政策措施啦，那用相關的指標去檢核的時候，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很生硬的過程，你要抽絲剝繭把你本來服務的很以人取向的這種方式套到他各種指標裡面...。

(G1：1)

(二) 定義模糊，執行困難

第一次焦點團體的成員認為行政院為因應國際潮流及外界壓力所推行之「性別主流化實施計劃」空有架構、未有實際內涵，給予較負面的評價。下面是一位在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擔任主任職務的成員的看法，反映出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對國內家暴系統的管理階層仍然很模糊。

性別主流化這個東西是怎麼產生的，到底是外來的？還是一些專家學者透過他們的經驗就把它弄成六個面向，硬要我們把自然的東西去把它符合格式的報告提出來，對我們來說那個過程是非常痛苦也是非常多的質疑。(G1：5)

此外，政府管理階層在參與本研究的過程中亦表示：

連我們在做○○委員會這樣的工作，都有這樣的事情、不確定性，那更何況一些比較陽剛的單位，他們對這個議題的理解，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不會有更多疑問嗎？（G1：3）

（三）對概念充滿誤解、更形筆路藍縷

在回顧與分析性別主流化的概念與推動演進過程之前，有必要對於本概念進行簡單的釐清。「性別」與「主流化」兩個詞彙本身都有很容易遭混淆的解釋，卻被擺在一起而建構出一個含糊其辭的新口號（李秉叡，2009），一如這位研究參與者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好像已經變成是一個現在會被看見的一個名詞，雖然有很多誤解，我記得每次開一些委員會就有委員說現在性別很平等阿！應該是男生太少的問題喔！然後女權高漲阿，申請保護令就是為了要離婚阿等等，就是會發現有一些，至少以我的經驗我覺得是誤解了性別主流化的意義。但是我覺得至少在人口統計上面，這些議題已經變成是大家都看見的東西。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改變啦！（G1：3）

（四）缺乏具體指標、內容及評估標準

事實上，以性別主流化做為國際間落實性別平等的政策而言，臺灣似乎在理解實踐的過程中仍不免遇上概念的辨證與釐清，連帶使得推動政策業務之工具、指標，及至意義的理解與操作尚不明確清楚。諸如：

我們過去這兩年曾經有法服處⁴的服務，來作為他性別服務的主題，裡面

4 法服處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中，司法系統被視為是納入綜合救援網絡的一環。為協助被害人完成司法程序以爭取司法權益，其間獲得多位委員的熱烈迴響，爰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倡導行動，期待強化社工與司法之連結，透過完整、便利的個人化服務設計，讓被害人能夠在提出司法訴

他要我們設定一個，你自己設定一個目標值...達成幾人次，這跟性別的評估一點關係都沒有，好那他就一定要有性別的東西出來，你是要講女性的服務越多越好叫做性別主流化嗎?...在定那個目標值本身來講，我覺得就充滿了迷思...每一年在寫這個要提這樣的計畫，或者事後，要做評估的時候我都會遇到這些困境。（G1：1）

還可以有什麼比較具體的步驟、策略...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其他我們應該做但沒有做的...我要怎麼去知道我們有沒有達到某個目標...到底我可以用什麼指標，去評量我有成功的做到了『性別主流化』這件事...現在是誰要做這個評估？。（G3：1）

（五）上位者對性別議題缺乏了解、為執行而執行

一位參與成員敘述了一段故事：

「最近又有一個案件是他就是外配然後離家嘛，然後他打到我們縣府，縣府又再打給我，那我們的機要說，他聽的懂我們解釋的，現在我們婦女離家這是她的權益，然後如果他有遭受到婚暴，那先生就不能夠去報協尋，我們機要聽的懂，他說我們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可是這個先生他透過民意代表來找機要，所以先生就會覺得說我是中華民國的人，那你總統怎麼不幫我這個中華民國人，他是越南人。然後小孩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人，然後我（先生）花了這麼多錢，...我想大家都很熟這樣的 story，所以我們機要也跟著說：「我都了解你說的而且我也支持，不過我們現在真的是面臨我們需要去說服。」那我覺得這樣的故事其實是無所不在

訟程序時，獲得各項福利與法律服務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保護服務工作時，相較其他福利類型社工服務，其服務範疇延伸進入至刑、民事司法系統為多，其中以性侵害案件及家庭暴力民事保護令之聲請為主要，而家庭暴力民事保護令之聲請，由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所轄地方法院設置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簡稱法服處），提供被害人相關社會福利諮詢、法庭陪同及保護令聲請狀填寫等相關法律程序等服務（內政部家防會，2009）。

地。我覺得這是很極端，那就反映說性別的價值我覺得他很需要再去，如果要回應剛剛講的說我自己會覺得需要花更多時間去培力我們自己性別的意識，但他沒有辦法那麼快（G1：3）。

也就是說，在性別覺察、性別主流化這些概念不斷被宣導與擴散的過程中，大家把「性別主流化」流於普遍用詞，甚或對「性別主流化」相關的語句進行調侃，視之為「女權意識高漲」。聽過是一回事，省察又是另一回事，在實踐過程中，這種表象的理解很容易瓦解，甚至在遇到權力議題時很容易妥協，一如上述參與者陳述的內容，雖然溝通過程表達可以理解，但最後行為卻難以實踐。

研究參與者肯定性別主流化的觀點，因為參與者普遍認為性別意識成為實務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但當作為檢視政策措施成效的檢核指標時，卻眼睜睜地發現推動「性別主流化」有其執行的難度，包括似乎流於形式，由特定的人參與訓練或會議等。

怎麼會是性別聯絡人接受這樣的資訊而已，可是其實提供資料的或是要寫相關資訊的都是其他的人...。（G1：4）

每次來上課都是那個性別連絡人，所以我在想說，中央推了很多課，可是其實，聽他們的分享都是說，每個部會都有一個性別工作小組，那每次就是性別工作小組會請來一些性別委員們來開會，那每次他們就就那些議案在開會，可是真的落實到各自的工作的時候，其實很多人都是覺得很模糊的，或是沒有關連性的。（G2：4）

「主流化」若要成為政策概念，那麼推動的人——也就是國家元首、以及各級機關首長，將會是性別培力關鍵角色，下面是一些實際的例子：

社福考核，要看呈現在性別主流化這個議題裡面，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當然他有要求地方的主管，特別是一級主管，都要去對性別主流化的東西有一個訓練跟認識我們因為也負責婦女權益這一區塊的工作，所以那時候我們也努力的爭取到，在努力的爭取到（強調），一級主管能夠來參與這樣的一個訓練，可是後來我們發現，真的在執行的時候，確實有某程度的這些困難，政策要決定跟性別主流化有關係的話，主管是特別是一級主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我們發現說，真正基層的工作人員，在我們要推動這樣一個東西的時候，會比較不被看重。（G2：1）

有一次是行政院婦權會辦，調訓各縣市政府的主管去上那個性別主流化，那當時我們處長在幾個科裡面不知道要派誰，他就說：『你看起來就是對那個性別比較有興趣啊，就派你去。』回來我就說：『根本不對，不應該派我。』...應該派那個負責婦權會的那個科長，因為他才有辦法在婦權會的架構裡面去做這件事情，對，所以可見得我們大家對什麼是性別主流化其實會把它以為它就是女性主義。（G2：2）

主管一直很忙，所以，我們也會 push 一直去參加。那我們有去的主管，就回來，我覺得他再跟我們討論一下方案推動的時候，就會比較有概念，那不是社工領域的長官的話，我們也是會鼓勵，真的要去參加。然後，去多了解這方面的內容...在工作上會比較好推動，我們的終極目標是會擺在主管能夠支持我們的，不管是所提的方案也好，關於這方面的方案也好。或者是我們在做個案上面，個案上面的一些處遇上，能夠給我們一些支持，我們都會鼓勵長官說，考核會影響到我們的分數。你只要上了這樣的課程，我們的考核，這個兩、三分，這三個都是兩分，就全部都拿得到。可是，如果你沒有去，我們是一分都拿不到。對，所以，我們都用這樣的方式，跟我們的主管講。那長官他就為了這個一定會去...至少我覺得，如果我們長官有去參加這樣的一個培力的話，其實回來，

那個觀念上多少都會有些...。(G3:2)

(六) 性別培力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雙軌論述

目前性別主流化成為全球化的產物之一，其政治理念與政策模式亦形成跨國網絡，進入各國政府、公民社會、到私部門的企業中，成為各種不同層次之治理的工具（Grosser and Moon, 2005）。性別主流化亦經歷漫長的時空才漂洋過海來到臺灣，以臺灣的發展來看，一開始是透過 NGO 婦女團體的運動人士與學術社群的資訊管道，逐漸滲入臺灣公/私部門的參考思維，再慢慢由中央政府內部開始發揮較大的影響力，換言之，即由局部至全面、由中央到地方、由公部門至民間團體逐步推演。這種策略雖符合所謂的「在場政治」策略（李秉叡，2009），卻可能流於一種口號以及術語的表述卻未必有實質效用；然而，參與此項政策的政府官員還是肯定由上而下的推動方式才能發揮效果。

在部會層級甚至到縣市政府，他其實會出現同樣問題，就是說當我們師資不夠，當我們的觀念還沒跟進的時候，不要全部拉，你可以先從部會裡頭，哪幾個部會，比較、比較怎麼講，你看重要性啦，就是跟性別影響比較大的，還是說哪幾個部會覺得可以先來做做看，先來做一段時間來評估來加強，之後再去複製啦，我覺得這種東西講的簡單一點就是說急也不急到這一天啦，不急到說今天一定要全面，你說與其做死了倒不如慢慢來，必先從一個小，例如說內政部，然後再擴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慢慢的把，同樣的在推當中就又培力一些人了嘛，那一個再一個再一個這樣擴散下去。(G1:6)

要把性別主流化的東西放在這個裡面呢，其實對我們來講已經是非常大的一個突破了，因為要深入到鄉下的地方去深耕，確實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那所以你說問我說成效在哪裡的話...某程度來講，至少開始大家對於性別這件事情是有被重視到了，甚至我們在整個議程裡面也會

去討論到性別...我們在推動者的方面，也遭受到頗多的壓力...中央要有一個更好、更明確的政策來支援地方，就不會讓工作人員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感覺到好像自己要造反，好像要改變社會什麼事情這樣子，特別是公部門在推，那我們也希望說民間部門在我們鄉下地方能夠推，可是民間部門在鄉下地方這方面概念其實是非常薄弱的，也只有靠公部門慢慢的去給他們東西，他才有辦法推...。(G2：1)

政策執行的模式，約可分為由上而下模式、由下而上模式、變遷學習模式、溝通模式、過程/結果模式等五種。家庭暴力防治法在政策推行模式中，是屬於「由上而下」⁵模式。自從性別主流化被引進臺灣後，行政院婦權會為主要的推動單位，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將「性別觀點」相關知識觀念透過各種在職訓練培力各個層級的公務人員並納入政策的主流，此與聯合國所提出的結論：成功將性別觀點納入主流的關鍵因素是高層領導管理先作出承諾，並建立有效的專責機制（聯合國，2002：27）顯然一致。

然而，這種由上往下的政策執行方式，研究參與者似乎有不同的看法與觀點，包括內容容易流於空泛、缺乏內化歷程、以及難以落實等：

從一路走來都在這個性別觀點之下，你有這個腦袋，這個概念，你才會納入你的法案，在你的施政裡頭才會放進去隨時檢討，在你的評估上面才有那個指標，那那個很細緻的。在你在統計分析的時候你才知道說要有性別的這個意識。可是基本培力概念是不穩的時候就會變的很空泛。然後做的人就搞不清楚，好像為做而做。(G1：6)

這種性別的議題跟這個家暴的議題在我們臺灣生長模式的一樣，就是都是從上而下，看到國外在做我們要從上而下，然後中間又欠缺比較細緻

⁵ 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所重視的是科層體制的控制過程，政策的規劃、形成與執行皆由高階層負責研擬與設計，目標與政策執行之方向等細節必須清楚明瞭，而低階層者負責盡力推動與執行政策，符合高階層所期待的目標，不可以輕易變動。

的溝通，所以他變成用一個框框就這樣框下來，下面的人根本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的時候，他就被迫要去學習說，而且這是一個政治正確阿，你等於說你形式上的東西你一定要符合這些規定，可是說真的那個內在那個東西它沒有內化。我覺得做下來的東西真的很表相。（G1：1）

性別主流化談的大概就是所謂的政策的問題，大家都認為說，政策要決定跟性別主流化有關係的話，主管是特別是一級主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G2：1）

二、「性別主流化」與家庭暴力做結合

（一）以性別主流化檢視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障礙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性別主流化」強調在各領域各層面的所有政策及計畫中，融入性別觀點之重要性，以降低不平等現象，將性別觀點主流化，並評估男、女在各種領域與層面的各種行動、立法、政策或方案的過程。所以性別主流化的終極目標是要達成性別的實質平等。而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反映出一種社會政治的控制權，父權社會結構是導致女性被以各種不同方法控制的最大原因，所以暴力可以說是在父權結構之下一種壓迫女性的手法與途徑，亦因此家庭暴力與性暴力議題常常被認為是一種性別暴力，而性別意識與家庭暴力工作習習相關，家暴社工需要具性別敏感度、並將性別觀點納入其評估處遇。研究參與者都認同性別觀點與家暴領域間具有高度關連性，以如下列陳述：

某個程度認為家暴的統計數據其實你還是很明顯看到數據上女性比例是八成以上受害者，所以是男性對女性的暴力，性侵害更是，可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在心理衛生這塊，或是其他的領域，的確我們家暴有時候是其他的議題，是我們要共同努力的。可是那個事情跟性別是兩個層面，我覺得兩個都應該被看見，而不是把它 mixed 在一起說，這個跟性別是

有關係...。(G1:2)

整個家暴防治法當初的立法也是缺乏性別的觀點。因為我們從頭到尾只有看到被害人，我們所有的機制都在保護所有的機制都在保護被害人，可是如果說整個所謂的預防的機制來看的話，那有 90%的被害人好了，那就是有 90%的加害人，那我們在法令或是政策或是服務配比上面為什麼我們都在保護被害人，而沒有處理加害人？那沒有處理加害人的後果是什麼？其實就是看到這些被害人，不斷的增加，不斷的增加，不斷的增加。(G1:3)

推家暴法每個人都是在實踐性別主流化的一個工作。所以我們在執行的時候，用 CEDAW 裡頭的這些，我們說人身安全裡頭的性暴力的這些指標來推家暴是更有方向感跟它的步驟感節奏感。那在用性別主流化的六個評鑑指標其中當然最主要的還是這個性別的預算也好，還有這個性別分析，性別統計，是跟我們這個家暴的關連性更高。(G1:6)

(二) 社工職場性別意識與生活性別實踐之間出現斷裂

內政部家防會委託學者進行《我國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服務方案之回顧與評估計劃》的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社工人員之「性別」意識與訓練均不足，建議強化性別意識和概念的培訓課程（嚴祥鸞，2009）。本研究也發現相似的結果，無論主管位階、還是一線社會工作者，普遍不瞭解性別主流化以及與婦女議題相關的 CEDAW 法案，性別知識與敏感度均顯不足，對暴力的觀感與看法存在矛盾與似是而非的女性主義論述。下面訪談資料中，研究參與者提到教育訓練、專業體察與性別經驗等影響因素：

有一些 worker 可能聽過這些課，有些沒有聽過，他們覺得這些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個案都做不完了。那到底我今天到底我自己在我的位置是在

性別主流化或者 CEDAW 的哪一個位置，確實會覺得很生澀。（G1：3）

女性的經驗其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特別是那些受暴婦女的經驗。那其實我也看見過去我們的社工，其實是不太不太去理解受暴婦女的經驗，就是對他整個生命的經驗、受暴的歷程其實是不太理解的，那也不太耐心，好好的去理解。因為案量太多，服務時間太短，服務都很表象式的，都是那樣問而已。（G1：2）

此外，本研究的發現也與 Smith（1987）論述相似，即社工對知識的理解、與其生活經驗之間有明顯的斷裂，如同其中一位參與的專家提出：

我們真正在作的人，其實到底多少人對性別這個議題有很清楚的認識，我也是打一個問號？那現在大家都是在做說，中央告訴我對待婦女要如何如何，就是你來報案的婦女我要如何如何，可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因為我是被法律要求的，他不是打從內在就知道有性別平等的這件事情...我們的社工，不管是男性社工或女性社工，對性別這個議題的敏感度，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也還需要更深入去加強家暴有很多都是從數字裡面看到被害人很多都是女性...那問題是說，我們的社工人員性別這個部分呢，他如何去很清楚的知道說，我要支持我們的婦女，或者是我們婦女有一些迷失的時候，我們怎麼樣把她帶到一個比較正確的一些觀念，因為這個是衝突的，有時候社工人員自己本身在性別的議題上他都是衝突的...他怎麼樣去引發出婦女也知道那是衝突的，有時候他都講不出來，他甚至也不太覺得那個到底是怎麼樣子，就會變成說社工也不知道說他這樣子講是具有性別歧視的意味這樣，是不自覺的啦。（G2：1）

職場 vs. 生活中的性別實踐

上述的訪談資料反映出部份社工員缺乏性別敏感度，即使部份社工員在職

場上似乎具有性別意識，能倡導提醒當事人爭取性別平等，但在自己的社會關係、生活經驗中，卻仍免不了在家庭生活中複製附屬次要地位，顯然「知識理解」不同於「生活實踐」，有待更多生活經驗的連結與學習，一如參與者下列的看法與意見：

我剛開始做婚暴的時候當時也是覺得很挫折，你每天告訴個案說性別是平等的，可是每天回家家務分工，自己回家沒做又覺得很罪惡，好像這是女人該做的事情，然後請產假為什麼是女人在家，然後回家跟婆婆媽媽討論，我懷胎十月生下來的小孩跟男生姓，然後請產假是很理所當然，看起來是很不錯我在請假，可是小孩是我在帶阿！所以我想那時候會有個議題是說，那性別的議題自己沒有克服，那乾脆不要做這個好了，衝擊太大。（G1：2）

我那時候是在跟他們分享說性別主流化其實非常的生活化，他其實是在看男性和女性不同的需求，然後我的政策怎麼去回應這個需求，那去跟他們講之後，開始去講說他的工作的經驗，其實跟性別主流化是有關連性的，可是在你沒有討論的時候，他其實會覺得性別主流化只是一個政策綱領，它離他的工作經驗很遠...。（G2：4）

個案的急迫性處理完之後內部的督導會議裡面，會有一些省思就是說，那我們自己 worker 本身呢？。worker 把自己也給定位在一個要被男性肯定，你才會覺得你是有價值的那種情形的時候...這樣你當 worker，你不會覺得很辛苦嗎？。（G3：2）

工作人員從工作中、生活中如何體察性別

性別無處不在，在家庭暴力工作中，總有一些具體可用的方式激盪起助人工作者生活裡那些早已存在的經驗。在工作裡頭，它可能會影響工作，包括工

作上的計畫，有哪些部份要帶入性別評估，也就是指個人的性別意識如何反映在工作。關鍵其實在於助人工作者是否能覺察，頓悟出生活與工作間的關聯性，慢慢就能從內化到擴散。參與研究的資深實務者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一線工作者在這種高度壓迫的體制中所面臨的處境，包括：

最近這十年，所謂的 worker 他對婦女內在的歷程了解都太少，因為我覺得現在 worker 現在的處境就是被要求，這些通報的有沒有出事情，所以我想這些 worker 的壓力在於他必須回應這件事情，所以他沒有太多空間去檢視我在哪裡，我自己掉進我自己的陷阱...。（G1：2）

性別的問題，在我們的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裡面其實都有，可是我們怎樣才可以把這些問題從角落裡面找出來，然後讓基層的公務人員從他的基層的工作裡面，跟民眾服務的工作裡面，有這種認識，我覺得現在...還蠻缺教育訓練的。（G2：2）

社工人的生命經驗

知識的生產往往與個人的處境經驗有關連，如果社工沒有生命經驗，社工有可能無法貼近服務對象的生命經驗歷程。要如何讓一群年輕的社工或社工系學生更貼近性別主流化的目標，進而有機會終止性別不平等呢？參與成員在焦點團體中不斷提到社工員切身的經驗：

一個社工人生的歷練，對於他在做這樣的工作過程當中是會有很重要的一個影響。那你同樣回到說如果你不理解我們在服務的一些對象他們的一些生命經驗的話，那我們怎麼提供他們服務？就是我們給他的服務還是只是非常表象的，那我們的關係也是...社工跟案主這種很『專業』，覺得那個是很表面、很理性的關係。其實是沒有進到他們生命經驗裡面去的...。（G1：3）

生命的經驗一定是有影響的...當你隨著二十歲、三十歲，然後你是單身到有家庭，那你同時面對是因為這東西其實不是只有個人的一個信念，還包括家庭、社會，他們對待...女性男性的一個看法，你要怎麼樣去突破...去在這個過程當中掙扎然後走自己的那個路，我覺得一定是一個生命經驗的一個歷程。（G2：3）

如果說這個學生能夠從大環境去看，那可能又有不同的意義了。就是說一個女性，當她這樣發展成長，她是不會跟男性擁有一樣的權利，會一樣沒有包袱去實現她的夢想，她能嗎？還是說這樣的女孩，她的夢想裡面其實就是嫁一位好老公。那個畫面其實沒有改變，我們還是，最希望是，這個女性在這個社會是可以自由的，跟男性有一樣的權利，去實現她的夢想。（G3：1）

我覺得很多年輕的新進社工，他們都很平順。生活當中也沒什麼大事件，沒有什麼大事件的衝擊。所以，你很多的為什麼的時候，就很難去了解為什麼案主會...，所以，我覺得滿重要的，這部分的訓練。（G3：2）

（三）與「男性」工作衝撞中的反思

歐美國家更早前就開始提出一種論述，若要建構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不單改變女性，改變男性也是同樣的重要（Snodgrass, 1977; Kimmel, 1987，引自梁麗清，2006）。如同第一場焦點團體中有保護體系的主管提到：

我還沒有進入婚姻，我還很年輕的時候，我對加害人就覺得這些人大概是就很有問題，我也不太想要去理他們，那我也覺得婦女受暴案才是我們要去重視的。可是，一旦他變成你的工作，然後你實際在進去做的時候，你慢慢就可以跟你關心的議題做連結，因為我也看見說這些男性的施暴者，他會去施暴，他背後的價值體系到底是什麼東西在影響著他，

然後他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做反應，那我也看到，某種程度他們跟我們傳統社會文化價值的一個觀念對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影響。（G1：3）

從上述參與者的談話中，可看出參與者因著與施暴者的接觸，開始思考性別、結構不只是對被害人帶來影響，同時也可能形塑了施暴者的行為模式。臺灣官方的男性關懷專線早在 2004 年前就設立，而在本研究的深度訪談中，家庭暴力防治社工提出男性被害人求助近年有慢慢增加，不過男性服務的經驗在臺灣畢竟還是很有限，但這些接觸經驗，顯然已為第一線工作人員帶來衝擊與反思。例如部份接受訪談的參與者建議應發展男性被害人的工作方法，以及因為與加害人的接觸，讓他們不確定自己該如何看待加害人、甚至是自己服務被害人的位置：

男性被害人一律要由婦保社工來承接，其實沒有考慮到男性被害人真正的需要，因為我覺得他可能他的需要，跟他要的那個服務，跟我們傳統整個家暴防治工作，以婦女為主軸的那個服務是不一樣的...沒有去思考到以性別主流化來思考男性被害人的一個需求。...以女性被害人主要為對象的那個思維跟工作模式，現在要我們一般在做這個工作的人員，來做男性被害人的工作，可是那個我覺得是有一些衝擊、挑戰和衝突的，那我會比較建議是，應該要去發展真正男性被害人的工作方法。（G2：3）

其實當時我在做家暴已經好幾年了，然後我覺得當時有個挫折就是說就是我們在討論家暴的範圍太廣了。不能夠只討論婚姻暴力，加害人你應該為他做些什麼，他們也是被害人。我想有很多這樣的一個價值讓我在當時覺得說，怎麼跟我得到的性別議題是有落差的，所以我想在那段時間很挫折，覺得不要再做了好累喔，覺得每天都被檢討我們做被害人不作加害人。（G1：2）

家虐的案子不見得是女性的，現在很多它的個案是男性...變成說，你沒有很有辦法很穩定的去站在女性主義弱者的角色，沒辦法。因為跟你工作的是男性。於是呢?...他們（社工員）的位置一直換...我們現在要要求社工人員，要很堅定的站在某種位置，變成也不實際。（G3：1）

三、性別培力所面臨的困難

如同第一場焦點團體的某位參與者所言，「在那個性別培力的部分還是要很紮實的去講清楚到底是什麼，性別跟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生活，跟我們在執行這個的工作，緊扣在一起。」有趣的是，什麼原因令性別議題最後被邊緣化，而為何在社工說著缺乏性別訓練時，上層的人卻認為如果要鼓勵更多員工參與性別培訓，恐怕還要費更大的力量。

幾年前如果說我們有新人進來，我們都一定會把性別教育放在一個好像是新生訓練的裡面。但是，反而我這次回來發現，你要塞的東西已經夠多了，整個機構要給他的東西，包括流程、然後那個資料庫...反而性別的東西不見了。（G3：1）

什麼是性別主流化的認識其實是不足的，所以做不出來，那你連最基本的預算都做不出來，統計做不出來，你很難看的到問題，我覺得除非就是我覺得要再紮實對基層公務人員，讓他把這個東西做...就是跟他業務有關的東西找出來，之後他自己就會看到那個問題...。（G2：2）

是不是家暴委員會也可以跟某個民間 NGO 合作，每年就輪流派縣市，每年都去是不是家暴委員會給公文，說地方政府可以給公假，那至於經費在自己想辦法，像我是願意自費去的，如果有機會的話。（G1：2）

（一）性別培力師資的難題

在性別主流化如火如荼推動的過程中，實務操作上卻面臨另一個困境，找不到合適的講師，有的專家具備性別的背景但欠缺機構所需要的特定專業，諸如身心障礙或是性侵害等等；有趣的是，研究參與者提出即使同一個訓練主題，卻從來沒有老師講的是同一個方向的内容，加上研究專長的差異，因此課程的內涵也都不一樣，目前的經驗是「性別主流化」暫時尚未有統一的教材。下列是幾種常見的難題：

性別主流化的一塊就是他要實施性別平等教育，就是說我們現在也在過程中有導入一些相關的訓練，但是我們在訓練的過程中會發現，每個人講的東西好像沒有真正告訴我要做什麼...。（G1：5）

公部門在導入性別主流化的時候，那為什麼會有落差讓我們感受到說有時候自己都搞不清楚，那個承辦人都，因為在講個人十個講十個不同，你真的去問他們自己，他們還不太清楚的詮釋，可是他就上路了，所以那個師資是很有問題的。（G1：6）

（教育訓練）講師都是從中央提供的...資料庫裡面，基本上都是從那裡。基本上是這樣來的，確實我們也面臨到請講師蠻大的一個困難...。（G2：1）

○○（某 NGO）之前在推那個性別意識融入家暴防治、性侵防治，還包括處遇，就融入我們四大核心服務的這個工作，所以我們就開始要上那個...內訓，那其實我們也找了很多都是...家暴啊、性侵啊、未成年懷孕跟兒少性交易的這個議題的專家，但是就會發現說，專家也都滿困難把我們的這些服務跟性別意識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們現在就打算要發展自己本土的經驗。（G2：4）

家暴現在你說是不是因為性別意識，才來工作。或者是真的站在女性的立場。我覺得已經沒有了。很多家暴的議題，其實是從比較互動論的角度去看...。（G3：1）

（二）反思社會工作的性別教育

教育是性別形塑的重要途徑，將「性別教育」融入社會工作課程，不僅啟發學生自己的性別經驗，並啟發其性別議題的思辨，而「教室」能否成為多元文化場域，需考量施教者在教育過程中能否引導學生留意生活細節，進而穿透其社會位置及處境，問題在於「缺乏性別意識的施教者遍佈」，該如何才能有效推動「無性別差異」教育訓練，促進教師性別意識覺察是關鍵（廖美蓮，2012）。「性別議題」處在社工教育的邊緣位置，是所有準社工人性別意識的形構歷程中的一項隱憂，其中的原因就如下面的兩位實務工作者所說的：

竟然沒有這個敏感度...現在連區辦有沒有對女性有歧視或者是污名化都沒有看到。他的價值觀會被他的個案去衝擊到。他可能會去面臨那個衝擊嗎？然後，他會去思考說，那他到底要怎麼去面對他的工作？。（G3：1）

應該這樣講，所以這個部分社工人員的訓練當然...要更多的探討、更深入的、深層的一些教育訓練。（G2：1）

1. 社工教育中性別教育課程設立的必要性

在學校大學的體制裡面，是可以再多增加就是這方面（性別教育）的課程，然後，讓學生也有這個機會，可以藉由這些課程，跟整個社會層面的人，可以有所接觸。...對這些準社工的大學生來講的話，如果可以在

課程上面，例如像大三大四，不是會有一些實習課程...可以增加這一些實務上面的操作也好，或者是知識上的培力...。(G3：2)

社工都要開社會學...更該要開性別社會學...對結構東西很理解才不會又掉入另外一種性別問題也好，或只設...一種歧視也好，或只是一個種族概念也好，他對那個結構問題他沒有全般的認識，你永遠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大學就要開這個課，絕對是必修，不可以選修，我們社工系一定要...。你要性別主流化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學普設通識課程，一定要上。然後特別哪些科系除了這樣上三個學分之外，可能還要下，還要更多的課程...。婦權會應該第一個最大的工作就是要從教育這個單元，大學評鑑裡面應該要有這個單元...。(G1：6)

社工教育現在有被批評的是...社工系出來的學生現在出來有很多的工作機會這種保護性的個案，那學校的教育是不是可以預先在這個領域上面可以預先給他們些訓練、準備如果讓他們有機會就是比較長時間去理解那些受暴婦女的經驗的話，那學校的教育是其實一個最好的機會。(G1：3)

其實我都不曉得現在大學開那麼多性別課程，到底那個效果是什麼？就是我覺得，我們的社工員好像都有一些...聽過一些性別的名詞，但是他那個性別盲的事情並沒有被解決。...他都覺得他聽過了性別平等，他知道什麼叫做同志議題...他們很喜歡講多元性別，喜歡講多元文化，...你再去深入跟他討論個案的時候，我就覺得...。(G2：4)

2.性別意識課程內容缺乏結合生命經驗體察

大學教育裡，有關性別平等或家暴議題，因著學生很有限的實際經驗，於是很多時候較流於意識形態的對話。當然意識型態是知識體系的一部份，倘若

意識型態本身沒有釐清，其實容易在理解與視角上傾斜，如果學生將來要做社工、要做家暴社工的話，除了意識型態之外，還要具備對體制的觀察與批判能力，這些如此真實的面向才能活化其理論知識，並混合他這一輩子都沒有經驗過的體驗而產生張力，因此教育是重要的一環：

性別的教育要從自身的經驗開始去做一些反思...缺乏對他經驗理解的時候，我就不得不用我們所從其他各種文化裡學到的一些偏見的經驗去看他們...沒有注意到他的差異需求的話其實我做的工作是不會貼近她的需要。(G1:3)

學校教育...可不可以置入一些很真實的些受暴婦女的生命故事，然後從這過程當中可以讓他們看到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是怎麼在這當中去發揮他的一些影響力的。(G1:3)

除了剛才提到說，回到個案生命經驗裡頭去了解性別...更重要的部份，從這些議題當中，慢慢讓他了解怎麼樣去尊重，怎麼樣去敏感，去培力這個敏感度，然後再帶到婦女裡頭我們說婚姻暴力，特別對被害人，那些受暴婦女的特殊處境。(G1:6)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這些準社工們，也能夠藉由不同的方式可以去了解說，每個人是會有不同的生命經驗的。我們可以去同理他，然後，去幫忙他，去幫他做不同的解讀。那這樣子出來，我覺得就是不見得要有那樣子的生命經驗，才能夠跟他一起工作。...我覺得很多年輕的新進社工，他們都很平順。生活當中也沒什麼大事件，沒有什麼大事件的衝擊。所以...很難去了解為什麼案主會...，你沒有辦法跟他工作的原因在哪裡。(G3:2)

3.師資的性別意識是性別教育的關鍵角色

教師是知識的實踐者，自從性別教育納入各級學校的教程之後，有許多篇研究探討國小、國中老師的性別意識形塑（廖美蓮，2012），但是關於高等教育的教育者之性別意識研究較罕見，然而社會工作教師資歷是社會工作教育發展一股巨大的推動力，亦因此實務工作者質疑教師本身的性別意識是否也需要受到檢視與性別培力。她們提出：

...現在社工教育的另外一個很大的危機是老師裡面有性別意識的？。

（G2：2）

我們這麼多領域師資的老師都在教學生，我反而是覺得不管你是各領域的老師的專業，其實都要有這樣的通識，讓大家對於這樣的東西了解，學生是上通識課程有上過的，可是老師沒有...可是他平常可能跟他的指導教授跟他的老師互動還比跟他去上通識課四小時來的高，...我覺得各級的老師其實應該要有個機會是可以接受性別主流化的一個訓練，或是至少他要知道這是什麼。（G1：4）

我覺得是要多管齊下。就是說教育部門，它們在選擇教科書的課材上面，就應該先做把關。然後，怎麼樣能夠讓通識的教育課程，能夠普及下去。...我覺得應該是要從教育的層面上來先紮根。那你有基本的想法根概念之後，我覺得才不會導致像目前的情況是說，上了大學以後唸社工系，才開始重構你自己對性別平等或性別主流化的這些概念。當然那樣的觀念，我覺得跟我們這一輩沒有多大的差別啦！進來這個領域工作以後，你才會去重新解構你以前的，然後，再重新重構你目前現在的概念，一些性別的一些看法。（G3：2）

現在年輕的 worker，他們本身那個性別的那個刻板印象其實我覺得比較鬆（強調），我覺得沒有像早期的時候，那個 worker 其實是我反而覺得

刻板印象是比較嚴重的，性別的刻板印象。家暴法突然通過了，然後整個案量就這樣飆升社工員一進來就被那個量就壓垮了，那督導也是阿，所以我覺得他們所受到的培養的歷程不夠，我覺得這個是現在社工人員他們受到很大的擠壓不見得說他們從學校裡面出來的時候，那個性別意識比我們以前差那個量跟以前比起來實在差太多了，所以他們被揠苗助長，就是一下子我們就期待他要達到那個水平，應該是畢業兩年就期待他有十年的水平...。（G2：2）

伍、結論與反思

在與各自擁有不同性別經驗的研究參與者對話和激盪、一同探討如何落實性別平等的過程中，透過焦點的討論，讓家暴的實務工作者藉此認識長久以來全球性的願景與夢想，如同拼圖一般從碎片看到有意義的全貌，於是「性別主流化」、「北京宣言」、「CEDAW」，還有「CSW」等概念對受訪者不再只是一連串陌生的名詞，而是從受訪者模糊的參與行動穿梭在歷史、政治與文化發展的脈絡中，也讓聯合國婦女組織持續推動的工作、行動與策略得以流入實務工作的現場紮根與延伸，是研究者此次研究過程最大的收穫；這同時是研究者另一種倡導與培力的介入方法，或許能活化實務工作者反身回觀工作經驗，並且體察到自身在推動性別平等與終止對婦女各種形式暴力的情感位置與重要性。

暴力的基礎乃奠基於權力與控制，具有權力的一方不時以暴力行為來操控另一方，倘若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違反憲法的基本人權與人身自由，以性別為由的暴力更加證實對女性的不公，突顯出社會工作者本身的性別與權力覺醒不可或缺。然而，任何行動背後的關鍵應該是人們的心意和意識形態，研究者在本研究中透過問卷瞭解家庭暴力防治社工人員對於性別主流化與CEDAW

的認識狀況，研究發現整個家暴系統內只有約一成⁶的社工（與社工督導）表示瞭解性別主流化與CEDAW的概念，多數從事捍衛婦女之工作的人完全沒有聽過這些概念，此發現與本文的結論相呼應，性別培力是一項重要的行動策略，期從產官學三方合力思考性別所產生的影響，徹底將性別主流化的思考模式帶入各個層面。性別主流化某程度就是一種挑戰男流知識的行動與策略，由於父權常常難以辨認，但卻是一種滲透力強的「看不見的統治」，因此必須明白且直接指出其中的問題：包括性別權力關係隱藏在各種社會體制內、男女之間的生理差異如何被不加思索的接受並用來合理化性別分工等。透過本研究的問題意識，重新釐清現實的概念，並省思抽象與普同的社工教育內涵以及進入社工場域與社會發展、變遷的脈絡，讓女性工作者或是服務使用者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詮釋自己的經驗，讓知識也能反映女人的利益與價值，重新賦予並創造知識的內涵與形貌。在強調「結構性」、「權力關係」的時候，如何抵抗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網絡內父權隱身術所造成的不公不義，醫療體系、警察體系、法官/檢察官系統內，「雄性」文化如影隨行，事實上，專業人員的父權框架思維所導致的性別盲、性別刻板化與性別偏見讓吾人不會輕易以為社會進步了。期待透過本研究結果的發現能夠論述清楚性別主流化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脈絡，簡單的說，前述的討論是為發展一種性別公民與權力分析，使之有助於性別教育進入社會工作領域開疆拓土，獲得更多正視。與此同時，針對研究結果的分析，提供家暴社工在職教育訓練方向能實踐拆除「個人就是政治」的具體作為。

CEDAW 公約是性別主流化的終極目標（UN, 2001; 何碧珍，2008），消除對婦女的暴行，惟有採行將「性別觀點」帶到父權主流的社會體制內的戰略，「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和其他「對婦女不公平」的議題才有解決的可能並邁向沒有女性遭歧視與暴力的男女平等的願景，這個夢想的行動已經持續了幾個世

⁶ 研究者引自《性別主流化：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教育的反思》（未發表資料）。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2009/08~2010/07），計畫編號：NSC 98-2410-H-031 -032-SSS。

代。走筆至此，回顧這一篇論文，研究者猶如受到當頭棒喝：由於過去傳統上男女的不對等，讓性別主流化倡導政策純粹關注到男女之間的差異結構，然而，在性別光譜上除男女這兩種主流的性別以外，尚有更多獨特的性別，她/他們的需要如何才能不被排除在體制外？如何在多元社會關係脈絡中降低社會區隔、階級分化與性別差異處境，恐怕是「性別主流化」策略接下來不可迴避的重要議題。

參考文獻

-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11）。〈100 年度家庭暴力事件通報統計〉。上網日期：2011 年 7 月 5 日，取自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頁 <http://dspc.moi.gov.tw/mp.asp?mp=1>
- 尤美女（2008 年 10 月）。〈臺灣推動落實 CEDAW 之現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機制培力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臺北。
- 王如玄（2000 年 3 月）。〈檢視及研修婦女人身安全相關法令〉，「婦女安全 2000 會議」，臺北。
- 王如玄、李晏榕（2007）。〈性別主流化-邁向性別平等之路〉。《研習論壇理論與實務月刊》，76：18-26。
- 王雅各（2004）。〈質性研究導論〉。謝臥龍（編），《質性研究》，頁 1-55。臺北：心理。
- 王增勇（2006）。〈社工與家庭暴力的相遇：性別關係的複製場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7：8-11。
- 王麗容（2003）。〈臺灣的性暴力〉。「2003 年國際婦女論壇會議」，2003 年 3 月，臺北。
- 申蕙秀（2003）。〈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一國的婦女國家機制簡介〉。「2003 年國際婦女論壇會議」，2003 年 3 月，臺北。
- 江妙瑩（2006）。〈爲宣誓加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賀彩〉。上網日期：2006 年 7 月 17 日，取自網氏女性電子報網頁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tv/tv218.htm>
- 呂欣潔（2011）。〈櫃中荊棘：同志親密暴力 VS 現行家暴網絡〉。《婦研縱橫》，94，35-44。
- 何碧珍（2008）。〈推動我國加入CEDAW的策略與努力〉。《研考雙月刊》，32（4），43-53。

吳乃慧(200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之研究－對日本法制之影響》。

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欣捷(2008)。《警察人員處理婚姻暴力事件過程中性別意識之表現及影響－以高雄市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秉叡(2009)。《全球論述中的性別平等－以性別主流化為例》。台北：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依依(2008)。《行政院「性別主流化」種籽師資培訓班之政策行銷分析》。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佳(2004)。《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在臺灣的實踐－從六位女性社會工作者的經驗出發》。南投：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昱貞(2000)。《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兩位國中女教師的性別意識與實踐經驗》。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琇琳(2005)。《專業助人者之替代性受傷與因應策略：以公部門家防社工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主義研究實例》。臺北：巨流。

高鳳仙(1998)。《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專論》。臺北：五南。

張錦麗(2002年7月)。〈兒時目睹婚暴之受暴婦女的社工處遇〉。《走出暴力創傷－兒童保護及家暴目睹兒童個案處遇研討會發表論文》，頁133-168。中華民國：內政部兒童局。

梁麗清(2006)。〈性別教育：從邊緣走向核心〉。梁麗清、陳錦華(編)，《性別與社會工作》，頁67-8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郭彩榕(2006)。《婚姻暴力防治工作人員之網絡整合態度與相關因素研究》。台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陳向明(2007)。《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五南。

陳俐靜(2007)。《變動中的兩性平等法制：女性主義與女權主義辯證》。高雄：中山大學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凱筑(2003)。《國小女性教師性別意識構成與實踐之研究》。台中：國立臺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綺媚(2003)。〈少女的充權工作〉。趙雨龍、黃昌榮、趙維生(編)，《充權—新社會工作視界》，頁 263-276。臺北：五南。
- 游美惠(2007)。〈女性主義方法論:研究的實作與實例〉。周平、楊弘任(編)，《質性研究方法的眾聲喧嘩》，頁 93-105。嘉義：南華大學。
- 黃心怡(2003)。《法官對婚姻暴力態度之研究—以北臺灣法官為例》。台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黃政傑(1996)。《質的教育研究：方法與實例》。臺北：漢文。
- 黃淑玲(2008)。〈性別主流化—臺灣經驗與國際的對話〉，《研考雙月刊》，32(4)，3-12。
- 黃富源(2000)。《警察與女性被害人—警察系統回應的被害者學觀察》。臺北：新迪文化。
- 黃聖堯(2006)。《臺灣婦女人權指標調查報告》。台北：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 廖美蓮(2009)。〈看學生，看課堂現場—再思社會工作教育之性別意識建構〉。《社區發展季刊》，126：339-349。
- 廖美蓮(2012)。〈性別與社會建構：初探大學社會工作系學生性別意識形塑〉。(將刊於臺大社工學刊，25 期)。
- 趙雨龍、黃昌榮、趙維生(2003)。《充權—新社會工作視界》。臺北：五南。
- 劉玉鈴(2002)。《女性社工員性別意識對專業關係的影響：以婚姻暴力防治社工員為例》。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友梅(1998)。《影響國中教師性別角色刻板化態度與兩性教育平等意識相關因素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謝小苓(1996)。〈兩性與教育機會—以兩所臺北國中為例〉。謝臥龍(編)，《兩性文化與社會》，頁 155-178。臺北：心理。
- 謝臥龍(1997)。〈促進兩性平等，教育應扮演的角色〉。《學生輔導月刊》，

48, 56-57。

羅燦煒（1997）。〈性別暴力與迷思再現〉。《性別與兩性研討會論文集》，頁 323-339。高雄市：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

蘇曉純（2006）。〈雨送黃昏花易落：從裁判書看法院對婚姻暴力之態度〉。《應用心理研究》，32，135-164。

聯合國（2002）。《將性別觀點納入主流概覽》。紐約：聯合國。

嚴祥鸞（2009）。《我國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服務方案之回顧與評估計劃》。台北：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Balloch, S., Andrew, T., Ginn, J. McLean, J. Pahl, J. & William, J. (1995).

Working in the Social Services. Londo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Work.

Beveridge, F., Nott, S., & Stephen, K. (2000). Mainstreaming and the engendering of policy-making: a means to an end?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7(3), 385-405.

Christie, A. (2001). Gendered Discourses of Welfare, Men and Social Work. In A. Christie (Eds.), *Men and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pp.7-34).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Flick, U. (原著)，李政賢、廖志恒、林靜如（譯）（2007）。《質性研究導論》。臺北：五南。

Grosser, K. & Moon, J. (2005). The Ro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Gender Mainstreaming.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4), 532-554.

hooks (1984). *Talking back :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Boston: South End.

Humm, M. (1992). *Modern feminisms: Political, literary, cultural*.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iu, Miriam M. L. (2007). Issues in Father-Daughter Incest Intervention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ull, Hull, UK.

Liu, Miriam M. L. (2008, February). *Conflict Resolution: Good Practice for Gender Empowerment*. Paper presented in the 52nd session of the

-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UN (USA).
- MacKinnon, C. (1982).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Signs*, 7(3), 515-544.
- Noel, J. R. (1995). Multicultural Teacher Education: From Awareness through Emotions to Actio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6(4), 267-274.
-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ter, E. (2008 年 10 月)。〈為婦女爭取平等權益－運用 CEDAW 公約：研讀國情報告與遊說通過主要議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機制培力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臺北。
-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hapiro, J. (2008 年 10 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為促進實質性別平等的工具〉。「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機制培力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臺北。
- Tang, N. (2002). Interviewer and Interviewe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men. *Sociology*, 36(3), 703-721.
- UN (2001).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cedaw27/den5a1.pdf>
- UN (2009).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Women and Peace and Security. Retrieved from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9/503/63/PDF/N0950363.pdf?OpenElement>
- Williams, C. L. (1995). *Still a Man's World: Men Who Do Women's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研究論文

從華人社會「自立」與「泛家族」之概 念論少年自立生活方案之設計^{*}

林秉賢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國際發展處專員

收稿日期：2011 年 6 月 2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2 年 1 月 10 日。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少年自立生活方案是家外安置少年，歷經兒童暨少年保護處遇的家庭重建/維繫服務等介入後的最後選項。意旨經歷一連串不安與變動的寄養或機構安置後，諸些裁量原生家庭與親屬仍無法提供少年發展性需求之個案，將再度面臨獨立生活的情境挑戰。而自立生活方案的目的，即在於協助諸些少年，妥適生活安排進而轉銜進入成年前期之社會生活適應。

本文旨在針對現行服務架構中以安置期間的自立準備，以及進入獨立生活後的生活適應階段之歷程，透過「泛家族」概念，探討少年於安置機構轉銜自立生活的經驗中，所呈現與專業人員、安置同儕間關係對自立生活方案規劃之意涵；另一方面透過「自立」概念之檢視，對應中西文化下之概念內涵，呈現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之自立途徑差異。盼從少年自立生活之本質面，探討方案規劃之基礎元素省察，回應「何謂自立？」、「安置情境下的泛家族經驗」對於方案之服務元素規劃之思維激發，盼在國內目前承襲以西方文化脈絡下，發展成形的少年自立方案，可愈加對於方案核心概念的本土意涵重視，並初步勾勒回應在地文化需求差異下之服務規劃。

關鍵字：華人自立概念、華人泛家族概念、少年自立生活方案

A culturally Programming of the 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Self- supporting and Pan-Familism perspective.

Ping-Hsien Lin

Specialist, Glob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Taiwan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TFCF)/PHD student, Social work Department of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 (ILP) is the last option to place children & adolescents outside their familie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family reconstruction and preservation services. It means that after a series of disturbing and unstable foster or institutional service, the authorities determine the adolescents whose biological families and relatives still unable to meet their developmental needs have to face the situational challenges to live independently again. The purpose of ILP is to help arrange these adolescents their current lives and then get adapted for social life when they enter their early adulthood.

The them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with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peers in the place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plans for ILP they present from the experience they get in becoming independent from institutional agencies, based on the preparations for independence during placement under current service structures and the phases of life adaption after becoming independent through the concept of the "Pan-familism". On the other hand, by reviewing concept of "self-supporting", here we correspond to the ideas and implications under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o presen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oriented and social-oriented means of becoming independent. From the nature of adolescents' independent living, we wish to correspond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Independent Living?” and to inspire the ideas inspired by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an-familism of Chinese under institutional circumstances” in planning service components of the program. Furthermore, to develop a mature ILP under the current domestic context that sequenced from western culture will emphasize the local implications on the program core concepts more and to draw the initial service plans that correspond to local need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words : 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 (ILP), Pan-familism of Chinese, Self-supporting

壹、緒論

「明天後，我又將是一個人，打開房門那種一片空白的孤寂，快樂、悲傷都不知道該向誰說的寂寞...我是一個人獨自的活著，意義何在？」

2005 年的夏天，筆者參與某安置機構的自立生活方案，為一群準備離院的安置少年，進行租屋、理財、生活住居等事務的轉銜生活進行處遇方案。歷程 28 天的自立生活體驗，在最後一天的晚上，筆者無意間發覺少年半夜在衣廚中的啜泣聲，打開衣廚後的畫面以及少年所說的話語，令筆者至今深刻難忘。將近 6 年的時間，筆者與少年成為兄長與朋友的關係，聽著他如何與育幼院同儕一起租屋生活、年節時的落寞感受，以及如何放棄大學升學機會，抉擇成為職業軍人，並在那裡與同袍找到片刻「家」的感覺之歷程。

【反思】

這些年的時間，筆者一直在想「他算自立了嗎？」，而「自立」又是什麼？

一、研究背景

「家外安置」是兒童保護處遇在經歷危機處遇、短期寄養安置，並進行家庭重建或者維繫措施後的最後選項¹。亦即當兒保社工判定家庭無意願或者無法提供安全的教養與適切兒少之發展情境時，社工處遇的選項有三（兒童局，2006）：（一）協助親屬家庭或者其他家屬收養取得監護權、（二）正式、長期的家庭寄養方式，取得兒少監護權、（三）獨立生活。這類家外安置的個案，除了經歷家庭破碎、暴力與身心理遭受侵害等危機過程外，同時更經歷一連串

¹ 依據內政部兒童局（2006）增修之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工作指南，少年進入自立生活階段，為判定家庭維繫與重建服務後，仍無法返回家庭之個案，在本文指稱進入自立生活階段之少年，意旨 2004 起兒童局明列獨立生活準備與追蹤輔導為補助項目所指稱之將屆滿 18 歲至大專（學）仍在學身分之少年。

不安與變動的寄養或機構安置歷程（劉美芝，2000；鄭貴華，2001；余瑞長，2003；李思儀，2011）。依據家扶基金會（2010）：「98 年度全國兒童少年寄養服務工作成果報告書」指出，2009 年結束寄養安置的 980 名兒少，結案原因為原生家庭重建 27.7%、有親友協助照顧 13.2%、被收養 10.7%、21.8%轉其他單位寄養，餘約 3 成之兒少則因為適應不良、契約期滿、原生家庭不願配合等因素，在非所謂獲得適切家庭或者親屬照顧情境下脫離處遇，當中有 2.3% 的兒少，因滿 18 歲被視為「案主自立」而結案。

從結案後的狀況來看，依據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hinese Childrenhome & Shelter Association: CCSA）於 2007 年的調查報告指出，96 名的育幼機構離院兒少，不管是國中或者高中階段個案，持續升學的比例皆不到 5 成，針對 15 所育幼機構的個案追蹤狀況指出，諸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兒少，亦有 5 成無法取得穩定的工作。少年在從安置機構轉銜進入獨立生活的過程，在就學、就業等生活自給面可說處於一種因關係與實質資源的缺乏，而落入一種多重弱勢的處境（陳俊仲，2009）。除了面臨經濟、住居、就業的需求，少年獨立生活亦包含人際關係與情感支持的需求（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2007；林瑜珍、李思儀，2008），而所謂獨立生活的意義，並非指個案在外獨居之事實，亦包含身心獨立自足的狀況，此情形是需要靠互助、互依來完成，絕非少年個人之責，亦非其單獨能力所及（杜慈容，1999）。畢國蓮（2006）針對安置個案離院後的生活經驗之研究中，除了對應了這樣的論點，亦進一步指出諸些經歷長期安置的少年不僅面臨與原生家庭關係的疏離，更渴望尋求新的依附關係之穩定性。

諸些針對結束家外安置少年的處境狀態，除了反應獨立生活之少年不僅有實際面的生計自給協助需求外，心理與支持性關係的滿足，亦為自立生活的需求內涵。特別在經歷長期安置的過程，少年是否能夠從機構工作人員以及同儕的互動中，感受到社會支持，是影響其心理健康狀態的重要因素（陳毓文，2008）；將工作人員視為「另類的家人」、安置同儕視為「類手足」的現象，亦反應這樣依存關係的品質與穩定性，對少年的適應狀況良劣具有重要的影響

(郭美滿, 1991; 林俐君, 2001; 畢國蓮, 2006)。這些現象與經驗研究的結果, 與筆者個人所經驗的觀察結果相似, 除了確認自立生活方案在實務上持續發展的服務需求外, 亦呈現兩個主要現象: (1) 獨立生活, 是經歷家外安置, 最終無法回到原生家庭或其他親屬替代資源的照顧體系中, 面臨需獨立自給的狀態、(2) 自立, 除了包含物質經濟、就學、住居等自給狀態外, 亦包含心理與社會關係的適應狀態。

二、問題意識

承前述筆者自身經驗的反思:「面臨獨立生活的少年, 如何算是自立? 自立的概念是什麼?」, 以及目前台灣面臨獨立生活少年的處境狀態。以兒少福祉維繫的立場, 協助諸些屆青少年發展階段, 即需提早面臨成年前期任務的獨立生活少年, 達到妥適生活轉銜與適應是必要的任務。而在方案設計之初, 如何界定核心處遇概念, 除了與個案需求相關, 亦反應方案是否能夠真切回應問題的情境 (Kettner, Moroney & Martin, 1990; Robson, 2000; CWLA, 2005)。

然自立的概念在傳統西方心理學的界定, 則包含獨立性 (Independent) 以及自主 (Autonomy) (Deci & Ryan, 1987, 1995), 強調的是獨立自主和不依賴他人獨立做出決定、獨力完成工作, 亦不需要他人好感之特質 (凌輝、張建仁, 2007), 這與華人的著重依存 (inter-dependent) 的自我概念與重視情境、群體關係 (collective orientation) 的社會行為表現具有差異 (Markus & Kitayana, 1991; 楊中芳, 1991; Yang, 1995), 與前述相關針對台灣安置兒少之經驗研究結果, 所呈現少年將同儕、工作人員視為「泛家族成員²」關係的重視與依存 (郭美滿, 1991; 林俐君, 2001; 李思儀, 2011) 以及離院後的獨立生活經驗, 所期待的穩定關係支持, 呈現不同的自立樣貌 (杜慈容, 1999; 畢國蓮, 2006;

² 「泛家族」意旨在于非家族團體外之組織、團體、機構所形成具家族色彩的整套組織心理、行為與運作方式, 是透過刺激類化而自然形成 (楊國樞, 1998)。本文所指為安置少年於機構與同儕、工作人員等相關團體成員, 所形成之類似家族運作之型態。

陳俊仲，2009）。

緣此，筆者盼透過少年自立生活方案，在「自立」與「泛家族」的概念檢視，討論以下兩個核心問題：

研究探問（一）：從中西「自立」的概念差異，檢視自立生活方案的設計元素

筆者盼從不同價值預設：西方社會中強調個人責任、能力展現與自我充足（self-sufficiency），以及華人社會脈絡之集體取向（collective orientation）與依存（inter-dependent），進行自立生活方案的思維元素檢視。

研究探問（二）：安置情境中的「泛家族」概念，對於自立生活方案的設計意涵

承前述研究與筆者對於承其經歷安置經驗兒少之觀察，盼可於本文可透過華人「泛家族概念」的思維，重新檢視育幼院、安置機構中所呈現同儕、機構工作者關係與互動，對於自立生活方案的設計意涵。

基於以上問題，本研究論述框架，依序由（一）華人「自立」與「泛家族」之概念內涵，以及（二）自立生活方案之設計，來進行（三）華人社會「自立」與「泛家族」概念下的自立生活方案檢視。

貳、華人「自立」與「泛家族」的概念

一、華人社會的「自立」觀點：融入群體的獨立

自立（self-supporting），一直是華人社會中所重視的自我發展向度（凌輝、張建仁，2007），其中自立的概念常伴著對於自我（self）的知識論差異，而形成不同的理論取向（Yang, 2003, 2004）。主要的核心區別在於強調個人與社會

取向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個人的發展將形成不同特質的自我（Ames, Dissanayake, & Kasulis, 1994; Ames, Kasulis, & Dissanayake, 1998）。然台灣之社會環境，既處於經濟工商社會薰陶下的個人主義文化，亦含括華人社會重視群體與相互關係的傳統文化，因此形成一種雙文化發展下的自我（陸洛，2003；楊國樞，1993，2004），偏廢一方的觀點，除了對於家外安置少年，如何達到自立之預設上的缺漏，落實在實務方案的設計上，亦可能產生處遇策略上偏重個人/社群關係的服務缺口。基於此思考立意，本文以楊國樞所提出的華人自我四元論為框架（Yang, 2004），端看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發展，如何界定個人自我發展的面向與內涵。

（一）華人自我的四元論

此一理論性架構係將當前華人社會個人的自我，分為社會取向自我與個人取向自我兩部分；前者是傳統性自我，後者是現代性自我。社會取向自我又再分為關係取向自我（relationship-oriented self）、家族（團體）取向自我（familistic (group)-oriented self）、及他人取向自我（other-oriented self）三種次級成分，分別是華人在人際生活範疇中強調關係，在家族團體生活範疇中強調家族或其它身為成員的團體，以及在涉及非特定他人之生活範疇中強調概化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或非特定他人（the non-specific other），所形成的不同次級自我。上述三種社會取向自我與個人取向自我合稱為當代華人的四類主要自我成分。楊國樞（2004）曾就下列十八項心理特徵比較這四類自我的異同，筆者針對此諸項指標，選擇自立方案設計可能涉及之少年互動對象、目的、適應行為的預設，情感以及情感依附對象等十項指標，呈現如表一。

從表一的個人自我特徵來看，個人取向採取的自我係採自主趨勢（autonomous trend），三種社會取向自我皆採融合趨勢（homonomous trend）（楊國樞，1992）。基礎上，個人取向的自我發展特徵，強調的是自我中心的增進利益，並且不易受到情境脈絡影響，追求的是自我的優越與表現，較不會依附情感於他人（凌輝、黃希庭，2008）；而社會取向的自我發展，則分別因

融合的特徵差異，區分為關係（特定重要他人）、家族（團體）或者他人取向（非特定之個人）之適應趨勢，同時分別衍生該社會取向單位之對象情境脈絡之規範（Yang, 1995）。

表一：個人取向自我與社會取向自我的心理特徵比較

心理特徵	個人取向自我	社會取向自我		
		關係取向自我	家族（團體）取向自我	他人取向自我
1. 適應趨勢	自主趨勢	融合趨勢（與另一人融合）	融合趨勢（與家族或其它團體融合）	融合趨勢（與非特定他人融合）
2. 互動對象	自己	一個有關係的人	家族或其它團體	非特定他人（概括性他人）
3. 互動目的	個人取向目的（以增進自己利益為主要目的）	關係取向目的（以增進關係和諧為主要目的）	家族（團體）取向目的（以增進家族或團體利益為主要目的）	他人取向目的（以增進來自非特定他人之名譽、面子及尊嚴為主要目的）
4. 脈絡化	去（或未）脈絡化	以二人關係為脈絡	以家族（團體）為脈絡	非特定他人為脈絡
5. 社會角色涉入	淡化社會角色涉入	在關係中有高度社會角色涉入	在家族或其它團體中有高度社會角色涉入	對非特定他人有中度社會角色涉入
6. 認同對象（identification）	認同自己（反身性認同）	認同關係中之對方（關係性認同）	認同家族或其他團體（家族/團體性認同）	認同非特定他人（擴散性社會認同）
7. 自我認定（identity）	個人性認定（如自認是個獨立自主的人）	關係性社會認定（如自認是個擅長交朋友的人）	家族性或團體性社會認定（如自認是個以家族為重的人）	擴散性社會認定（如自認是個名譽重於一切的人）
8. 需求類別	個人性需求（如自主自依、自足、個人效能）	關係性需求（如依賴、相依需求）	歸屬性需求（如團體認同、團體保護等需求）	擴散性需求（如公眾性面子與名譽、來自非特定他人之尊敬）

心理特徵	個人取向自我	社會取向自我		
		關係取向自我	家族（團體）取向自我	他人取向自我
9. 情感類別	自戀性情感（如自我愛戀、自我尊敬、自我榮耀等感受）	關係取向情感（如親子之愛、手足之愛等感受）	家族（團體）取向情感（如家族之愛、團體性榮耀感等感受）	他人取向情感（如公眾性面子、名譽他人取向自尊等感受）
10. 情感依附對象	依附自己	依附特定關係中之對方	依附家族或其它團體	依附非特定他人或概化他人

註：修訂自楊國樞（2004：25-26）。

在華人四元論的自我觀中，可以發覺少年自立的概念，並非單一的只有自我功能與技能面向的需求，亦著重個人在關係緊密的群體中，可能為家族、重要他人或者同儕面向之自我概念，並在當中獲得團體認同、支持與安全感的情感依附。在這些面向的檢視當中，得以置少年自立方案設計於不同發展觀點的需求，以一種使然面的考量，來尋求各項度在實務操作上的意義思考，而對自我發展特徵的預設，相對會衍生取向差異之處遇思維。

（二）個人/社會取向自我發展之特徵

承前述自立概念的差異，在華人自我四元論的觀點中，重要的核心仍源自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發展區別，而所謂自我發展的狀態，可能產生一種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相互統合的狀態（楊國樞、劉奕蘭、張淑慧、王琳，2010），筆者以下從社會取向自我與個人取向自我，為主要核心概念檢視相關研究，提供不同觀點以辨識少年達到自立狀態的自我發展特徵。

1. 不同觀點的自立特徵：個人特色與能力 V.S 社會關係的互動與品質

華人自立概念的內涵，在社會上的自我呈現，重視社會讚許（social desirability），其呈現的歷程與特徵，指出華人希望別人讚許的其實是社會取向的自我特徵，而不是個人取向（林以正、楊中芳，2000）；在探討社會互動的

表現上，亦特別著重參照家族（團體）與他人取向的自我，必須依各種情境拿捏分寸，來形成良好的社會形象（林以正、楊中芳，2001）。孫蒨如（2000，2001，2002）在探討個人與社會取向的自我上，對自我肯定概念的運作歷程；自我評價模式（self-evaluation maintenance model）以及虛假自我、自我設限在自我概念的運作中，研究結果指出，個人取向自我與社會取向自我兩種自我取向是不同的系統。而這樣的特質，於華人國小學童之人口群中，亦呈現著重個別自我形成學業能力較佳，著重群體相依取向人際關係發展較佳的差異（凌輝、黃希庭，2008）。

著重個人的自立取向，自我表徵的是透過「對抗社會限制」及「表達個人特質及特色」的行動來達到獨立的自我認同並展現個人意志能力；而社會取向表徵的則是透過強調「自己與他人間關係和諧」、「人際關係品質」以及「自我超越」的行動來達到相依的自我認同（Yeh, Liu, Huang, & Yang, 2007）。

2. 自立的自我評價：個人與社會範疇的適應結果

青少年在兩種自立的取向，由於各自著重的特徵內容不同，各自專擅的作用功能也不相同。其中，由於個人化自主性著重強調的面向是聚焦在個體自身上，因此強度愈高時，所發揮的正向作用效果主要是反映在與個人範疇（intrapersonal domain）相關的適應或後果變項上（例如抑制個體的焦慮、憂慮，或增加個人的自尊等）（Yeh, Bedford & Yang, 2007）；另外，由於關係自主性著重強調的面向是聚焦在人際關係品質上，因此強度愈高時，所發揮的正向作用功能主要是反映在人際範疇相關（interpersonal domain）的適應或後果變項上（例如促進社會技巧、社會自尊或抑制攻擊與偏差行為等）（Yeh & Yang, 2006）。

而諸些針對個人/社會取向的適應性之研究範疇，諸如幸福感、自我/社會自尊、自我/團體效能等議題內涵皆已有相關經驗研究累積（例如陸洛，2004；翁嘉英、楊國樞，2004；Chen, 2009），然可確認的是辨識不同觀點之自立取向，則適應結果的面向亦使然不同。例如若單指向個人取向的自立觀點，除了個人能力建構外，期待較良好的群體融入，則在預設上就可能呈現方案邏輯上的缺

口。

3. 折衷型態的存在：個人/社會發展取向需求的雙元考量

折衷型態或稱雙元文化自我（個人與社會取向），乃是假定在混合的社會經濟與文化情境下，將產生多種面向的自我特質（楊國樞等人，2010）。在韓貴香（2010）研究華人追求成就的表現上，指出華人會依據與他人互動的情境與關係，表達成功的歸因，而不只是單純的展現自我能力。而陸洛（2001，2003）以焦點團體法研究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自我，在台灣人的自我概念運作上的呈現，顯現出「折衷自我」的現象，指出在台灣工業化之個人取向自我，已經漸被華人社會取向之系統納入。而這些研究結果亦顯示，雖然仍無足夠的經驗證據呈現「折衷」的自我樣貌與其類別的獨立性，但對於個人的發展而言，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發展，就何謂妥適自立的狀態，僅作個人/社會取向的單向預設是具有觀察上與實際產生落差的偏誤可能。

以華人四元論為自我發展的框架而論，少年自立的概念可區分為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之特徵表現，而個人取向的自立特徵，顯現在個人能力建構與自我特色展現上；社會取向的自立特徵，則展現出較佳的人際和諧與社會形象，亦具有透過團體歸屬，形成情感上、團體成就與共同規範的特徵。緣此，華人社會的少年自立發展，除了關注個人自立技能面的需求，另重視其與團體（諸如安置同儕、專業人員）、社會他人的互動能力養成，則具有社會取向層面的自立發展意義。

二、 華人社會的「泛家族」概念：離院（家）獨立生活

面臨家外安置的少年，最大的處境特徵在於經歷長時間與院內安置同儕、社工與生活輔導員等專業人員的密集互動經驗。針對諸些經驗的狀態內涵指向專業人員與安置童間的關係、安置同儕間的關係，不僅對安置童的情緒、生理發展具保護、傷害、支持、資源提供等正負向的重要影響（彭淑華，2007；陳

毓文，2008），亦涉及日後同儕在就學、找工作、住居安排上的資源使用（畢國蓮，2006；陳俊仲，2009）。然就扮演協助家外安置個案，轉銜進入社會情境的少年自立方案，對於安置機構所產生的互動經驗，以及如何看待這場域當中緊密的關係，以致形成一種看似家族關係複雜現象下，當中能有那些自立方案規劃與處遇上的思維激發，則是本節次所期待探討的。

所謂華人「泛家族」(pan-familism)的概念，意指即為個人在非家族團體外之組織、團體、機構所形成具家族色彩的整套組織心理、行為與運作方式（楊國樞，1993，1998）。其初使來自血緣家族的概念中，家族提供其成員在認知上的意涵包含（1）強調家族的延續、（2）家族的和諧、（3）家族的團結、（4）家族的富足以及（5）家族的名譽；情感上的意涵則包括（1）一體感、（2）歸屬感、（3）關愛感、（4）榮辱感、（5）責任感以及（6）安全感（葉明華，楊國樞，1998）。雖然安置/寄養情境，為非血緣關係的組成；但諸些家族運作概念，衍生至泛家族化的歷程時，則透過（一）組織/團體型態的刺激類化、（二）角色關係的刺激類化，以及（三）心理行為的刺激類化，使組織/團體形成與家族行為類似的表現（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2005）。以下筆者以這三向度的泛家族視角，看待少年於安置情境中，如何形成似家族群體的互動與意義。

（一）「家」的情境影響：安置機構/團體型態的刺激類化

對安置少年而言，所謂「家」的情境影響，一部份來自於（機構）組織方式，另一部份則為（機構）運作方式。組織方式意旨成員間的層級與排序，在初始的家族概念中，則為親屬輩份、長幼有序的倫常關係（莊耀嘉、楊國樞，1999）；而運作方式，則是指在關係的層級中，產生資訊提供、決策與資源分配的行為。然在非血緣的機構組織方式，諸些家族式的組織運作內涵，則以專業關係、同儕間關係的層級排序運作為主。

在此思維下，我們可以在華人相關針對安置機構內成員的互動關係中的研究中發現，針對為何安置個案對於社工、同儕產生一種「類父母」、「類手足」

的現象（例如畢國蓮，2006），提出泛家族化組織的觀點解釋。亦即安置個案與專業人員、同儕間乃是透過類似家族成員的組織行為，來期盼產生家族中在情感上的安全感、歸屬，或者相互規範的行為關係。對於安置少年，透過「泛家族」組織行為的意義上，是具有透過諸些機構重要他人與組織運作設計，來達到有目的的刺激個案，朝向社會取向自我功能提升的可能。而這些來自機構的泛家族行為，亦將成為日後少年面臨自立生活時，認知與情感的重要歸屬依據。

（二）泛家族成員的影響：角色關係的刺激類化

在前述的安置機構泛家族運作背景中，在機構重要他人與少年的互動過程，則形成一種角色關係的類化。諸如，社工員在互動經驗中，被認定扮演類父母的角色，則會類化成為照顧、提供支持或者決策的角色；同儕，則可能形成一種手足關係，產生兄長輩份、相互支持/競爭等關係。而這樣的安置機構成員角色互動，其品質除了影響安置兒少的情緒與適應狀態（陳毓文，2008；陳俊仲，2009），亦具有角色楷模的意義。因此，在泛家族觀點下，諸類家族角色關係的刺激，已不僅止於專業關係的助人與受助者角色意義與功能。

（三）「家教」的表現：心理行為的刺激類化

廣義言之，任何將家族內所形成的心理與行為，推廣到外部的團體、社會表現，皆可以說是泛家族中的心理行為類化（楊國樞，1993）。亦即安置少年的認知、行為意願與情緒，都可能來自於安置機構中「泛家族」情境與成員間所產生的基模。例如安置少年與社工員間，屬於規範控制，對應資源提供的關係，相對的自立少年可能類化此行為在社會關係的互動型態中；抑或者機構採取較強烈的宗教價值情境，而少年亦可能有較多信仰上的信念與表現。而此類現象，在泛家族觀點下，可以說是一種類似家教的展現。而經歷此泛家族經驗的自立少年，亦難以將未來的生活因應方式與這「家教」內涵作切割。

綜上所述，在華人「自立」的概念下，少年自我的妥適發展具有個人與社

會取向兩個層面。而個人取向傾向於提升少年個人能力、特色的展現；社會取向則具有參照團體、他人行為，產生社會技能、關係與社會形象的呈現。特別針對諸些經歷安置經驗的少年，其來自機構的「泛家族」經驗，除了是情感與資源支持的重要來源，亦具有角色楷模、心理行為類化等影響自我發展的重要途徑，絕非僅為專業組織與接受服務者間的關係。然偏廢個人取向，忽視安置機構的「泛家族」經驗，其實等同忽視華人少年自立需求的評估面向，亦可能喪失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產生妥適生活適應的處遇介入因素。

參、少年自立生活方案之設計

針對面臨家外安置個案的少年自立生活協助，已是一跨國間對於少年轉銜進入社會的福祉維繫體現。雖然不同國家對於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設計，因其政策價值取向以及兒少福利制度規範差異，形成不同的服務設計內涵，但基楚上方案發展的成熟程度，可透過法律與政策層面、規劃與資源、服務輸送內涵、監督與評量以及核心議題的研究累積等五個面向，檢視方案發展狀況（Stein & Munroe, 2008），目前在諸些發展少年自立方案的國家，主要仍以英、美兩國的發展較為健全（Pinkerton, 2010）。

本文考量方案制度設計與實際施行經驗的累積程度，以美國所推行的少年自立生活方案（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 ILP）的項度內涵為主軸。再者，美國自立生活方案的內涵，其概念內涵除了經常為我國兒少福利輸送的參照（例如，台北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經濟扶助計畫），亦具有個人取向預設較為鮮明之社會環境特徵，源此本文期待透過美國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原則、策略與作法上的呈現，得以與華人「自立」與「泛家族」概念作交叉檢視，以瞭解少年自立生活方案可增修之方向與意涵。

一、 個人取向為主體之少年自立生活方案原形：方案設計內涵與向度

美國自 1997 年的「收養暨家庭安全法案」(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即明文提載對年長的寄養兒少年可提供技巧學習、獨立訓練等有關服務；接續於 1999 年的「寄養轉銜獨立法案」(subsequent Foster Care Independence Act)，將法定服務年齡降至 14 歲兒童開始，提供獨生生活的事務協助，並於 1985 年著手試行規劃，1987 年全面於美國各州陸續施行名為少年自立生活的服務方案 (Naccarato & DeLorenzo, 2008)。而其立意乃在於針對結束暫時性的寄養，但仍無法回到親屬家庭之兒少，進行一系列獨立生活之準備。

方案的需求立基於一系列關於結束安置面臨獨立生活之兒少，所產生的種種生活困境與問題行為的發生。諸如居無定所、放棄繼續教育、失業與不穩定的就業、陷入救助體系、未婚懷孕與觸法監禁等現象的因應 (Barth, 1990; Mares, 2010)。以下筆者依據美國兒童福利聯盟³ (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 CWLA) 於 2005 年依據其從事少年自立方案的規劃經驗，所彙整之方案規劃手冊為依據，同時參照相關文獻分別就其設計原則、處遇階段、策略規劃與行動作法等面向，說明少年自立生活方案之內涵。

(一) 方案設計原則

1. 以少年為主體的共同參與

以少年的發展性需求為基礎，透過個案的全程參與，使過程即為一種成長，使參與成為一種服務與需求的契合過程。

2. 創造健康與安全環境

讓少年在自立方案的服務中，感受到生理與心理的安全，以少年的個別化

³ 美國兒童福利聯盟係由全美公私兒少福利組織所組成之聯盟，成立於 1920 年，不僅為美國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相關法源的擬定與倡議者，亦於各州提供少年自立生活直接服務之兒少福利組織。

差異與獨特性，創造獨一無二的情境，使其感受到自在安全。

3. 促進健康關係之建立

重視關係的維繫與品質。讓少年感受到「有人瞭解與相信我」、「有人關心我」。除了重視關係的穩定性，亦需讓其體會工作者、家庭與其的界線，體認自己的自由（freedom）與責任（responsibility），以形成一種你我各自獨立之健康關係的氛圍。

4. 做中學

實際的經驗是生活技能的最佳導師。需讓少年有實際的體驗過程，並在過程中學習為自己作決定，並承擔自己決定後的對應責任。

5. 社區伙伴關係

連結社區資源，使少年學習辨識社區資源、嘗試規劃去取得資源，來達到融入社區並獲取生活支持，成為社區的一份子。

6. 體認獨立，必經過一段相互依存的時間

讓少年知道，沒有人是真正獨立。在 18 歲的時候要他們能夠獨立自給（self-sufficient），不僅不合理也對他們不公平。需預先體認，獨立必經一段相互依存的過程，而這需要時間的醞釀。

7. 建立持續地回饋機制

方案工作人員與少年需建立一個持續性評估（assessment）的機制，使方案在進行中，得以調整內涵來切合實際需求。而評估的方式需與少年共同參與原則相符。

8. 重視個人長處

方案設計需建立在少年個人、家庭、社區等生活脈絡下的長處展現。預設個人是有能力與潛能的，而方案規劃過程中，工作人員需關注少年能夠作些什麼、參與什麼事務，並提供少年個人能力的展現機會。

在這 8 項原則中，呈現對個案服務個別需求的重視、個體自主取向心理發展（autonomous）、強調個人的抉擇與相對責任以及透過社會參與，融入社區的自立發展預設。惟第 6 點，提及個人與他人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但基本上仍將

此互依狀態視為過渡過程，而非一種自立的預設型態。

（二）處遇階段

在處遇階段面向，大致上依作法可分為尚未進入法定的離院年齡門檻，或是尚未進入真實獨立生活情境的自立能力準備期，以及屆獨立生活階段的生活事務支持與因應階段（Kroner, 1988; Berzin & Taylor, 2009）。本文參照洪文惠（2010）對於自立生活方案處遇階段的命名，分別就自立能力建構與準備期與自立生活因應與任務解決期作兩階段區分。

1. 自立能力建構與準備期

此階段首在將自立生活基礎能力訓練置入日常生活，由少年居住及服務輸送系統提供；如寄養家庭、育幼安置院所、學校、社區非營利組織等。能力之建構為一自然濡染與實際操作的學習過程。

2. 自立生活因應與任務解決期

此階段首在催化增強少年自決、及系統化活動規劃，以自立生活為核心、少年為主體的現實能力。由少年居住及服務輸送系統提供：如寄養家庭、育幼安置院所、學校、社區非營利青壯年轉銜服務組織等。來達成生活任務的達成，並在實際經驗中逐步成長邁入自立生活。

在處遇階段的劃分基本上是在轉銜（transition）概念下作區分，一方面包含能力轉銜，另一方面則為生活情境的轉銜。為安置情境跨入社區、真實社會情境等單位的差異。而美國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由個人能力增強，轉入社區參與的階段銜接取向是較為鮮明的特徵。

（三）、策略規劃

1. 連續而彈性的生活協助安排

應該結構而制度化的安排少年自立生活後的生活起居，並且保留持續、彈性的調整空間。使少年亦可能在面臨需要臨時安置的協助時，也有正式的制度規劃協助，而變動而不確定的提供個別案例協助。

2. 持續性的個案管理

有效能的個案管理應包含評估、訓練、資源發展、倡議與評量。成功的個案管理，包含能夠積極且一致的投入，使達能夠影響少年的生活決策。而非僅為非固定、間斷不一致的自立少年生活狀態資訊獲取，但卻無法產生實質的生活事務影響。

3. 少年正向發展的架構

評估、發掘少年的長處與潛能，而非他們的問題與不足。使他們能夠在方案中，貢獻並參與社區事務。但這並非代表生活問題需求的忽視，而是以這樣的正向的策略影響日後少年的能力強化，並促使成員社區所接納的一員。

4. 統籌規劃，在地施行的架構

強調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在地社區融合，但透過的途徑是採中央層級單位（美國聯邦政府）的一致規劃、協調並提供對應資源的方式執行。使自立生活方案透過個管制度協調教育、就業與社區組織等單位層級，使少年得以獲得一致性支持與融入地方性社區的需求。

在方案的策略規劃，美國少年自立生活方案，強調少年個別需求的重視，以自立生活問題為核心，運用個案管理機制，協調與彈性地達成變動的需求與一致的目標。微觀面是少年正向發展的任務重視、中介面是個案管理制度的統合，鉅視面則為中央統籌規劃/資源募集，地方施行的架構。其策略架構具政策規劃上命題意涵，但本文關注的層次，則為其方案對於正向、長處觀點的策略架構，以及以少年問題與需求為主體核心的方案策略要點。

（四）、行動作法

在方案的行動作法上，主要包含住居、教育、就業、支持網絡與因生心理健康發展等面向，以下分項並參照相關美國執行經驗之研究說明內涵。

1. 住居安排

針對少年進入獨立生活後，在穩定生活住所事務的協助。作法上包含住居生活津貼的補助，以及方案人員持續的追蹤，以提供諮詢與住屋資訊的資源轉

介 (Lindsey and Ahmed, 1999)。同時建議保持與原寄養家庭父母的聯繫關係以維持情感上的支持，方案人員則提供暫時性的過渡住所協助 (Pecora et al., 2006)。

2. 教育支持

因應少年面臨獨立生活情境壓力，經常出現放棄就學的狀況進行協助。應由自立生活準備階段，透過寄養、安置機構社工，持續性的瞭解個案學校表現，並瞭解個案之教育決策想法，避免在升學轉銜階段遭受環境壓力放棄而未被察覺 (Blome, 1997)，同時相關兒少機構組織亦需與學校單位建立穩定的溝通與互動 (Reilly, 2003)。

3. 就業支持

提供進入職場之少年，就業與人力資本培養上的協助，以因應獨立生活之少年所產生工作與收入不穩定之問題。作法上包含提供職業訓練、職場體驗以及與雇主的接洽協助 (Iglehart, 1994; Pecora et al., 2006)。

4. 支持網絡

提供與社區、學校等相關單位的網絡聯繫與參與，特別針對以進入自立生活情境的少年，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性關係 (Georgiades, 2005; Pecora et al., 2006)。

5. 生理健康與心理發展

針對可能造成少年生理與心理情緒困擾的情境因素，以及少年本身狀態，進行持續性的評估，除了排除情境不利因素，亦提供心理上的支持與諮詢。(English et al., 1994)。

二、 華人「自立」與「泛家族」概念下的少年自立生活方案取向

個人取向的能力培養、潛能激發，以及自我心理的自主性特徵 (autonomous)，並在獨立生活的情境中，透過良好的公民參與融入於社區，

是個人取向少年自立方案的預設。然在自立概念上的差異，以及華人重視家族、人際群體的特徵下，為滿足社會取向的自立發展需求，以下幾個方案規劃取向是華人少年自立生活方案可擴充發展之規劃取向。

（一）、方案預設的擴充：群體、互依原則的重視

對於何謂「自立」，以及少年如何算是妥適發展的預設，是方案規劃之立基。承前個人取向的少年自立生活方案原型中，可以發現其內含對於群體與人際互依原則的假定，視為個人參與公民行為的技能與網絡之一，而非基礎對少年發展需求的假定。然洪文惠（2010）在規劃台北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能力指標手冊之方案基礎預設的設定時，亦提及華人少年在「社會我」面向的發展需求。筆者以為應審慎重新檢視少年自立方案的預設，而非全然的進行複製操作。應將少年成功融入群體、相互依存以及重視社會關係的社會取向發展需求，納入基礎方案預設。

諸些具體向度包含視面臨獨立生活考驗的少年間，彼此的相互依賴，對於重要他人的關係維繫期待，視為一種自我發展的特徵，而非病態或不成熟的表現，方能反應文化脈絡差異下的方案適用性。

（二）、泛家族組織與運作的目的性介入

西方文化脈絡下衍生導入的少年自立生活方案，對於少年融入社區與公民參與的期待，已清楚融入於方案策略之中。筆者以為目前台灣社會交雜傳統與商業化後社會文化關係，少年的公民參與以及融入所在社區的需求，應有其需求性。但並非因此全然忽視華人對於「泛家族」組織與運作的獨特性需求。反而應重視諸些面臨獨立生活需求之少年，在經歷安置/寄養經驗的過程中，諸些與家族行為相似的情境，所反應的心理暨社會特徵，有哪些可介入協助並視為自立生活助力的本土化策略。

如表三所示，泛家族組織與運作的目的性介入，乃是將安置/寄養經驗視為自立發展的核心任務場域之一。將機構組織運作方式、安置同儕與工作人員

關係角色納入處遇規劃，而不是僅為過渡安置所以及資源轉介的媒介。

表三：泛家族觀點下安置機構/寄養場域中的自立協助策略

處遇階段 策略項目	自立生活能力建構與準備期	自立生活能力任務聚焦期
安置機構/團體型 態的刺激類化	目的式介入（機構）泛家族規範設計 倫常與輩份運作的檢視、分析與運用 家族（團體）歸屬感的建立的重視	返「家」制度的設計 「兄姊弟」互助關係的支持 泛家族規範與社會場域的銜接
角色關係的刺激 類化	介入（機構）泛家族成員（安置同儕 與工作人員）間的楷模學習行為。 重視建立彼此互依、信任與支持之親 密關係，而非疏離之個人取向界線	引導將安置/寄養的泛家族經驗中， 與重要他人、類手足的互動方式，與 社會他人互動作複製學習。 強化泛家族成員的支持關係延續。
心理行為的刺激 類化	正視機構內階段的「家教」薰陶，目 的式強化群體式的價值觀、信念教養 與認同，而非控制、規範等視為過渡 安置的管理手段。	引導展現泛家族經驗，所培養之價值 信念（諸如誠實的某某機構少年）， 並維繫歸屬感與群體我的認同，使機 構處遇得以對少年產生實質與延宕 性影響。

（三）、社會取向的少年自立生活方案行動作法

強調個人取向的自立協助策略，主軸在於能力建構的培養。而社會取向的自立協助策略，則關注如何經營群體關係，建立團體、重要他人或普遍的社會認同，以達到資源的連結運用、機會的獲取與社會我的健康發展。其策略作法如下表四所示，針對住居、教育、就業等面向，除了個人取向的能力培養外，同時介入協助少年與不同社會取向的互動單位，進行有意義的連結（例如，廠商雇主）、累積互動經驗與連結窗口，致使得以透過社會能力達成生活事務目標，並提升自我的社會認同。

表四：社會取向的少年自立策略作法

自立取向 方案設計項度	個人取向 自我	社會取向自我		
		關係取向自我	家族（團體）取向自我	他人取向自我
住居安排	培養資訊			
	收集、資源使用與租屋覓屋之生活技能	重要利害他人的運用，尋覓同住而相互支持對象與維持關係	安置同儕的群體互依共居，維持相互照顧與穩定住居成本分攤	培養社交技能，與分租、租賃者建立良好的和諧關係
教育支持	生涯規劃能力建構、自我扶擇	建立學習楷模對象，請求協助與經驗複製	透過同儕/機構對於教育期待的認同，以達動機誘發	參照社會教育趨勢，協助爭取社會認同之學位
	生涯規劃能力建構、自我扶擇	運用就業機會相關人事的關係維繫，穩定和諧關係與增加覓職機會	同儕就業資訊與機會的分享，與相互提攜。	注重勞動市場與職業的聲望，協助建立社會普遍認同的職業形象
支持網絡	融入社區與連結資源之使用能力	維繫網絡窗口之關係，保持關係和諧與社會形象	以穩定的泛家族成員、同儕為核心擴散連結，建立信任與親疏遠近的關係	協助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與社團活動，追求社會角色與連帶關係經營
	學習自我負責、強化個人特色以及與他人的界線	建立權威與重要他人認同的良好自我社會形象	以群體、團體歸屬認同提供安全感與自我認同	以良好社會關係與社會形象，維繫自我社會自尊與認同感。

承上個人取向/社會取向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規劃討論，其意義並非否認現行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設計適切性。而在於希冀透過重新檢視華人心理與文化特質的重視，突顯少年自立方案，對於本土兒少需求回應能力之省思。是否完整複製他國方案之經驗，即能期待同樣效果的再現？而這效果的再現，又是否忽視了某些本土性需求的面向？這些問題皆需要開放的態度來進行思考、探問。

例如筆者所述的安置機構「泛家族」經驗與作法，其實在諸多實務機構已有類似的處遇方式，亦行之有年（例如，安置機構的「家族」規範、返「家」日的安置童交流聯繫等）。這些作法似乎在方案的規劃中，易受到忽視或未被正視為處遇設想的重要環節。然在導入方案的同時，似乎也壓抑了過去本土文化脈絡下經驗的長處與效用。筆者以下嚐試透過實務方案在轉換概念後，融入華人自立與泛家族概念的服務構想範式設想，並針對幾項因文化與方案預設的差異，所呈現的思維衝突進行反思與討論，盼能對兒少安置與自立生活協助業務的相關實務工作者，有所想法上的激發與交流。

三、 華人「自立」與「泛家族」概念在台灣現行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服務範式想像

台灣目前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服務發展，在中央主要為內政部兒童局於2004年將自立生活準備及自立生活追蹤輔導項目列入補助範疇，2006年確立地方政府的職責和角色，釐清方案服務的對象，透過增加補助專業人員服務費、個別心理輔導與治療費、個案生活費、以及個案就學、就業、職業訓練的交通費等四項，形成目前服務方案發展的依據。地方政府層面，除了兒童局下設之教養與安置機構外，主要為台北市與高雄市所推行的弱勢少年自立生活方案，補助對象的年齡為18歲至23歲（高雄市年齡下限為16歲），補助項目包含生活補助費、教育費用、個人成長及社會參與費用，並且設立培立家園，

提供短期住宿。

在民間非營利組織，則以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簡稱 CCSA），以家外安置兒少為服務人口，投入少年自生活事務的服務發展與提供，陸續於 2006、2207、2008 逐漸由經濟協助、追蹤輔導至轉銜服務等單項業務，形成整合式的服務架構（李思儀，2011）。就公私主要服務發展現況，筆者以台北市政府與 CCSA 等兩個方案規劃細項較為明確且具持續服務輸送經驗之單位為範式，呈現華人「自立」與「泛家族」概念在台灣現行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服務範式想像：

（一）個人獨立能力與社群依存能力—雙軸的轉銜架構

目前國內的少年自立生活方案主要架構，不論在台北市政府的「經濟弱勢少年自立生活方案」或是 CCSA 的「少年自立準備、追蹤、轉銜服務」，儘管在起步年齡與處遇階段的規劃略有差異，但基本上仍不脫前述美國少年自立生活方案架構，主要以少年獨立能力與心態之準備，以及屆離開安置機構後的住居、教育、就業與經濟之資源連結支持。特別在社工的角色上，主要的角色特徵仍在機構期間為資源的連結與服務輸送者，離開安置後則強調個案管理者的角色。

如表五所示，依洪文惠（2010）接受台北市政府委託所研發之少年自立生活服務指標來看，服務規劃的架構乃依據少年能力、獨立生活前的準備以及進入獨立生活後的適應支持等三部分，核心焦點為個人獨立能力之培養，以少年之能力發展狀態，逐步由瞭解自己、認同自己、技能學習、轉銜適應到獨立狀態，作為處遇階段的區辨。以促進少年始能（enabling）獨立生活之適應能力，進行個別化的處遇計畫，是服務架構的基礎框架。

表五：台北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方案服務架構

服務階段	自立生活能力建構	自立生活準備	自立生活適應
服務年齡	12～15 歲	15 歲以上家外安置個案	安置結束～23 歲
服務主題	生活適應、自我探索、人際與兩性關係、基本理財、生活自理	自我探索、自我照顧、人際關係、法律常識、職業探索、租屋與生活自理	穩定就學/穩定就業、住居協助與生活適應
服務重點	安置生活適應、團體生活規範、人際社會技巧與基礎理財教育	著重生涯職業規劃、生活自理能力與財務租屋等獨立生活事務體驗	確認就學/就業，與情緒/健康狀態追蹤，並提供問題因應之支持
服務角色	資源提供者	資源提供者	個案管理者

整理自洪文惠（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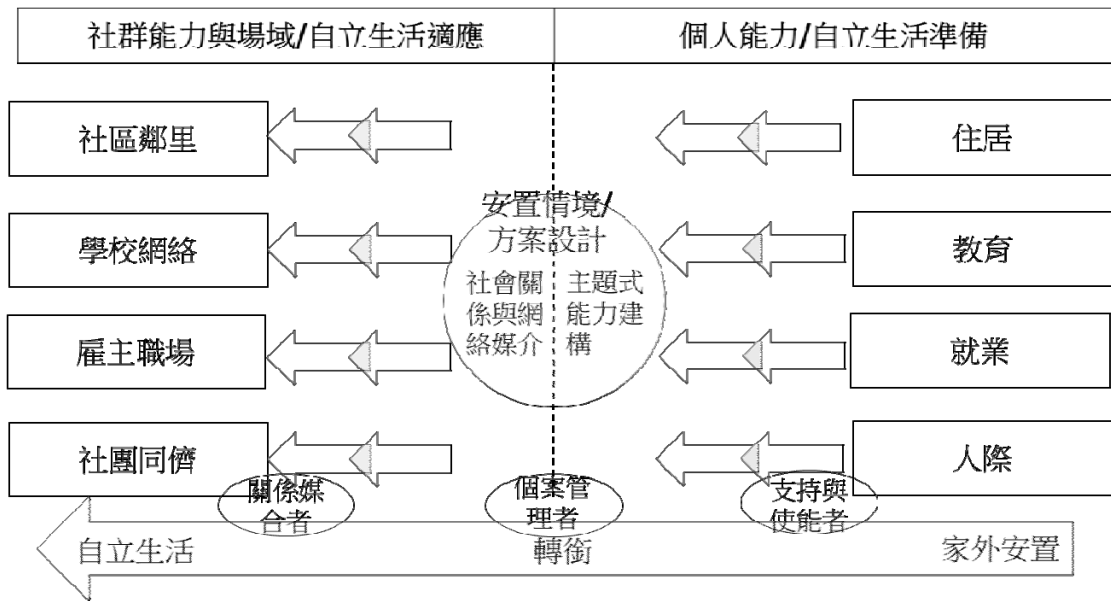
再有如表六所示，從 CCSA 的少年自立生活方案規劃來看，由於其發展是依據生活經濟扶助、轉銜到追蹤輔導循序整合的過程，相較於台北市經濟弱勢少年自立方案，是以少年安置狀態，作為處遇階段的劃分。在安置期間，主要焦點一樣為能力建構，在安置後期則著重個別化轉銜計畫；進入離開置機構階段後，焦點轉移到臨時住居以及追蹤訪視服務上。其服務框架，在個案管理的角色較為鮮明，而著重半獨立式生活空間的提供的作法，與美國少年自立生活方案更為相近，但社區轉銜的部分，雖較前述台北市經濟弱勢少年自立方案較有側重，但整體而言仍以少年個人適應狀態，以及脫離安置機構期間的轉銜生活議題因應為主要。

表六：CCSA 自立生活方案架構

服務階段	轉銜服務階段		追蹤輔導階段	
	結束安置準備階段	轉銜準備階段	半獨立階段	獨立生活階段
服務年齡	14 歲	15 歲	16 歲	23 歲
	16 歲	17 歲	18 歲	23 歲
服務主題/ 重點	儲備少年學習知能、心理調適與未來活預備金	持續維持少年穩定就學，並提升生活技能，及心理預備狀態，並依據個別需求擬定服務計畫	提供半獨立生活空間，漸進式進入社會適應階段。	擬定個別需求服務計畫，並由社工人員追蹤訪視，促進少年社會適應，以達獨立生活之目的。
服務角色	資源提供者	資源提供者→個案管理者	個案管理者	

整理自李思儀（2011）。

在上述兩個自立生活方案的實務架構，皆有清楚對於少年自立生活準備的框架，但基本的預設不脫個人能力的拓張，以及以個人為單位的服務規劃焦點。若能擴張「社會取向自我」的社群依存能力為另一轉銜關注焦點，形成策略如下圖一：



圖一：個人獨立能力與社群依存能力的雙軌自立轉銜規劃概念圖

1.針對服務主題，進行對外相對社群的連結

在上述 CCSA 以及台北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方案服務架構之範例中，現行自立生活方案的規劃設計中已逐漸朝向主題式能力建構的具體規劃，並在實務上採「體驗式學習」的方式在職場體驗、獨立生活體驗等較深入之處遇安排，皆已不乏在實務工作的策略中出現。惟包含服務設計以及工作者的角色上，仍是強調個案本身之能力強化，以及工作者課程安排、活動帶領等支持與使能者之角色。

在華人社會取向自立的概念中構想，若能將少年自立的方案規劃取向，融入社群依存與社群網絡資源的媒合角色納入方案規劃，成為雙軌延續性的服務，則能透過諸如：雇主媒介、已自立青年社團、媒介機構相關資源團體關係人等方式，協助個案媒合就業、社群支持以及住居優惠等社會關係網絡，同時亦具體建構個案本身的社會依存能力。一個方案基礎自立概念的轉換，連同相同主題的行動策略以及工作者本身的角色轉換，則已有利於個案藉由機構資源與社會角色達到融入社群的機會優勢與社會能力建構。

2.對內安置情境中，進行個案群體的依存連結

在實務上不乏針對面臨自立生活準備之個案，進行自我探索、人際關係互動等主題式能力建構。但卻少見正視機構安置期間或者自立生活準備期間，同儕間相互支持與群體關係建立的方案規劃，或者即使有也僅視為機構例行處遇或者管理的一環。在華人自立的概念中，機構場域的轉銜角色，則得以透過將自立準備之少年，以形成內部社群關係方式進行能力演練，並作為將來媒介外在社會資源的中介體。具體作法諸如形成自立同儕團體，例如家扶基金會對於自立青年所組成之「家友會」、「自立青年會」，讓轉銜期間就建立個案的社群關係，使其延續到進入社會後，得以保持關係進行資源分享與相互協助，則是社群依存觀點的自立取向行動。

（二）從機構內的「泛家族」規範，強化自立生活能力指標

在服務規劃原則與策略架構中，台灣目前幾乎完全承襲美國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架構在運行，特別是行動作法的複製，以獨立生活事務為指標的模擬與因應，諸如就學、就業支持等項目之規劃已趨於一致，例如洪文惠（2010）所規劃之少年自立生活指標因素，以「自我照顧能力」、「個人生涯規劃」、「基礎生存技巧」、「支持網絡建構」、「選擇與決定能力」以及「生活與壓力調適能力」等少年在自立生活中必須具備的能力，做為自立生活能力評估指標的 6 個向度，並據以發展自立生活能力評估的 10 項指標，如圖二所示。其項度與美國 CWLA 基調相似，朝向生活事的模擬、與準備的議題範疇。

指標一：自我照顧能力	身體與健康	日常生活
指標二：個人生涯規劃	就學與教育	就業與工作
指標三：基礎生存技巧	金錢管理	
指標四：支持網絡建構	社區連結	人際關係
指標五：選擇與決定能力	自我認同	
指標六：生活與壓力調適能力	社交與溝通能力	休閒生活

圖二：台北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方案服務指標架構圖

整理自洪文惠（2010）。

然除了前述小節透過華人社會取向的自立概念，進行服務架構思維，朝向社會群體的延伸思考外；另一焦點即為自立生活方案的能力指標，如何在泛家族概念的設想中，採取指標強化的作用。筆者以洪文惠所研擬之六大指標為例，設想透過華人泛家族概念的思維觀點，從諸些面臨自立生活個案所接觸的安置情境中，將安置機構中的泛家族規範有目的的納入方案設想，分別從機構成員角色、機構規範以及互動中的心理行為刺激，與自立生活方案做連結如下圖三所示：

在現行的自立生活方案規劃中，個人能力指標成為方案規劃中具體而獨立的處遇目標。然諸些指標卻鮮少與機構內情境條件做緊密的連結規劃，而形成單案處遇計畫以課程、營隊、團體方案等形式規劃出現。但就華人泛家族的概念中則可以採行的行動方案包含：

諸如對守時概念與生活作息安排的要求，對應生活時間安排與職場訓練的規範；衝突情況下的應對規範，對應非預期生活壓力事件的處理，以及儀容面貌的姿態規範，對應社會觀感與社會形象的養成。若忽視機構規範的類化刺激，僅以機構管理為目的未做方案目的性的連結，則個案長期時間養成的負面效益，諸如被動配合的態度、隨意可取得的衣著為主、習慣高度權威控制的約束等，及非短期自立生活方案採用主題式課程等方式可以改變的機構影響。

安置機構中的成員角色，易形成泛家族成員的關係。往往強化某些兄長、類親屬長輩的角色出現。多數時候基於專業倫理以及管理考量，常常將諸些關

係排除於方案的規劃中，卻忽視自立生活方案的主要人口，普遍有這樣類親屬的安置生活經驗。如果工作者能夠針對自立生活指標，進行這些泛家族角色的運用，而非止於私下非正式關係，例如：有計畫的安排已結束安置成員的「兄長成員」，進行租屋、職業介紹；或者由工作者透過個案，藉由對工作者產生類親屬長輩的信任關係，說明人際界線與自我保護的生活事件議題，皆比排除對這些關係存在的正視，或者產生非計畫中、私下關係取向的發展更符合方案的正向效益。

3.以機構生活事件為主題，規劃自立生活指標的介入處遇

泛家族概念講求共同生活經驗的延伸與擴張。對於諸些個案而言，透過課程與相關活動，亦難以複製一般正常社會經驗並內化。例如：即便知道正常的求職程序、履歷表與要求，但他們的生活經驗可能難比擬一般家庭兒少，少了出國旅遊、家庭經驗等，卻多了一般少年較少有的廚師、土木證照等技術證照。種種細節，足以讓他們在獨立因應的狀態下，趕到不適或者自卑等狀況。有目的的以機構生活情境事件為要素，連結指標進行處遇，形成如團體生活對於服兵役的適應議題、面試情境中對於安置經驗的自我陳述，皆為將安置階段的泛家族經驗，類化在有正面引導效益的方案項目上之作法。

筆者在本章引介以美國為主之個人自立取向的自立生活方案設計原型，並說明援用華人社會化自我與泛家族概念之框架，於本土自立生活方案規劃之取向構想，最後以現行實務方案規劃與操作現況做可能的方案思維設想。其意涵不在於引證東西文化差異的優劣佐證，而盼可以刺激相關實務工作者發現，筆者所提策略其實未盡脫離現行實務操作範疇，亦非大破開創之構想。僅諸些包含對於自立生活少年的社會性群體需求、安置機構中的情境關係，往往在全然個人能力建構取向的方案規劃中，失去了對諸些要素的檢視與在方案規劃中的重視。盼透過以下議題討論總結分享筆者理路。

肆、討論與建議

一、 審慎檢視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預設：獨立不應等同於「自立」

方案的概念預設，是一系列效益期待的原點。而如果社會工作實務，欲在華人生活圈施行，對於價值觀的澄清則是必須的工作（黃維憲、曾華源、王慧君，1995）。在本文提及的相關本土心理學研究結果，已累積相當的經驗研究（例如楊國樞，2004），佐證中西文化差異下的自我心理特質，雖難以獨斷判定西方兒少等同個人取向，華人兒少等同社會取向，但就方案規範性需求的考量，捨棄華人少年的社會性自我發展取向，以及華人生活經驗法則，全然以個人取向的獨立狀態為方案主體預設，則有方案規劃上的偏誤之虞。再者，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核心意義與價值，旨在協助面臨家外安置後，尚無法返回親屬家庭的少年，妥適邁入社會生活之目標，在方案規劃上若無法提供少年提升社會取向之自我發展能力，亦與提供少年自立生活協助的服務輸送價值基礎相違。

本文的核心旨在期盼，諸些方案規劃與服務輸送伙伴，審慎的檢視規劃中或者現行操作中的少年自立方案，思考其核心的預設：「獨立與自立」概念差異下的本土意涵，一一核對實務上少年的反應現象，並檢視方案作法上的適切性，不僅對於服務使用者而言，是以需求為主體之重視，亦是社會工作專業對於服務使用者，發展任務滿足之專業體現。

二、 專業關係與角色的省思：安置情境中的專業角色運用

社會工作教育過程中，秉持對案主採非評斷性和高度接納，是服務過程中的基本特質取向（曾華源、胡慧嫻、李仰慈、郭世豐，2006）。然就安置機構中的場域現象，當個案將社工、生活輔導員視為兄姐、父母角色之狀況發生時，

作為專業人員如何面對這樣的關係？採取純然分明的界線，對於面臨自立生活挑戰的兒少有何正面意義，值得思索。就本文所提及「泛家族」觀點中，當組織中的成員建立起一套類似家族角色的組合，衍生心理刺激類化的歷程時，安置機構的專業人員則能夠藉由諸些類兄姐、類父母的角色，產生認知暨行為引導的功能。

就專業角色的基礎思考，應具有避免傷害以及有效解決個案問題的意義（黃維憲等，1995），而在華人社會中，雙重關係與模糊關係界線乃是獲得案主信任的基礎，這也是專業關係維繫的要素（曾華源等，2006）。因此，就少年自立生活方案中，專業人員面臨諸些安置少年，在「泛家族」情境的狀態，以介入處遇功能面的考量，專業關係確實得以善用「類兄姐」等角色意義，進行目的式的引導與信任關係的維持，特別對於少年自立方案在離院後的專業關係影響的持續性具有意義。然未經思索的否認、拒絕與安置兒少的劃清界限，強化少年為受服務者之角色，除了忽視泛家族情境下的處遇介入機會，也可能將促使此類泛家族關係成為抬面下的非正式關係，則無益於專業關係傷害的風險降低。

三、應重視安置情境中的泛家族經驗：機構安置非僅為法定的庇護所

安置機構到底是自立少年的法定庇護所，或者為少年的支持與情感依歸，自立方案的規劃具有其影響性。其意涵在於如果以少年發展性的需求，積極的將安置機構場域，視為少年自立生活準備階段的任務情境，以及進入獨立生活期的自立生活事務因應階段，需要資源與情感支持的依歸，則安置機構皆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樣的安置機構角色意涵，在西方的少年自立生活方案中，亦等同重要。惟差異在於以美國為參照的經驗中，安置機構能否發揮自立生活準備與自立生

活支持的功能，一部份因素在於個案管理機制的銜接。然就「泛家族」觀點下，華人社會的自立生活方案規劃，除了個案管理制度外，尚可透過安置情境中的泛家族組織與運作，達成少年在機構中的社會規範學習，以及形成以家族認同、家族情感歸屬、成員互依等泛家族情境的類化刺激。核心的差異，在於安置機構視個案為「過渡的服務使用者」或者「家族團體的一員」，而其取向其實即是對於家庭式教養經驗的正視，將群體的認同、規範、價值信念等，作為專業服務規劃的一塊，而非僅為文化脈絡下的經驗法則。

再者就目前台灣安置相關法規與服務委託關係，逐步形成服務輸送制度化的同時，以管理取代家族治理的趨勢，對於與案童間的關係、情境的氛圍，是否「法定的安置過渡所」之感受，已經強於一個具情感與心理歸屬意涵的支持性發展情境，值得實務工作伙伴省思與覺察。

四、 少年自立生活適應的相關本土化命題

華人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發展，相關命題在心理議題層面，包含少年自立生活適應的評估指標，諸如團體效能、社會自尊、家庭學校等多元面向生活滿意、社會互動能力等含括社會取向自我之因素，目前仍尚待發展與進一步研究。目前美國少年自立生活方案的評估指標發展，諸如 ACLSA 評量表（Ansell-Casey Life skill Assessment）已發展成熟為方案規劃與執行的重要參考依據，而工具的發展有助於自立方案的實施效益（Nollan et.al., 2000）。然國內目前除了洪文惠（2010）所編撰之台北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能力評估指標為主要外，對於方案評估之指標與工具仍缺乏相關經驗與研究累積。而洪文惠於手冊中亦提及華人少年對於社會我的心理概念，以及文化差異下的適應取向有其指標發展上的差異，在心理暨社會相關指標的發展上，是為值得延伸關注之研究命題。

在方案規劃與施行策略面向，除了重視少年生活技能面的能力，以及對於社區支持系統的連結外，亦應該積極的針對安置或寄養的泛家族情境，對於少

年正向發展社會適應與支持關係之元素做策略上的研擬，並以社會取向自我發展的需求作考量，探討少年對於關係取向的人際維持、機構/寄養家庭資源的維繫運用，進行就學、就業、住居支持等主題式的策略探討，則是一個除了整合社政、民間非營利組織資源外的重要方案策略發展選項。

伍、結語

做為父母，當孩子學會走路的那天起，即可以預期有一天他/她將離開家庭、有自己的事業與生活，展開自己的人生旅程；這一系列的自立過程，在從接生者手上接過孩子的那一刻，就已開始。在西方傳統文化中，或許在成長過程中多了獨立能力培養的重視，以及鼓勵離家面對生活挑戰的價值精神；而華人社會則多了家族式的關係保持、家長式的引導與關心，盼孩子能成為家族認同與具社會聲望的一員。然儘管中西文化上具有價值與作法上的差異，可以確認對於孩子的自立協助之關懷與初始的情感連結，將是伴隨兒少自立的共同元素。

作為社工會工作者以及相關協助少年自立生活的專業人員，所扮演的角色與父母的差異，在於我們將自己定位為少年人生旅程中，上車做工，當少年發展問題得以改善時，則默默下車的陪伴者。面對諸些家外安置兒少，普遍親屬關係的破碎與缺乏下，他們對於自立生活挑戰的不利因素，卻是對於父母與家族成員的持續關懷與支持引導之缺乏。面對這樣的情況，雖然我們無法真正替代他們父母的角色，但卻應該更審慎關注一般華人家族所能提供的引導與協助功能，同時不吝於扮演持續而穩定情感支持的窗口。在他們匱乏上，看見我們的功能；而非在我們的長處上，看見他們的需求，筆者以為這應是華人社會下，少年自立方案相關工作者值得一同自許的專業價值與角色。

參考文獻

- 內政部兒童局 (2006)。《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指南》。線上檢索日期 2011.4.2。
網址：http://www.cbi.gov.tw/CBI_2/internet/main/index.aspx
- 洪文惠 (2010)。《台北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能力評估指標-編撰說明暨使用手冊》。台北：聖道基金會。
- 杜慈容 (1999)。《童年受虐少年「獨立生活」經驗探討—以台北市少年獨立生活方案為例》。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余瑞長 (2003)。《育幼機構受虐兒童之社會適應研究—以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思儀 (2011)。《從經歷安置服務少年觀點解讀「獨立生活」之起步—以「獨立生活第一桶金儲蓄計畫」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2007)。《96 年育幼院院生離院與就學、就業情況調查分析報告》。取得日期：2011.4.1。網址：http://www.childrenhome.org.tw/consumer/www.childrenhome.org.tw/uploads/File/CCSA_Report/9609ccsa-report-b.pdf。
- 林以正、楊中芳 (2000)。〈中國人在研究情境中的自我呈現〉。《教育部研究計畫報告：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88-H-FA01-2-4-3)。
- 林以正、楊中芳 (2001)。〈「公我」與「私我」的拿捏對中國人自我呈現行為的影響〉。《教育部研究計畫報告：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89-H-FA01-2-4-3)。
- 林俐君 (2001)。〈育幼機構院生成長脈絡之探討—以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受刑人子女為例〉。《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1，41-68。
- 林瑜珍、李思儀 (2008)。〈CCSA「離院生活自立方案」服務分享〉。《「安置少年自立生活方案：英國與國內經驗分享」2008 國際研討會手冊》，頁

- 115-134。台北：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 洪文惠（2010）。《台北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能力評估指標-編撰說明暨使用手冊》。台北：聖道基金會。
-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2010）。《98 年度全國兒童少年寄養服務工作成果報告書》。台中：內政部兒童局。
- 翁嘉英、楊國樞（2004）。〈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自尊：概念分析與實徵測量〉。《「華人的自我歷程、自我概念及自我評價」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 孫籥如（2000）。〈自我肯定歷程在相依我概念下的運作過程〉。《教育部研究計畫報告：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89-H-FA01-2-4-3）。
- 孫籥如（2001）。〈自我界定與自我評價維持模式〉。《教育部研究計畫報告：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89-H-FA01-2-4-3）。
- 孫籥如（2002）。〈自我評價、自我提升、及自我保護：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觀點〉。《教育部研究計畫報告：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91-H-FA01-2-4-3）。
- 莊耀嘉、楊國樞（1999）。〈家庭中的人際互動結構與運作模式〉。《本土心理學研究》，12，3-46。
- 凌輝、黃希庭（2008）。〈場依存-獨立性認知方式與兒童自立水平關係〉。《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16（4），384-386。
- 凌輝、張建人（2007）。〈學生自立意識的方法學思考-現象學方法的運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15（1），92-95。
- 黃維憲、曾華源、王慧君（1995）。《社會個案工作》。台北：五南。
- 曾華源、胡慧嫻、李仰慈、郭世豐（2006）。《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論》。台北：洪葉。
- 葉明華、楊國樞（1998）。〈中國人的家族主義：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3，169-225。
- 畢國蓮（2006）。《歷經長期機構安置的兒少保護個案結案後的生活經驗初探》。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毓文（2008）。〈國內接受機構安置少年憂鬱情緒之探究：問題陳顯與解釋因素〉。《中華心裡衛生學刊》，21（1），75-101。

陳俊仲（2009）。《育幼機構院生的多重弱勢歷程研究－兒童保護或社會排除》。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陸洛（2001）。〈人我關係與自我運作〉。《教育部研究計畫報告：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89-H-FA01-2-4-2）。

陸洛（2003）。〈人我關係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現身〉。《本土心理學研究》，20，139-207。

陸洛（2004）。〈現代華人之個人與社會文化的差距對其生活適應之衝擊〉。《教育部研究計畫報告：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92-H-FA01-2-4-3）。

郭美滿（1991）。〈兒童教養機構〉。周震歐主編，《兒童福利》。台北：巨流圖書。

彭淑華（2007）。〈機構安置：保護他（她）？傷害他（她）？－兒童少年保護工作人員眼中之機構虐待圖像〉。《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6，1-36。

楊中芳（1991）。〈回顧港台「自我」的研究-反思與展望〉。楊中芳、高尚仁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台北：遠流。

楊國樞（1993）。〈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台北：桂冠。

楊國樞（1998）。〈家族化之歷程、泛家族主義及組織管理〉。鄭伯燾主編，《台灣與大陸的企業及人力資源管理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信義文教基金會。

楊國樞（2004）。〈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22，11-80。

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2005）。《華人本土心理學（上）》。台北：遠流。

楊國樞、劉奕蘭、張淑慧、王琳（2010）。〈華人雙文化自我的個體發展階段：理論建構的嘗試〉。《中華心理學刊》，52（2），113-132。

- 鄭貴華（2001）。《身體受虐兒童對「家庭重聚」接受意願之探討—以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為例》。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美芝（2000）。《機構安置受虐兒童社會適應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韓貴香（2010）。〈華人對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與動機之分析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2（1），41-73。
- Ames, R. T., Dissanayake, W., & Kasulis, T. P. (Eds.).(1994). *Self as person in Asian theory and practic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Ames, R. T., Kasulis, T. P., & Dissanayake, W. (Eds.).(1998). *Self as image in Asian theory and practic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arth, R. P.(1990). On Their Own: The Experience of Youth after Foster Care.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7(5), 419-446.
- Blome, W. W. (1997). What happens to foster kids: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of a random sample of foster care youth and a matched group of non-foster care youth.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14, 41-53.
- Berzin, S.C. & Taylor, S.A.(2009). Preparing Foster Youth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unty 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s and Community-Based Youth-Serving. *Journal of Public Child Welfare*, 3:254-274
- 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2005).*CWLA standards of excellent for transition, independent living, and self-sufficiency services* .Washington, DC: Print b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Chen, H. (2009).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coping*. USA: Indiana, Ball State University. Doctor of Philosophy.
- Deci Chen, H. (2009).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coping*. USA: Indiana, Ball State University. Doctor of Philosophy.
- Deci, E.L., Ryan, R.M.(1987). The support of autonomy and the control of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1024-1037.
- Deci, E.L., Ryan, R.M.(1995). Human autonomy as the basis for true self - esteem, In Kernis, M.H.(1995). *Efficiency, agency, and self-esteem*. New York: Plenum

Press.

English, D. J., Kouidou-Giles, S. K., & Plocke, M. (1994). Readiness for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youth in foster care.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6(3/4), 147–158.

Georgiades, S. (2005). A multi-outcome evaluation of an 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22(5), 417–439.

Iglehart, A. P. (1994). Adolescents in foster care: Predicting readiness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6(3/4), 159–169.

Kroner, M. J.(1988). Living Arrangement Options for Young People Preparing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hild Welfare*, LXVII(6),547-561.

Kettner,P.M., Moroney,R.M.,Martin,L.L.(1990). Designing and managing programs:an effectiveness -based approach.高迪理譯（1999）。《服務方案設計與管理》。台北：揚智。

Lindsey, E. W., & Ahmed, F. U. (1999). The North Carolina 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 A comparison of outcomes for participants and nonparticipant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1(5), 389-412.

Mares,A. S.(2010). An Assessment of Independent Living Needs Among Emancipating Foster Youth. *Chil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27,79–96.

Markus, H.R., Kitayana, S.(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98: 224-253

Naccarato,T. & DeLorenzo,E.(2008). Transitional Youth Services: Practice Implications from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ences Social Work* , 25:287–308.

Nollan, K. A., Wolf, M., Ansell, D., Bums, J., Barr, L., Copeland, W. & Paddock, G. (2000). Ready or Not: Assessing Youths' Preparedness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hild Welfare*, LXXIX(2),159-176.

Pecora, P. J., Kessler, R. C., O'Brien, K., White, C. R., Williams, J., Hiripi, E. (2006). Educationaland employment outcomes of adults formerly placed in foster care: Results from the northwestfoster care alumni study.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8, 1459-1481.

- Pinkerton, J. (2010).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odels in Independent Living Services(1). *2010 CCS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odels in Independent Living Services*. Taipei: CCSA.
- Robson,C.(2000).Small-Scale Evalu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魏希聖、鄭怡世譯 (2005)。《方案評估：原理與實務》。台北：洪葉。
- Reilly, T. (2003). Transition from care: Status and outcomes of youth who age out of foster care. *Child Welfare*, 82(6), 727-746.
- Stein, M. & Munroe, E.(eds)(2008).*Young people's Transitions from Care to Adulthoo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London, Philadelphia :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 Yang, K. S.(1995).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Lin,T.Y., Tseng, W. S. & Yeh, Y. K. (Eds.),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pp.17-39).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K. S. (2003). Beyond Maslow's culture-bound linear theor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of the double-Y model of basic human needs. In V. Murphy-Berman & J. J. Berman (E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49.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pp. 175-255).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Yang, K. S. (2004). Toward a theory of the Chinese self: Conceptual analysis in terms of social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 orientation. In K. S. Yang & K. Y. Hsu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Chinese Self Process, Knowledge, and Evaluation* (pp. 1-52). I-lan County, Taiw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 Guang University.
- Yeh, K. H., & Yang, Y. J. (2006).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individuating and relating autonomy orientations in culturally Chinese adolescen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 148-160.
- Yeh, K. H., Liu, Y. L., Huang, H. S., & Yang, Y. J., 2007. Individuating and relating autonomy in culturally Chinese adolescents. In J. Liu, C. Ward, A. Bernardo, M. Karasawa & R. Fischer (Eds.), *Casting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pp. 123-146). I-lan County, Taiw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 Guang University.

Yeh, K. H., Bedford, O., & Yang, Y. J., (2007).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the Coexistence and Domain Superiority of Individuating and Relating Aut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2.

研究論文

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開案與結案狀態之因素：從個人人口特徵與服務輸送的探討^{*}

趙善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許玢妃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副局長

王仕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何華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1 年 11 月 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2 年 1 月 10 日。

^{*} 本文資料是取自作者接受某縣市政府委託進行的「婚姻暴力處遇服務成效評估研究」。謝詞：感謝支持、協助、參與本研究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主管和工作人員，以及研究助理；同時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教授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本文通訊作者：許玢妃。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是否開案，以及開案個案結案狀態之重要因素。本文資料是來自作者接受某一縣市政府委託的「婚姻暴力處遇服務成效評估研究」中，「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2005年的通報個案之相關服務資訊，其中未開案者有 290 人，正式開案者 810 人。透過邏輯迴歸模型建構後發現，性別、暴力類型、通報總次數、是否來自衛生單位通報，是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是否開案的重要關鍵因素；服務項目數是影響開案個案是否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結案之關鍵因素；性別、暴力類型、與相對人關係、通報總次數、是否來自衛生單位通報、服務項目數，是影響開案個案是否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服務結案之關鍵因素。

關鍵字：婚姻暴力、開案、結案、服務輸送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dividu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ce Delivery to Discuss the
Factors of Influencing the Opening and Termination
Status of a Marital Violence Reporting Case^{*}**

Shan-Ru Cha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n-Fei Hsu

Deputy Commissioner, Social Affairs Bureau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Shu-Twu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Chin H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ed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influencing the opening and termination state of a marital violence reporting case. The data is taken from some country's research project "Study on the Effect Evaluation of Marital Violence Treatment Services" conducted by the writer of this study. Among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reporting cases from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Sexual Assault and Children -Juvenile Protection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country in 2005, 290 people did not open their cases, but 810 did. Through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 The data is taken from some country's research project "Study on the Effect Evaluation of Marital Violence Treatment Services" conducted by the writer of this study.

Model, it is found that gender, violence types, reporting number, and whether the reportings from the health institutes are the key factors in influencing the opening of a marital violence reporting case. The service item numb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because some cases could solve their own problems and terminate their cases due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ir abilities through various services offered. Besides, gender, violence types, relative relationship, reporting number, whether the reportings from the health institutes, and service item number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would influence whether a termination is due to the receiving and completing of a medical care subsidy.

key words : marital violence, open case, termination, service delivery

壹、前言

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10）的統計，歷年來家庭暴力通報件數中，以婚姻暴力（含離婚、同居）暴力類型所佔的比例最高，約佔半數以上，以 2010 為例，在 105,130 件的家暴通報案件中，有 59,704 件是婚姻、離婚或同居關係的暴力，相較於 2005 年成長了 1.46 倍，並且是遠超過兒童保護、老人虐待。但相較於兒童保護、老人虐待，婚姻暴力被害者是成年人有絕對的自主權，且有較多的社會資源或生命能量，因此相對有較高的決定權決定是否要正式進入服務系統或是處遇服務內涵。所以，婚姻暴力的通報個案不見得都會進入正式開案的服務系統，或是即便進入服務系統中也有可能隨時中斷處遇服務，因而影響家庭暴力防治成效。因此，若能進一步瞭解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是否正式進入開案服務系統以及正式開案結案狀態之因素，則有助於提昇服務輸送的暢通性與完整度。

所謂開案（open case）係指潛在的服務對象資格是符合機構的開案指標或是個人需求是符合機構的功能之下，機構將正式提供服務；所謂結案（termination）則是個案工作的目標已達成或因特殊原因而無法達成個案工作目標時，機構不再對服務對象提供服務（莫藜藜、黃韻如，2003；謝秀芬，2006）。基本上是個案服務輸送過程中資源控管的兩個重要關卡，同時也是方案服務績效評估的兩個重要時間點（莫藜藜，1999；柯麗評、王佩玲、張錦麗，2005）。因為，這其中牽涉到需要協助的個人或家庭是否獲得服務，以及獲得服務的個人或家庭是否達成預定的服務目標。現階段國內外有關婚姻暴力的研究多數是以女性被害者的現況與需求（王麗容、陳芬苓，2003；Tjaden and Thoennes, 2000；Tiefenthaler, Farmer and Sambira, 2005）、服務方案執行與困境（黃淑玲、林方皓、吳佩玲，2001；祝健芳，2002；Gills et al., 2006；Mills, 2001；Whitaker et al., 2007），以及接受服務後服務對象的滿意度、改變或意見（劉淑齡，2002；李碧琪，2003；Bennett and O'brien, 2007；Hovell, Seicl and Liles, 2006）等議題為

主，較少探討影響是否開案（含未開案原因）以及不同結案狀態之因素（含結案原因狀態）。因此，本文將以此議題做為討論焦點。

本文資料是來自作者接受某一縣市政府委託的「婚姻暴力處遇服務成效評估研究」中，此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2005年1100個通報個案之相關服務資訊，其中未開案者有290人，正式開案者810人。「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是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為提昇家庭暴力、性侵害及兒少保護通報個案資訊完整性，達到個案管理目的，2004年整合兒童局兒童保護個案管理系統及台北市、高雄縣之個案管理系統所建置的資訊資料庫，因此此資料庫所建立的資料是所謂的官方既有的統計資料。使用官方既有資料進行分析是屬非介入性研究，不需要請婚姻暴力通報個案再度填寫相關問卷或是接受訪問，主要的優點是可以避免當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資料蒐集情境下會面時，可能產生對資料的干擾，但其限制是研究架構與問題必須配合既有資料庫之內容（Frankfort-Nachmias and Nachmias, 2001）。因此，雖然根據相關文獻，影響是否開案、不同結案狀態的因素有個人、服務輸送、所處社會環境等三個面向（黃淑玲等，2001；潘淑滿，2007；Beaulaurier et al., 2007; Gillis et al., 2006；Wolf, Ly, Hobart and Kernic, 2003），但在「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中僅能提供部份個人人口特徵、服務輸送資料。因此，本文也將僅從個人人口特徵與服務輸送資料兩個面向，探討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是否開案與不同結案狀態之相關因素，而無法涵括婚姻暴力通報個案個人面向全部之因素，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等重要變項，這也是本文的限制。

貳、文獻探討

一、 婚姻暴力的定義與現況

所謂婚姻暴力係指暴力行為發生在同居中或同居過之雙方，彼此的關係可能是法定之夫妻、已離婚之配偶、同居或曾同居過的親密伴侶（Barnett, Miller-Perrin, and Perrin, 2005；周月清，1995），即是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條第一、二款所範定的對象——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者，以及第三條第一、三款所範定的暴力行為——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以及騷擾（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們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所以，基本上婚姻暴力包括了現在與過去、合法與事實上有婚姻關係的雙方，所發生的身體傷害、精神虐待或恐嚇威脅。

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9）的統計，2006 年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通報個案佔家庭暴力通報總數的 62.31%；2007 年佔 60.45%；2008 年所佔之比例雖有降低，但仍有 58.25%，是國內家庭暴力的主要類型。王麗容和陳芬苓（2003）針對台灣地區婚姻暴力問題的調查報告指出，台灣的婚姻暴力發生率為 17.38%；暴力行為以肢體暴力最嚴重，以已婚人口估算，每年約有十四萬人遭配偶拳腳相向，其中兩萬五千人（17%）是每天或週週被打的嚴重暴力，而女性是為男性的三倍。根據美國疾病管控與預防中心以及聯邦法院的統計，美國婦女遭受親密伴侶暴力傷害的比例為 25%，而男性為 8%（Tjaden and Thoennes, 2000）。與美國的情況相較之下，國內婚姻暴力的發生率是較低，會有此結果相關的影響因素不少，但其中不同種族、文化對於暴力容忍度的差異是一個關鍵因素（Lee, Pomeroy and Bohman, 2007；Menjivar and Salcido, 2002）。

然而，不論是何種型態的暴力行為，只要是在長期或高頻率的暴力行為之下，對受害者的生、心理及生活皆會造成負面影響。Monahan 和 O'Leavy（1999）

的研究發現，身體暴力中女性的腦部經常是受傷之處，容易有記憶力衰退、專注力減弱、精神疲勞與頭痛、頭暈現象。在心理方面，容易沮喪、無法集中精神、有自殺意念、高度的恐慌、焦慮（侯玟里，2001；Zlotnick, Kohn, Peterson and Pearlstein, 1998）。另外，根據我國司法統計年報（2007）得知，2004 至 2006 年間約有 10%離婚原因是遭受他方虐待。所以，整個社會必須為婚姻暴力承受相當大的成本。Tiefenthaler et al.（2005）依據美國統計局 1998 年的報告指出，在公共福利系統中有 55%~65%的婦女在過去是曾遭受到伴侶的虐待；並且亦有研究指出，遭受親密伴侶暴力虐待婦女的身體健康照顧成本是非受虐待婦女的兩倍，心理健康照顧成本是八倍（Golding, 1999; Wisner, Gilmer, Saltzman and Zink, 1999）。

儘管婚姻暴力對被害人會有負面影響，但對多數的女性被害人而言，所期待的是協助她終止婚姻親密暴力的發生，而非終止婚姻親密關係。所以，高達七成左右的受暴婦女在接受相關服務之後，仍舊選擇留在或是回到施暴者身邊（潘淑滿，2007）。Zink, Regan, Jacobson 和 Pabst（2003）曾提醒相關服務提供者，如果婦女仍選擇留在施暴者身邊，那麼必須跳出既有的服務輸送邏輯——被害人選擇離開施暴者的假設，重新思考婚姻暴力雙方的需要。不過，也因為多數的婚姻暴力被害人不會一開始就選擇離開施暴者，但親密伴侶暴力又是典型的重複性暴力行為，易形成暴力循環（Laycook, 2001）。因此，婚姻暴力女性被害者解決問題的過程，是在求助與放棄間不斷的反覆，且內心充滿掙扎與矛盾（Newman, 1993）。影響婚姻暴力女性被害者難以離開或脫離施暴者的原因，除了可能對婚姻關係或完整家庭仍有期待之外，還可能包括了環境中相關資源的缺乏，以及社會規範的指責、個人內在對孤獨的害怕……等（柯麗評等人，2005；Anderson, et al., 2003）。所以，對於身陷婚姻暴力的雙方，尤其是女性被害人若要終止婚姻暴力再度發生或是脫離暴力關係，是需要相關資源的支持。

二、 婚姻暴力的服務輸送：開案與結案

由於，婚姻暴力是屬於家庭暴力的一部份，且現階段國內的服務輸送並未針對婚姻暴力有特別設計特定的服務輸送，故在此介紹的婚姻暴力服務輸送仍以整體的家庭暴力為主軸。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八條規定，地方政府應整合警政、教育、衛生、社政、民政、勞政……等單位，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提供相關服務，其中包括了受暴者的個案服務。目前各縣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針對個案服務，皆採用 24 小時「113 婦幼保護專線」之單一窗口接受通報，並且應案主個別化需求，提供緊急救援和安置、協助診療、驗傷、採證等危機處置，以及心理輔導、經濟扶助、法律服務等後續服務（潘淑滿，2007；祝健芳，2002）。雖然，家庭暴力防治法有網絡合作的理想性，但社政單位仍是主責單位（游美貴，2010）。由於每個縣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組織模式、人力編制、相關資源不盡相同，因此在個案工作服務輸送的設計，包括開案指標、服務項目、結案指標，會依實際情況而所調整。

為能履行社會工作者對案主的倫理責任——照顧的義務、適當處遇的義務、審慎處理結案的義務，基本上對於開案與結案指標的訂定都會多方考量與謹慎處理（曾華源、胡慧嫻、李仰慈、郭世豐，2006）。理論上，每個機構在訂定開案指標時，是根據機構實際服務功能，不過有時也會以服務對象的條件為開案指標（莫藜藜、黃韻如，2003）。共同參與研究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之開案指標是同時考量服務對象條件與機構功能，其開案指標主要有四：1.設籍○○市或現居○○市之個案；2.有遭受家庭暴力之事實；3.有求助意願；4.案主有下列需求者，緊急救援庇護及安置、法律諮詢、心理諮商、保護令之聲請、醫療服務、子女會面、就學輔導、職訓與就業團體、參加團體方案、面談諮詢（需後續協助）、經濟扶助（生活、醫療、訴訟、庇護、住宅）、陪同服務（驗傷、偵訊、出庭、就學、就醫、返家）、協助申辦相關福利資源（低收入戶、身心障礙手冊）、關懷支持、轉介服務等。所以，即使個案有明確的受虐事實與需求，但個人本身不願意進入正式服務輸送系統，社會工作者亦無法

強迫之，而此現象對視婚姻暴力為家醜而不宜外揚之國人是相當常見。不過，為能謹慎處理未正式開案之通報個案，參與本研究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在服務流程中，仍要求社會工作者對於未正式開案之個案必須聯絡，以確保個案接受服務之權益，並在行政程序仍須完成類似結案的工作。

結案是表示該社會工作機構與社會工作者不再對某位案主提供任何服務，不過並非意味案主問題一定獲得解決（莫藜藜、黃韻如，2003）。結案的原因或狀態有可能是案主已實現特定目標，能較獨立面對問題；案主有新問題的發生，而機構無力解決，必須經由轉案工作來尋求其他的助力；案主不滿意服務，中途退出；覺得有進步，不需要再接受治療；或案主有特殊事件，如搬家、發現急性嚴重疾病等（黃維憲、曾華源、王慧君，1985）。共同參與研究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依據家庭暴力的防治目標與實際服務情形訂定 11 個結案指標：1. 已完成處遇服務；2. 自開案日起 3 個月後無再受暴力事實且案主表明無須中心介入；3. 案主表明已可自行處理，經評估無須中心協助；4. 服務過程中案主的需求已非中心服務範圍轉介其他社福機構；5. 案主或相對人一方死亡；6. 案主遷移至其他縣市（國家）已轉介至當地家暴中心；7. 離婚無再受暴事實；8. 案主遠離受暴環境；9. 相對人遷移案主之住所；10. 與案主（相對人）失聯；11. 其他。前三項的結案狀態是屬於較正向的，是多數工作者與案主共同努力的方向，也就是所謂的積極性結案，意指工作人員與服務對象完成處遇服務和目標，以及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只是在服務輸送過程中有不少的干擾因素，因此並非所有的個案在結案時皆是在此狀態。另外，在結案時個案本身的狀態有可能同時符合多個結案指標，故結案評估時是採多重考量，也就是說個案結案時之狀態有可能符合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指標。

本文所採用的 2005 年某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中，810 個正式開案研究樣本的結案狀態或原因是以完成處遇服務排名第一；其次則是案主表明可自行處理且經過評估無須中心協助；再其次則是自開案日起 3 個月後無再受暴事實且案主表明無須中心介入。由於，案主表明可自行處理婚暴情形或是自開案日起 3 個月後無再受暴事實，意味著其能力提昇

可解決生活中相關的問題，故本文在探究影響不同結案狀態因素時，首先是以「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而結案」個案作為參考組。另外，完成處遇服務結案個案又以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的人次最多，在此情況下，本文又將以「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之個案為第二種參考組，試圖了解影響婚暴被害人進入正式服務系統後只選擇醫療費用補助之因素。

三、 婚姻暴力被害人與求助行為

根據法令，婚姻暴力被害人能夠依循既定的管道尋求公共部門的協助，但事實上尋求公共部門正式機構協助通常不是他們第一選擇。Mills (2001) 及 Goodman, Dutton, Weinhurt 和 Cook (2003) 曾以受暴婦女為研究對象探究其求助歷程，結果指出尋求正式機構的協助僅是少數受暴婦女第一個求助的對象，多數者則是在求助親友無效之後，才會轉向正式機構尋求協助。周月清 (1994) 的研究指出，婚姻暴力對婦女的傷害除了身體上的受創外，心理上也蒙受莫大的傷害，但當她們受到侵害時的因應行為是忍耐、求助於自己本身的支持系統，再者才是求助於專業服務體系；並且是在個人的社會支持系統已無法有效提供協助時，才會轉而求助正式的支持系統。黃一秀 (2000) 的研究亦指出，當受虐婦女在用盡了自己認為可能的方式來解決暴力無效之後，才會向外在環境求助，並且非正式的支持系統，如親人、朋友為第一順位，其次才是正式的服務單位，如警察單位、醫療單位、社福團體。然而，婚姻暴力被害人不願運用正式或專業服務系統的原因，是因為不相信他們可以提供有效的服務 (Bowker, 1984)，或是擔心被標籤化 (許采臻，2006)。不過，由於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往往還具有強烈的情感繫屬關係，當被害人向外求助時只是希望執法機關的介入能夠確保她們本身的安全、財政上的穩定與保護子女的安全，或是幫助她們的加害人，至於強制力介入之請求，則往往是被害人最後才會考慮的選擇 (Ford, 1991)。

至於，影響或是阻礙婚姻暴力被害人向正式支持系統尋求協助的原因，就個人面向，因受到面子文化及以女性為主的服務系統之影響，男性較女性不易對外尋求協助（潘淑滿，2007）；年齡較大者因考量多方社會規範的束縛，較不傾向對外求助（Beaulaurier et al., 2007）；外籍配偶多數會長期隱忍配偶暴力相向，不向外求助，期待有朝一日能取得台灣身分證（潘淑滿，2007）；教育程度較高者因較能理解正式支持系統的運用，通常較會使用正式支持系統（Kalmuss and Strans, 1990）；國內對於同居的親密關係仍有著負面的刻板印象（徐光國，2003），故非合法婚姻關係的通報個案礙於社會的觀感，通常也就較不願意進入正式的服務系統。除了上述個人人口特徵因素之外，例如婚暴被害人擔心正式服務系統對他們會有歧視和批評，以及擔心施暴者會報復，也會阻礙他們使用正式服務系統（Gillis et al., 2006; Wolf et al., 2003）。其次，就服務輸送面向，婚姻暴力被害者多次或有具體的受虐事實證據，也就是被通報的次數較多，以及來自衛生單位的通報，亦較可能接受外在的協助（Wolf et al., 2003）。最後，在婚暴被害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之面向，Beaulaurier et al. (2007) 研究結果發現阻礙婦女受暴者求助的社會環境因素包括了家人的反應、神職人員的態度、司法系統與社區資源的回應性。尤其在社區資源的回應是一般人認為社區資源的幫助是沒有用的、社區資源很難用，或是誤傳社會服務資源是混亂的和支離破碎時，更會阻礙其使用正式服務系統之相關資源。

根據上述之相關文獻，影響婚暴被害人是否使用正式服務系統資源之因素主要有個人（含人口特徵與對正式服務系統的看法）、服務輸送、婚暴被害人所處的社會環境等三個面向。但由於本文的資料是使用既有的資料庫，而既有資料庫通報個案的相關資訊僅涵括了個人重要的人口特徵如性別、年齡、國籍等，以及服務輸送系統中的通報總次數、通報單位。故本文在探討影響婚暴力通報個案是否開案之因素時，也僅能以個人重要的人口特徵與服務輸送系統中的通報總次數、通報單位作為可能的預測變項。

然而，進入正式的公共服務系統後，婚姻暴力被害人能否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或改善生活品質，則又是個案服務輸送評估另一個重要議題。婚姻暴力被害

人男女皆有，但進入正式服務系統絕多數是女性，故相關的研究幾乎是以女性婚姻暴力被害人為研究對象。Wathen 和 MacMillan (2003) 就有系統的檢視 22 篇有關受暴婦女服務方案成效之研究報告，結果發現確實有合理的證據顯示，如果受暴婦女接受特定的服務方案之後，整體而言是有機會可以降低再次受暴的機率，或是改善其生活品質。只是，並非每個服務對象都可以達到同樣的結果。Riger et al. (2002) 的研究指出，接受諮商服務的受暴婦女，有 30% 表示接受服務後仍有暴力事件發生，但亦有 24% 表示在過去一年沒有暴力的發生。Bennett 和 O'brien (2007) 也曾經評估過同時接受戒癮中心與家庭暴力服務中心服務的受暴婦女之服務成效，結果有 26% 的受訪者表示服務結束後仍有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但亦有 19% 清楚的表示沒有任何家庭暴力事件再發生。所以，處遇服務並非是影響服務成效的唯一因素。

Sherman, Smith 和 Rogan (1992) 就曾指出，處遇服務能否減低暴力事件再發生之機率，還須端賴個案本身的婚姻狀態。在 Hovell et al. (2006) 的研究中，也就明確的指出除了服務項目的多寡之外，受暴婦女和施暴者是否為合法婚姻關係與處遇服務成效之間有密切的相關性，反而處遇服務時間的長短與服務成效之間沒有明確的關係。另外，在國內劉淑齡 (2002) 曾以 15 個已經結案的受暴婦女進行公部門社工處遇服務效益評估，研究結果發現不見得每一位受暴婦女對所獲得的每項服務感到滿意，尤其認為夫妻關係輔導無效，甚至有時反效果；15 個受訪對象在當初被通報與接受服務時，都是合法的配偶關係並且同住，但在接受訪問時（距離結案達三個月上未超過一年），維持婚姻且同住者有 6 位，婚姻持續但分居者有 2 位，離婚收場有 7 位。

由上述可知，可能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開案結案狀態的因素，除了個人重要的人口特徵與服務輸送系統中的通報總次數、通報單位之外，還有被害人與相對人的婚姻狀態，以及服務輸送系統中的處遇服務內容。在本文中，婚姻狀態是以合法婚姻或非合法婚姻、與相對人關係是同住關係或非同住關係來進行測量。

參、研究方法

本文主目的是在探討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是否開案，以及開案個案是否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之因素。本文資料是來自作者接受某一縣市政府委託的「婚姻暴力處遇服務成效評估研究」的一部份，即是此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2005 年的通報個案之相關服務資訊。使用既有官方資訊資料庫是屬非介入性研究，其優點是可以避免當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資料蒐集情境下會面時，可能產生對資料的干擾，但其限制是研究架構與問題必須配合既有資料庫之內容（Frankfort-Nachmias and Nachmias, 2001）。不過，若能清楚說明既有資料庫的內容與限制，以及使用方式，其資料仍有助於從事社會現象或行為的探究（Babbie, 2005）。因此，以下會清楚的說明「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的背景與內容、本文使用此資料的方式與面臨的限制。

一、 研究架構

根據相關文獻、研究目的，以及「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可提供的資料，本文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主要將從個人人口特徵、服務輸送兩個面向，來探討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是否開案及結案狀態之因素。在探究影響通報個案是否開案時，因為尚未有正式服務之提供，故在服務輸送變項僅含括通報總次數與單位；在探究影響結案狀態之因素時，是將結案狀態分成是否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結案、是否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結案兩組進行。故，本文研究問題有：

（一）瞭解研究樣本個人人口特徵。

（二）探究影響研究樣本（通報個案）是否開案之因素，以及其未開案之原因。

(三)瞭解研究樣本(通報且開案)之結案原因,以及探究影響是否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是否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之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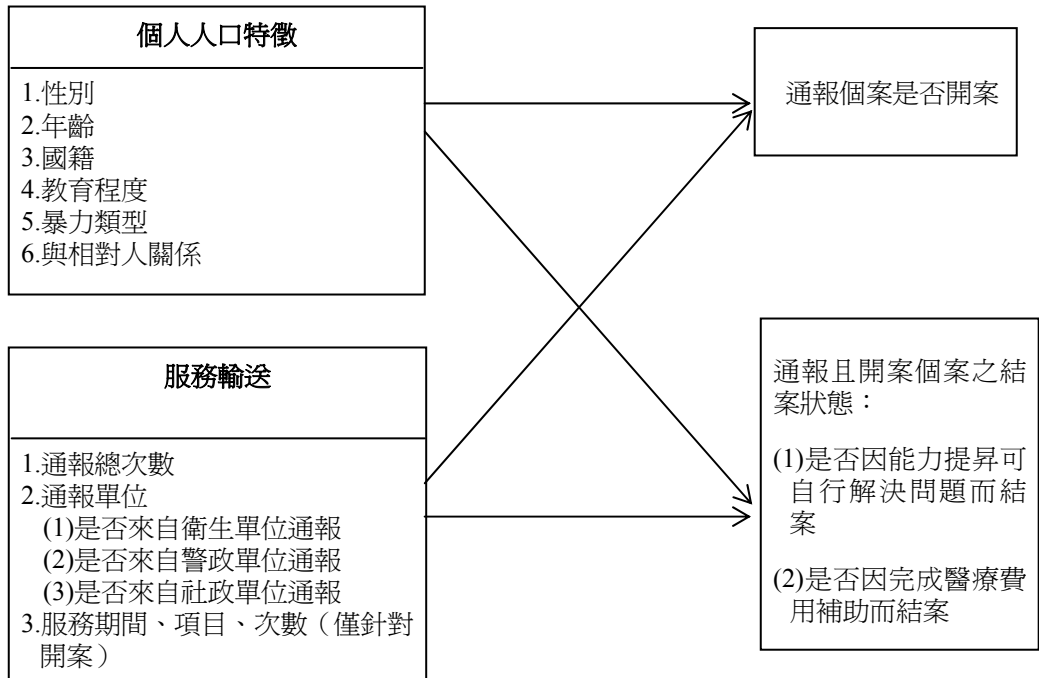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

二、 研究材料

本文的資料來源是某一縣市 2005 年「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系統資料庫」1100 個結案個案之相關服務資料。此資料庫是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為擴充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資料庫系統個案管理、統計分析功能,並整合兒童局兒童保護個案管理系統及臺北市、高雄縣之個案管理系統,於 2003 年下半年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資料庫系統功能擴充暨兒童保護個案管理系統整合專案」,並於 2004 年底完成。因此,2005 年開始要求各縣市政府家暴社工員上網在此資料庫登錄相關的服務訊息,以提昇資訊

系統完整性，達到個案管理的目的。此資訊資料庫除了登記通報個案重要基本資料與服務內容之外，還包括了通報個案未正式開案原因及通報個案結案狀態。因此，此資訊資料庫能夠適時的反映出各縣市政府家暴個案處遇服務之情形。

由於，委託作者進行研究的縣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2005 年的資訊系統資料庫具有一定程度之完整性，故以此年度的結案個案之服務資料為研究材料。另外，共同合作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為能謹慎服務每位通報個案，故在服務流程中通報但未開案者仍必須進行必要之連繫與行政程序上的結案工作。因此，為配合合作單位的系統作業，故結案個案亦包括通報但未開案、通報且開案者兩類。根據統計，2005 年結案個案為 1,100 人，其中通報但未開案 290 人、通報且開案 810 人。所以，探究影響是否開案之因素時，是以 1,100 人為研究樣本，在探究影響結案狀態因素時，是以 810 個正式開案之結案個案為研究樣本。

三、 資料整理與分析

「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的系統功能在統計上僅能做描述性的計算，無法做模型建構，因此研究工作人員將 1100 個結案個案之相關資料，一一重新登錄在紙本後，再將資料輸入電腦，並以 Statistics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12.0 版的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選擇了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邏輯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 (一) 研究樣本個人人口特徵之分析：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
- (二) 影響研究樣本(通報個案)是否開案之因素，以及其未開案原因之分析：邏輯迴歸、次數分配、百分比。
- (三) 研究樣本(通報且開案)結案原因，以及影響是否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

決問題、是否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因素之分析：次數分配、百分比、邏輯迴歸。

在上述的統計方法中，為能找到影響研究樣本是否開案，以及是否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是否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之重要變項，特別選用了邏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邏輯迴歸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適用條件最大差異在於效標變項性質的不同，邏輯迴歸分析的效標變項是以名義變項為主（吳明隆、涂金堂，2005）。本文中的三個效標變項，如是否開案、是否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是否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皆是名義變項，故選用邏輯迴歸進行分析。

然而，在進行邏輯迴歸分析時，預測變項必須為數值變項，因此須將名義變項轉化為虛擬變項。其中，性別男性轉換為 0、女性為 1；外國籍轉換為 0、本國籍為 1；教育程度 1 時，不識字、國小、國中轉換為 1，其他為 0；教育程度 2 時，高中職轉換為 1，其他為 0；暴力類型是非合法婚姻（離婚、同居關係）轉換為 0、合法婚姻暴力類型為 1；與相對人關係是非同住關係（配偶分居、離婚分居關係）轉換為 0，同住關係（配偶同住、同居、離婚同居關係）為 1；衛生單位通報為 1，不是為 0；警政單位通報為 1，不是為 0；社政單位通報為 1，不是為 0。

四、 研究倫理與研究限制

將「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的結案資料重新登錄在紙本時，因為研究工作人員非機構人員，會有資料保密的倫理發生，故簽署一份機構規範書，研究人員僅能在研究期間因研究需要，在機構內查閱 2005 年結案個案之「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系統資料庫」，並且必須確實遵守個案資料保密原則。另外，本文的研究材料是使用「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少保護資訊資料庫」，是屬既有資料庫，因此在探究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是

否開案，以及開案個案結案狀態之重要因素，可能的預測變項無法涵蓋研究樣本個人對正式服務系統的看法、所處的社會環境等重要概念，這是本文的限制。

肆、研究發現

一、研究樣本個人人口特徵

在 1100 個婚暴被害人研究樣本中女性有 1070 人（97.3%），而男性僅有 30 人（2.7%）；平均年齡為 38.92 歲，多數集中在 30-39 歲（401 人，37.2%），其次為 40-49 歲（305 人，28.3%）。國籍多數集中在本國非原住民（969 人，88.9%），其次是大陸（64 人，5.9%），再其次是東南亞地區的國家（34 人，3.2%）。在教育程度方面，被害人是以高中職為多數（435 人，48.2%），其次是專科大學暨以上（187 人，20.7%）、國中（160 人，17.8%）。所以，雖說中低教育程度為多數，但高教育程度者仍約占五分之一。至於相對人的教育程度扣除遺漏值 654 人之後，亦集中在高中職（177 人，39.7%），其次是專科大學暨以上（119 人，26.7%）、國中（86 人，9.3%）。同樣的，雖說相對人，也就是所謂的施暴者是以中低教育者為多數，但高教育程度所占的比例亦不低，可能四人中就有一人。至於，暴力類型是以有合法婚姻關係者居多數（991 人，90.1%），其次為同居關係者（60 人，5.5%）；與相對人關係是配偶同住關係占多數（905 人，83.1%），其次是配偶分居（76 人，7.0%）（詳見表 1）。

表 1 個人人口特徵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n=1100)

變 項	人數 (%)	變 項	人數 (%)	
性別		教育程度	被害人	相對人
男性	30(2.7)	不識字	15(1.7)	3(0.7)
女性	1070(97.3)	國小	106(11.8)	61(13.7)
年齡層		國中	160(17.8)	86(19.3)
未滿 20 歲	4(0.4)	高中職	435(48.2)	177(39.7)
20~29 歲	201(18.6)	專科、大學暨以上	187(20.7)	119(26.7)
30~39 歲	401(37.2)		(遺漏值 =197)	(遺漏值 =654)
40~49 歲	305(28.3)	暴力類型		
50~59 歲	132(12.2)	合法婚姻關係暴力	991(90.1)	
60 歲以上	35(3.2)	離婚暴力	49(4.5)	
(\bar{x} = 38.92 ; 遺漏值=22)		同居關係暴力	60(5.5)	
國籍		與相對人關係		
本國非原住民	969(88.9)	配偶同住關係	905(83.1)	
本國原住民	21(1.9)	配偶分居關係	76(7.0)	
大陸	64(5.9)	同居關係	57(5.2)	
東南亞(越南、菲律賓、	34(3.2)	離婚同居	16(1.5)	
印尼、柬埔寨、馬來西亞)		離婚分居	35(3.2)	
其他(美國、西班牙)	2(0.2)	(遺漏值=11)		
(遺漏值=10)				

二、 影響通報個案是否開案之因素（含未開案之原因）

爲能建立適配與完整的邏輯迴歸模型，找出重要的影響變項，先以個人人口特徵變項建構模型一，然後再加入服務輸送變項建構模型二。結果發現，模型二整體適配性佳 ($\chi^2=148.677^{***}$)，有效的預測變項有性別、暴力類型、通報總次數、是否來自衛生單位通報等四個變項，正確預測率 79.3%；勝算比 Odds Ratio 即 Exp (B) 分別爲 6.294、6.780、1.302、2.046，且迴歸係數 β 值

皆為正值，因此女性開案的機率是男性的 6.294 倍；合法婚姻關係暴力類型開案的機率是非合法婚姻暴力類型的 6.780 倍；通報總次數每增加 1 次，則開案的機率增加 1.302 倍；通報單位是來自衛生（含醫療）單位，其開案機率是沒有來自衛生通報單位者的 2.046 倍（詳見表 2）。因此，就個人人口特徵、服務輸送面向而言，女性、合法婚姻關係暴力類型、被通報次數愈多、是來自衛生單位通報者，其進入開案的機率較高。

就上述之研究發現，換個思考的角度，就是男性、非合法婚姻關係暴力類型、被通報次數愈少、非來自衛生單位通報者，是相對不願意進入正式服務系統。不願意或未開案之原因，有七成者是表示不需要中心協助，約有八成者表示自己有能力自行解決，當然亦有 8% 是聯絡不到案主而無法開案（詳見表 3）。

表 2 影響研究樣本「是」、「否」開案之邏輯迴歸分析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變項	β	Wald	Exp (B)	變項	β	Wald	Exp (B)
常數	-3.100	17.228***	.045	常數	-3.442	17.948***	.032
性別	1.960	15.485***	7.098	性別	1.840	12.100**	6.294
年齡	.017	3.637	1.017	年齡	.017	3.384	1.017
國籍	-.213	.417	.808	國籍	-.326	.898	.722
教育程度1	-.177	.529	.838	教育程度1	-.107	.180	.899
教育程度2	.018	.006	1.018	教育程度2	.054	.057	1.055
暴力類型	1.991	67.518	7.326	暴力類型	1.914	55.432***	6.780
與相對人關係	.172	.411	1.187	與相對人關係	-.032	.013	.968
				通報總次數	.264	7.452**	1.302
				衛生單位通報	.716	6.910**	2.046
				警政單位通報	-.447	3.080	.639
				社政單位通報	.103	.071	1.108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 通報個案未開案原因項目之次數分配表 (n=290; 複選)

變 項	人次 (%)	排序
案主表示無受暴事實發生	2(0.7)	
案主遠離受暴環境	17(5.9)	4
相對人遷離案主住所	3(1.0)	
案主表示有能力自行解決	140(48.3)	2
案主表示不需本中心協助	208(71.7)	1
社工員評估非家暴案	4(1.4)	
聯絡不到案主	23(7.9)	3
已與相對人和好	9(3.1)	
社工已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3(1.0)	
案主無求助意願	1(0.3)	
案主已離台回到自己國家	1(0.3)	
由其他縣市開案	15(5.2)	5
案主死亡	2(0.7)	

三、個案結案原因及影響結案狀態之因素

(一) 結案原因

810 個正式開案研究樣本的結案原因是以完成處遇服務排名第一 (790 人次, 97.5%); 其次則是案主表明可自行處理且經過評估無須中心協助 (203 人次, 25.1%); 再其次則是自開案日起 3 個月後無再受暴事實且案主表明無須中心介入 (101 人次, 12.5%)。另外, 亦有 52 人次 (6.4%) 是因與案主 (相對人) 失聯、有 43 人次 (5.3%) 案主遠離受暴環境、有 40 人次 (4.9%) 離婚無再受暴事實而結案。所以, 絕多數是因完成處遇服務, 或是因問題解決能力提昇而結案, 不過約有一成者是因為脫離受暴環境或離婚結案 (詳見表 4)。

由於, 在結案原因中又以完成處遇服務而結案的人次最多, 故進一步探究完成的處遇服務內涵, 結果發現以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的人次最多 (618 人

次，78.2%）、其次是法律諮詢（195 人次，24.7%）、再其次是保護令聲請（101 人次，12.8%）。因此，完成的處遇服務項目是以實物、工具性服務為主（詳見表 5）。

表 4 開案個案結案原因項目之次數分配表

(n=810; 複選)

變 項	人次(%)	排序
完成處遇服務	790(97.5)	1
自開案日 3 個月後無再受暴事實且案主表明無須中心介入	101(12.5)	3
案主表明可自行處理，經評估無須中心協助	203(25.1)	2
服務過程中案主的需求已非中心服務範圍，轉介其他社福機構	2(0.2)	
案主或相對人一方死亡	1(0.1)	
案主遷移至其他縣市(國家)已轉介至當地家暴中心	26(3.2)	
離婚無再受暴事實	40(4.9)	5
案主遠離受暴環境	43(5.3)	4
相對人遷離案主住所	10(1.2)	
與案主(相對人)失聯	52(6.4)	
其他(案主/相對人入獄.....等)	4(0.4)	

表 5 完成處遇服務項目之次數分配表

(n=790; 複選)

變 項	人次(%)	排序
緊急救援庇護及安置	32(4.1)	
法律諮詢	195(24.7)	2
心理諮商	13(1.7)	
保護令之聲請	101(12.8)	3
醫療服務	1(0.1)	
子女會面	2(0.3)	
就學輔導	3(0.4)	
職訓與就業輔導	19(2.4)	
參加團體方案	7(0.9)	
面談諮詢(需後續協助)	81(10.3)	4
緊急生活費用補助	9(1.1)	
醫療費用補助	618(78.2)	1
訴訟費用補助	7(0.9)	
陪同服務(驗傷、偵訊、出庭、就學、就醫、返家)	42(5.3)	5
協助申辦相關福利資源(低收入戶、身心障礙手冊、失業給付)	1(0.1)	
轉介服務(其他縣市、其他民間機構)	42(5.3)	5
相對人鑑定與處遇	22(2.8)	
目睹兒童團體或心理諮商	4(0.5)	

(二) 影響結案狀態之因素

積極性結案狀態——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完成處遇服務，是個案服務所期盼的目標，因此接下來探討影響此二項結案狀態之因素。本文將案主表明可自行處理且經評估無須中心協助、自開案日起 3 個月後無再受暴事實且案主表明無須中心介入二個結案原因，視為案主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而結案之狀態，故以此為「參考組」，進行邏輯模型建構。另外，因完成處遇服務的 790 人次中，又以完成醫療費用補助為多數，約七成八，故亦進一步以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者為「參考組」，進行邏輯模型建構。

1.影響研究樣本「是」、「否」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結案之因素

同樣的，先以個人人口特徵建構迴歸模型一，結果顯示整體模型適配性不良（ $\chi^2=8.068$ 未達顯著水準），因此進一步加入服務輸送面向預測變項建構模型二，結果顯示整體模型適配性佳（ $\chi^2=41.172^{**}$ ），有效的重要預測變項僅有服務項目數，且正確率 66.8%（詳見表 6）。服務項目數的 Exp (B) 為 1.603，並且迴歸係數 β 值為正值，所以當研究樣本所接受到的服務項目數每增加一項，則研究樣本結案時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之機率增加 1.603 倍。故，當研究樣本所接受的服務項目數愈多時，則結案時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之機率愈高。所以，正式服務系統所提供服務項目的多元性，是有助於研究樣本問題解決能力的提昇，而非服務時間的長短或是服務次數。

表6 影響研究樣本「是」、「否」因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之邏輯迴歸分析模型

變項	模型一			變項	模型二		
	β	Wald	Exp (B)		β	Wald	Exp (B)
常數	.339	.104	1.403	常數	-.133	.013	.876
性別	.056	.004	1.058	性別	-.217	.060	.805
年齡	-.011	1.444	.989	年齡	-.012	1.669	.988
國籍	-.142	.225	.867	國籍	-.106	.114	.899
教育程度1	.319	1.746	1.375	教育程度1	.255	1.035	1.290
教育程度2	-.069	.097	.933	教育程度2	-.156	.458	.856
暴力類型	-.226	.352	.798	暴力類型	-.013	.001	.987
與相對人關係	-.455	2.391	.635	與相對人關係	-.171	.296	.843
				通報總次數	-.008	.013	.992
				衛生單位通報	-.420	2.060	.657
				警政單位通報	.012	.003	1.012
				社政單位通報	.225	.397	1.252
				服務期間	.016	2.057	1.017
				服務項目數	.472	8.989***	1.603
				服務次數	-.093	1.169	.91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影響研究樣本「是」、「否」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結案之因素

爲能建立較適配與完整的邏輯迴歸模型，仍先以個人人口特徵建構模型一，進一步加入服務輸送變項建構模型二。研究結果顯示，模型二的整體是配性佳 ($\chi^2=632.677^{***}$)，有效預測變項有性別、暴力類型、與相對人關係、通報總次數、來自衛生單位通報、服務項目數等 6 個，正確預測率高達 94.1%。模型中的 6 個有效預測變項 Exp (B) 分別爲 74.440、42.255、4.745、0.778、13.538、0.002，其中除了通報總次數、服務項目數的迴歸係數 β 值是呈現負向作用之外，其餘四個皆爲正值（詳見表 7）。因此，女性較男性可能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服務結案的機率爲 74.440 倍；屬於合法婚姻關係暴力類型者是非合法婚姻關係者的 42.255 倍；與相對人是同住關係者是非同住者的 4.745；來自衛生單位通報者是非衛生單位通報者的 13.538 倍。但是，如果通報次數每減少一次，則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服務結案的機率則提高 1.285 倍 ($1/0.778=1.285$)；而服務項目數每減少一項，則提高 500 倍 ($1/0.002=500$)。所以，基本上研究樣本是女性、屬合法婚姻關係暴力類型、與相對人是同住關係者、來自衛生單位通報者也可能因完成醫療補助服務而結案之機率較高。不過，被通報次數增加時，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的機率則降低，並且服務項目數增加一項則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之可能性降低許多。看來，當研究樣本有較多的受暴經驗、有較多元的服務需求時，是不會只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結案。

表 7 影響研究樣本「是」、「否」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結案之邏輯迴歸分析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變項	β	Wald	Exp (B)	變項	β	Wald	Exp (B)
常數	-6.884	22.389***	.001	常數	-2.550	1.271	.078
性別	2.355	4.569*	10.541	性別	4.310	11.395**	74.440
年齡	.004	.170	1.004	年齡	.007	.115	1.007
國籍	.370	1.523	1.448	國籍	-.904	1.140	.405
教育程度1	-.048	.038	.954	教育程度1	.938	3.307	2.554
教育程度2	.129	.332	1.138	教育程度2	.866	3.645	2.378
暴力類型	3.172	18.248**	23.866	暴力類型	3.744	16.605***	42.255
與相對人關係	1.531	20.661**	4.624	與相對人關係	1.557	7.565**	4.745
				通報總次數	-.251	5.043*	.778
				衛生單位通報	2.605	22.095***	13.538
				警政單位通報	-.290	.346	.748
				社政單位通報	-.326	.171	.722
				服務期間	-.001	.083	.999
				服務項目數	-6.153	52.187***	.002
				服務次數	.210	.222	1.234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是否開案與結案狀態之重要因素，做為提昇服務效能之參考。以下說明與討論幾點重要發現，並提出建議。

一、結論與討論

(一) 影響通報個案是否開案之因素（含未開案之原因）

研究結果發現，性別、暴力類型、通報總次數、是否來自衛生單位通報是

影響婚姻暴力通報個案是否正式開案的重要影響因素。其中，以暴力類型的影響倍數較高，合法婚姻關係暴力類型是非合法者的 6.780 倍；其次女性是男性的 6.294 倍，來自衛生單位通報是非衛生通報者的 2.046 倍，並且通報次數每增加一次開案的機會則增加 1.302 倍。此研究結果與徐光國（2003）、潘淑滿（2007）、Wolf et al.（2003）等人的觀點或是研究結果相吻合，即是具有合法婚姻關係者、女性、有多次受虐事實或是有具體外傷者使用正式服務系統資源的可能性較高。也因此，是非合法婚姻關係、男性、初次或是沒有具體外傷者，是較不傾向使用正式服務系統資源；至於不使用的原因，研究結果發現主要是婚姻暴力被害人認為不需要中心協助或是表示自己有能力自行解決。此結果與周月清（1994）、黃一秀（2000）、Mills（2001）及 Goodman et al.（2003）等人的研究論點相似，即是婚姻暴力被害人在暴力初期通常是求助於非正式的支持系統或是先使用自己慣用的解決方式來面對暴力；除非是受到嚴重的身體與精神虐待，或是本身慣用的方式無法有效解決時，才會願意進入正式的服務系統。不過，也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發現婚姻暴力被害人的年齡、國籍、教育程度不是影響其是否開案的顯著因素，與 Beaulaurier et al.（2007）、潘淑滿（2007）、Kalmuss 和 Strans（1990）的研究結果或觀察不盡相同，也就是說不論年齡多寡、是否為本國國籍、教育程度高低，在本研究中不足以影響其進入正式服務系統的意願或是動機。此結果也打破了婚姻暴力正式服務系統中對婚姻暴力被害人存在的某些迷思，例如年齡較年輕者較願意求助於正式服務系統；本國婦女較非本國籍者較傾向求助於正式服務系統；教育程度較高者亦傾向使用正式資源。

另外，上述的研究結果同時意涵著幾個值得討論的議題。首先，是對婚姻關係主觀性的認定。根據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條第一、二款之規定，婚姻暴力所範定的對象包括了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者，所以非合法婚姻關係者，因有共同生活之事實故涵括在內。不過，因在目前的主流婚姻價值主導下，同居者的親密關係仍受到質疑與批判，其心理上難免有名不正、言不順的感覺（徐光國，2003）。因此，當暴力發生要進入正式服務系統時，同

居者雙方，尤其是女性，受到社會規範的影響，在主觀認知上難免會抗拒承認與施暴者是屬於廣泛的婚姻關係，或者擔心工作人員以社會道德規範來評斷他們，故通常不傾向開案。但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Frias 和 Angel（2005）、Brownridge 和 Halli（2002）指出，同居者是較已婚者更容易陷入危險性的暴力情境中。所以，同居者對於婚姻關係主觀性認定與法令範定之落差，會阻礙其使用相關之福利服務，並容易與社會產生疏離，因而可能造成婚姻暴力防治的死角。

第二，是婚姻暴力的性別社會建構與期待。社會政策的背後通常皆隱含某種程度的性別價值意識形態，我國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尤其明顯，因為其訂定與保障婦女的人身安全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在執行此法令的相關服務輸送多數是以女性的生活經驗與需求為基礎，提供女性被害人相關的緊急庇護與支持服務。再加上在男強女弱的社會期待，以及男人的面子文化作祟下，使得男性更不願意對外尋求協助，特別是正式的服務系統（潘淑滿，2007）。本研究結果證實了此論點，因為男性正式開案的機率僅是女性的 15.89%。此結果就如同許雅惠（2001）所言，我國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確實是處在「性別化」與「去性別化」之間擺盪的矛盾狀態。因為，就女性目前在社會環境中所擁有的資源整體較男性少，並且婚姻被害人以女性為絕大多數，婚姻暴力防治工作女性性別化是合理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男性被害人，以及當男性被害人出現而以女性為主體的服務輸送無法提供適當的服務時，就顯露出婚姻暴力防治工作事實上是存在某種性別歧視。Atkinson, Greenstein 和 Lang（2005）曾提醒，婚姻暴力雖是建立在一個性別不平等的架構下，但性別是一個變項而非常數，故應注意性別角色的變動，否則將難以跳出既定的性別角色思維，而又陷入另一種性別不平等的架構。雖然，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於檢討防治業務時，也曾提出政府應該積極推動「去性別化」的福利設計，使被害人不論性別均能獲得適切發展（內政部，2000；簡慧娟，2001）。不過，因為目前兩性不平等仍然存在，且婚姻暴力被害人是以女性為主的情況下，婚姻暴力防治工作若是去性別化是否合宜？還是應該提高性別敏感度？值得進一步思考。因為，個體

本身的性別存在著實質的意義與需求。

第三，則是對婚姻暴力行為的感受性。雖然，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條第一、二款所範定的暴力行為，包括了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以及騷擾（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們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即是有身體傷害、精神虐待或恐嚇威脅。不過，本研究結果發現來自衛生單位通報者，也就是有具體性的身體傷害者開案機率較高。可見，婚姻暴力通報個案對暴力行為的感受性偏向身體傷害，要有身體受傷的事實，才較願意承認或接受遭受虐待，而較願意進入正式的服務系統。此結果突顯一個現象，即是婚暴被害人還是很難跳脫「身體傷害」為主的婚姻暴力思考，而忽略其他形態的暴力存在與影響。然而，根據黃志中（2007）長期在醫療場域的觀察，強調以身體虐待的婚暴認知，反而容易被精巧的轉化為一種符合父權意識形態的定義，不僅會誤導社會反婚姻暴力的方向，更會使受虐婦女身陷父權精密架構下的束縛，因為許多施虐者的暴力方式會轉換為，使用不會造成明顯傷痕而驗不出傷的毆打暴力方式或是精神虐待。另外，Gordon（2000）的研究結果指出，因為婚姻暴力的當事人之間往往還有情感的繫屬關係，因此除了會發生肢體上的暴力攻擊之外，常會合併發生性虐待與精神虐待。所以，如何突破以身體傷害為主的婚姻暴力感受與認知，是婚姻暴力防治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

第四，則是對婚姻暴力問題解決的方式。本研究結果發現，隨著被通報次數的增加，婚暴被害人開案機率才會隨之增加。換言之，初次被通報者是較不願意接受正式機構的服務，而是自己想辦法解決、求助非正式支持的協助；等到受暴次數逐漸增加，才會較願意與正式機構有所接觸。此結果除了證實婚姻暴力具有循環現象、持續性與重複發生之特質外，同時也顯現出婚暴被害人面對婚姻暴力問題的方式一開始是傾向私了化。會有此現象，主要是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多數還有著情感關係，並且被害人對於加害人仍有寄望（陳蕙婷，1997；黃翠紋，2004；黃志中，2007），因此總是希望問題能夠私了化，不願意不相干的外人介入，以免破壞與加害人關係，將來無法復合。所以，為能在

「避免暴力傷害」與「情感關係的維持」之間取得平衡，婚暴被害人是不希望政府的執法進入家門，除非真的是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脅或是決定要離開加害人，而這也是婚姻暴力與其他暴力行為最大的差異。既然了解具親密關係的婚姻暴力是蘊藏著矛盾情緒與情感，那麼對於婚姻暴力的防治工作不應該與其他暴力類型一樣，把加害人抓起來或是將他們隔離之法律單面向的思考，也就是為停止暴力一定要終止親密關係，而是應有另一面向的思考，即是婚姻暴力防治工作重要核心在強化婚暴被害人本身的面對暴力問題能量，以及其非正式支持網絡的能量，並且強調的是親密關係的經營而只是暴力問題的解決，來縮短婚姻暴力防治工作與婚暴被害人需求之間的距離。

（二）個案結案原因與影響結案狀態之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婚暴被害人正式進入家庭暴力服務系統後結案原因或狀態，是以完成處遇服務所佔的比例最高（790 人次，97.5%）；其次則是案主表明可自行處理且經過評估無須中心協助（203 人次，25.1%）；再其次則是自開案日起 3 個月後無再受暴事實且案主表明無須中心介入（101 人次，12.5%）。此結果與 Riger et al.（2002）針對美國伊利諾州尋求家庭暴力服務的受暴婦女所做的服務評估相較之下，再度受暴力是較低（12.5% < 24%），不過絕多數是因以完成處遇服務而結案，是處於正向之狀態。只是進一步探究完成的處遇服務內涵時發現，以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的人次最多，約八成。會有此結果當然與多數的通報個案是來自衛生單位（含醫療院所）有關，這也表示進入正式服務體系者多數是有就醫行為。

然而，根據黃志中（2007）的研究指出，受虐婦女就醫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治療身體的病痛，另一則是為驗傷。前者表示受虐婦女是受到較嚴重的身體傷害，後者表示受虐婦女可能有離婚的意念，在進行受暴證據收集。所以，相較於沒有就醫行為的婚暴被害人，有就醫者通常是受到較嚴重的傷害，或者是婚暴行為所帶來的傷害已有一段時間但似乎無法扭轉，故著手進行結束關係的準備，相對的潛藏危險性較高。只是，後來多數仍選擇完成醫療費用補助就

結案。此結果基本上透露出兩個重要的訊息，一是呼應婚暴被害人對暴力感受是以「身體傷害」為主；二是婚暴被害人處理暴力的態度是傾向「醫療化」，試圖減輕婚暴此反社會規範行為所引發的情緒與情感傷害。所以，在服務輸送的過程中，面對只有醫療費用補助之需求者，服務提供者應該與他們有更多的互動、對話，使其有足夠的機會了解婚暴行為的本質與被自己本身所隱藏或壓抑的需求。另外，檢視目前婚姻暴力服務輸送系統中的相關服務，可發現多數服務設計之基礎是以婚暴被害人離開加害人為出發，如緊急救援庇護及安置；訴訟、庇護、住宅等生活經濟扶助；子女會面與就學輔導（潘淑滿，2007）。僅有少數服務設計之出發點是較無價值判斷，其中又以醫療費用補助的程序最為簡便與資格門檻最低。在此情況下婚暴被害人為了避免婚姻角色或生活型態的改變，也就選擇了最沒有價值判斷的服務項目。但也因此，整個服務的提供出現傾向「社會救助化」之現象（許雅惠，2001），使得婚姻暴力的實質內涵被忽略，影響婚姻暴力防治之工作效益。面對此現象，實有必要重新檢視婚暴被害人的需求，重新調整服務項目，提高服務與需求之間的適切性。

雖然，在本研究中多數的婚暴被害人開案個案是以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處遇服務而結案，不過也有近四成的人次是因案主表明可自行處理且經過評估無須中心協助或是自開案日起 3 個月後無再受暴事實且案主表明無須中心介入，在本文中是界定為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之結案狀態。透過邏輯迴歸分析發現，僅有服務項目數是關鍵因素，且服務項目數每增加一項，機率則提高 1.603 倍，但服務期間長短、總次數卻不是關鍵因素。此研究結果與 Hovell et al. (2006) 的研究發現相似，即是多元服務項目組成的處遇模式服務效能是優於單一服務項目，以及處遇服務時間長短與暴力事件再發生率沒有顯著性的意義。另外，雖然 Sherman et al. (1992) 指出處遇服務之效能、或是能否減少暴力事件的再發生率與其身的婚姻狀態有密切關係，不過本研究結果發現個案的暴力類型（合法婚姻或非合法婚姻）、與相對人關係（同住關係或非同住關係）與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之結案狀態並沒有密切關係。可見，婚暴被害人婚姻狀態是否會顯著的影響其解決問題能力或無再受暴事實之處遇服務效能是

需要進一步的探討。然而，可確定的是服務項目數多寡，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可見，婚姻暴力被害人若要能增強其問題解決能力或是避免再受暴，確實是需要外部支持系統給予多元的協助。此結果也反映出婚暴被害人在生活中是面臨多元的需求。因此，積極的開發與設計符合需求的多元化服務項目，以及協助婚姻暴力個案看到本身的需求並鼓勵其使用相關服務，是有助於婚姻暴力防治之工作效益。

既然，使用多元的服務項目，有助於婚暴被害人增強本身的問題解決能力或是避免受暴情形再發生，可是多數為何只選擇醫療費用補助這項服務。從個人人口特徵與服務輸送面向出發，透過邏輯迴歸分析發現，性別、暴力類型、與相對人關係、通報總次數、是否來自衛生單位通報、服務項目數是影響開案個案是否只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之重要因素。其中，以服務項目數的影響倍數最高，當服務項目數每減少一項，則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而結案的機率有 500 倍；其次，女性是男性的 74.440 倍，合法婚姻關係者是非合法者的 42.255 倍，來自衛生單位通報者是非衛生單位通報的 13.538 倍，並與相對人的關係是同住者為非同住者的 4.745 倍。所以，基本上女性、合法婚姻關係暴力類型、與相對人是同住者，並且有明確的身體傷害事實時，個案是傾向只需要一項醫療費用補助服務，並且完成補助後就表示可結案。

雖然，前面的研究結果指出婚暴被害人婚姻狀態（合法婚姻或非合法婚姻、與相對人關係是否同住關係）與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之結案狀態並沒有密切關係；可是卻與是否只完成醫療費用補助之結案狀態有密切關係，尤其是與相對人處於合法的婚姻關係者是比處於非合法者更傾向只使用醫療費用補助此服務項目就來結案。此結果如同潘淑滿（2007）、Zink et al.（2003）的論點，婚暴被害人除非生命已受到嚴重威脅，否則多數仍舊是希望留在施暴者身邊，維持既有的夫妻關係，所以「被打就離開」的想法是不符合女性自身關係的生命經驗（黃志中，2007）。也因此完成醫療費用補助，拿到醫院的診斷證明書之後，通常也就不希望正式服務機構的介入。然而，會有此現象的產生，也當然可能與目前婚姻暴力防治制度的設計是傾向以離開親密暴力關係有

關。所以，對於選擇留在親密暴力身邊者，工作人員除了告知日常生活安全計畫準備之外，通常沒有什麼服務可以提供（黃志中，2007；潘淑滿，2007）。此外，也有可能是對於婚暴被害人的需求評估與處遇計畫，幾乎是建立在社會工作人員的個人判斷而非理論的架構思維；再加上內外部資源條件限制，導致許多的服務計畫幾乎清一色都是口頭性的徵詢，不是依據需求評估提出建議，而無法提供具個別化的適切服務（潘淑滿，2003）。因此，為能提昇婚姻暴力防治之工作效益，除了要改善個案工作之模式之外，整體的服務系統設計確實應該破除單一的思考邏輯——被害人選擇離開施暴者的假設（Zink et al., 2003）。Whitaker et al.（2007）也曾指出服務方案背後所依據僅是單一的邏輯思考與哲理，是無法對不同生活型態、不同文化的家庭產生幫助。故，服務輸送設計者與提供者應以多元的觀點，來瞭解婚姻暴力雙方的需求與期待。

最後，依據上述之重要研究結果，整理繪成圖 2，可清楚得知性別、暴力類型、通報總次數、是否來自衛生單位通報是影響通報個案是否開案之影響因素；服務項目數是影響是否因能力提升可自行解決問題結案之因素；性別、暴力類型、與相對人關係、通報總次數、是否來自衛生單位通報、服務項目數等 6 個影響是否因完成醫療費用補助結案之因素，期待此研究結果可作為實務場域服務輸送提昇婚姻暴力防治成效之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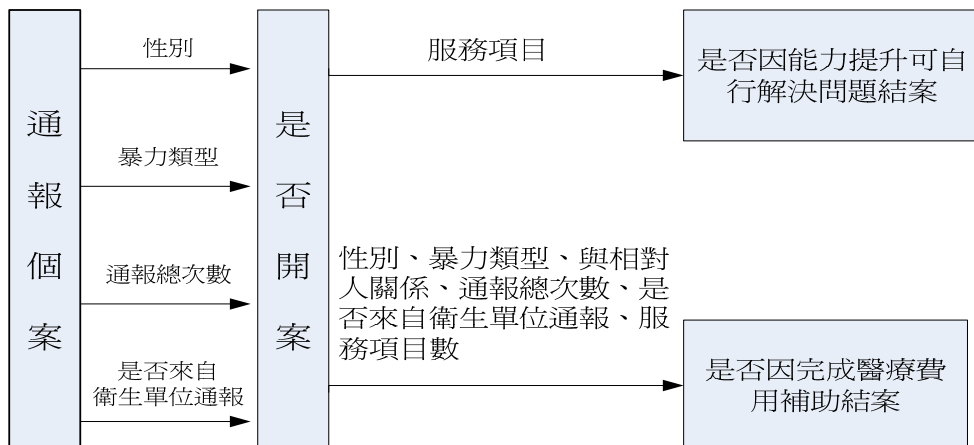


圖2 影響開案與結案狀態之重要因素

二、建議

（一）積極加強宣導家暴防治體系所涵蓋的服務對象，並且排除服務系統中對同居關係可能存在的歧視。研究結果發現，非合法婚姻關係暴力類型者願意開案的機率相較於合法者是偏低，此現象之產生與現階段社會對同居關係者仍不認同有關之外，也可能是因同居者本身對自身的親密關係之認定是非法令保護的範圍。因此，相關的宣導應加強對家庭暴力中婚姻關係對象的認定，並且檢視與排除存在服務系統中可能的歧視、偏見，包括工作人員的語言、態度、相關服務項目申請資格，使有需要者願意接近服務系統。

（二）提高婚暴服務系統對性別的敏感度，兼顧兩性不同的需求。研究結果發現，男性正式開案的機率相較於女性是偏低，原因除了與社會的性別角色、男性擁有較多的資源和權力有關之外，某個程度與婚姻暴力服務設計以女性為主軸相關。因此，建議婚姻暴力服務系統之設計，必須注意性別是變項而非常數，反映出性別存在的實質意義與需求；並且工作人員應具高度的性別敏感度，先看到婚姻暴力被害人的需求而不是性別，勿讓民眾誤解婚姻暴力服務體系是女性被害人之專利，降低服務系統的性別障礙。

（三）突破以身體傷害為主的婚姻暴力感受與認知，提高國人對婚姻暴力本質的認識與瞭解。研究結果發現，有具體身體傷害之事實、或是有多次被通報的婚暴被害人，正式開案的機率較高，此結果反應出婚暴被害人對於婚暴的感受是偏向身體傷害，因而容易忽略婚暴的本質；也因此本研究結果也發現多數開案者是僅以完成醫療補助費用就結案，面對婚暴的態度是傾向醫療化，而非親密關係的經營、家庭動力的調整。因此，建議透過適當的社會教育推廣，提高國人對婚姻暴力的認識與瞭解，使婚姻暴力防治工作能有較具全面性、積極性。

（四）增加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社區模式之服務輸送，拉近婚暴被害人與服務系統之間的距離。由於婚姻暴力是蘊藏著矛盾情緒與情感，婚暴被害人通常希望在「避免暴力傷害」與「情感關係的維持」之間取得平衡，在暴力問題發生初期，解決方式是傾向循非正式支持系統或是以自己慣有的模式，因此研究結果發現隨著通報次數的增加，婚暴被害人開案機率才會增加，也因此容易陷入暴力循環及造成嚴重傷害的發生。故，建議增加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社區模式之服務輸送，例如結合民間社區型的相關服務團體，舉辦相關的服務活動，一方面可藉此強化婚暴被害人本身的面對暴力問題能量，以及在此過程中結交更多的朋友，增強其非正式支持網絡的能量，另一方面可減低婚暴被害人在心理尚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必須面對法律裁定色彩濃厚的政府家庭暴力防治系統之焦慮，拉近婚暴被害人與服務系統之間的距離。

（五）增加服務輸送的多元觀點，使服務更貼近婚姻暴力雙方的生活與需求。研究結果發現，隨著服務項目數增加，婚姻暴力個案能力提昇可自行解決問題而結案之機率增加；另外，在目前以脫離婚姻暴力關係為主的服務系統中，婚姻暴力通報開案個案多數傾向完成醫療費用補助就結案。因此，應增加服務方案背後多元的邏輯思考與哲學，設計符合不同生活型態、不同婚姻關係和期待的工作模式與服務項目，貼近與服務對象的生活與思維，如此才有可能提昇服務對象問題解決能力。另外，在個案工作過程中，社會工作者應該以理論的架構思維，提出需求評估建議，並且社會工作者與個案接觸時要告知專業服務的整體內容，以及各項服務對被害人之幫助內涵及作用，增加被害人使用醫療費用補助以外相關服務之比例。

（六）對未來研究之建議。由於，本文是以既有的服務紀錄為研究材料，因此研究架構未能涵蓋個人、服務輸送、社會環境三個面向中所有的可能變項，尤其是社會環境面向；服務紀錄的填寫品質，如被害人、相對人教育程度遺漏值偏高，皆影響研究結果。另外，本文是以某一縣市的婚姻暴力的通報個

案為樣本，使研究結果外在效度受限，無法全盤推論至其他縣市。故，建議未來相關研究能在充裕經費的支持下，進行直接資料的收集，並考量不同面向的可能影響因素，對婚姻暴力通報個案開案與結案情況能有全面的瞭解；以及增加參與研究的縣市數與區域，以提昇研究的外在效度。

參考文獻

- 內政部（2000）。《家庭暴力防治法實務研討會施政報告資料》。台北。
-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10）。《97 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類型統計》。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頁網址：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檢索日期：2012 年 01 月 05 日。
- 王麗容、陳芬苓（2003）。《台灣地區婚姻暴力問題之調查研究》。台北：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 司法院統計年報（2007）。《地方法院終結離婚事件離婚原因一按年別分》。司法院網頁：<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檢索日期：2009 年 5 月 1 日。
- 吳明隆、涂金堂（2005）。《SPSS 與統計應用分析》。台北：五南。
- 李碧琪（2003）。《南投縣婚暴受虐婦女對保護服務的需求、需求獲得協助情形與滿意度之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周月清（1994）。〈受虐婦女與社會支持探討之研究〉。《婦女與兩性學刊》，5，69-93。
- 周月清（1995）。《婚姻暴力—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置》。台北：巨流。
- 侯玟里（2001）。《受虐婦女之生命威脅狀況、創傷後反應與身心症狀之相關》。高雄：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柯麗評、王佩玲、張錦麗（2005）。《家庭暴力理論政策與實務》。台北：巨流。
- 徐光國（2003）。《婚姻與家庭》。台北：揚智。
- 祝健芳（2002）。《婚姻暴力防治網絡中地方政府社工人員角色之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莫藜藜（1999）。《全民健保與醫院社會工作》。台北：雙葉。

- 莫藜藜、黃韻如（2003）。〈社會個案工作的過程〉。載於編者許臨高，《社會個案工作》，頁 37-111。台北：五南。
- 許采臻（2006）。《婚姻暴力求助婦女重回受暴循環與求助經驗之研究》。桃園：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雅惠（2001）。〈家庭暴力防治—性別化的政策分析〉。《社區發展季刊》，94，277-288。
- 陳蕙婷（1997）。《婚姻暴力中受虐婦女對脫離受虐關係的因應行為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華源、胡慧嫻、李仰慈、郭世豐合著（2006）。《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論》。台北：洪葉。
- 游美貴（2010）台北市婚姻暴力被害人垂直整合服務方案實施之研究。《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2，53-108。
- 黃一秀（2000）。《婚姻暴力之受虐婦女求助歷程之探討》。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黃志中（2007）。《婚姻暴力—醫療社群現象之探討》。台北：合記。
- 黃淑玲、林方皓、吳佩玲（2001）。〈都市原住民婚暴狀況及社工處預初探——以台北市某社區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15，113-157。
- 黃維憲、曾華源、王慧君（1985）。《社會個案工作》。台北：五南。
- 黃翠紋（2004）。〈婚姻暴力嚴重性影響因素之研究〉。《犯罪學期刊》，7（1），127-154。
- 劉淑齡（2002）。《公部門婦女保護服務社工之協助效益-從受暴婦女角度探討》。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潘淑滿（2003）。〈婚姻暴力的發展路徑與模式：台灣與美國的比較〉。《社區發展季刊》，101，276-292。
- 潘淑滿（2007）。《親密暴力-多重身分與權力流動》。台北：心理。
- 謝秀芬（2006）。《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技巧》。台北：雙葉。
- 簡慧娟（2001）。〈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以來的執行困境與展望〉，發表於「婦

- 女、兒童與家庭保護福利輸送研討會」。台北：中華民國社會政策學會。
- Anderson, M. A., Gillig, P. M. Sitaker, M., McCloskey, K., Malloy, K. & Grigsby, N. (2003). Why doesn't she just leave: a descriptive study of victim reported impediments to her safety.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8(3), 151-156.
- Atkinson, M. P., Greenstein, N. T., & Lang, M. M. (2005). For women, breadwinning can be dangerous: Gendered resource theory and wife abus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 1137-1148.
- Babbie, E. (原著)，陳文俊 (譯) (2005)。《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雙葉。
- Barnett, O., Miller-Perrin, C. L., & Perrin, R. D. (2005). *Family violence: Across the lifespan*. USA: Sage.
- Beaulaurier R. L., Seff, L. R., Newman, F. L. & Dunlop, B. (2007). External barriers to help seeking for older women who experienc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2, 747-755.
- Bennett, L. & O'Brien, P. (2007). Effects of coordinated services for drug-abusing women who are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3 (4), 395-411.
- Bowker, L. H. (1984). Coping with abuse: Personal and social networks. In Roberts, Albert R. (Ed.). *Battered women and their family: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treatment programs*. NY: St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Brownridge, D.A., & Halli, S. S. (2002). Understanding mal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cohabiting and married wome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ith a synthesized model.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7, 341-361.
- Ford, D. A. (1991). Prosecution as a power source: a note on empowering women in violent conjugal relationship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25, 313-334.
- Frankfort-Nachmias, C. & Nachmias, D. (原著)，潘明宏、陳志瑋 (合譯) (2001)。《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韋伯。
- Frias, S. M. & Angel, R. J. (2005). The risk of partner violence among low-income hispanic subgroup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7, 552-564.
- Gills, J.R., Diamond, S., Jebely, P., Orekhovsky, V., Ostovich, E.M., MacIsaac, K., Sagrati, S., & Mandell, D. (2006). Systemic obstacles to battered women's

- judicial system: When will the status quo chang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2(12), 1150-1168.
- Golding, J. (1999).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 a risk factor for mental disorder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4, 99-132.
- Goodman, L. M., Dutton, M. A., Weinhurt, K., & Cook, S. L. (2003). Th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trategies index: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9(2),163-186.
- Gordon, M. (2000). Definitional issues i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illance and research from a violence research perspectiv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6(7), 747-783.
- Hovell, M. F., Seid, A. G., & Liles, S. (2006). Evaluation of a police and social services domestic violence program: Empirical evidence needed to inform public health polici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2 (2),137-159.
- Kalmuss, D. & Straus, M. (1990). Wife's marital dependency and wife abuse. In M. Straus and R. Gelles (Eds.), *Physical violence in American families: Risk factors and adaptations to violence in 8,145 families* (pp. 369-379).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Laycock, G. (2001). Hypothesis-based research: The repeat victimization story. *Criminal Justice*, 1, 59-82.
- Lee, J., Pomeroy, E. C., & Bohman, T. M. (2007).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a sample of asian and caucasian women: The rol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2, 709-720.
- Menjivar, C., & Salcido, O. (2002). Immigrant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 Common experien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Gender & Society*, 16, 898-920.
- Mills, S. A. (2001).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Jamaica : a descriptive study of women who access the services of the women's crisis center in Kingsto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7(11),1284-1302.
- Monahan, K, & O'Leavy, K. D. (1999). Head injury and battered women: an initial inquiry. *Health and Social Work*, 24(4), 269-278
- Newman, K.D. (1993). Giving up : Shelter experiences of battered women. *Public*

- Health Nursing*, 10(2), 108-113.
- Riger, S., Bennett, L., Wasco, S., Schewe, P., Frohmann, L., & Camacho, H. (2002). *Evaluation of services for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herman, L., Smith, S., & Rogan, D.P. (1992). Crime, punishment, and stake in conformity: Legal and informal control of domestic viol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680-690.
- Tiefenthaler, J., Farmer, A., & Sambira, A. (2005). Service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unty-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 565-578.
- Tjaden, P., & Thoennes, N. (2000). *Extent,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trieved January, 2008, from <http://www.ncjrs.org/pdffiles/a/nij/181867.pdf>.
- Wathen, C. N., & MacMillan, H. L. (2003). Interventions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cientific review.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9(5), 589-600.
- Whitaker, D. J., Baker, C. K., Pratt, C., Reed, E., Suri, S., Pavlos, C., Nagy, B. J., & Silverman, J. (2007). A network model for providing culturally competent service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3 (2), 190-209.
- Wisner C.L., Gilmer, T.P., Saltzman, L.E., & Zink, T.M. (1999).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o victims cost health plans mor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48, 439-443.
- Wolf, M.E., Ly, U., Hobart, M.A., & Kernic, M.A. (2003). Barriers to seeking police help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8, 121-129.
- Zink, T., Regan, S., Jacobson, C., & Pabst, S. (2003). Cohort, period, and aging effect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older women's reasons for remaining in abusive relationship. *Violence Against Women*, 9 (12), 1429-1441.
- Zlotnick, C., Kohn, R., Peterson, J., & Pearlstein, T. (1998). Partner physical

victimization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American families: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gender.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3(1), 156-166.

研究論文

社會排除觀點在原住民相對弱勢處境分析上的侷限性^{*}

劉鶴群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侯念祖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陳芝瑜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

收稿日期：2011 年 10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2 年 1 月 18 日。

^{*} 通訊作者：劉鶴群，H.Liou@asia.edu.tw，0932106921，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413 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 500 號。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修改意見。本研究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臺灣貧窮與社會排除測量指標之發展歷程研究」補助，計畫編號 98-2410-H-468-020，一併致謝。

中文摘要

本研究欲檢視社會排除的論述，是否足以用於分析原住民族之弱勢處境。傳統的社會排除概念所指涉的是個人在經濟及非經濟面遭受剝奪的過程，強調多面向及動態之特質，常用來衡量公民在多元社會生活面向上的差距。此概念對於反映臺灣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長期存在福利落差的境況，應具有高度之政策價值。然本研究發現社會排除概念分析的是個人層面的生活面向，在此架構之下，每個人都被視為是同質性高的公民。用同一的社會排除標準予以檢視，看不到集體經驗亦可能是個人的生活品質的重要構成要件。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資料顯示，原住民族集體的語言、文化及生活方式是否被主流社會認同與接納，對原住民的生活品質有深遠的意義。另外在生活品質的具體面向上，居住在原鄉的原住民最優先關注的不是如所得、就業、人際互動、社會參與、教育、健康等個人或家戶層次的議題，他們更重視自然災害及交通對生活的影響。因此在衡量原住民族社會排除或生活品質時，應通盤考量原住民族之集體及特殊需求。

關鍵字：社會排除、原住民族、集體權利、公民權

The Limitations of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s in Analysing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Disadvantages

He-chiun Liou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sia University

Nien-tsu Hou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sia University

Chih-yu Chen

Master of Science (MSc),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s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whether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s are sufficient for the analysis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disadvantages. Social exclusion ofte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an individual being economically and non-economically deprived, emphasizing its multiple and dynamic nature, and often being used to measure the gaps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concept of social exclusion could inform social policies in relation to indigenous peoples, as it could be used to measure the welfare gaps between the mainstream and the indigenous society. However,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exclusion analysis assumes homogenous citizenship, applying the same criteria of social exclusion to each individual, disregarding the impacts of collective experience on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focus group data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ext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languages, cultures and ways of life being recogniz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indigenous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With regard to specific aspects of quality of life, indigenous people do not prioritize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level well-being,

such as income, employment, social network, social participation, education, and health, etc. Instead,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llective issues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 analyzing indigenous people's extent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ne must take their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special needs into account.

Keywords: Social Exclusion, Indigenous People, Collective Rights, Citizenship

壹、前言

臺灣原住民族現今的戶籍人數約有 51 萬人，佔我國總人口的 2.2%¹。就經濟情況來說，原住民族家庭的所得，只有臺灣全體家庭平均值的 47%（行政院原民會，2007：16）。在教育程度上，十五歲以上的原住民族，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只有 16%，比起一般臺灣十五歲以上的人口當中，有 36% 的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相差甚遠（行政院原民會，2010：17）。在失業的情況方面，民國九十八年底原住民族人口的失業率為 7.31%，比同期臺灣全體的失業率 5.74% 為高（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112）。此外，醫療資源及公共建設的分佈不均，讓原族民族的平均壽命比漢人少八歲²。

如上述資料所示，臺灣原住民族不僅在物質資源（所得）上呈現相對剝奪，在其他包括教育、經濟參與（就業）、及健康等諸多社會生活面向也處於不利的狀態。臺灣原住民族這種多重剝奪，與「社會排除」概念強調部分群體在社會生活上呈現多重不利的現象多所呼應。此外，社會排除的論述突顯部分公民在諸多社會生活面向上的差距及社會整合上所遭遇的障礙，這對於理解及弭平臺灣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長期存在多重生活水準及福祉落差的境況，似乎具有高度之研究及政策意義。

然而社會排除論述著重個人取向的社會權，忽略了少數族群集體權的面向，因此在分析原住民族的弱勢上，存有顯著的侷限性。本研究透過焦點團體的方式，試圖探討臺灣原住民族是如何從自身的經驗中理解社會排除，並將之與自西方引進之社會排除論述進行比較。本文並引介紐西蘭毛利政策中的相關措施，作為我國衡量原住民族生活品質/社會排除的借鏡。

¹ 資料來源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www.apc.gov.tw/main/docList/docList.jsp?cateID=A000297&linkParent=49&linkSelf=161&linkRoot=4>，瀏覽日期：2010 年 9 月 27 日。

² 請參考內政部網站統計，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瀏覽日期：2010 年 9 月 27 日。

貳、 社會排除觀點

學術界對於社會排除究竟指涉為何的看法是相當分歧的。簡單來說，社會排除概念所指涉的面向並非單指經濟匱乏，而是要以排除的多面向所造成個人經濟面與非經濟面匱乏及剝奪的動態累積過程來闡述，準此，「多面向」與「動態」累積以及強調「群體」與「關係性」問題（Percy-Smith, 2000; Room, 1995, 1999），是社會排除概念的最大特徵。

社會排除的論述可以說是根植於古典社會學理論的。它呼應了功能主義的學說，如韋伯（Max Weber）主張某些群體可以藉由「社會封閉」（social closure）的過程，犧牲其他群體的利益以確保及維持自身的特權（Berting and Villain-Gandossi, 2001）。而社會排除最根本關注的社會整合（integration）與凝聚（cohesion），則與涂爾幹（Emile Durkheim）及莫頓（Robert K. Merton）的理論觀點類似（Levitas, 1998; Born and Jensrn, 2002）。此外，社會排除常指涉自由權、政治權以及社會權的剝奪，則又似乎出於馬歇爾（T. H. Marshall）的公民權典範。

社會排除這個詞彙在當代的使用，大多數學者認為是由 René Lenoir 在 *Les Exclus* 一書中首先提出（Lenoir, 1974），然而也有學者指出 Secretan 及 Klanfer 分別早在 1959 年及 1965 年時即已針對該概念進行討論（Estivill, 2003: 10）。隨後社會排除概念在 1980 年代開始被廣泛的使用，即便僅在歐洲一地，社會排除在不同的歐洲國家中有時也代表不同的意涵，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經濟與制度的脈絡，以及不同的政治與社會傳統。有鑑於社會排除概念上的複雜性，一些學者試圖對社會排除的論述或典範予以分類，其中以 Haliry Silver 與 Ruth Levitas 的分類最常為研究者引用。

Silver（1994）指出社會排除的論述及應用其實是鑲嵌在三個社會科學及政治典範中，包括連帶典範（Solidarity）、獨佔典範（Monopoly）、及專門化典範（Specialization），而這些典範又分別紮根於政治哲學中的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以及自由主義(Liberalism)中。相似地，Levitas (1996, 1998, 2005) 將英國公共討論中的社會排除概念區分為三種互相競爭的論述(discourses): 即社會整合論述(Social Integration Discourse, 簡稱 SID)、重分配平等論述(Redistributive Egalitarian Discourse, 簡稱 RED)、與道德社會底層論述(Moral Underclass Discourse, 簡稱 MUD)。檢視 Silver 與 Levitas 的分類，雖然在類別名稱上有所出入，但在內涵與精神上有極高的重疊性，因此以下將兩個分類整合後進行討論。

Solidarity 典範或 SID 論述中的社會排除的概念發源於歐陸，特別關注的是個別公民與社會連結(solidarity)的斷裂。歐洲共同體成立以後，部分會員國的社會成員面臨被社會福利制度排除的問題，這嚴重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品質；同時也影響到了社會成員被社會整合在一個超越國家的歐盟社會中，影響著歐盟一體化的進程。另外一個重要的背景是歐盟的核心國家如法國與德國面臨福利國家危機，需要通過改變社會政策來改變社會福利的資源分配原則。歐盟成員國家在面對福利國家的危機時，社會排除理論就擔負了重新詮釋社會福利原則的責任。社會排除理論將社會成員在福利資源中不平等的分配視為部分社會成員被社會排除的現象。因此，歐盟成員國家發展社會排除理論的研究，試圖通過社會政策，改變社會資源的分配，提高社會成員的社會參與，解決福利國家危機。於是，在此種思維之下，歐盟著重將貧窮和社會排除問題與歐盟社會政策的推進聯繫在一起。因此 Solidarity 典範或 SID 論述下的社會排除特別重視社會凝聚，在政策上則將焦點置於勞動市場與就業政策。

與 Solidarity 典範或 SID 論述強調社會納入與社會整合不同，Monopoly 典範或 RED 論述係緣起於歐洲左派的批判社會政策學術圈，其中心的議題是主張資源的缺乏（也就是貧窮）會導致生活條件遭受剝奪，而人們被剝奪的情況不只包括物質的剝奪，還包括各種的社會參與及各項服務的剝奪。「排除起因於階級、社會地位、以及政治權力的交互作用」(Silver, 1994: 543)，且尤其重視資源被優勢團體獨佔(monopoly)的問題。為了打破資源分配的

問題，Monopoly 典範或 RED 論述主張完整公民權及社會正義的實現。關鍵人物 Peter Townsend 於 1979 年的文章中主張，想要能夠理解貧窮，不應該只侷限在維生所需的問題，而是應該納入人們無法參與社會慣常生活的問題：「個人、家庭或群體處於貧窮狀態的定義是...當他們所有的資源遠低於社會中平均個人或家庭所應掌握的資源，其結果是，他們會被排除於正常的生活型態、習俗與活動之外」(Townsend, 1979: 32)。社會排除在歐洲左派所指涉的是物質資源剝奪（貧窮）所造成的結果，同時社會排除也較強調多面向及其動態過程。

最後 Specialization 典範主張社會排除是「社會分化、經濟勞力分工以及社會地位隔離」的產物 (Silver, 1994: 542)，但強調問題的根源主要是個人責任的未履行。MUD 論述又更進一步強調「問題」群體的問題歸因於該群體成員的行為或道德缺陷。MUD 認為貧窮與社會排除問題的癥結在社會底層階級 (underclass) 及依賴文化 (dependency culture)，換句話說貧窮與社會排除是個人價值觀與行為的產物。國家政策必須要能夠鼓勵窮人積極參與社會，並懲罰那些繼續沉淪在社會最底層階級的人們。MUD 的主張以理論家 Murray (1984, 1990, 1994) 為代表，反對藉由社會福利進行資源的重分配，因為這樣會產生「反誘因」(perverse incentive)，讓人們依賴更多的國家福利。這樣的論述在英國保守黨執政，並認為貧窮現象在英國已經「絕跡」的 1970 年代後的政治氛圍中，獲得了極大的迴響。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得知，社會排除這個概念不論對左派、右派、或中間偏左的團體或政黨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以右派來說，一些歐盟的會員國，特別是所謂的「富國」(主要是德國與英國的偏右保守政府)，不願承認國家存在著「貧窮」的現象與貧窮人口，乃對「貧窮」字眼保留不用，而以社會排除取代貧窮，並強調這種社會最底層的社會排除現象是一種自我的排除。就中間偏左的團體來說，社會排除的概念比較不具責難意味，在政策推行上因強調社會納入，不直接去處理貧窮需要大規模所得重分配的問題，較容易贏得社會大眾的支持。比如英國新工黨與歐洲社會民主政府多強調以就

業為核心的反社會排除政策。最後，左派團體重視的是貧窮問題的嚴重性及消滅貧窮政策，因此藉由吸納社會排除的概念，得以凸顯貧窮的結果不只呈現在物質資源的剝奪，伴隨而來的是一個多面向的社會參與的剝奪，藉此來強化所得重分配的重要性。因此 Levitas 認為，被社會排除的人，就 RED 來說是「缺錢」，就 MUD 來說是「缺道德」，而對 SID 來說是「缺工作」(Levitas, 1996, 1998, 2005)。

參、社會排除與公民權論述

承上節所述，社會排除與公民權的行使息息相關。英國社會學家 T. H. Marshall 在 1950 年所發表的《公民權與社會階級》(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一文中，將公民權區分為「民權」(或稱自由權)(civil rights)、「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 與「社會權」(social rights) (Marshall, 1963)：

一、民權 (civil citizenship)：指的是個人的自由，尤其是言論的、思想的及信仰的自由，以及財產權及司法權。

二、政治權 (political citizenship)：指的是投票權及參政權。

三、社會權 (social citizenship)：指的是經濟福利與安全的權利，其中包括了教育權、工作權以及健康照護權。

我們因此可以說，在 Marshall 來看，公民應得權利的演進，是從「自由」方面的應得權利，進到「參政」方面的應得權利，再進到「經濟與社會安全」方面的應得權利。而在每一階段，都有其相應的權利論述作為權利爭取的基礎。

上述民權與政治權是在傳統自由主義的權利概念下，國家不得剝奪個人的各項自由、以及投票及參政權。所以這兩個權利是個人用來消極的對抗專制的國家體制所發展出來的哲學。社會權則主張國家應該積極的提供社會福利給公民，明白指出了社會上必須進行一定的所得、財產、以及權力的重分

配，因為許多弱勢者所處的立足點不足以讓他們有能力行使平等的社會權利，透過資源的重分配才能夠保障所有的公民（尤其是弱勢者）享有相同的社會權。由此觀之，民權與政治權保障個人權利的不被踐踏，而社會權則強調弱勢者的福利應受到集體的保障。

由此觀之，個人權利觀點到了 Marshall 提出社會權時已遭到初步的挑戰，社會權概念的提出與福利國家的出現，標誌者人們開始意識到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所潛藏的集體社會風險，而對於弱勢團體賦與權利（社會安全制度）便是對這些社會風險的回應。然 Marshall 的社會權在行使上，不論是透過社會保險制度或是普及式的社會津貼，雖具有分散集體社會風險，或對弱勢群體補償的意涵，但在社會權的資格上，皆是以個人作為權利的載體，也就是權利之保障與賦予仍係以個人為對象。這種權利與下節所述以整個民族、族群、部落、或社區為權利載體之「集體權利」，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

如前節所述，社會排除不論是從 Silver 的三個典範或 Levitas 的三個論述來理解，基本上關照的都是個人的權利或生活面向。例如在最左派的 Monopoly 典範或 RED 論述中，論者最關切的是物質的剝奪是如何的造成個人或個別家戶在社會參與上的障礙。Solidarity 典範或 SID 論述強調的是個人與社會連結的斷裂，因此強調政策必須要能夠促進社會的凝聚，將所有的公民納入（inclusion）。Specialization 典範或 MUD 論述則更具個人主義色彩，強調社會排除的個人或次文化歸因，被排除者的道德層面是其關注的焦點。在這些論述中看不到集體經驗是如何對個人的生活水準與品質產生意義--每個人都被視為是同質性高的公民，用同一的社會排除標準予以檢視。因此傳統社會排除所關切的公民社會生活面向，基本上並沒有超越 Marshall 公民權概念中以個人為權利載體的範疇。

肆、 集體權利與個人權利的並重

首先，我們先簡單的介紹何為集體權（collective rights）？和集體權相對應的就是所謂的個人權利，亦即上述所提及的、為現代社會所充分熟悉的各項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近代各種權利論述及其實踐，早期絕大多數都是「個人權利」，而「集體權」則是晚近才逐漸受到重視的，即所謂「第三代人權」（施正鋒，2005：2）。以被視為當代最重要的人權約法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為例，該宣言就被批評為強調的權利只是「個人權利」而非「集體權利」（Freeman, 2006: 39）。³以該宣言的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為例，便可以得知。

雖然人們能在自由、政治與社會權上受到保障，對個人的福祉（well-being）至關重要。然而，對一個社會中的少數族群來說，即便其個人權利能夠受到保障，少數族群的個人福祉也不必然就能滿足。少數族群的福祉亦與他們是否能接觸自己的文化、此一文化的繁榮、以及他人對此一文化的尊重有關。而少數族群集體權利的保障，有助於這種文化的繁榮與彼此尊重。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特定權利的重要性——例如，承認、認同、語言和文化歸屬上的權利——人們就會受到傷害（無論是主觀或客觀的），即使他們的自由、政治和社會福利權利得到尊重，結果也可能傷害他們的自尊心與自主感（sense of agency）（Kymlicka, 2005: 8-11, 21）。

個人權利的保障為何並不充分？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學者

³ 然而，雖然目前世界範圍內存在的權利及其論述，絕大多數是「個人權利」，但是，我們對於「集體權」應該並不至太陌生，例如在勞動者權利中所謂的「勞動三權」：團結權、協商權與罷工權，以其實質而言，就是一種集體權利的表現（亦即，以「工會」為集體）。或是1997年進行第四次憲改時，「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所發動的「616 原住民族上草山」大遊行，不但進一步主張將原住民正名為原住民族，同時也提出保障土地權、參政權、發展權；或是1987年同樣由原權會所發表的《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所主張的「自治權」、「文化認同權」等，亦是「集體權」的表現。

Kymlicka 以典型的自由主義國家美國為例，其「民族國家打造」(nation-state building) 過程對於少數族群是不公正的。首先，是在共同語言方面，雖然國家未必明訂官方語言，但是人們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無論是教育、與各種機構的接觸、以及溝通等，都必須產生一種實質上的「官方語言」(如此國家才不至於分崩離析)，這對於少數族群來說，面臨的問題是，如果所有的公共機構都使用另一種語言運作，那麼，少數族群就會被擠到社會主要經濟、學術和政治機構的邊緣的危險 (Kymlicka, 2005: 14-15)，因此這一過程其實對於少數族群而言是不公的。

或是，在自由主義國家中，多數決的原則即使是在不違反人權的原則下，也會造成少數族群的傷害。例如，自由遷徙和投票的權利讓多數族群的成員能移居至少數族群的傳統住居地，或是透過投票擊敗少數族群，然後破壞少數族群文化，或利用行政區劃的權力削弱少數族群的集體力量。因此，少數族群為了保護自己免受這種壓迫，便需要土地所有權、語言使用權、自治權、群體的政治代表權，以及對直接影響其文化生存的事務的否決權等集體權利，並限制多數族群自由遷徙和投票的權利 (Freeman, 2006: 126; Kymlicka, 2005: 67-79)。

同時，從社會福利論辯的傳統來看，通常個人自由(競爭)與強調國家的集體福利制度是對立的，亦即，制度化的社會福利是透過集體的(國家的、公共的)制度保障來追求社會平等，而其對立面則是認為唯有透過自由的競爭才能發揮個人潛力並促進社會的進步。換言之，在傳統的社會福利理論中，經常將個人與集體對立起來，但是，這樣的論述對於原住民族而言，恐怕有其觀照上的侷限與盲點，如同上述已經言及的，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特定(集體)權利的重要性—例如，承認、認同、語言和文化歸屬上的權利，少數族群的成員就會受到傷害，即使他們的自由、政治和社會福利權利得到尊重，結果也可能傷害他們的自尊心與自主感。因此，對於集體權的探討，

將對原住民族的社會政策之討論有其重要性⁴。

換言之，為什麼討論集體權對於原住民族是重要的，因為作為少數族群，原住民的生存、文化持續，以及尊嚴和認同，都無法與其所屬的集體分割。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集體權利沒有獲得保障，原住民族個別成員的權利保障是無從依附的。這其實是集體權利一個非常重要的內涵。

而在集體權的實踐追求方面，有關於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取得了一些進展。以聯合國而言，聯合國原住民人口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經過十年的努力，在 1993 年完成《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並在 1995 年成立一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the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進行條文的審查工作。而這一草案後來終於在 2007 年 9 月 13 日第 61 屆聯合國大會第 107 與 108 次會議中，以 143 國贊成、4 國反對、11 國棄權及 34 國缺席的投票結果獲得通過，成為正式宣言--《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該宣言除了確認原住民族成員擁有同等一切的個人權利之外（宣言第一、二、七條），其他條文可以說是對於集體權的肯認，其中包括：認同權、自決權、文化權、教育權、語言權、福利權、財產（土地）權、政治代表權及補償權等。再以國內而言，2005 年所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其中明訂的原住民族所擁有的集體權包括：自決權、先住權、文化（發展）權、土地權、資源使用權，以及自治權等集體權利。

在處遇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差距（disparities）的問題上，紐西蘭是及少數同時關照原住民族集體與個人發展的國家。紐西蘭政府採取兩項重要的作為：（1）拉近紐西蘭原住民族毛利人（Māori）與非毛利人（non-Māori）的社會與經濟差距（closing the gaps）；（2）毛利人集體的能力建構（capacity

⁴ 以名詞的使用來看，過去無論我們使用「原住民」一詞，或是英文中的 indigenous people，都是個人為權利載體的用法。近年來開始使用的「原住民族」與英文的 indigenous peoples 的用法，可以看出符應了「集體權」概念興起的轉變。

buildings) (Kawharu, 2001)。

表 1 毛利人特殊之生活品質指標

毛利人特殊指標：毛利人在毛利人世界成功的生活品質指標	
文化與語言	毛利人口中能說流利毛利語的百分比
	在非毛利人口中，認同毛利人在不懂毛利語的人面前，也可以講毛利語的百分比
	參與毛利族活動，如聖地慶典、毛利語言復興運動、毛利舞蹈等
毛利與中央政府關係	根據「懷唐伊條約」的賠償請求數、毛利保留地數
土地、其他資產與實體	從毛利人所擁有的貿易資產所取得的補償金額
	在毛利人土地上所設立的企業及組織數
	毛利土地法庭申請案件的處分率
	毛利保護區海岸線的公里數
	漁場存量
	國定毛利文化遺產/遺跡的數量

資料來源：Te Puni Kōkiri, 2007: 24.

表 2 毛利人作為紐西蘭公民之普世生活品質指標

普世指標：毛利人作為成功公民的生活品質指標	
經濟	平均週所得
	淨財產
	就業率
教育	教育參與（不同教育程度的就學率）
	學習成就
健康	平均壽命
	能獨立生活的平均餘命 ⁵ （Independent Life Expectancy）
社會	中央及地方選舉的參與率
	地區組織的參與率

資料來源：Te Puni Kōkiri, 2007: 24.

⁵ 指的是新生兒可以期望獨立生活的總年數，其中獨立生活指的是沒有自陳的生活功能障礙，或是需要他人或複雜的醫療器材協助。

在具體的措施上，紐西蘭中央政府的毛利發展部（Te Puni Kōkiri）規劃毛利潛能途徑（Māori Potential Approach）⁶，發展毛利人生活品質指標（Te Puni Kōkiri, 2007），以做為衡量政策效果的準據。其中明確地界定毛利人福祉的提升，必須同時兼顧特殊及普世的生活層面。在毛利人特殊生活指標方面，毛利人的語言文化、集體的政治與權力、以及土地與資產權等構面，必須納入以評估毛利人之整體生活品質（表一）。同時毛利人在經濟、教育、健康及社會參與等普世標準上，亦必須與所有紐西蘭非毛利人平等（表二）。因此讓每位毛利人成為成功的紐西蘭公民（也就是得以滿足普世的生活指標），同時在集體層面，他們必須也要能夠實現族群集體目標，毛利人的發展才可謂是真正的成功。

伍、 研究方法

過去兩年中，因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⁷需要，研究者共舉辦十一場公眾焦點團體，希冀能夠了解在臺灣的社會脈絡裡，民眾是如何理解社會排除這個概念與現象。為了考量地理特性、城鄉及族群文化的差異，研究者將焦點團體分為都市、鄉村以及原住民團體，其中原住民焦點團體共計三場，其中前兩場舉辦於南投縣仁愛鄉，後一場則舉辦於屏東縣霧臺鄉，每場參與人數在 6-8 人之間（焦點團體成員資料請參閱附件一）。

前兩場原住民焦點團體之參與者主要先由討論：「什麼是他們認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及必需活動？」以此提供焦點團體參與者對於社會排除的思考範圍以及感受的訊息，其後再針對哪些面向可能構成一個人或家庭被社會排除？此階段討論的目的，是著眼於讓參與者討論有哪些必需品及必需

⁶ 毛利發展部，<http://www.tpk.govt.nz/en/about/mpa/>，瀏覽日期：2010 年 7 月 11 日。

⁷ 本研究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臺灣貧窮與社會排除測量指標之發展歷程研究」改寫而成，計畫編號 98-2410-H-468-020。

活動是每個公民都應該要有的。若與此種狀態相反，則為社會排除，藉由「正面」的必需清單，帶出「相反」概念的社會排除，使討論焦點不因對於社會排除概念的不熟悉、不明確，而無法加以討論。其後再透過參與者討論社會排除的不同面向，參與者描述他們所認知社會排除會發生的面向，指出哪些人是他認為被排除或是無法充分參與這個面向的生活，亦是從具體面向帶出抽象之社會排除概念。

第三場原住民焦點團體則採用不同的策略，原因是於前兩場的團體中，並未直接針對社會排除此一名詞作開放性討論，而是藉由具體面向的討論，協助焦點團體參與者思考及描繪出較抽象之社會排除概念。然於前兩場焦點團體實際進行後，研究者發現大眾並非完全無社會排除之概念，也不需藉由大量具體事物之引導才能針對社會排除作發想。大眾多數在拋出「社會排除」名詞之後，就能作一開放性之討論，並且透過焦點團體的互動討論，除了能勾勒出社會排除之抽象性概念，更能彼此討論激發出公眾所認為社會排除應具備何種之具體面向。基此，為了增加資料蒐集之豐富性，降低訪談大綱之討論焦點的侷限性，第三場焦點團體則針對社會排除作一開放性之討論隨後再針對該焦點團體特別關注之面向，進一步深入探究，以蒐集原住民族對於社會排除認知之相關資訊。

陸、 研究發現

一、「原住民族社會」集體地被「主流社會」排除

在原住民族焦點團體中，可以發現原住民族對於社會排除認知與漢族的團體存有顯著的差異。第一是原住民族對「社會」的認同與漢人明顯不同，因為臺灣主流社會中價值的建構者，往往並無含括原住民族。因此，對於原住民族焦點團體成員而言，當討論「社會排除」的議題時，他們跳脫微視的

指標層面，因為他們更關心的是這個「社會」的指稱，是否是他們所能接受與理解的「社會」。若沒有更積極納入不同族群的考量，對於原住民族而言，所謂的「社會」，對其而言，是一個「被這個歷史被這個殖民之後，我們的價值已經不是我們所屬的價值」（原住民社會排除焦點團體三），即是一個被迫與主流文化相唱和，卻扭曲了自己的價值與文化的「社會」。

我簡單講一下，因為感覺這個社會到底指的是那一個社會？因為我們所處的是不同的社會...在整個中華民國的大框架之下，可是在我們自己原住民其實又有一個社群存在，他也許是一個小的社群，但是在一些價值上的不同就可以區隔成兩個不一樣的社會，可是我們常常在講說這個社會的建構者是誰？誰認定說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原住民有一種漂泊感的時候就是...這土地是我們的沒錯，我們也講我們的語言，可是為什麼在這個大框架，這幾十年來的環境我們沒有辦法找到自我的認同感？所以那個排除到底是在排除什麼？為什麼而排除？他的條件到底是什麼？（原住民團體三，Se8）

原住民族焦點團體對於主流社會的懷疑，主要來自於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文化長期的邊緣化及歧視。以原住民族賴以生存的山林為例，原住民族對於自我認知是山林的使用者、維護者，但政府機關卻將其長久以來使用山林資源的生活型態，污名化成為山林的破壞者，更利用政策的手段加以限制。對此，原住民焦點團體成員，不僅認為自己的族群特性受到污名，更使得長久以來的習俗、習慣受到不該有的限制。

政府講的都是我們濫砍濫伐，那個不對，我們沒有濫砍濫伐。不過講起來我們原住民，是很會...很會用山的人啦！不會隨隨便便破壞。但是現在吼，一般全部滑下來的地方大概就是林務局的土地，我們原住民保留地還沒有那麼嚴重，你所有去看它震下來的大部份就是林務局的...那

個...那個他們在管理的那個山。(原住民團體一, A05)

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習慣並未加以鼓勵,而是透過制度與法律的方式加以干預,使其社會活動的參與受到限制。例如原住民的狩獵習俗,此不僅是一種社會活動,狩獵中的技巧以及獵物的分享等皆具有文化意義,在在都是鑲嵌於其文化脈絡當中無法分割的一部分。

Ap2: 我們原住民比較喜歡吃野生動物,不能吃這邊啊,那是保育類的啊,山羌山羊那個都是保育類的。

Ap 5: 本來就是有山產那些東西。

Ap 1: 我們從小是這樣子,我們以前阿公阿爸這樣,靠山吃山,代代都是這樣...這個不會斷掉啦,這一代一代的啦。

Ap 2: 就是像打獵的話,我們原住民就比較喜歡去打獵嘛對不對,阿~應該不能限制我們。

Ap 1: 應該是要放鬆一點。

Ap 1: 他那個,那個紙鈔,那不是,這個是保育類飛鼠,飛鼠是保育類百分之百,但有的不是保育類。不是保育類,他用那個罩, 去那個法院以後,不會講,我一天都站著那邊不講,沒有辦法講!

Ap 4: 怕!

Ap 1: 對!我們是怕就是那個怎樣, 我們比不過那個啦,平地人很會講話我不會轉啊。

Ap 5: 太老實了。

Ap 4: 說真的就是去頂罪就對了。(原住民團體二)

對於原住民而言,法律是與自己文化脈絡完全不同的制度,所以對於這樣的遊戲規則不僅不認同,也因語言的關係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之意思,更認為主流族群是無法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便「我一天都站著那邊不講,沒有

辦法講」(Ap1)，寧願放棄表達意見的機會，「說真的就是去頂罪就對了」(Ap4)而接受了法律制度對他不理解的懲罰。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發現，傳統地社會排除概念運用在分析原住民族的弱勢處境時有其限制。社會排除的概念及其相關的測量強調的是社會權的概念，關注的是福利落差的問題。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基本上不是社會排除概念關切的議題。然而將一體適用、以個人為載體的社會權，將其優先順序置於原住民族集體權的前面，就必須審慎思考所謂的一體適用的福利提供，比如說相同的教育、就業、醫療、社會安全等福利，會對原住民族產生怎樣的影響。個人福利及生活水準落差的弭平，是否就代表著集體權利的滿足！抑或是當原住民族集體權未獲保障時，原住民族因缺乏集體行動的能力，原住民族的個體就永遠無法實現個人社會權。在追求社會納入（社會排除的反義詞）的同時，是不是要付出原住民自身文化特徵及價值體系，遭到挑戰或甚至削弱的代價。

在社會福利論述的傳統中，之所以未觸及集體權的討論，主要是認為藉由個人人權的保障，便足以保護文化少數族群的權利（劉鶴群、侯念祖、陳竹上，2011：223）。然而，從以上的原住民焦點團體中，參與的原住民成員自覺的陳述出「認同」、「傳統領域」與「文化」等集體性概念的重要性中，我們應可知覺到這樣認知是不足的。

主要的因素是，原住民的「美好生活」(well-being，普遍譯為「福祉」，亦是「社會福利」所追求的目標)並不只是藉由個人權利的保障，因而能參與進入主流社會生活中，並藉由「競爭」而獲得生活資源這樣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比較是漢人（主流）社會的想像。一方面，作為社會中的少數群體，在文化、語言與決策參與上，原住民族因有意無意的被排除，而難以處於「平等的競爭狀態」中。因此，事實上蘊含著「機會平等」，但仍維持「自由競爭」的價值觀的「進步的自由主義」(radical liberalism)的意識型態——同時亦是當代制度式社會福利主張的理論基礎之一，並無法涵蓋這一「集體（權）被排除」的面向。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個人權利獲得「保障」，但是

原住民仍然有著強烈的「不公平」的感受：

「我們比不過那個啦，平地人很會講話，我不會轉啊」(Ap1)、「政府講的都是我們濫砍濫伐，那個不對，我們沒有濫砍濫伐...一般全部滑下來的地方大概就是林務局的土地，我們原住民保留地還沒有那麼嚴重」(Ao5)、「在一些價值上的不同就可以區隔成兩個不一樣的社會，可是我們常常在講說這個社會的建構者是誰？誰認定說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Se8)。

或是，即使在個人權利的保障下，原住民的生活福祉能獲得安全保障(security)，但這仍可能是一種缺乏尊嚴的、有所屈辱的感覺(如「原住民濫墾濫伐」的印象、「是去頂罪的」的感受等)，這即是「集體權」未獲保障與肯認的後果。

我們從臺灣有關原住民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歷程及其內涵來看，固然早期的有關政策乃是以「同化」原住民作為目標，但及便是在後來的原住民運動的衝擊下，以及「社福黃金十年」的發展中，原住民以公民權利的資格同樣享有一般公民的福利待遇，甚至可能還擁有較多。但這些表象充其量「也只是臺灣自 1990 年以來，社會福利施政大幅『進化』的反映。僅有的差別，可能只在於對於原住民的補助、服務與救助等措施，降低服務取得的門檻以示『優惠』而已。」(劉鶴群，侯念祖，陳竹上，2011：242；劉鶴群，侯念祖，2009：125-126)。也因此，即使在這些福利措施一視同仁的「保障」下，原住民仍有著如同上述所述及的各種疑慮、不平、屈辱等感受。這些都在在說明了個人權利的保障對於原住民而言，是遠為不足的。

二、 社會排除面向優先性的差異

一般國內在討論社會排除的議題時，主要之內涵包括貧窮、失業、社會互動與參與面的缺乏、支持網絡的缺乏、政治參與的缺乏等面向（王永慈，2001；李易駿，2007）。這些資源、社會參與及生活品質的面向，對於普遍多數主流社會的公眾來說，也許是最為重要的，然在思考原鄉部落的社會排除內涵時，必須要放到原住民族特有的地域、文化、族群的脈絡下去看。

與平地主流社會不同，原住民地區焦點團體成員主要居住的部落多位於山區，從焦點團體的資料中，其所最為關注、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部份，主要在於交通的便利、道路的通暢與否。尤其，原住民部落於交通層面所受到的排除程度，受到地理位置與地形之因素，自然較平地來得高，加之山區於颱風季節所受到的天然災害的機率，在颱風災害以及道路中斷兩項原因的加乘效果，使原住民地區社會大眾在交通以及颱風的憂慮程度都非常高。原住民地區焦點團體成員對於颱風的憂慮，主要來自土石流所帶來的破壞，往往不僅是交通上的斷絕，更是生命財產的威脅，自然在此部份社會排除面向的關切程度也相對較高。

可能比較擔心的就是到了雨季的時候.到時候那個房子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原住民團體二，Ao5)

「Ap1：像有颱風比較不方便，在山上。

Ap4：他這個，本來要去宜蘭，卡在梨山兩天啊。

Ap2：從梨山到南山陸續都坍方了啊。沒有幫忙我們維修。

Ap4：修兩天了都還沒好。

Ap1：還沒好，快五天了，再兩天就五天了。

Ap4：他卡在這邊三天了。

Ap1：我要回到宜蘭啊.去宜蘭啊.今天第三天不知道明天還通不通都還不知道...

Ap5：所以在山裡面可能交通上非常非常重要。

Ap1：山上最不方便的就是交通、那個路啊。（原住民團體二）

而原住民地區最主要感受到自己因地理位置而被忽視、被排除的因素，主要來自於上述的土石流的威脅，並且土石流的災害是帶來生活中全方面的影響，正如同原住民地區焦點團體成員所言：「反正就是食衣住行都不行了，水也沒有，水也沒有了...」（原住民團體一，Ao4）、「我們都是難民」（原住民團體一，Ao4），而這樣的影響使得原住民族的生活受到了極大的不便，不僅生活品質受到影響，更往往因為政府後續的處理速度，不符合原住民地區大眾的期待，使其有被忽視、被排除的感受。

現在都政府那個，什麼，那個，敷衍，很慢...那個土石流已經很久了，比我們...。（原住民團體一，Ao4）

「這一次...這一次強力的那個辛樂克颱風過來的時候吼，像這樣的水災吼，這個...這一次的政府是忘記我們原住民部落，它重視到只有溫泉。它只有...因為是風景區，名聲又大，所以他們所有的力量投入到那裡，電視一個禮拜都在播，我們這個時候，一個禮拜還沒有出來，出來的是我們前面的加油站，但是它內部這個地方沒有，那一天我很生氣是我直接打電話打到縣長室，我說你們只有著重在那個地方，這個部落怎麼都忘記了，我說你們什麼時候要派人來這裡，我說活動中心也沒了，都淹了嘛...我說都沒了，我說那我們的部落差一點點...。（原住民團體一，Ao5）

也因為政府的功能在原住民地區焦點團體成員的眼中是效果不佳的代名詞，加上其自助自治的能力和族群的觀念較強，使原住民地區對於許多公共服務與設施，失去期待與信賴的感受，寧願相信部落間彼此的能力，致使

許多應由政府提供的基礎福利設施，於原住民部落當中，已非主要提供者。

我們的錢自己收，可能比政府要來幫我們修理的錢可能還要再多，因為我們現在都是自助的，水壞掉了，我們自己去...不用等政府來做，因為你政府來做，大概半年以後。半年以後我們都已經沒水了！。(原住民團體一，Ao5)

因之對於原住民族的生計而言，原住民族最優先關注的不是如所得、就業、人際互動、社會參與、教育、健康等個人或家戶層次的議題，而是自然災害及政策失敗對整個原鄉所產生的破壞與影響。這正印證了前面所強調的，作為社會中的少數族群，原住民族的個別成員，其「美好生活」(福祉)是來自於個體與集體的緊密連結的結果，這包括了文化權、傳統領域的支配權、生存權、自治權，甚至自決權等集體權利的實踐；而以自然災害及政策失敗對原鄉所產生的破壞與影響來說，自治權更是一項關鍵的集體權利。

擴而論之，如果原住民族能擁有自治權(為優先的)等等集體權利，許多的公共設施的提供、公共服務的可及性、稅收權力的擁有、需求決策的制訂，將可以依據原住民族居住地、文化與價值、社會組織、經濟生活等特性，來進行具主體性的規劃與實施，同時更具有(自然災害後重建的)時效性。

反之，若依據目前政府在施政上「人人平等」的個人權利之思考模式，進行資源的普及式、平均式的安排，則原住民族作為少數者、主流社會中的「匿名者」(因居住偏遠較不具有「可見度」)以及詮釋權的缺乏(導因於語言使用的劣勢)，所能分配到的資源將是被稀釋或不具時效的。而這影響的將不只是個別原住民的生活，甚至會是原住民族的集體生存的問題！缺乏了集體權的保障，不僅族群集體恐將逐漸消失，同時個人的生活福祉亦將無從依托，或許也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被同化於主流社會。

柒、 結論

本研究發現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及生活方式是否被主流社會認同與接納，對原住民的生活品質有深遠的意義。即使原住民族個人的經濟生活獲得保障，但如果是處於令他們缺乏尊嚴、有屈辱感的社會中，這樣對原住民族來說，並不是真正的社會包容 (social inclusion)，因為原住民族對於「認同」、「傳統領域」與「文化」等集體經驗相當重視。另外在生活福祉的具體面向上，原鄉部落因所處的區域環境特殊，加上政府長期的忽視及效能不彰，原鄉原住民相較於平地居民，更重視自然災害及交通對生活的影響。因此在衡量原住民族社會排除或生活品質時，應通盤考量原住民族之特殊需求。然社會排除的主流論述源於歐美，反映出的是歐美的社會脈絡，以及政策的需要，強調的是以個人為福利載體的資源重分配或社會整合 (integration) 措施，因此如果未將集體權利及原住民族特殊需求的層面考量進去，則不適於全盤套用在臺灣原住民族上。

紐西蘭政府很明顯已經重視到這一點，因此毛利發展部 (Te Puni Kōkiri) 規劃毛利潛能途徑 (Māori Potential Approach) 中明確地界定毛利人福祉的提升，必須同時兼顧特殊及普世的生活層面，其中特殊的生活層面即涵括毛利人的語言文化、集體的 political 權力、以及土地與資產權等構面。

因此，若要打破社會排除概念用於分析原住民族弱勢處境上的侷限性，必須要在普世公民的社會權指標外，增加原住民族的集體指標。有了普世的社會權指標，社會排除便能用來衡量一位原住民，她/他是否在個人的社會權上被「排除」，以了解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在普世的生活品質上是否存有落差。社會排除概念如此就如 RED (重分配平等論述) 所述，能用來分析物質的剝奪是如何的造成原住民族個人或個別家戶在社會參與上的障礙。

然而如果有了集體指標，則社會排除尚能了解原住民族，是否在語言、

文化、資源、政治等集體面向，受到主流社會的「排除」。社會排除的概念因此不侷限於個人的被排除歷程、經驗或結果，也擴及在社會中，「一個集體被另一個集體或整體社會所排除」的論述及分析。換言之，如此社會排除可以用以測量原住民族的自治程度，而自治對原住民族的生活品質意義重大，因為許多的公共設施的提供、公共服務的可及性、稅收權力的擁有、需求決策的制訂，將可以依據原住民族居住地、文化與價值、社會組織、經濟生活等特性，來進行具主體性的規劃與實施。

參考文獻

- 王永慈 (2001)。〈社會排除：貧窮概念的再詮釋〉。《社區發展季刊》，95，72-84。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7)。《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報告》。臺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0)。《98 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李易駿 (2007)。〈臺灣社會排除人口之推估〉。《人口學刊》，35，75-112。
- 施正鋒 (2005)。〈臺灣原住民的集體人權與美澳紐加等國的比較〉。東吳大學人權學程舉辦「第一屆人權學術論文研討會」發表論文。台北，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2005/5/26-27。網路擷取資料，<http://iyouth.youthhub.tw/iyouth/getfile?source=A411102A2D370281580D4CE6EAF191B61386C2EF025FB26956D27D09F976687AC8CD8577F3F22794A852238F00A7C162&filename=22ECD5B028ABCCA13BF00469C38350BA3B91B9DF71659F0C>。擷取時間：2009/3/10
- 劉鶴群、侯念祖 (2009)。〈種族優惠或積極賦權措施？－論我國社會政策中對原住民（族）的優惠／賦權措施〉。《社區發展季刊》，127，121-133。
- 劉鶴群、侯念祖、陳竹上 (2011)。〈原住民族權利論述與臺灣原住民族福利服務的內涵和發展〉。李明政主編，《多元文化社會工作》，頁 219-254。台北：松慧出版。
- Berting, J. and Villain-Gandossi, C. (2001). Urban Transformations, the French Debate and Social Quality, in Beck et al., *Social Quality: A Vision for Europe*. Hague/London/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Born, A. and Jensen, P. H. (2002). A Second Oder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J. G. Andersen and P. H. Jensen (eds), *Changing Labour Markets, Welfare Policies and Citizenship*. Bristol: Policy Press.

- Estivill, J. (2003).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for Combating Social Exclusion: An Overview*.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Freeman, M. (原著), 湯智賢 (譯) (2006)。《人權：跨學科的探究》。台北：國立編譯館。
- Kawharu, M. (2001). Local Māori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Social Policy of New Zealand*, 16: 1-16.
- Kymlicka, W. (原著), 鄧紅鳳 (譯) (2005)。《少數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Lenoir, R. (1974). *Les Exclus*. Paris: Seuil.
- Levitas, R. (1996). The Concept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New “Durkheimian” Hegemony. *Critical Social Policy*, 46: 5-20.
- Levitas, R. (1998). *The Inclusive Society: Social Exclusion and New Labour*.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Levitas, R. (2005). *The Inclusive Society: Social Exclusion and New Labour* (2nd edn) .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Marshall, T. H. (1963).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Marshall, T. H. (ed.)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Heinemann.
- Murray, C.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 Murray, C. (1990). *The Emerging British Underclass*. London: IEA.
- Murray, C. (1994). *Underclass: the Crisis Depends*. London: IEA.
- Percy-Smith, J. (2000).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Janie Percy-Smith (ed.). *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Toward Inclus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 Room, G. (ed.) (1995). *Beyond the Threshold: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Bristol: Policy Press.
- Room, G. (1998). Social Exclusion, Solid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8(3): 166-174.
- Te Puni Kōkiri (1998).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for Māori: A Discussion*

Document for the Māori Potential Forecast Repor., Wellington: Te Puni Kōkiri.

Townsend, P. (1998).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附件一 原住民團體成員基本資料

原住民團體一	編號	性別	居住地	年齡
	Ao1	女姓	南投縣仁愛鄉	70
	Ao2	女性	南投縣仁愛鄉	88
	Ao3	女姓	南投縣仁愛鄉	70
	Ao4	男性	南投縣仁愛鄉	81
	Ao5	女姓	南投縣仁愛鄉	60
	A06	女性	南投縣仁愛鄉	55
	Ao7	男性	南投縣仁愛鄉	80
原住民團體二	編號	性別	居住地	年齡
	Ap1	男性	宜蘭縣大同鄉	46
	Ap2	男性	南投縣仁愛鄉	58
	Ap3	男性	台中縣和平鄉	48
	Ap4	女性	南投縣仁愛鄉	45
	Ap5	男性	南投縣仁愛鄉	48
	Ap6	女性	南投縣仁愛鄉	27
原住民團體三	編號	性別	居住地	年齡
	Se1	女姓	屏東縣內埔鄉	23
	Se2	男性	屏東縣內埔鄉	24
	Se3	女姓	屏東縣霧台鄉	47
	Se4	男性	屏東縣瑪家鄉	43
	Se5	女姓	屏東縣三地門鄉	52
	Se6	女性	屏東縣瑪家鄉	36
	Se7	男性	屏東縣霧台鄉	51
	Se8	女性	屏東縣瑪家鄉	33

研究論文

高齡者生活的數位落差與科技近用^{*}

蘇健華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收稿日期：2011 年 11 月 16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2 年 1 月 22 日。

^{*}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提供的寶貴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數位落差之所以成爲一項重要議題，其前提爲資通訊科技已深度融入人們的生活。然而，發展時序推進至此，當更多的人可因此而獲得生活便利時，我們更應關注到那些依舊被遺留或稱遺忘的少數，因爲這樣的少數受到的剝奪與排除，將更甚以往。

高齡人口在相關政策的實施後，成長相當有限，一般解釋爲高齡人口「不需要」這些新產物；另一解釋則爲「科技恐懼」。本文提出，高齡者是可以藉由科技發展而增進其福祉，同時也認爲高齡者的使用問題，與其說是恐懼，不如以障礙視之。據此，採取傳統高齡者與身心障礙研究之「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概念來進行思考，以類比當前科技先進國家推動之 U 化發展之根本依據-U 運算 (Ubiquitous Computing)，其意義在於不一定需要「高科技」，但需要符合「人性」。

關鍵字：數位落差、通用設計、U 運算

Digital Divides and Technology Access of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People

Chien-Hua Su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Digital Divide become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deeply merged into our lives. However, as the development timing up to now, when more people can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live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ose few people who are still left over or forgotten. Such few people will suffer the deprivation and exclusion more than ever.

After the practice of the related policy, the growth of the elderly people is quite limited.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every indication that the elderly people “do not need” these new produc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regarded as “technophobia.” It is impli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at the elderly can increase their welfar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the meantime, the elderly people’s problem of use is not so much fear as obstacles. Accordingly, the present study adopts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Universal Design” of the study on the elderly people and the disables to proceed to think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key base Ubiquitous Computing of Ubiquitous development promoted by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advanced countries. The real point does not necessarily lie in “high technology” but it should correspond with “humanity.”

Keywords: Digital Divide 、 Universal Design 、 Ubiquitous Computing

壹、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一、 資訊社會的發展

由於電腦的廣泛運用，以及網路資通訊技術的普及，人類社會產生重大的變革。其主要特點如同 Manuel Castells (1998) 所指出，「流動空間」使人們跨越地理的限制；「無時間的時間」展現出同步與非同步的彈性時間特質。藉由這樣空間與時間概念的轉變，建構出一個資訊社會。如同蒸氣機開啓工業社會的發展，資訊科技在這些年來對個人、團體、國家以及全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同時對於人類社會中的經濟、政治、教育、傳播、文化、藝術各層面均造成不同程度的變革。

關於「資訊社會」一詞，懷疑論者認為資訊自從人類文明開端，藉由圖像、文字來記錄生活過程即已存在，有什麼是新的？其一在於「知識經濟」。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 1965 年即提出「知識」將取代土地、勞動、資本、機器設備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而在之後，他也將「知識工作者」視為後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資訊」與「知識」的關係在於藉由資訊的蒐集、確認、組織、解釋、儲存、傳遞...等過程，將形成一個知識系統。由於電腦的運用與資通訊的發展，人們在這樣的知識系統中得以處理高過以往無數倍的資訊，同時快速的累積與傳遞。而既然知識為當前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那麼當然對科技發展產生更大的驅力，形成一種科技循環¹。

當資通訊技術已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部分，卻出現一個弔詭的問題，一方面科技發展宣稱「來自於人性」，有助於增進人類福祉；另一方面卻也由於人們不可避免地進入資訊社會中，因此數位落差問題已不再只是一種工具的選擇，而是生活權利的剝奪。John Seely Brown & Paul Duguid (2000) 即認為：「如

¹ 由於知識與資訊得以產生財富的累積，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即促成科技的發展，以處理更多的資訊，因而產生科技發展與資料處理量相互競逐的循環。

果只有資訊邏輯（logic of information）而揚棄人性邏輯（logic of humanity），我們就無法看到完整的世界」。資訊雖然在現今對於各個生活層面都很重要，我們可以在任何面向去運用其來增進效能，但卻不應該爲了用而用，扭曲人性來適應資訊科技。

二、理想與現實

我們可以相信，電腦與網路的運用與普及，在增進人們福祉上，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資訊科技可以視爲是一種平等器，以往可能僅有菁英份子才有辦法接觸到的種種資訊，現在卻能夠透過網際網路等資訊科技，普遍地讓一般民眾皆得以輕鬆的獲取。透過電腦爲中介的傳播方式，使得傳統上許多劃分階級的因素，例如種族、教育程度、收入、性別等等，不再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在虛擬的空間之中，人的接觸並不因外表美醜或是現實生活中的階級地位來影響互動，現實人際關係較爲貧乏的人，將可以在此獲得滿足，一些有特殊偏好而受到主流價值所排擠，或是其他弱勢群體的人們也較能得到公平得對待，獲得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認同；如同 Margaret Wertheim（1999）所說：「上網的人可以在網路上拋開現實環境中個人所遭遇的身體、以及其他物質空間上的限制，尋求精神上的完美和自由」。

除了在精神層面的滿足之外，在實際層面上也可經由網路傳播跨時空的特性來搭起支援網絡，不同群體或個人可經由這樣的特質來進行彼此的聯繫，形成一股團結的社會力量，除了訊息的搜尋與傳遞之外，更可以進行新時代的社會運動，爲自身爭取權益：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運動是有目的的集體活動，其試圖想改變社會制度與價值，他們可藉由網路所突顯自己，如勞工運動藉由網路脫離企業家，並連結、組織及動員，而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各種人權運動、種族認同運動、宗教運動、民族主義國家獨立運動，以及長久以來文化表現與

政治成因的擁護者也都是如此。網際空間已成為全球化的電子集會場所，在此有著多元的聲音。(Castells,2001a)

依照這樣的說法，社會中的弱勢族群相當可能可以在這樣的科技進程中，得到社會的公平待遇。然而，傳統階層研究的主要研究中，教育往往是一個重要變項，教育的成就往往對其後的職業取得有著正向的關聯。經由網路，遠距教學成為可能，任何環境都不會因為師資或是學校的位置而有所差異，殘障人士更可應用特殊軟硬體的協助來改善環境的不友善困境，進而得到所需的教育資源。當教育機會得以改善，這些弱勢族群更可進而有機會扭轉之前的地位取得劣勢。

當這些科技產物被視為消除不平等的希望時，數位落差便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楊榮宗(2004)綜合探究了數位落差的內涵作了如下的定義：

在數位化資訊社會中，個人因其社會屬性，如性別、種族、家庭經濟、階級或居住地區等的不同，使得在資訊科技的近用機會、使用能力、與內容取用適合度產生差異。資訊近用機會，包括有電腦設備的擁有、網路的連結使用機會及網路的使用狀況等；資訊科技的使用能力，包括有資訊素養及資訊技能素養等等。

國內研究者李孟壕、曾淑芬(2005)也指出無論是以早期研究者的指標抑或是依據其所試圖建構較完善之數位落差指標作為有效變項時，屬於社經地位較優勢的人，所能得到的資源就越多，網路近用或是數位落差的得分就越高；相反的，當社經地位屬於弱勢的族群，則近用程度得分就越低。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前文所述的理想面要達到似乎相當困難，因為在現實的條件中，弱勢族群根本無法取得應有的軟硬體設備及得到入門教育，因此，雖然資訊科技與傳播技術有機會讓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童、婦女、外籍配偶、身心障礙人士、老人、低收入戶等族群改善其不利條件，但必須達到資訊時代的「最低生活需

求」。若非如此，在原本弱勢族群已經具有原本因地理因素的傳統落差之外，數位落差更是為他們追求正常生活，再挖了另一鴻溝。

三、社會排除之多重剝奪

在這樣的情況下以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來切入，數位落差的討論會較具意義。從傳統對於貧窮問題開始，「那一條線」的劃分一直是重要的爭議點，Peter Townsend 以「剝奪」視之：當低於某個收入的門檻，剝奪會加劇，並加速或增加不均。在 Townsend 的觀點，這一條線是可以藉由確認、或排序 human needs 而被畫出來。然而，對 John Rawls 而言，不可能科學地定義 human needs，這是因為人們對自己生活的評價有著極大的不同。但是他仍認為即使需要與愛好是不同的，仍然可能去確認一些滿足生活計畫中有用的財貨，以及必要的工具。這些都可以被稱之為“primary goods”。“primary”在此具有兩種意涵，第一，這些財貨是一種基礎，沒有它們，將沒有任何人可以過著他們覺得有價值的生活。第二，primary goods 是基本的（elementary），無論任何喜愛或偏好的人，這些是建立自己生活的基本材料（Ruggles,1990）。

Amartya Sen 認為 Rawls 聚焦於 primary goods 就如同 Townsend 一樣是一種間接、不符合需求的實質自由測量方式。實際問題不只是一些財貨，同時還包括他們能用這些財貨去做些什麼。根據 Sen 的觀點以評定個人的狀況不光從他所持有的財貨來看，而且要去評估他的實際潛力或是能力，也就是實質的自由。而近期以來由歐洲所開始採用的社會排除概念就是延續這樣的能力取向，其特質在於同時關注 primary goods' 上的絕對剝奪與相對剝奪，再加上能力取向的關懷點。如果社會上每一個人對於集體的選擇有相同的意見，那麼就不會有爭議。然而如果眾人的意見不完全相同，就必須建立一種方式調和個人之間的差異。Sen 所著的《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指出，一般學者討論社會選擇時普遍假定人人平等，可是從社會福利的觀點看，社會中不幸人士的意見或偏好得到重視才是社會福利的提升（引

自劉瑞華，1999)。

「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 是由歐盟委員會所構思提出的社會政策概念，並受到聯合國國際勞工局所採用。...更精確地說，社會排除指在由社會制度和價值所架構的社會標準中，某些個人及團體被有系統地排除於能使他們自主的地位之外」(Castells, 2001b)。關於其中的自主 (autonomy) 一詞，Castells 將其定義為在社會建構的個人自主/社會他律下的一般界限。然而這樣的社會排除是一個過程而非一種狀況，因此這樣的分界也會隨時間而有所變化，就資訊社會生活而言，應有的技能門檻就是分界的那條線。社會排除是一種過程，而且具有多重的剝奪。

社會排除的概念與涂爾幹的 solidarity 恰恰相反，意味著排斥與無連結。理論家認為：「多樣的剝奪與痛苦的累積，導致一群人遭受的不利地位不斷累積，因而難以得到社會政策回應。」此社會排除的觀點回應了 Harrington 的關注點：「窮人和大世界失去了連結」。也回應了 Wilson 的社會錯置 (social dislocation) 概念。總結來說，社會排除意指不完整的公民權，和缺乏融入主流社會的能力。經由這樣的觀點，擴大了社會不平等的分析面向 (Brady, 2003)。

事實上，數位落差問題，並不會隨著當前科技發展形式而被解除，更確切地說，真正嚴重的反而是科技發展最為先進的國家。原因在於，對於科技後進國家而言，人們缺乏資訊近用以及素養，只是未能成為頂峰的科技人；但在科技先進國家中，全國有八九成人口都有一定的近用機會與基礎素養，其餘的少數比例人口，在這樣環境下所受到的相對剝奪，是嚴苛的。

四、科技與人性

數位落差的議題在過去十餘年來受到廣泛熱烈的討論，聯合國更在千禧年

高峰會議中，與 191 個會員國共同商定一套工作發展目標。這些目標被視為全球事務的重要核心，被稱之為「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其主要內容包含了各會員國的伙伴發展關係，其中更著重於資通訊技術的發展面向。歐盟同時也在各項政策上推動資通訊技術的普及，其於 2006 年發表一份「Internet for all」計劃（EU,2006），以改善歐洲資訊不平等的情況為目標，期望建立一個無障礙的資訊社會（barrier-free information society）。而在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也都紛紛強化國家各項建設，以因應這樣的世界潮流。

當我們試圖思考解決這樣的問題時，有著許多不一樣的途徑，其中當然包括科技懷疑或是悲觀論者的看法；另一方面則是科技樂觀主義者。這樣的兩極觀點對於理論的建構以及哲學的思辯上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在具體作為的規劃上，卻難免產生盲點或是不可作為。找尋出路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既然從人類存在以來，工具的使用一直隨著人類歷史而發展，不妨將現代科技同樣視為一種中性的工具，設法讓它興利而避害。如同美國學者 Don Ihde 主張，當人們利用科技獲取過去無法達到的目的，因而主張科技樂觀時，人們不應忘記在此同時人類也失去了因科技的替代造成之感官、知覺感受之喪失。另外，當人們反對科技之樂觀，而強調人類必須返回過去的伊甸園時，人們也不應該忽略，人類也同時失去因科技可能帶給人類的豐富經驗。科技的發展應該是潛藏著利與弊，當現代社會之科技為人帶來驚奇與美麗遠景時，人不能忽視科技可能帶來之意識型態的影響（引自林志忠，2001）。理性問題不在科技本身，而是如同哈伯瑪斯所認為，在於人類自主性的消逝。

貳、高齡者排除問題的「標定」

在台灣，影響數位落差較為明顯，甚至形成數位牆的因素，就屬「年齡」了。所謂「數位牆」，是用來強調數位落差特別嚴重的群體界線，因台灣中高

齡人口缺乏從事資訊行為的意願，是台灣資訊使用率無法提升的主要原因。若檢視近幾年台灣的數位落差情況，可大致發現，年紀越大，對電腦以及網路的使用程度普遍越低。政府自 2004 年開始執行縮減數位落差計畫之後，中高齡人口的數位落差現象應能獲得相當的改善，但 2005 年的各項指標並未有明顯的上升，在某些項目甚至有下降的趨勢（陳怡如，2007）。

一、世代落差

根據行政院研考會 2007 年調查資料²顯示，台灣地區電腦使用年齡在 50 歲以上降到 50% 以下；上網年齡的分水嶺在 40 歲即快速由八成以上降低至六成以下。而若以人口推估資料來計算，台灣 12 歲以上民眾，約有 680 萬人不知如何上網，其中 40 歲以上民眾即佔 598 萬。

表 1 不同年齡別之電腦使用率及網路使用率

	電腦使用率（%）	網路使用率（%）
12-20 歲	99.2	98.8
21-30 歲	96.2	94.4
31-40 歲	89.4	84.2
41-50 歲	67.0	58.6
51-60 歲	46.4	35.5
60 歲以上	15.5	8.9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2007），〈96 年數位落差調查-世代篇〉

然而該調查亦顯示在過去兩年的發展中，30 歲以下民眾由於電腦及網路使用比例已相當高，因此主要提高的關鍵在於 31~60 歲間上網人口的增加所

² 行政院研考會（2007），〈96 年數位落差調查-世代篇〉（<http://www.rdec.gov.tw/public/Attachment/852111514871.pdf>）

造成。但是，在 61 歲以上的人口，對於科技的接受與學習雖有成長，但卻相當緩慢，甚至於可能是由前一個世代進到這一年齡層所造成的數字成長。

雖然在許多新興的軟硬體服務上，不乏跟得上時代的高齡者，運用電腦與網路上的各項服務，例如創立個人部落格³，或是藉由網路搜尋交友、理財、保健及旅遊推廣等資訊。但是由客觀的統計資料顯示，無論是使用何種服務，高齡者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很大的進步與討論空間。或許會有這樣的疑問，如果不願意接觸會怎樣嗎？這問題的答案將回到縮減數位落差的基本議題來回答，也就是當社會由工業社會進入到資訊社會，這些新科技產物除了工作領域，更進入生活領域，因而對一般人而言，使用的障礙可能造成社會排除，而對於弱勢族群而言，更可能造成雙重甚至於多重的排除。

關於世代落差方面，有兩個面向值得思考：第一、當前的發展現況，是否關注到高齡長者的特質？怎麼用？用來做什麼？第二、這樣的問題是不是會隨時間而有所改善？問題關鍵是「世代」還是「老」？

電腦態度的研究乃是屬於科技的心理學取向，其背後隱藏三大假設（林宇玲，2003）：（1）電腦是重要的社會進步工具，每個人都應該使用它；（2）電腦是中性化（neutral）的工具—任何人以正確的方式使用它，都有相似的結果；（3）個人的電腦態度會影響其電腦的學習成效與使用意願。基於這些預設，導致「電腦恐懼」被歸咎成「個人問題」—或因個人的成見、怠惰、或不當的使用方式，皆有可能造成個人無法接受電腦，故此取向建議以資訊教育來改善此問題。

行政院自 2001 年起便開始推動縮減數位落差的工作，2002 年在核定「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⁴時，將「數位台灣(e-Taiwan) 計畫」列為十大建設計畫之一，期望將台灣打造成亞洲最e化的國家、高科技服務島。2004 年，「縮減數位落差計畫」列為「數位台灣計畫」重要分項計畫之一。而在實際作

³ 〈誰說高齡就不能有部落格？〉（<http://blogger.chinatimes.com/blognews/archive/2007/09/26/200562.html>）。

⁴ 〈挑戰 2008 國家計畫〉，（<http://www.etaiwan.nat.gov.tw/content/application/etaiwan/et1002003100000000/guest-cntgrp-browse.php?ordinal=10020031>）。

爲上，也唯有〈6.5.1.5 提升弱勢族群數位運用能力暨充實設備計畫〉⁵與高齡者有關，而其中的弱勢族群更包含了低收入戶、弱勢婦女、銀髮族、身心障礙者等不同性質的弱勢族群，因而效果有限不難想像。其中低收入戶、婦女與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可能會以提高個人資訊素養以增進當前職場所需之技能與競爭力爲主要目的，但在高齡人口來說，這些需求畢竟不高，因此誘因較少。

二、 面對科技的恐懼與接受

「科技恐懼」是經常被用來解釋高齡人口對於科技產品使用率低的原因，但這事實上涉及了「機會」與「動機」，更進一步的可能源於「市場空白」⁶。機會在於離開工作崗位之後，進一步接受訓練的機會變少，而社會上提供的機會同時也不若年輕人多，但關於這方面，政府所推動的「長青學苑」中的課程似乎可以改善這一種情況；其次爲動機，也就是大多數老年人缺乏學習的動力和要求，認爲自己即使學了也用不上這些高科技產品。至於市場空白方面，延續機會與動機的因素，在硬體設備的發展上並未能以高齡人口爲主要對象；其次在於軟體應用上，更無法提供老年人所需要的服務。中高齡人口之所以形成數位牆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資通訊科技的發展逐年上升，尤以 90 年代以後急速進展，除了硬體屢出新產品之外，軟體的變化也是日新月異，年長的民眾無法即時掌握如此的趨勢，自然影響其資訊行爲。再者，中高齡人口的生理狀況也不若年輕人，在使用產品方面較吃力，況且他們的教育背景及程度與現今社會有些差異，不識字或缺乏英文基礎的人比比皆是，這些都是阻礙他們資訊使用行爲的因素（陳怡如，2007）。

F. Davis 等人以「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去調查個人電腦使用行爲時，發現電腦自我效能會影響「易用性」（ease of use）與「認

⁵可見 6.5.1.5 提升弱勢族群數位運用能力暨充實設備計畫，（http://www.etaiwan.nat.gov.tw/content/application/etaiwan/project/guest-cnt-browse.php?cntgrp_ordinal=&cnt_id=317）

⁶〈中國老人的科技恐懼症〉（<http://61.129.65.8:82/gate/big5/health.eastday.com/eastday/health/yfyz/node3347/node3350/userobject1ai1786611.html>）。

知的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並進而決定個人的電腦接受度——亦即，電腦自我效能愈高者，愈覺得電腦好用，而且同意電腦有利於完成任務，同時他們也會對電腦產生正向態度，願意使用它（引自林宇玲，2003）。依據這樣的觀點，正可以接續至 Sara Czaja 與 Chin Lee（2007）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及根據資料顯示，老年人並不見得有科技恐懼症，甚至是很有意願使用如電腦之類的科技產物。然而，整體經驗是相當個人化的，取決於個人使用經驗、可得的支援、科技運用所帶來的益處等因素，據此決定其態度與自信。

上述的研究結果顯示，老年人需要的是「用」而不是「學」，研考會於 2006 年也曾經針對中高齡民眾舉辦座談會，深入探討他們對於電腦網路的認知及需求，討論內容中「不會注音符號」對高齡者操作電腦上的確產生困難（研考會，2006）。由此可知，我們必須為高齡人口數位落差問題進行「定性」，首先，中高齡者並非無意願使用科技產物或電腦；但在學習上面與使用方面的確遇到困難，因此最好能夠用最簡易的方式來使用，這得由「人機介面」來改善，而非教育訓練；第三，在硬體設施與服務提供的質與量上都必須要提昇。整體而言，就是要回答一個簡短的問題：怎麼用？用來做什麼？

三、「新」科技與「老」問題

在此，所要提出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世代落差」問題究竟是社會變遷所造成的世代銜接問題，還是一個高齡人口勢必遇到的問題。前者所要表達的可見前文兩個圖表所示，無法進展的是目前 61 歲以上世代，由於這一世代是在科技發展之時對電腦與網路於職場使用較少的一群，因此，若這一問題是由於社會變遷而有的銜接落差，是否等到世代汰換時，這樣的問題會自然解決？

而若是後者，這一個問題是「老」的問題，也就是當人們隨年齡增長，體能與腦力發展亦或是社會退化⁷，造成這樣一個世代是每個人的必經過程，而

⁷ 由於離開職場以及脫離密集的技术學習與接處，而造成對新鮮事物理解力減退的狀況。

非只是「斷代」的特殊問題。

這在當前似乎不容易找出真正答案，但是或許可以由之前的經驗來嘗試推論，若以世代來區分，當前對電腦與網路使用上較為缺乏的世代，其對於一般家庭生活使用的家電卻沒有任何障礙，而類似於當前電腦與網路使用的障礙卻在更上一世代中發生。若由這樣的想像來看，與「新」科技障礙產生關連的似乎不只是某一世代，而是每一世代的「老」問題。倘若這樣的推論沒有錯，那麼關於「世代落差」問題就相當值得關注，而非僅以「弱勢」來視之與識之。

即便是世代銜接問題，當前屬於此一世代的人口並不在少數，況且真要達到世代汰換仍需要十數年以上的時間，若在下一個世代未能提昇至一定的水準，所牽涉的仍舊會是相當龐大的人口群。而若真為「老」問題，依據世界人口結構的發展，高齡人口的問題，即為人類全體的問題。

（一）、高齡化社會的需求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發現：82年9月底，台灣地區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有148萬5200人，佔總人口之7.09%，已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化社會指標；96年底止，我國戶籍登記人口之65歲以上老人計有234萬3,092人，占總人口10.21%，老化指數58.13%，均呈持續增加之現象。另依據行政院經建會的推估，預估至民國115年就會超過20%。⁸

依據內政部〈民國94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⁹顯示，在該年資料中，50~64歲國民對未來生活最擔心的問題，以自己的健康占32.52%最多，經濟來源占21.81%居次，自己生病(失能、失智)之照顧占11.26%再次之。65歲以上老人對未來生活最擔心的問題，以自己的健康占24.35%最多，經濟來源占15.52%居次，自己生病(失能、失智)之照顧占10.61%再次之。

這些統計數據的意義在於，人口老化問題已是不容忽視的社會議題，其影

⁸ 〈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與政策〉(<http://sowf.moi.gov.tw/04/01.htm>)；〈九十七年第十週內政統計通報(96年底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概況)2008/03/06〉(<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

⁹ 〈民國94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http://sowf.moi.gov.tw/stat/Survey/94old.doc>)。

響涵蓋勞動力、社會經濟、政府財政...等等面向；然而，當老年人口為社會人口結構之最大宗時，老人問題即成為整體人類的共同問題。因此，必須全面地對於老人福祉問題進行全面的考量，由前述資料可見 50 歲以上人口對未來生活最為擔心的在於健康照護（包括健康狀況與失能之照顧），其次為經濟。

荷蘭 Eindhoven 科技大學的 Graafmans 與 Bouma，為老人福祉科技做了如下定義：「老人福祉科技基於對老化現象的知識，從事技術和科技產品的研究開發，希望能為老人提供較佳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以及配合的醫療照護」（引自陳芬苓，2005）。這可包含消極面與積極面，消極面一般為運用目前各種社會福利、扶養、醫療等社會安全制度來因應各項經濟與健康方面的不足；但這些似乎不足以跟上人口老化的速度，同時也造成經濟財政上的壓力，使得人們不得不更進一步的思考，也就是並非等到老、病乃至於失能之時才進行介入。因此，如何應用各種科技輔助，使得生理機能漸趨衰退的中高者，能夠依照其不同身體狀況需要，能夠健康、舒適、安全地自主生活，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積極面向。因此，

早期健康科技的介入，可以延後或減少高齡人口在身體機能上的衰退速度，避免高齡者處於失功能的狀態而需要依賴個別人員的服務，進一步影響其獨立性、與社會接觸能力及生活品質，也可降低整個社會照顧的成本。（陳芬苓，2005）

技術可以作為一種補償機制，以協助人們進入老年期，特別是在認知和安全領域，同時也作為一種機制，優化他們的日常生活。（Horgas & Abowd, 2004）

這樣一來，協助人們進入老年，以及讓高齡人口「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都可讓高齡者身心受到妥切照顧。研究顯示，對所有人而言，「家」或是「居住環境」除了是一個房子以外，更具有許多不同的重大意義，包括地位

與成就；（房屋擁有者）；責任（維持一個家庭）；安全；自主性和隱私（個人的選擇和自由）。這些意義都代表著老人對於居處的需求。

另一方面，內政部〈民國 94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¹⁰同時指出，在當年資料中，50~64 歲國民會使用電腦者 34.55%；65 歲以上老人會使用電腦者僅 6.67%。此狀況顯示 50 歲以上人口對於電腦使用是有障礙的，因而在這資訊時代中，一則在工作上產生障礙，使之可能提早被排除於職場之外；其二，當前科技產物普遍被運用，但卻缺乏整合與親和性，使得中高齡人口對於科技產物產生「介面障礙」，因此高齡者將更難以獨自生活，又在日常生活中遭受排除，資料顯示高齡者最期望的生活方式是與子女同住，但在當前老化、少子的發展下，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不解決此類問題是不可能達成的。在此強調「介面障礙」而非「科技恐懼」乃在於其實已有相關研究指出高齡人口對於科技產品的使用問題，並非基於「科技恐懼」，甚至於對科技是有所期待與興趣的（Horgas & Abowd, 2004; Czaja & Lee, 2007）。例如高齡人口對於電視、電話、自動提款...等等，都可運用自如，因此，或許我們可以大膽宣稱，真正的問題不是來自於科技本身，而應是源於人本身的認知，以及科技發展是否真正來自於「人性」。

（二）、使用障礙的限制

經濟高度發展，商業活動頻仍，人們追求效率需求，使得絕大部分的商品設計與開發以及環境規劃，多以「健全壯年人」為標準對象。這原本是無可厚非之事，但卻也因此高度集中淪陷於價格殺戮戰場。其實仔細觀察一下，我們生活周遭存在的人們包括：男人、女人、小孩、年長者、力氣大、力氣小、孕婦、推嬰兒車、腳受傷、手受傷、慣用右手、慣用左手、手小、手大者等。這些「使用者」個別差異需求，已是不爭的事實，卻往往被忽視。

¹⁰ 〈民國 94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http://sowf.moi.gov.tw/stat/Survey/94old.doc>）。

日本因應高齡化社會，積極發展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¹¹。UD致力做到貼心設計，產品開發時，想到的不再只是外觀或使用方法，更考慮到使用者心理層面的感受，所以簡單地說，通用設計就是「貼心」與「關懷」的實現（張麗卿，2007）。

在論及高齡者在使用科技產品所遇到的障礙時，提及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該問題到底是「世代問題」亦或是「高齡者的普遍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要關切新科技使用障礙，是由於高齡人口由於處於科技發展銜接的斷代年齡層，所以產生使用障礙或是科技恐懼等問題；還是這是所有人一到某個年齡就會遇到的普遍問題。

根據高齡者的相關研究發現，高齡者在操作科技產品時，有著包括視覺（視野、視覺接受訊息速度、光源的感受、視覺距離、顏色辨別、閱讀能力..等）、認知機能（記憶力、反應力）等問題（廖哲政，2002；黃伯勳，2004）。然而由於當今科技產品的主要販售對象為並非高齡人口，而是以前述「健全壯年人」為主，使得這些高齡者的普遍問題，成為一種「障礙」。在研究中顯示，在操作上，複雜度與是否能有類似的生活經驗對於高齡者使用科技產品上具有一定的影響，精密且複雜性的發展趨勢，對於視力與認知退化的使用者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困難；另一方面，由於高齡者沒有相關的經驗可類比，使得在操作介面學習上也較不容易。根據黃伯勳（2004）對於高齡者電腦輸入介面相關研究指出，高齡者在使用觸控筆的效率明顯高於使用滑鼠。這樣的結果可以用以證明如果操作介面具有日常生活經驗的類比感受，那麼在高齡者學習上具有一定的成效。因此，在宣稱高齡者有科技恐懼之前，似乎應先嘗試改善使用者人機介面才是妥切的作法。也就是說，『與其說是科技恐懼，不如說是「使用障礙」』。

¹¹ 同時亦翻譯為「全適化設計」、「共用性設計」、「全民設計」、「共通設計」、「全方位設計」等。

四、小結

高齡者對於科技產物的使用，在前文所討論中指出，由於當前科技融入生活已是先進發展國家的必然趨勢，雖然可以宣稱不使用仍可自在生活，但就平等與正義來看，的確面臨著社會排除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將會日益擠壓被排除者的生活機會與自主權力。其次，雖然一般認為高齡人口數位落差問題是一個銜接的過度時期的現象，但本文探討將此一問題定性為設計與發展上，由於持續未將高齡人口的特質視為重要消費與使用族群，因此造成操作困境與使用障礙；事實上高齡人口並非對科技有所恐懼，甚至反之，高齡人口才應該是未來科技產物所應標定的使用族群才是，換句話說，倘若整體發展思維沒有改變，這問題將是所有人（非僅是高齡人口）在人生晚期都會遇到的「老」問題。

簡言之，科技發展不應對任何族群產生排除，高齡人口更是有機會藉由這些產物帶來福祉，既然如此，我們當然該由障礙排除著手來解決相關問題。

參、「障礙」與 U 化：Universal Design 與 Ubiquitous Computing

一、普遍與特殊：障礙定義的轉向

由於科技使用障礙是一項新的關注議題，因此我們可以由傳統關於「障礙」的論述進行瞭解，以嘗試進行概念的連結。「障礙」的界定上，一直有著不同的觀點，其中主要為醫療模型（medical model、bio- medical model）與社會模型（social model）的爭議（Bickenbach et. al,1999；潘佩君，2008）。醫療模型採用病理學的觀點，將醫學和角色理論相結合，認為身體機能異常或損傷，將造成個人在扮演日常角色與從事日常活動時產生障礙。也就是說，障礙的來源

在於個人疾病、創傷或是健康因素。這樣的觀點，被批評為將障礙因素個別化，也同時產生污名化，排除社會環境因素與社會責任的回應。相對於此，社會模型則認為障礙並非來源於醫療模型所述之個人健康因素，而是來自於社會環境，因而此種觀點也同時被稱之為社會-政治觀點（social-political perspective），其認為真正問題是社會構成的（social construct），甚至更直接的指控，這是一種社會壓迫的固有形式（sophisticated form of social oppression）（Bickenbach et. al,1999）。此觀點由少數弱勢者的立場出發，認為社會環境對於特殊個人不友善，因而產生障礙。社會模型的論點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主要立基論點。但該模型卻顯露出一些問題，例如無法回答障礙是否真來自於社會環境，是否真能不考慮個人本身的功能衰退因素；加上其由少數人經驗為主體，具有特殊人口的標的，同時也可能產生污名化問題（潘佩君，2008）。在醫療模型與社會模型的爭議之後，Oliver 與 Barnes 提出解決方式：醫療化模型（medicalization model）。主要在於倡導由醫療專業領域對於失能者進行介入，但其最終目的在於讓身心障礙者能夠回歸正常生活（Oliver&Barnes,1998）。

就在這樣的爭議當中，WHO 也在障礙的定義上有了多次的修改，由 1980 年採取醫療模型為主的定義與分類。由於社會模型與不平等議題的討論，後來便將社會環境因素納入架構之中，包括 1999 年的 ICIDH-2（國際損傷、障礙、及殘廢分類手冊；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以及 2001 年 ICD-ICF 都同時納入醫療與社會面向。

有別於以往將障礙視為某些特殊群體的少數問題，近年來多數同意「障礙是一種普同性的經驗」。其概念源於美國社會學家 Zola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一篇論文 Toward the Necessary Universalizing of a Disability Policy，這篇論文採取不同的角度討論身心障礙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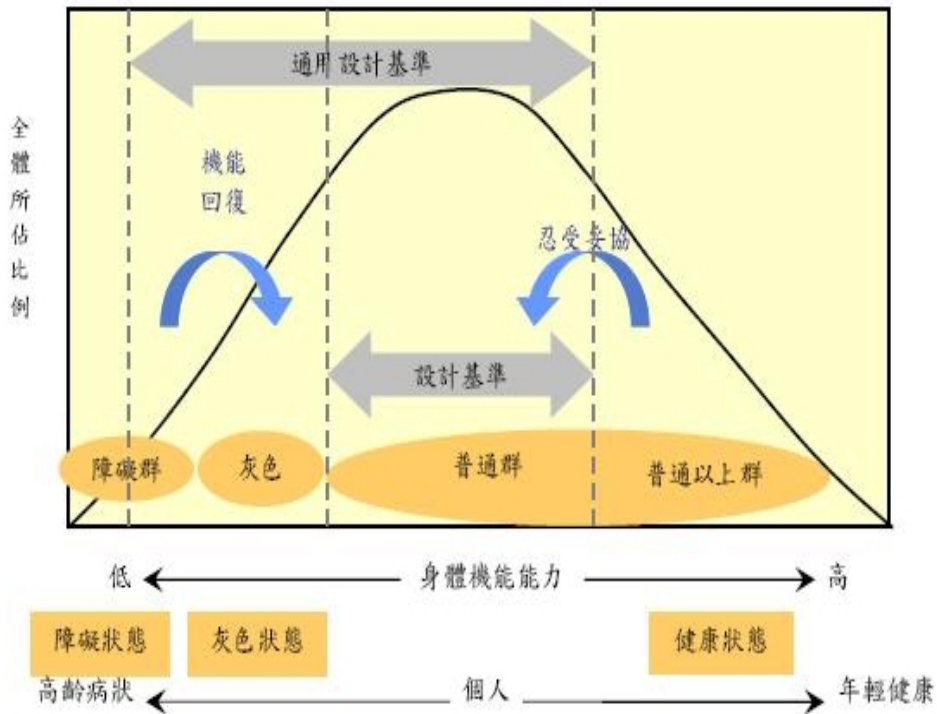
隨著社會進與醫療科技的發達，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身心障礙人口已經不同於以往，一方面因人口老化更多的人會在老年階段經驗身心障礙的過程，一方面因為醫療科技的進步愈來愈多的人，會受益於醫療科技而存

活下來，相對的也會有更多的人會處於終身的身心障礙狀態。因此，就身心障礙人口數量與身心障礙本質兩方面來看，Zola 認為以後的社會，身心障礙的經驗將是普同的人生經驗不同的是有的人終身活身心障礙受到限制的狀態下有的人會在老年開始經歷，有的人會在人生的中期開始經驗身心障礙的歷程。在他認為，身心障礙的區分不再是你們與我們的差異而是大家都會經歷身心障礙的風險。公共政策唯有意識到這樣的發展趨勢，在住宅、交通、就業等各個領域將無障礙與融入的概念納入，才能真正的達到消弭身心障礙者被社會排除與歧視的後果（轉引自王國羽，2003）。

據此，由普同主義（Universalism）出發，每個人都會老，老化過程中難免產生身心障礙，障礙問題的面對與排除，不光僅僅是針對部分群體，而是普適於所有的人們。

二、 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過去的設計基準，都以「普通群」為設計對象，而這個族群的人口數量也是最多，但是，相對的這樣的設計基準，沒有將左邊部分屬於障礙群或灰色（身體機能較差，如高齡者）考慮進去，如果以通用設計之概念，規劃設施基準，考慮的族群較廣，部分有障礙者、灰色族群，也會被考慮進來，而這樣設計概念而產生的設施，可以提供障礙者、灰色族群機能回復的功能，提供具有輔助性，以達到與一般人一樣移動能力的效果（徐淵靜，2006）。



圖一 通用設計概念圖，引自徐淵靜（2006）高齡社會之交通與運輸。

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概念與前述關於障礙的界定問題有著密切關係，1950 年代由於戰爭與小兒麻痺症的流行，使得社會開始關注肢體障礙的問題，此時所面對的問題，乃是一般生活環境對於肢體障礙者造成的生活不便與限制。因而產生無障礙設計（Barrier Free Design）的理念，然而隨著障礙界定的概念轉變，以及社會需求的差異，1970 年代後期，「親近性設計」（Accessible Design）被用來代表這種改變，不只是讓行動不便者可以補強功能，更希望能讓其回復日常生活。美國建築師 Michael Bednar 認為這還不足以滿足需要，而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 Accessible Housing Center 主任 Ron Mace 提出「通用設計」一詞，用以超越「親近性設計」的內涵，提出更廣泛適用的概念。這項想法並不是新的風格，而是對於需求與市場的認知，讓所有設計與生產的物品都能被各種人口群所運用。「當這樣的理想完全實現，將會成為隱形的、可

行銷的、有利潤且安全的環境，並在身體與情感上都能接近大多數使用者」（Fletche, 2002）。

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概念由於不同的運用有著一些不同的著重要點，但其共通點在於，通用設計即是要盡最大的可能，使得設計出的有形產品或是無形方案，造福所有人群。讓有障礙的人能夠如常生活，讓一般人更為便利，並且即便未來可能身心有所衰退，亦能安然面對。然而對於社會同時具有多項意義，例如高齡化社會來臨的回應；由於通用設計中「通用」的概念，可免除早期針對性設計所造成的歧視；由於兼顧市場與需求面向，使用者滿意度與競爭力同時可以提昇；藉此，更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形態，增進高齡人口、身心障礙者以及推及所有人的福祉；最重要的是，如 Ron Mace 所提及，這些設計並不是新的，只需要概念與心態的轉變，鑲嵌入生活中，在自然隱形下，雖會對人們生活帶來改變，但卻不需要太大的成本，以及對環境的大改變。

三、 通用設計概念的導入

既然前文已將高齡者數位落差視為是一種「障礙」而不是一種「恐懼」，那麼我們即可嘗試以通用設計的構想，來思維解決此項問題。其中目前各科技先進國家的U化發展¹²，這個U指的是Ubiquitous Computing，但在概念上，我們可以將其可視為一種ICT的Universal Design。

Ubiquitous Computing (UbiComp) 為已故的全錄帕拉奧圖研究中心 (Xerox PARC;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首席科學家馬克魏瑟 (Mark Weiser) 博士於 1988 年所提出。他並在其 1991 年發表的文章〈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¹³中一開始便提到：「影響最深刻的是那些已經未能察覺的技術，它們已經將自身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難以區辨」(Weiser, 1991)。他將寫作視為第

¹² 目前主要的包括歐盟的「i2010」、日本的「u-Japan」、韓國的「u-Korea」、台灣的「u-Taiwan」；其餘包括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都有類似的計畫進行中。

¹³ 以下關於 Weiser 提及概念為摘譯原文改寫而成。

一個資訊科技來思考，它能夠將人們的口語表述記錄下來並且長時間儲存，不受個人記憶限制。直至今日，這樣的技術無所不在，在各個領域影響被使用著，並且不需要特別受到關注。Mark Weiser認為以矽晶片為基礎的資訊科技則完全沒有成為環境的一部份。雖然已經有極大數量的電腦被販售使用，但是由於必須要使用複雜的「行話」與其溝通，因此，大部分電腦仍舊存在於它們自身的世界中，而不是人們的生活。Mark Weiser與PARC的同事提出他們的論點：個人電腦的晦澀難懂的状态，與「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無關，「個人」的電腦本身就是一種錯誤。

(一)、注意力的釋放：專注於工作，而非工具

據此，Mark Weiser 等人構思一種新的思維，即便是攜帶式電腦都被其認為是過渡產物，他們要的是以人類環境為考量，讓電腦自身隱藏至幕後。這不僅僅是技術的問題，同時也是一種心理反應：「當人們習得某事夠好，將不需要刻意覺察到它。…唯有當這些東西消失時，我們才能真正不需思索的自由使用；然而將焦點集中於超越於此的新目標上」。無所不在的電腦構思，與大部分電腦發展趨勢不太相同；它不僅是意味著電腦可以與任何地方進行連線，因為就算是擁有一部行動電腦可以與世界各地連結，我們的焦點還是在這小小盒子之上。

(二)、不是虛擬真實，就是真實

Mark Weiser 的想法中，「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是與其對立的概念，他認為虛擬真實雖然可以讓人們探索難以到達的場域，但虛擬真實只是一張地圖，而非一個場域(virtual reality is only a map, not a territory)。或是說：虛擬真實只是在一個巨大裝置中模擬世界，而非無形地為已經存在的世界增添價值。在他的概念中，這些東西終將融合入人們社會之中，就是真實。

(三)、無所不在的網絡

大多數的電腦將參與這樣的改變，而它們將相互連結為一個無所不在的網絡 (ubiquitous network)。每個房間有著數百部電腦。這似乎有些嚇人，但就如同牆內密佈的電線一般，數百伏特的電流在裡面流走，數百部電腦也將在人們未意識到的情況下運作，並且在不知不覺中幫助人們完成其日常工作。

標籤 (tabs) 是體現這概念的最小構成部分。可以作為最簡易的辨別與聯繫，這就是雲端的最初概念。數以百計的處理器與顯示器不會像滑鼠與視窗系統一樣是「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就只是一個愉快而且有效能的「地方」(place)，讓事情得以解決」。

Mark Weiser 提及 ubiquitous computing 的議題，並不是要闡述什麼原則，也不是要條列出所有複雜的技術。而是想要藉由目前看得到的事物，拼湊出未來生活將會如何的圖像。希望推動這項技術，也就是希望扭轉個人電腦於生活與工作場所的型態，而讓人們覺察到更多在另一端點的人，而非僅止於電腦。Mark Weiser 在現在的辦公室中，人們看著螢幕，對同伴視而不見；在虛擬實境的概念中，外在的世界與人們彷彿不再存在。Ubiquitous computers 卻不同，它存在於人們的世界中，不對人們互動產生障礙，如果有，也是藉由更直接的聯繫，使不同地區與時間的社群帶來更緊密的凝聚。

Mark Weiser 認為這些發展在二十年內即會發生，與個人電腦相比，Ubiquitous computers 並不會有多少功能是新的，但卻可以使工作更快更容易，花費更少的心力。在社會議題上，也可降低電腦上癮者，當電腦無所不在，也就沒什麼特別需要考慮成癮的問題。最重要的，其可以解決資訊超載 (information overload) 的問題，人們在樹林中散步可以獲取的資訊將不少於任何電腦系統，但在森林中散步的放鬆感受必然甚於坐在電腦之前。「適合人環境的機器，不是迫使人進入它們，而是讓人們使用電腦像在樹林裡散步一樣舒暢」。

四、 實際發展方向

Mark Weiser所提出的Ubiquitous Computing構想以及MIT團隊所提出的「活氧計畫」¹⁴都將為這樣的問題找到解決方案，真能夠「將一些影響深刻的技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唯有當這些東西消失時，我們才能真正不需思索的自由使用；然而將焦點集中於超越於此的新目標上」(Weiser, 1991)。真正需要的科技是所有技術圍繞著人，而不是所有人關注著使用介面。也同時可以使得人們真能在如氧氣般充斥著科技產物的環境下，達到活氧計畫所欲之：「花最少的力量，而能做到最多的事」。

就前述高齡者的首要需求，健康與照護面向來說，越來越依賴科技的進步來預防、覺察與處理高齡者於社區居住所可能產生的複雜問題。新的運用範圍涵蓋植入、穿戴式科技(implanted and wearable technology)；以及在生活中嵌入式的分散網絡(distributed networks embedded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遠距提供居家健康服務(in-home delivery of health services from remote locations)。這些技術以高齡人口幾項迫切的健康需求為目標，包括促進身體機能和社會的互動，促進早期診斷，從而使自我監測的健康狀況，並保證適當的治療。在個人層面，它們有助於維護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並且盡可能長時間地保有其為一獨立自主的人。在總體層面，它們的價值在於幫助壓縮的發病率，以符合健康生活的目標(Dishman & Matthews & Dunbar-Jacob, 2004)。

在不同的研究中有著不同的分類：Bouma & Graafmans 將老人科技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 Mobility and Transport：與高齡者行動上相關的科技發展；第二類是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是關於高齡者認知上的表現以及與其他人溝通上的協助；第三類是 Housing：是居住環境品質的改善；第四類是 Home Health Care Technology：是居家健康照護方面的科技。之後，Fozard et al.又加上工作及娛樂兩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高齡實驗室(Age

¹⁴ 〈About Project Oxygen〉(<http://oxygen.lcs.mit.edu/>)。

Lab) ”的 Coughlin 教授對於快速增加的高齡人士所需要的科技產品，則歸納成以下五項：終生的運輸系統 (lifelong transportation)、健康的家 (healthy home)、個人溝通系統 (personal communication)、高生產力的工作環境 (productive workplace)、對照護者的支持 (supporting to the care giver) (引自陳芬苓，2005)。

然而，前述針對高齡化科技的輔助，設計上有著幾項共同的重點目標：(a) 對於運動、知覺、認知方面障礙的輔助裝置 (assistive devices that compensate for motor, sensory, or cognitive difficulties)。 (b) 監控與回應系統，包括突發事件的反應以及危機處理，以期藉由預警來降低危機與對新問題的反應 (monitor and response systems, both for emergency response to crisis situations as well as for early warning of less-critical and emerging problems)。 (c) 協助社會溝通 (social communication aids。) (Horgas & Abowd, 2004)。

在居家輔助裝置上，目前最常見的即為各項的行動協助，而在知覺方面大多是記憶輔助，可以是運用簡便的時程設定功能，也可能是未來發展的人工智慧系統，即可以補強高齡者在記憶方面的衰退，最常見的也最普遍的就是服藥提醒。

監控與回應系統，可以讓高齡人口更自由、也更安全的獨自行動，對其子女而言，在允許長輩獨立活動時，也同時在一些危機上提供安全網。最可能發生的就是跌倒，以往需要周遭有人可以協助呼救，但監控設備則可在最快時間發出警訊。監控系統包括了幾個思考面向：(1) 哪些訊息是被紀錄與傳送的，可以是醫療訊息 (呼吸、血壓、心跳、服藥狀態...)、運動數據、簡單的覺察訊息。(2) 隔多久的時間針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可以是瞬間反應，也可以進行長時間趨勢分析。(3) 這些資料與個人的關連性。醫療警示系統可以提供諮詢，並且提供電子病歷，可進行遠距醫療或是健康狀態的監控。(4) 高齡者需要如何配合。例如定位系統、監控身體機能的配戴裝置、對環境的感測裝置...

最後，社會溝通方面，很多高齡者面臨的不僅僅是身體機能的老化問題，社會性的老化也是一項值得被注意的重要問題。地理上的距離與老人行動的

限制，使得家庭成員接觸疏離，同步的通訊設備可以使得子女與家中長輩排除地理限制進行互動，而更有新興的構想，即為數位家庭（digital family），其中記錄了家中每一位成員的每日行動資訊，雖然成年子女仍舊不在身邊，但在心理上卻可產生一種微妙的安定感。

如何能將其視之為積極面向，就在於若能解決中高齡人口的「介面障礙」，那麼才能真使得科技與人類生活緊密結合。對於前述經濟與財政問題，配合科技輔助便可以藉由中老年人延長工作年限來有效解決，這在未來人口結構下，是必然的趨勢；而在「在地老化」（age in place）的需求下，安全而便利的居住設計更可滿足高齡者的內心需求，同時減低工作人口的照顧負擔。

五、 小結

Ubiquitous Computing 的構思並未在意圖上與 Universal Design 進行類比或是結合，但本文發現其是具有意義上的一致性，也就是在發展上，由特殊性轉向普遍性。身心障礙研究中，由針對特殊障礙者設計的輔具，朝向改良友善環境；Ubiquitous Computing 可以帶來的啟示為，針對數位落差問題，人們需要的是用，不是學。但如果是依循著人性發展，Universal Design 或是 Ubiquitous Computing 即能以低成本，而對環境產生大改變。

肆、 結論

科技發展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但在研究發展中卻往往是兩條平行線，社會福利領域更是少有相關討論。現今台灣屬於科技發展先進國家，因此指稱為資訊社會當不為過。這也代表了早期資訊社會著作認定 ICT 所形塑出來的「虛擬空間」，這樣一個新場域或是另一個空間的觀點必須改變，因為整體來說這已經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空間了。在這樣的現況中，如果有某一些人由於某些因

素而無法融入這樣的「完整」日常生活空間中，即是一種社會排除的形式，必須受到關注。

在數位落差造成的排除中，以高齡人口同質性較高，一般改善方案由於大多著力於教育與訓練之上，對於其誘因與需求滿足有著相當大的「代溝」，造成的改變效果也相當有限。在問題的標定上，普遍認為這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問題，會隨時間自然解決，但本文認為，科技發展是動態的、無止境的，新科技產物不斷出現，而人年齡不斷增長，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中使用屬於自己時代的產物，但是卻同時得面對新發明的「高科技」，這種科技在前跑，人在後面追的情景，將會在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出現，因此，這絕非特殊的斷代問題，而是一種普遍問題。

回顧社會排除的基本意涵，排除者指不能分享經濟成長成果的人而言，包括身心障礙者、自我毀滅者、老年和殘障者、藥品濫用者、青少年犯罪者、反社會者等。在此之中，沒有社會保障，且又被貼上社會問題的標籤。被排除的人的共同點，是無法適應一個社會所決定的規範，因而淪為社會弱勢團體（李易駿，2006）。如同前文所提 Sen 之觀點，社會中不幸人士的意見或偏好得到重視才是社會福利的提升，而近年來社會工作的 Empowerment 實務觀點也同樣關注此一面向，因此在進入資訊時代中，現在與未來都不能忽視這樣的議題。

Williams-Searle (2001) 針對工傷的歷史研究指出，工業化早期的鐵路工人，在工作場所受傷被視為是一種勇於挑戰危險的表現。因為工作而導致身體損傷的工人往往被視為有經驗的象徵，在鐵路工人的兄弟會中生活，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而隨著科學管理的引進，工傷被認為是不遵守工作守則、破壞規範的個人危險行為。在科學管理的制度下，工作場所受傷的工人往往被開除或是被排除在遠離工人生活圈的慈善機構、療養院之中（轉引自張恆豪，2007）。

依據這樣的脈絡思考，高齡人口在社會各個領域都曾經居於中堅地位，傳

統話語中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即指出老年人在生活與社會各方面的經驗累積，是屬於一種豐富的社會資源。曾幾何時，當老年人與障礙議題相連結，前述的各種限制與隔離便加諸於這些「寶」之上；更甚者，隨著全球面臨的少子女化議題的受到關注，這些「寶」更成了人口統計數據上的「依賴人口」。

發展心理學家 Erikson (2000) 曾針對二十九位八十歲高齡長者作深入訪談之生命回顧，以說明其生命週期概念，其中「活躍參與」(vital involvement) 與高齡人口所面臨的絕望期危機有著相當的關連，幾乎所有他們受訪到的老人皆受到相當程度的老年生理與心理失調影響，高齡帶給人生理上某些程度是無可避免的衰退與行為限制，但人的心智，不一定會因年老衰竭而有所影響：「保持人生的完整是這時期最主要的和諧性格傾向，這股力量以與同樣瀰漫在此時期的「絕望感」取得平衡。至於最後的一股力量「智慧」是在面對死亡時，對生命超然的關懷。雖然此階段人們肉體及心理功能日益衰老，的確，老年人仍能保持其智慧，並學著傳達其完整的經驗」。然而其受訪者表示即使在部分生活上需要外在協助，但卻仍希望保有更多的自主空間，這不僅與獨立生活的能力有關，也同樣與能在熟悉的環境中，有條理地在完成日常事務之能力相關。在互助的環境中，即使遭遇到身體衰竭與自主性有無之疑惑，老年人仍然可以以自信的態度來面對。反之，如果生活在陌生的環境中，缺陷、限制，與羞愧感，將會慢慢地侵蝕老年人的生活。因此，在其研究中指出，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將可消滅其絕望期的失落感，但是限制主要在於「生理的限制」：身心機能衰退。「活動範圍」：研究發現由於各種對於老年人行動的限制，而造成活動範圍縮小，這將常導致老年人生活態度不自主的退縮，這是一種不適應症，常常會導致老年人的遲鈍及情緒沮喪。「環境熟悉度」：陌生環境將剝奪老年人獨立並掌控自己生活的權利。

不需要與恐懼是較常被用來回應落差問題的答案，事實上，在高齡化社會中，健康照顧、子女陪伴與在地老化是高齡人口的普遍需求，ICT 的運用，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來滿足這樣的需求，而障礙被視為恐懼也是一大誤解，同時更是一種污名化，問題的關鍵在於高齡人口在被給定的規範中，沒有

被納入考量之中，因此，排除相關障礙以及去污名化便是其中關鍵之所在。

本文由身心障礙問題研究中，Universal Design 排除空間障礙的思維，發現與近來倡導之 Ubiquitous Computing 有著共通之處。兩者皆認為人本設計應當鑲嵌於所有環境之中，不需要特別關注即能排除生活障礙、增進福祉。這也同時兼具一樣的意義，即當 Universal Design、Ubiquitous Computing 的發展原則成為共識，共享其便利性的不僅僅是當前的身心障礙者、高齡人口，亦或是未來的可能障礙者與未來的高齡者，而是包含所有人。在基本生活與自主權力的需求下，這或許是解決高齡人口數位落差難題的可能解決之道。

前文提及許多國家紛紛提出 U 化，看似可以如本文所欲，藉由 Ubiquitous Computing 的概念受到重視，因而有機會改變現在的發展與當前的環境，但實際內涵上仍以日本較為符合以人為本的發展趨勢，至於韓國與台灣，大抵接續著 E 化、M 化乃至於到 U 化提出宣稱計畫，但本質上仍舊以科技產業以及經濟發展為主要關注焦點，可說是名不符實。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僅就概念上進行討論，藉由 Universal Design、Ubiquitous Computing 的引入與連結，作為相關討論的開端，其後的研究可以針對 Universal Design、Ubiquitous Computing 的內涵進行深入探討；在政策方面，可就不同國家對於 U 化的發展、雲端政策，分析與評估其內容與成果；最後藉由概念與政策的分析評估，發展出真正有效的方案與計畫。

參考文獻

- 內政部（2008）。〈九十七年第十週內政統計通報(96 年底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概況)〉。資料檢索日期：2010.03.21。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
- 內政部(2010)。〈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與政策〉。資料檢索日期：2011.02.18。網址：<http://sowf.moi.gov.tw/04/01.htm>。
- 內政部（2005）。〈民國 94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資料檢索日期：2010.02.18。網址：<http://sowf.moi.gov.tw/stat/Survey/94old.doc>。
- 王國羽（2003）。〈身心障礙研究概念的演進：論障礙風險的普同特質〉。2003 台灣社會學年會。資料檢索日期：2010.03.21。網址：http://tsa.sinica.edu.tw/Imform/file1/2003meeting/112903_1.pdf。
- 行政院（2002）。〈挑戰 2008 國家計畫〉。資料檢索日期：2011.01.18。網址：<http://www.etaiwan.nat.gov.tw/content/application/etaiwan/et100200310000000/guest-cntgrp-browse.php?ordinal=10020031>。
- 行政院研考會（2006）。〈95 年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報告〉。資料檢索日期：2011.01.18。網址：http://www.digitaldivide.nat.gov.tw/數位落差調查報告/95_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報告/menu.html。
- 行政院研考會（2007）。〈96 年數位落差調查-世代篇〉。資料檢索日期：2011.01.18。網址：<http://www.rdec.gov.tw/public/Attachment/852111514871.pdf>。
- 李孟壕、曾淑芬（2005）。〈數位落差再定義與衡量指標之研究〉。《資訊社會研究》9，89-124。
- 李易駿（2006）。〈社會排除：流行或挑戰〉。《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0（1），1-47。
- 林子超（2000）。〈現代理性困境與救贖——哈伯馬斯對西方理性主義的重建〉。

資料檢索日期：2010.01.18。網址：<http://life.fhl.net/Philosophy/bookclub/society/06.htm>。

林宇玲（2003）。〈電腦恐懼的理論探究〉。《資訊社會研究》，5，327-358。

林志忠（2001）。〈科技社會何處去？論科技素養教育目標〉。《菁莪季刊》，12（4），25-34。

徐淵靜（2006）。《高齡社會之交通與運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NSC94-2420-H163-001-KF。

張恆豪（2007）。〈特殊教育與障礙社會學一個理論的反省〉。《教育與社會研究》，13：71-93。資料檢索日期：2010.03.21。網址：<http://www.nhu.edu.tw/~henghao/16805550-200706-x-13-71-93-a.pdf>

張麗卿（2007）。〈究極日本通用設計體貼中湧現的商機〉。《能力雜誌》，2007年8月號，競爭優勢專欄。

陳怡如（2007）。〈台灣目前數位落差現況之探討及因應對策〉。資料檢索日期：2011.01.18。網址：http://thinktank.stpi.org.tw/eip/index/techdoc_content.jsp?doc_id=1195045554187&ver_id=3。

陳芬苓（2005）。〈科技在老人健康照護之應用與發展〉。資料檢索日期：2010.05.25。網址：[http://sowf.moi.gov.tw/19/quarterly/data/110/17 科技在老人健康照護之應用與發展.doc](http://sowf.moi.gov.tw/19/quarterly/data/110/17%20科技在老人健康照護之應用與發展.doc)。

黃柏勳（2004）。《高齡者電腦輸入介面之使用性與效率》。台北：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榮宗（2004）。《校園數位落差因應策略分析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學系碩士論文。

廖哲政（2002）。《高齡化社會之產品使用性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瑞華（1999）。〈飢荒、貧窮與福利—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en的貢獻〉。資料檢索日期：2010.01.20。網址：<http://chntlb.chshs.tpc.edu.tw/science/content/1999/00060354/0014.htm>。

潘佩君 (2008)。〈高齡化社會趨勢下老人與障礙者的交通運輸議題〉。資料檢
索日期：2010.01.20。網址：<http://www.sw.ccu.edu.tw/modules/Seminar/97053002.pdf>。

Bickenbach, Jerome., Chatterji, Somnath, Badley, E.M., and Ustun, T.B.(1999).
Models of disablement, univers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8.
1173-1187. Retrieved 29-1-2010, fro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BF-3W086M8-5&_user=1495503&_rdoc=1&_fmt=&_orig=search&_sort=d&view=c&_acct=C000053192&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495503&md5=0c0bfa198f879eb42f14644b0b3aaf7c.

Brady, David(2003). *Rethinking the Sociological Measurement of Poverty*, Social
Forces, vol.81 no.3 pp.715-752.

Brown ,John Seely & Paul Duguid (2000).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astells ,M. (原著)，夏鑄九 (等譯) (1998)。《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
山出版。

Castells, Manuel(2001a).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 (原著)，夏鑄九 (等譯) (2001b)。《千禧年之終結》。台北：唐山。

Covington, G. A. & Bruce H. (原著)，賴志純 (譯) (1998)。《親近性設計》。
台北：六合。

Czaja, S. J. & Lee, C. C. (2007). The impact of aging on access to technology.
Universal Acces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5, p.341-349. Retrieved
22-1-2010, from http://www.sigaccess.org/newsletter/sept05/Sept05_02.pdf.

Czaja,S.J.& Lee,C.C.(2007).*The impact of aging on access to technology*.
Universal Acces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5, p.341-349.

Davis, F., Bagozzi, R. P. and Warshaw, P. R. (1989).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 Management Science, 35(8): 982-1003.
- Dishman, Eric & Judith Matthews & Jacqueline Dunbar-Jacob(2004). "Everyday Health: Technology for Adaptive Aging", from *Technology for Adaptive Aging*, Richard W. Pew & Susan B. Van Hemel, Editors,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Workshop on Technology for Adaptive Aging,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etrieved 29-6-2010, from http://books.nap.edu/openbook.php?record_id=10857&page=179.
- Erikson, E. H., Joan M. E., & Helen Q. K. (原著), 周怡利 (譯) (2000)。《老年研究報告—人生八大階段》。台北：張老師文化。
- EU (2006). Internet for all: EU ministers commit to an inclusive and barrier-free information society. Retrieved 20-10-2010, fro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6/769&format=PDF&aged=1&language=EN&guiLanguage=en>.
- Fletcher, Valerie(2002).〈全民設計—21世紀以人性設計爲主的設計〉。《設計》，103期(2002/02)。
- Hill, T., Smith, N.D. and Mann, M. F. (1987). "Role of Efficacy Expectations in Predicting the Decision to U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Case of Computer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2: 307-313.
- Horgas, Ann & Gregory Abowd(2004).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Living Environments for Older Adults", from *Technology for Adaptive Aging*, Richard W. Pew & Susan B. Van Hemel, Editors,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Workshop on Technology for Adaptive Aging,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etrieved 20-9-2009, from http://books.nap.edu/openbook.php?record_id=10857&page=230.
- Ihde, Don (1993).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 Introduction*, N. Y.: Paragon House.
- Margaret Wertheim (原著), 薛絢 (譯) (1999)。《空間地圖—從但丁的空間到網路的空間》。台北：商務。
- Oliver, Mike & Barnes, Colin (1998). *Disabled people and social policy: From exclusion to inclusion*. Longman: New York.

Ruggles, Patricia(1990). *Drawing the Line*.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Silver, Hilary (1994).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3(5-6): 531-578.

Weiser,Mark(1991).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 Retrieved 18-10-2009,
from <http://www.ubiq.com/hypertext/weiser/SciAmDraft3.html> .

研究論文

「男性養家模式」？從女性作為「照顧者」的勞動參與經驗檢視其意涵^{*}

洪惠芬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11 年 10 月 3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2 年 1 月 22 日。

^{*} 本文為 97 年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為 NSC 97-2410-H-031-011。感謝兩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指正，文中謬誤由作者自行負責。

中文摘要

因為依賴者對照顧的需要是人類作為生物無法迴避的現實，任何一個社會都得設想出一套制度安排來解決依賴者對照顧的需要。就某種程度來說，「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家庭內性別分工正是這樣的制度安排。因此，如果我們的社會基於對「性別平等」理念的追求，企圖改變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安排，讓女性得以從家庭照顧任務中解脫出來；那麼我們的社會緊接著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女性留下來的家庭照顧任務該由誰來承擔？而且，假使就像女性主義者說，女性過去被要求承擔家庭照顧的任務，使她們身陷性別不義的處境；那麼我們的社會在設想男性養家模式之後的照顧制度安排時，也不應重蹈覆轍：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應當盡可能地確保任何一個接替承擔照顧任務的人的處境獲得基本程度的保障。

本文將檢視「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照顧任務、與照顧者處境、以及它的鬆動對照顧任務、與照顧者處境所造成的影響。本文將先分析「男性養家模式」的內涵、以及它的變遷對照顧任務所產生的衝擊。接著，我會將焦點放在「男性養家模式」變遷之後的出路。我將從「受薪勞動」與「照顧任務」兩者間的矛盾與衝突，去討論可行的出路。

關鍵字：男性養家模式、女性勞動參與、照顧者、理想工作者、勞動力的商品化與祛商品化

**An Examination of ‘Male Breadwinner Model’:
On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s as ‘Caregivers’**

Huifen 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Each human society should make efforts to settle certai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solve the dependent’s inevitable need for care. To some extent, the gender labor division within family, under ‘male breadwinner model’, may be seen as suc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Hence, if our society attempted to transform the existing gender labor division within family, to liberate women from the role of family caregiver, based on the ideal of ‘gender equality’, we might be immediately confronted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o must assume the burden of family caregivers left by women? And, as feminism has suggested, women have been trapped into the situation of gender injustice, because of being required to stay within family and to assume the care burden. Thus, when our society designs the care arrangements of post-male breadwinner model, we should avoid the same mistakes, that is: we ought to try our best to protect all the persons who take the place of women’s given burden of caregivers from the unjust treatment.

My article examines the care arrangements and the situation of caregivers under ‘male breadwinner model’,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this model’s declining. I first analyze the conception of ‘male breadwinner model’, and discuss what influen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le breadwinner model’ made on the care arrangements. I then intend to be focused on the ways out of post male breadwinner model, based on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wage labor’ and ‘care task’.

Keywords: Male Breadwinner Model,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Caregiver, Ideal Worker, the Commodification and Decommodification of Labor Force.

壹、前言

台灣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同其它工業化國家相比一直偏低。但是就長期來看，女性以及已婚女性對勞動市場的參與對台灣來說，就像它對其他工業化國家，是「不可逆轉」的社會變遷趨勢。這樣的社會變遷趨勢意味著：未來在台灣，凡是成年女性，只要具備足夠的工作能力，她將跟成年男性一樣投入勞動市場。不少論者將這種男性、與女性均投入勞動市場的社會變遷趨勢視作「男性養家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的式微（Cf. Crompton, 1999）。

過去，社會學家在看待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變化時，一直以「男性養家模式」的興起與式微作為歷史轉折的時間參考點。簡單地說，工業化使得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由農業走向工業。這樣的轉變導致工作場所逐漸和家庭領域分離：家庭只處理再生產事務。家庭、與它所處理的再生產事務皆被看作私人領域的範疇，由女性負責。女性完全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整個家庭的所得維持由男性負責。許多論者將這種將女性被賦予再生產任務、並因此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的狀態稱作「男性養家模式」。隨著「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製造業部門在生產體系的重要性逐漸被服務業取代，再加上女性教育程度與性別意識的提升，女性逐漸整合進勞動市場。「男性養家模式」才開始式微。

這種理解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歷程的觀點跟結構功能論的影響脫離不了關係。Pfau-Effinger（2004）認為，在這樣立場之下，無論是「前現代」轉變至「現代」之際，家庭領域與生產體系分離，女性被排除在生產活動之外並被要求一肩扛起照顧依賴者的責任；或是「現代」轉變為「後現代」時，女性離開她們被賦予的照顧任務，重新被整合進生產體系；全被視作一個社會「工業化」與「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就某種程度來說，這種「現代化論」確實捕捉到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變化與特定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歷史關聯性。不可否認地，女性在工業化初期被排除在生產體系之外，並承擔起那些被留在家庭領域內的再生產活動；它與工業革命之後生產性活動逐漸從家庭領域中分化

出來的結構性轉變，的確存在相當程度的關聯性。同樣地，二十世紀後半女性又重新被整合進生產體系；這樣的變化亦和服務業部門的崛起及擴張為女性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經濟結構變動有密切的連結。儘管如此，隨著九〇年代社會學界與女性主義學者對女性參與勞動市場趨勢的經驗研究越來越豐富，這個從「現代化」來理解女性參與勞動市場變化的立論開始遭受到挑戰。

首先就實然層次來說，工業化初期女性被排除在生產性活動之外的程度，並不像「男性養家模式」這個概念所指稱的那般高。Jassens (1998) 即提醒我們：在考察女性與生產性活動或勞動市場之間的關係時，如果將不同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差異考量進來，那麼「男性養家模式」與「工業化」之間並不像前述「現代化論」所預設的那樣，存在必然的歷史連結。Pfau-Effinger (2004) 分別回溯德國、荷蘭及芬蘭這三個歐洲國家工業革命前後的歷史後發現：只有德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途徑接近「現代化論」所描述的，「男性養家模式」的出現與工業化有比較緊密的歷史連結。Pfau-Effinger (2004) 還進一步指出：就算在「男性養家模式」蔚為主流的情況下，也不是所有階級的家庭都承受得起「男性養家模式」的家庭生計所得維持方式。德國的經驗顯示：儘管在一九五〇年代，「男性養家模式」已經是德國當時對家庭的理想圖像，但是仍有相當比例的工人階級家庭妻子在迫於家庭所得較低的無奈下，不得不進入勞動市場分擔丈夫的養家責任。顯然，「現代化論」的史觀顯然太過簡化女性被排除和整合進生產體系或勞動市場的歷史變遷。它同時忽略不同社會在文化規範的差別、與不同階級的女性在經濟處境的差異，對女性投入生產性活動可能產生的影響。

其次，「現代化論」也輕忽了：「男性養家模式」作為一個實然的概念並不只描述大量女性被排除在生產體系之外的狀況而已，它還同時意指著生產體系將女性排除於外後在家庭內部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安排。國內外針對家務勞動的經驗研究都指出：儘管越來越多已婚女性進入勞動市場，而且她們投入有酬工作的心力與時間也越來越高，但是她們男性的另一半並沒因此而大幅度地增加他們投入照顧任務與家務勞動的心力和時間。換言之，家

庭內部照顧任務及其他無酬家務勞動的分配最後沒有像「資源交換理論」所預期的那樣隨著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在勞動市場的表現提升而趨於性別平等（Cf. Thompson and Walker, 1989）。夫妻皆外出工作的「普遍養家模式」儘管日益普及，但是因為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安排仍舊穩固，因此妻子從工作崗位回家後還得繼續 Hochschild（1990）所謂無酬的「第二輪班的工作」（second shift）。

「現代化論」似乎過分樂觀：就家庭內部照顧與家務任務仍由女性承擔的狀況來說，「男性養家模式」的鬆動只是局部的。

最後，儘管夫妻皆外出工作的「普遍養家模式」持續地擴張，但是「現代化論」顯然沒看到：已婚女性採取的勞動市場參與方式同「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男性作為養家者的動市場參與方式並不相同。女性普遍採取的勞動參與方式無論在勞動時間的安排上、或在工作歷程的連續性上都不同於男性。以勞動時間安排來說，許多文獻都指出：那些自戰後陸續投入勞動市場的已婚女性當中有相當高比例是採取「部分工時」的就業型態（part-time employment）。此外自一九七〇年代起即有相關研究指出：女性很容易受家庭生命歷程中某個階段的來臨或結束，而在勞動市場中反覆地進出。

顯然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後的社會與經濟處境並不像「現代化論」所呈現的那般樂觀。「男性養家模式」並未隨著越來越已女性投入職場而全盤地鬆動。即便妻子分擔養家責任的雙薪家庭已經越來越普遍，但是妻子仍舊被期待擔起對未成年子女、或家中其他依賴者的照顧任務。許多女性因此陷入「時間貧窮」的窘境。更棘手的是，家庭照顧任務的承擔還連帶地影響到女性在勞動市場的表現與成就。女性為了兼顧家務照顧任務普遍採取一種不同於男性那種「全時」且「終其一生」的就業策略。這樣的就業策略讓女性即使得以進入勞動市場，也是處在一個相對邊陲的位置。

對許多女性主義者來說，讓女性重新整合進勞動市場，既是促成「性別平等」的手段，也是「性別平等」本身的目標之一。因此「男性養家模式」一直是女性主義極力批判的對象。「男性養家模式」的存在不但代表著女性被排除在生產體系與勞動市場之外；而且就「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家內性別分工安

排所具備的規範性意涵，顯然它本身就是造成女性被排除在勞動市場的障礙。所以如果「男性養家模式」並沒有如前述「現代化論」的預期那樣自動隨著女性參與勞動市場而告終，那麼這對女性主義者而言不只意味著女性還未被充分地整合進勞動市場，這也表示：家庭內部的照顧任務對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障礙也比想像中大。

本文雖然同樣以「男性養家模式」作為主題，但是我在這裡並不循傳統女性主義者的途徑，從「性別平等」的立場去檢視「男性養家模式」。本文想將焦點放在「照顧任務」。我當然同意：讓女性同男性一樣平等地參與勞動市場是「性別平等」的重要里程碑；男性養家模式的殘存勢力對這個里程碑的達成構成了阻礙。不過，除了「性別平等」這個目標之外，我同樣在意的是：那些原先由女性所承擔的「照顧任務」該何去何從？倘若「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家庭照顧任務承擔嚴重地阻礙女性平等參與勞動市場，那麼我們的社會該怎麼消除它對性別平等所構成的障礙？它的答案絕對不僅止於將家庭照顧任務自女性肩上卸除下來而已。

因為對照顧的需要是人類作為生物無法迴避的現實。生老病死這樣的生命現實，使得任何一個人無可避免地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會陷入需要他人照顧的依賴狀態。因此，任何一個社會都得設想出一套制度安排來解決依賴者對照顧的需要。就某種程度來說，「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家庭內部性別分工安排正是這樣的制度安排。所以，如果我們的社會基於對「性別平等」理念的追求，企圖改變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安排，讓女性得以從家庭照顧任務中解脫出來；那麼我們的社會緊接著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女性留下來的家庭照顧任務該由誰來承擔？而且，假使就像女性主義者說，女性過去被要求承擔家庭照顧的任務，使她們身陷性別不義的處境；那麼我們的社會在設想男性養家模式之後的照顧制度安排時，也不應重蹈覆轍；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應當盡可能地確保任何一個接替承擔照顧任務的人的處境獲得基本程度的保障。

接下來，我將以「男性養家模式」這個概念作為全文的主軸。由於「男性養家模式」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它牽涉到許多社會制度，包括生產體系與勞

動市場、性別規範與家庭制度等。本文把分析的焦點放在跟「照顧任務」相關的社會制度上。本文將檢視「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照顧任務、與照顧者處境、以及它的鬆動對照顧任務、與照顧者處境所造成的影響。下文將分作三節。第貳節將聚焦在「男生養家模式」的內涵、以及它的變遷對照顧任務所產生的衝擊。第參節則將焦點放在「男性養家模式」變遷之後的出路。第肆節，我將從照顧任務該如何安排才符合社會正義、以及勞動的商品化與祛商品化的角度，重新檢視我在前一節指出的出路，並以其作為結語。

貳、「男性養家模式」對照顧任務的意涵

要對「男性養家模式」下個明確的定義並不容易。因為，「男性養家模式」並不單純指稱傳統的性別分工導致男性作為勞動市場主要參與者的社會事實。除了這項社會事實外，它牽涉到其它不同面向的社會制度。許多論者往往基於不同的分析需要，各自就不同的制度面向對「男性養家模式」下定義。例如，我在前面曾引用的 Pfau-Effinger，她（1999, 2004）便將「男性養家模式」視作家庭成員關於家庭內部事務的特定分工安排。相對照下，Jassens（1997）在期刊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所編著的增刊特輯中，「男性養家模式」的定義並不侷限在家庭內部的分工安排。在這本增刊特輯中，大多數的作者或多或少會將這個概念與家庭外部的生產體系相連結。此外，由於「男性養家模式」還涉及類似性別角色規範這種具備強烈規範性意涵的社會制度，因此有些試圖對這個概念作批判的論者——尤其是女性主義者——在下定義時會特別強調它的規範性意涵。例如，Land（1980）、以及 Fraser（1997）就將「男性養家模式」緊扣「養家薪資」的意識型態。Sainsbury（1996）甚至將它用來指稱歐洲福利國家在戰後建立那套為維繫與鞏固「養家薪資」的所得維持體系。

鑑於「男性養家模式」牽涉到如此多樣的社會制度，為了充分掌握這個概

念的複雜性，Creighton（1999）在分析「男性養家模式」在英國社會的歷史起源、以及它式微後可行的出路時，即將這個概念理解成一種「社會協定」（social compact）。

一、「男性養家模式」作為一種多重面向的社會協定

同前面 Pfau-Effinger 一樣，Creighton（1999）先從家庭成員對家庭內部事務的分工安排來定義這個概念。接著他指出：男性養家家庭的興起，導致整個社會逐漸凝聚出一套「協定」。Creighton（1999: 520）強調：這套「社會協定」是多重面向的。它不只規範男人與女人間的性別分工安排、以及該維持什麼形式的伴侶關係；它同樣規範了：一個人的時間該如何在家庭和工作場所進行分配？就業機會該怎麼在不同家庭間作分配？以及整個社會該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維持那些沒有工作所得的社會成員。由於協定並不限於性別關係面向、也不侷限在家庭內部，它還涵蓋到勞動市場的運作、勞動市場與家庭之間的關係、以及基本生計保障的承諾。因此，參與這項協定運作與維繫的各造並不只有家庭領域的男性與女性而已；公共領域的受僱者、雇主、與國家也都受到這項協定的約束。

Creighton（1999: 520）指出在這項協定底下，不同面向的規範與約束彼此的關聯性相當緊密，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當某個面向的規範與約束因為社會變遷而產生變化，其它面向的規範與約束必然受到牽連。所以，當越來越多已婚女性參與勞動市場，這樣的趨勢首先衝擊的是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安排。但衝擊絕對不僅止於此。「男性養家模式」作為一項社會協定底下的其他面向規範與約束，包括家庭內部的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以及勞動市場原有的運作方式、與勞動市場與家庭間既有的關係模式都會受到衝擊。

既然 Creighton（1999）將「男性養家模式」理解成一種「社會約定」，那麼顯然他和女性主義者一樣看到「男性養家模式」所具備的強烈規範性意涵。

不過，相較於女性主義者基於「性別平等」的理念而對「男性養家模式」的規範性意涵採取嚴厲的批判立場，並積極地透過行動促成它的變遷，Creighton 對於「男性養家模式」的評價是比較正向的。Creighton 同意女性主義的批判。他承認「男性養家模式」作為一種多面向的社會協定，的確有它的限制在。不過，同樣重要的是，它對現代社會的運作與維繫也有不可抹滅的貢獻。因此它的鬆動確實帶來某些好處，但同時也製造了某些問題。

「男性養家模式」作為一種多面向的社會協定，它的限制何在？它又對現代社會作了什麼貢獻？Creighton (1999) 在簡單地分析完「男性養家模式」的社會協定在英國社會的歷史起源後，曾就這套協定的「性別」、「反貧窮」、「時間」、「伴侶關係」、與「經濟」這五個面向，去分析它對整個英國社會的貢獻與限制。

（一）性別面向。首先「男性養家模式」作為一套社會契約確立了以生物性別作為基礎的清楚分工安排。女性被分派到「照顧者」的角色；她們被要求負責料理家務、並回應其家庭成員生理上與情緒上的需要。男性則被分派到「養家者」的角色。一方面在家庭內部，他們因為被要求成為好的所得提供者，而不被期待分擔家務勞動與照顧任務；另一方面在家庭外部，他們被要求成為值得信賴、守紀律的工作者。這兩種角色要求與期待是相輔相成的：畢竟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個人要成好的所得提供者，前提是他得進入勞動市場、而且在勞動市場中有水準以上的表現。

（二）反貧窮面向。其次，工會與雇主的「養家薪資」意識型態、以及英國政府在戰後建立的所得維持體系、與充分就業承諾，共同確保了：幾乎所有具備工作能力的成年男性均有一份工作，而且這份工作的薪資水準足以養活一家老小，讓妻子不去工作，全時地扮演「照顧者」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所得維持體系的存在除了對那些依賴人口較多的家庭作所得補充外，它也避免某些家庭因為男性養家者喪失勞動所得而陷入經濟困境。

(三) 時間面向。Creighton (1999: 524) 引用E. P. Thompson (1967) 著名的論點，指出：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也改變了人們對「時間」的觀念。在前現代社會，人們對時間的概念普遍為「任務取向」。資本主義者與工業革命之後，僱用關係普遍化。前現代那種任務取向的勞動管理方式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現代人所熟悉的那套用時間來安排勞動的勞動管理方式。勞動時間開始被商品化。一個人投入勞動的時間被視同金錢：對僱主來說來，那是生產成本；對受僱者來說那是他犧牲非工作時間換來的報酬。不過勞動時間若被徹底地商品化，不只對受僱者及其家庭的生計安全造成威脅，它也可能剝奪了受僱者社會再生產的時間。Creighton (1999) 認為：「男性養家模式」作為社會協定的形成相當程度地緩和了勞動時間被「商品化」後對受僱者的社會再生產、以及工作與非工作時間衝突所造成的衝擊。Creighton (1999: 524) 以英國社會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十小時工時運動」(Ten Hour Movement) 作為例子，指出：男性養家模式的契約底下，國家透過公權力對工時、與工作天數的管制，確保了：所有受僱者有一定的工作外時間，來投入家庭生活、恢復勞動力、甚至追求休閒生活、以及自我充實。簡言之，男性養家模式的協定涵蓋國家對勞動條件的管制；藉由這樣的管制，勞動時間被「商品化」後有酬工作與社會再生產在時間上的矛盾與衝突得以緩衝。¹

(四) 伴侶關係面向。男性養家模式的社會契約除了確立以生物性別為

¹ 這就是 Esping-Andersen(1990)的「祛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Esping-Andersen(1990)所謂的「祛商品化」效果並不是只有福利供給一途。國家對勞動市場的干預措施，同樣可以透過降低勞動市場的市場邏輯對生計所得的影響程度，達到緩解人們對勞動市場所得的依賴的效果。Esping-Andersen(2000)在回應 Room(2000)對「祛商品化」這個概念的批評時，便用兩個例子來說明國家對勞動市場的干預措施對於「祛商品化」效果所作的貢獻。首先是解僱上的管制。在勞資政三方共組的所得協商機制底下，雇主不能隨著經濟景氣的上下起伏、以及連帶的勞動市場需求波動來調節他的僱用政策，雇主只能在員工嚴重違反勞動契約的極端狀況下才能解僱員工，否則他必須付出大筆的資遣費。Esping-Andersen(2000: 358)認為這種對雇主解僱決策的限制意味著：受僱者作為商品的特質已大為削弱。其次是薪資水準的決定。在所得協商機制底下，受僱者的薪資水準亦不完全取決於他實際的生產力。雇主往往不會管受僱者對生產的貢獻是否隨著他服務年資的累積而增加，而直接將受僱者薪資水準與服務年資連結起來。此外，工會與資方達成的薪資調漲幅度協議也適用同一產業的全部受僱者(具工會會員資格)，無論個別受僱者彼此間的生產力就實際而言存在多大的差異。對 Esping-Andersen(2000: 358)來說，這種與生產力脫勾的薪資政策同樣是一種祛商品化效果的展現。就工時限制同樣具備削弱受僱者作為商品的效果而言，工時限制也是一種「祛商品化」。

基礎的分工安排外，它也對婚姻中的伴侶關係作了規範。在這套契約底下，人們成年之後被期待進入異性戀婚姻。一旦進入婚姻後，人們被要求對伴侶忠誠，也被期待永久地維繫與伴侶間的婚姻關係。這些期待與要求的目的就在降低非婚生子女與離婚的風險。因為較低的非婚生子率、與離婚率意味著：那些沒有男性養家者可倚靠的女人和小孩的人數將控制在最小範圍。整個社會只需透過對男性養家者「養家薪資」的維繫就可以讓貧窮問題獲得相當程度的緩解，用不著再處理那些單親媽媽與單親兒童的經濟困境。

（五）經濟面向。最後雖然就歷史來說，男性養家模式的興起跟資本主義脫離不了干係，但是 Creighton（1999: 525）認為：在男性養家模式這套社會契約底下，經濟體系的運作並不完全採行自由市場原則。家庭的生計需要反倒是更重要的依據。倘若經濟體系是循自由市場原則，那麼工作機會的分配應當取決於人們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也就是說，人力資本越雄厚的人應優先取得工作機會。然而根據 Creighton（1999: 525）對英國社會的觀察，在現實的經濟體系中，工作機會的分配並不全由人力資本的高低來決定，「養家者」的身份往往也是重要的因素。當養家者的身份作為工作機會分配的依據時，在男性養家模式既定的性別分工底下，已婚男人佔據最優先的位置，相對照下已婚女性則被排擠到最後的位置。

此外，不只工作機會的分配會考慮一個人是否具備「養家者」身份，「養家薪資」的意識型態也意味著：雇主在決定受僱者的薪資水準時，受僱者的生產力並不是唯一的考量，受僱者的家庭生計需要也是重要的因素。就工作機會優先分配的「養家者」、以及「養家薪資」的意識型態，顯然在男性養家模式這套社會契約底下的經濟體系並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就像 Creighton（1999: 525）所言的，這當中夾雜著相當強的「道德經濟」色彩。

Creighton（1999: 526）試圖透過上述五個面向的分析，對「男性養家模式」作為社會契約對整個社會的貢獻進行歸納。總的來說，他對「男性養家模式」貢獻的歸納主要有二。一是他主張：男性養家模式透過對「養家薪資」的

維繫、與婚姻穩定的規範，大幅度地防範兒童貧窮的發生，並促使整體社會生活水準——尤其是工人階級——獲得改善。二則是他認為：藉由家庭性別分工、以及國家對勞動條件的管制，男性養家模式亦相當程度地調解有酬工作與再生產間的衝突，讓受僱者有額外的時間投入家庭生活與對未成年子女的照顧，並且讓女性作為照顧者得以免於工作與家庭兩頭燒的時間貧窮困境。

二、男性養家模式對「照顧任務」的貢獻與限制

就某種程度來說，這兩點貢獻都跟整個社會對那些「依賴者」生計需要的回應有關聯。第一個貢獻是在處理依賴者的所得維持需要。第二個貢獻則關乎依賴者的照顧需要。對沒有工作能力、也沒有自理能力的「依賴者」來說，要活下去，不只需要他人提供所得，同樣也需要他人提供照顧服務。這兩項貢獻的存在，確保了「依賴者」可以同時獲得活下去所需要的所得與照顧服務。對 Creighton (1999) 來說，「男性養家模式」關於依賴者生計需要的保障，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順利運作與長久維繫，具有深遠的意涵。在他對「男性養家模式」在英國社會的起源與式微所作的分析，他反覆地透露一個訊息：資本主義對「受薪勞動」的要求**在本質上**，是同整個社會的「再生產需要」相互衝突；但是「男性養家模式」的存在，讓這樣的衝突獲得緩衝。

(一) 貢獻？

嚴格講起來，對依賴者的照顧服務這類再生產活動，跟所有的生產性活動一樣，同屬「勞動」的範疇。這兩種類型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衝突，我們從上文 Creighton (1999) 引用 Thompson (1999) 的論點來說明男性養家模式作為一套社會協定在時間面向的貢獻，已經隱約地看見端倪：它顯然與勞動時間的商品化密切關聯。

前文提到：Thompson (1967) 認為在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之前，人們對

時間的概念是「任務取向」。就某種程度來說，這種「任務取向」的時間概念跟工業化之前生產體系與家庭領域的緊密連結脫離不了干係。我們可以從Thompson（1967: 60）對於「任務取向」時間概念歸納出的三項特性，見到這樣的關聯性。首先，Thompson（1967: 60）認為在「任務取向」的時間概念下，人們是依自己的主觀感受與想法來安排自己的勞動，而不是由「時間」來安排勞動。例如，在傳統小農社會，農人是按照自己觀察到的需要來安排下田耕作的任務；而不是像現代大型企業的受僱者那樣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並照表出任務。其次，和第一項特性相關。當人們依循任務取向的時間概念，「工作」與「生活」間並沒有清楚的界線。人們不僅可以隨時按照當天任務的需要而延長或縮短工作時間，而且勞動與社交活動是緊密交錯的。現代受僱者只能利用工作**之外**的時間，來追求家庭與休閒生活。但對採取工業化之前習慣以「任務取向」來安排時間的人來說，他們並不需要將工作與非工作時間區分開來，因為當他們在勞動時，他們就是在「過日子」。簡言之，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最後一項特性則是關於任務取向時間安排的評價。對於那些習於由時間來安排勞動、並照表操課的現代人來說，「任務取向」的時間安排導致勞動缺乏效率。

Thompson（1967）認為任務取向的勞動安排所受到的挑戰主要來自「僱用關係」，而非機械化的生產方式。他（1967: 61）強調：即便在前現代社會相當普遍的手工業，手工業的工匠一旦僱用家庭外的人手來幫忙，那麼工匠就不能用那套「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的時間概念來管理他所僱用的人手。在僱用關係底下，雇主使用家庭外人手的勞動，得付出薪資。家庭外人手的勞動時間成了「金錢」——雇主的「金錢」。雇主當然不可能任由他僱的人手用那種「過日子」的方式來勞動。他必須盡可能**利用**受僱者的勞動時間，確保它沒有被浪費掉。在這樣的管理邏輯之下，受僱者也強烈地感受到：雇主用錢購買的時間、與他自己所「擁有」的時間之間的差別。區分「工作/非工作時間」的勞動意識於焉形成。在這樣的勞動意識下，受僱者同樣不可能再把工作視同於生活。

資本主義與工業生產方式讓僱用關係普遍化。以時間來安排勞動的勞動管理方式逐漸取代過去那種任務取向的勞動管理方式，而成為主流。在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下，按理說，受僱者的勞動市場所得將與他所投入的勞動時間存在高度相關。然而吊詭的是，勞動時間若被徹底地「商品化」，它也可能回過頭來妨礙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永久維繫。

在勞動被商品化的情況下，雇主付出薪資購買受僱者的勞動時間。對雇主來說，這是生產成本。在追求利潤的壓力下，他勢必得極盡地利用受僱者的勞動時間。同樣地，受僱者是憑著出賣他的勞動時間賺取薪資。對受僱者來說，這是他維持生計不可或缺的條件。在生計的壓力之下，他勢必得盡其可能地投入時間到有酬工作上。雇主盡可能地利用受僱者勞動、與受僱者超時勞動的生計壓力，必然對整個社會的再生產需要造成嚴重的衝擊。在大多數的時間被用在有酬工作上，受僱者的非工作時間被大量地壓縮。這不但對受僱者恢復勞動力所需要的時間造成影響，更剝奪掉受僱者投入照顧任務的時間。然而矛盾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持續地運作得仰賴源源不絕的勞動力：不只受僱者的勞動力再耗盡之後可以在第二天上工前恢復，還得有一代接著一代的受僱者出賣勞動力供雇主利用。也就是說，如果任由勞動商品化的邏輯剝奪人們恢復勞動力、以及照顧下一代勞動力的時間，那麼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根本無法長久地維繫下去。就這點來說，「男性養家模式」透過「養家薪資」的保障、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與婚姻關係的規範，調解了勞動商品化對再生產活動的衝擊，確實意義深遠。

（二）代價？

但這是有代價的。Creighton（1999: 256）明白地指出它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性別平等」。從 Creighton 在上述五個面向關於「男性養家模式」的分析，很清楚地，這項社會協定之所以能夠發揮調解「受薪勞動」與「再生產活動」間衝突的效果，主要是透過它底下的各種規範與約束將「再生產活動」隔絕在勞動商品化的衝擊之外。然而為了達成這樣的隔絕，女性卻因此被排除在「受

薪勞動」之外。

「男性養家模式」將女性排除在「受薪勞動」之外，當然不表示她們用不著勞動。她們仍舊勞動。家務事是勞動。對依賴者的照顧服務也是勞動。只不過這些勞動未被「商品化」。這意味著：她們的勞動不具市場上的價值，無法像受薪勞動一樣轉換成維持生計所需要的薪資。要活下去，她們得倚靠某個供給者（*provider*），提供她們活下去所需要的現金資源。在男性養家模式的社會協定底下，她們的丈夫被要求承擔這項任務。

Kittay（1999）將女性爲了投入對依賴者的無酬照顧勞動，而不得不倚靠他人提供生計所得的處境，稱作「衍生的依賴」（*derived dependency*）。Kittay（1999）之所以提出「衍生的依賴」這個概念，是因為她認爲：女性作爲照顧者對於供給者的依賴，與那些沒有工作能力與自理能力的依賴者對於照顧者的依賴，在本質上並不相同。Kittay 將依賴者對照顧者的依賴稱作「直接依賴」。她認爲「直接依賴」是依賴者的能力限制使然：因爲依賴者缺乏自理能力，他必須倚靠他人的照顧服務才能活下去。這是人類作爲生物無可避免的生理限制。但是在「衍生依賴」中，女性作爲照顧者並不是因爲不具備工作能力才得倚靠供給者的所得維生。而是對依賴者的照顧勞動讓她們分身乏術。她們即便有工作能力，也沒有多餘的精力投入「受薪勞動」。這是由依賴者對照顧者的依賴**衍生而來**的處境。

Kittay（1999: 43）將男性養家模式底下女性作爲照顧者對男性的經濟依賴理解成「衍生的依賴」，我認爲她的目的在提醒女性主義者：傳統性別分工安排並不純粹是性別角色規範而已；它同時也是一項「合作安排」，是人們在資本主義下爲了回應依賴者的生計需要而形成的「合作安排」。不過，這並不是一個公平的「合作安排」。Kittay（1999: 43）在指出傳統性別分工的「合作安排」意涵後緊接著引用 Sen（1990）的論點，提醒我們：它還是一種潛藏衝突的合作安排。在傳統性別分工中，男性與女性雖然透過養家者和照顧者之間的角色分工與合作，來確保家中依賴者的生計需要獲得回應。但是在分工與合作的過程中，彼此的利益不見得一致，甚至可能相互衝突。舉個常見的例子，

雖然在男性養家模式的協定底下，丈夫被要求扮演好的所得提供者，但是由於家庭屬私人領域，整個社會並沒有透過國家的公權力強制丈夫在分配所得時一定得顧及到妻子及其他依賴家人的基本利益。也就是說，妻子最後能否被分配到足夠維生的經濟資源，這幾乎取決於丈夫的良知、以及他與妻子的關係。不少經驗研究都指出：家庭內部的資源分配並不像一般人想像得那般公平（Cf. Piachaud, 1982）。妻子在家庭內的貧窮處境並不是罕見的狀況。

Sen（1990）將傳統性別分工這種潛在衝突的合作安排稱作「合作的衝突」（cooperative conflict）。Sen（1990）認為在合作的衝突當中，每一個參與合作的人都處在一種和對方作討價還價的處境（bargaining position）。但是這討價還價處境的評估，並不是純粹由合作參與者對合作安排的貢獻來決定。合作參與者的主觀感受，尤其是他們本身是如何看待自己與對方分別在合作安排所作出的貢獻，也佔了很重要的份量。因此就算從客觀標準來看，合作參與者彼此對合作安排的貢獻幾乎相等，但只要在主觀感受上，其中一方不認為對方的貢獻和自己相當，那麼那個被認定貢獻較少的一方在討價還價時就居於較劣勢的處境。在這樣的狀況下，弱勢的合作參與者為了維繫她和另一方的合作關係，她勢必得忍受對方在討價還價時可能作出的不合理要求。Kittay（1999: 43）認為這正是傳統性別分工作為「合作安排」，女性照顧者在當中的處境。

就客觀的標準來看，依賴者要活下去，不可能單憑養家者在勞動市場賺取的金錢。就像 Tronto（1993）說的：

金錢雖然提供了滿足人類需要所需的資源，但卻無法直接地解決人類的需要問題。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老早之前就注意這樣的問題：薪水支票、或者其他種類的現金給付要轉換成可以直接滿足人類需要的形式。這中間非常多的工作要做（Tronto, 1993: 107）。

這些工作包括日常用品的採購、洗衣燒飯、以及居家環境的維護等等。對於一個沒有自理能力的人來說，他就算有足夠維生的金錢資源，也需要他人提供照

顧服務，協助他將金錢資源轉換成可以直接滿足其生理需要的餐點、乾淨衣物、與舒適住所。簡言之，養家者與照顧者的勞動，對於依賴者生計需要的回應，均有相同價值的貢獻。然而，男性養家模式的社會協定底下，照顧者的勞動被隔絕在勞動商品化的影響之外。只有養家者的勞動是受薪勞動。他的勞動可以被轉換成金錢，不但能維持他自己的經濟安全，甚至能累積財富。因此退出合作安排，他在合作安排中的付出不會付諸流水。相較之下，照顧者的勞動儘管有價值，卻無法轉換成金錢。合作破局後，她很可能一無所有。合作破局可能導致的悲慘後果，使得女性照顧者相較男性養家者，有更強烈的意願去忍受在彼此合作關係破局前對方較惡劣的對待方式。Sen（1990）稱這為「較弱勢的破局處境」（worse breakdown position）。這種狀況經常發生在許多婚姻暴力的案例中。

女性被排除在「受薪勞動」之外，儘管讓照顧任務被隔絕在資本主義底下勞動被商品化的趨勢外，確保大多數依賴者的生計需要能獲得回應。但這卻導致女性無法像男性那樣透過「受薪勞動」累積自己的經濟實力，避免自己陷入惡劣的經濟處境。的確就像 Creighton（1999）說的：男性養家模式的社會協定是以女性的利益作為代價，來換取對依賴者的生計需要——尤其是照顧需要——的保障。

因此，當戰後，越來越多工業化國家的女性追隨男性的腳步進入勞動市場，成為受薪勞動者，整個社會對依賴者生計需要的保障必然受到衝擊。Creighton（1999）認為：西方工業國家在七〇年代之後日益惡化的兒童貧窮現象、以及對兒童、失能者等依賴者的照顧安排面臨轉變等問題，就是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對依賴生計需要保障的衝擊的後果。

三、「受薪勞動」與「照顧任務」的緊張關係

我要強調的是：男性養家模式鬆動後，女性的自主性、與整個社會對依賴

者的生計需要保障的矛盾和衝突，絕對不是一種本質上的兩難議題。它只不過**再度地**反映了資本主義底下的「受薪勞動」與「照顧任務」之間的緊張關係。Elizabeth Beck-Gernsheim和她的丈夫U. Beck在詮釋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歷史趨勢時，對兩者的緊張關係作出相當透徹的分析。

U. Beck與E. Beck-Gernsheim（1990/1995）將資本主義與工業化之後「受薪勞動」興起、或者勞動被商品化的社會變遷，詮釋為一種「個人主義化」的歷史過程（individualization）。當勞動成為勞動市場的商品，勞動逐漸跟勞動者所在的社群需要脫勾，勞動者不是基於對社群成員的情感連結或責任而勞動；勞動者在勞動市場的表現與成就只屬於勞動者自己，同其他人無關（Beck-Gernsheim, 1998: 57-58）。在這樣的歷史詮釋下，男性養家模式的社會協定將女性、以及她們所從事的照顧任務排除在受薪勞動之外的作法，被視作「個人主義化」歷史過程的未竟之功。因此當二次戰後，各個工業化國家陸續面臨已婚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社會變遷，這代表著「個人主義化」歷史過程的完成：原先只有男人被納入「個人主義化」的歷史過程，現在隨著越來越多女人成為「受薪勞動」，女性也將被納進這個歷史過程。

顯然Beck與Beck-Gernsheim也是從「現代化」的角度去詮釋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歷史趨勢。不過，Beck夫婦雖然將女性參與勞動市場趨勢視作對現狀的超越，²但是他們並不像女性主義者那樣逕將這樣的超越當作其理論訴求的理想狀態。他們理論的目的是在瞭解這樣的超越對人類社會的非預期後果。

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某種程度代表著：女性逐漸擺脫掉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約束而有機會透過進入勞動市場，去追求他們自己想要的生活。過去只有男性擁有這樣機會，但是隨著男性養家模式的鬆動，女性也開始擁有這樣的機會。一個女人成年之後，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步入婚姻之後的生活方式不再只有家庭領域內部的「照顧者」角色一途，她們還可以藉由對勞動市場的參與，

² 關「現代」之後的社會，究竟該用什麼名詞去指稱它，不同立場的學者有不同的主張。有些學者用「後現代」；有些則採「後工業」。Beck在他的理論體系中則用「第二現代」這個概念作為指稱。相對應地，一般人所謂的「現代社會」，則被他稱作「第一現代」。

去過一種完全不同於家庭內「照顧者」的生活型態。女性主義者當然欣見這樣的社會變遷。畢竟這表示女人的選擇自由增加了。

但是 Beck 與 Beck-Gernsheim (1990/1995) 提醒我們：這裡增加的選擇自由是一種「勞動市場自由」。女人有機會透過勞動市場的參與而擺脫掉工業社會加諸在她們身上的家庭照顧者角色，固然增加了她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自由。然而在他們看來，這並不意味：她們從此可以無拘無束地甩開任何加諸在她們身上的外在束縛。嚴格講起來，她們只是從家庭內「照顧者」這種性別角色的束縛跳進另外一種束縛。因為當任何一個人企圖藉著參與勞動市場來追求他想要的生活時，他同樣得承受與遵循勞動市場的壓力以及對他的要求。也就是說，不單是家庭內的「照顧者」角色會對佔據這個角色的個體有所期待、並構成壓力。勞動市場同樣存在著某種運作規則；在這套運作規則之下，任何進入勞動市場的個體在扮演「工作者」角色時，同樣受到某種角色期待與規範的約束。

Beck 夫婦 (1990/1995) 透過「勞動市場自由」這個概念指出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工作者」角色後可能受到的束縛，當然不表示：他們不看好女性對勞動市場的參與。對他們來說，女性對勞動市場的參與作為一種社會變遷趨勢無所謂好壞。他們在意的是：這股社會變遷趨勢對現代社會造成了什麼樣衝擊？Beck 夫婦 (1990/1995) 認為：在勞動市場的運作規則底下，個體扮演「工作者」所承受的角色期待與規範，和個體在關係維繫上必須依循的角色要求——包括家庭、婚姻、親子與朋友關係——是相互矛盾的。因為，

勞動市場所傳達的理想形象是那種完全行動自如的個體，這樣的個體將他/或者她自己當作不斷運作的彈性工作單位，擅於他人競爭，充滿企圖心，並隨時準備捨棄那些依著他/或者她的存在與身份而加諸在身上的社會承諾 (social commitment) (Beck and Beck-Gernsheim, 1990/1995: 6)。

也就是說，當任何一個人企圖透過勞動市場追求他想要過的生活時，他可能付

出的代價就是他在家庭、婚姻以及友誼這類傳統社會連繫當中對家人、對親密伴侶與對朋友的社會承諾。

Acker (1990) 在對資本主義者的工作組織結構作分析時，也提出類似的見解。Acker (1990) 認為：在勞動市場中，雇主或企業爲了追求最大的利潤、並盡可能地促進生產組織運作的效率，它會將所有工作者**設想成**「沒有血沒有肉」的人 (disembodied)：它不去過問他們的生理需要、心理感受、以及是否有私人生活領域的事務要處理；對雇主或企業來說，工作者存在的唯一目標就是「工作」。在這樣的設想下，工作者不能有其他更迫切的事情來阻撓他們執行生產組織賦予他們的職務；一個人若有太多工作之外的事務要處理、或責任要承擔，將會妨礙他對工作的投入，代表他是不適任的工作者。

這種「沒有血肉的工作者」當然不存在於現實社會。在真實的世界中，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無論身體再強健、或心智再堅強，每個人都有疲累與肚子餓的生理需要，也都有心情低潮或沮喪的時候。更重要的是，大多數人都不是孤家寡人地活在世上，人們有都自己在乎的人，他們對這些自己在乎的人也都有某種責任在。儘管真實世界並不存在這種「沒有血肉的工作者」，不過 Acker (1990) 認為：就男性那種「全時而且終其一生」的勞動市場參與模式來說，「男性工作者」可能是真實世界中最接近這種「沒有血肉的工作者」的人。換言之，勞動市場所傳達出的那種理想「工作者」形象並不是「性別中立」的概念，它其實具備相當強烈的「性別意涵」。

這也表示：成爲受薪勞動後，女性若想在勞動市場中取得跟男性相當的成就，她們也必須追隨「男性工作者」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盡可能地讓自己保持在行動自如的狀態，隨時可以因爲雇主的要求、或者工作組織的需要而將自己的在家庭生活與社區生活的私人事務，包括自己的健康、以及自己對家人、對親密伴侶、對朋友的社會承諾暫時地捨棄。

然而，當初男性作爲血肉之軀卻能以一種相當**接近**雇主或企業對「工作者」的理想形象的方式投入工作，完全是因爲傳統性別分工安排讓他們在有妻子作爲後盾，替代他們處理那些因爲自己全天候、並終年不間斷地投入工作而無暇

理會的私人事務：包括照料他們自己的生理需要外，還有代替他們履行對家人與朋友的社會承諾。換言之，一直以來，雇主或企業之所以不用去理會「男性工作者」作為血肉之軀的私人事務，並不是因為「男性工作者」真的沒有私人事務要處理。而是因為有女性照顧者作為他們的後盾，讓他們可以把自己**假裝成**那種沒有任何私領域事務要處理的彈性工作機器。

現在那些原先作為男人後盾的女人也跟著進入勞動市場。在沒有另外一個家庭照顧者作為後盾的情況下，女性以血肉之軀要用那種幾近「沒有血肉的工作者」的形像參與勞動市場，那些因此被迫捨棄的社會承諾將構成難題。

四、照顧者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作為「道德上的責任」

假使那些被迫捨棄的社會承諾是對某個成年人的承諾，那麼問題不算太難處理。在「現代」的道德觀，也就是「公正」的道德理論下，那些具備自主能力的成年人在「私人感情領域」、或者Beck夫妻（1990/1995）在這裡所指稱的「關係領域」當中同其他成年人間的感情掙扎或利益衝突，原本就被排除在「道德問題」的範疇之外。雖然在私人情感領域當中，人們對於自己父母、另一半、或者朋友都有某種社會承諾在，但是在公正的道德理論中，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欲望和福祉負起責任。因此，當一個人因為參與勞動市場而不得不捨棄自己在私人感情領域中對某些人的承諾，那是他個人人生規劃或生活方式選擇的問題，無關「道德」。³

然而棘手的是：那些被迫捨棄的社會承諾還涵蓋了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Kymlica（1990: 283-284）認為：人們或許可以要求一個具備自主能力的成年人承擔起對自己的欲望與福祉的責任，但是人們不可能期待「依賴者」一

³ 比方說在 Rawls 的公正理論當中，「公正」並不是一種無所不包的道德理念(comprehensive moral conception)。Rawls(1993: 12-13)強調他的公正理念是一種政治上的概念；他並不想透過這個理念去解決**所有**涉及價值判斷與選擇的規範性議題。所以打從開始，他便將公正理念所要處理基本問題嚴格地限定在：具自主能力的成年人(competent adult)在公共領域的互動。因此，人們在私人感情領域的糾紛、與承諾，並不是其「公正」理念所關照的主題。

——無論是兒童或者因身心功能損傷而喪失自理能力的身心障礙者與老人——負起這樣責任。這樣的期待並不合理。因此，當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爲了順應勞動市場對「工作者」的角色規範，而被迫捨棄她們對「依賴者」的社會承諾時，它絕對不只是女性個人人生規劃與生活方式選擇的問題，它還牽涉到「依賴者」的生命維繫。的確，傳統性別安排預設女人必須承擔回應「依賴者」對照顧服務的要求，並不符合性別平等原則。而且，不是每個女人都甘於以「擔任照顧者」作爲自己的人生目標。然而，女人作爲「照顧者」所面對的不是自主的成人，她們所面對的是「依賴者」，是必須倚靠他人的照顧服務才能活下去的「依賴者」。女人不可能單憑性別平等原則，在沒有找到替代者之前就逕自捨棄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而追求自己所嚮往的生活方式。因爲依賴者很可能因此失去性命。

男性養家模式契約底下的「現代家庭」雖然父權，但是它作爲社會再生產組織卻有效地回應大多數依賴者對照顧服務的需要。二次大戰結束後，工業化國家陸續面臨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社會變遷，「現代家庭」作爲社會再生產組織陷入危機。幾乎在所有工業化國家，包括台灣，兒童照顧、及對失能者的長期照顧均成了倍受注目的公共議題。關於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陷入危機，它的解方當然不是再走回頭路，要求女性重返家庭，讓家庭恢復它作爲社會再生產組織的功能。這不但不可行，也站不住腳。

我們回不去了，也不該回去。我們只能繼續往前走，設法在女性也成爲受薪勞動的社會條件下，解決「照顧任務」與「受薪勞動」的衝突。從某個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一個轉機。在現代家庭作爲父權的社會再生產組織陷入危機之後，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而且是**非**父權的社會再生產組織取而代之(Folbre, 1993: 248)。

參、男性養家模式鬆動之後： 「照顧任務」與「受薪勞動」間衝突的新出路

按以上的分析，顯然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在當代的危機，跟它本身與「受薪勞動」間的矛盾與衝突脫離不了干係。因此接下來，我將以「照顧任務」與「受薪勞動」的緊張關係作為基礎，從「如何緩和兩者的緊張關係」的立場，指出：要建立一個符合性別平等的社會再生產制度，我們可以採行的策略。這當中有些策略屬公共性的策略，已經是許多國家的現行政策。有些策略則屬私人性的策略。這些私人性的策略雖然只是人們在缺乏國家政策支持下的權宜之計。但就社會學的角度，這些權宜之計深具應然層次的意涵。我認為我們或許可以透過對它們應然層次意涵的分析，去思考它們被轉化成公共性策略的可能性。

如果就像 Creighton(1999)、Beck 與 Beck-Gernsheim(1990/1995)及 Acker(1990)等人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作組織中，「受薪勞動」所受到的角色規範與要求與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相互衝突，那麼就邏輯上，我們可以循兩種途徑來緩解兩者的緊張關係。第一種途徑把焦點放在「照顧任務」，透過家庭外照顧體系的建立，將「照顧任務」轉化成「受薪勞動」。第二種途徑則聚焦在「受薪勞動」，針對資本主義社會底下「受薪勞動」的角色規範進行批判與改革。

一、途徑一：照顧任務從家庭內的無酬勞動轉化成「受薪勞動」

儘管就應然的層次來說，任何一個站在「照顧者」位置的人對於「依賴者」維繫生命所需的照顧服務是一種「道德上的責任」：因為「依賴者」在欠缺足夠自理能力，必須倚靠另一個人的照顧服務才能活下去，因此任何一個站在「照

顧者」位置的人，不管當初是基於什麼樣的機緣、或理由站上這個位置，又或者他是否甘願站上這個位置，他在道德上就有責任去「確保」他的「依賴者」對照顧服務的需要獲得回應（Kittay, 1999）。⁴

然而重點是：那個站在「照顧者」位置的人**不必然**得像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性別分工安排所預設的那樣，是那些同「依賴者」有血緣或者家屬關係的女性。照顧者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雖然是 Beck 與 Beck-Gernsheim（1990/ 1995）所指的那種人們在社群生活中對重要他人的社會承諾，但它仍具備勞動的本質。在資本主義勞動被商品化的趨勢底下，它同樣可以像其他的勞動那般，被轉化一種商品。也就是說，不一定得是兒童的母親、或者失能老人的妻子、媳婦或成年女兒才能站上「照顧者」這個位置。透過家庭外照顧體系的建立，那些跟依賴者沒有血緣或家屬關係的人，只要具備工作能力，也可以用「受薪勞動」的身份站上這個位置。

當照顧任務逐漸由家庭內部移轉到家庭外部，並從一種依附血緣與性別角色的社會承諾轉化成勞動市場中的有酬工作，它代表著整個社會再生產組織的轉變。不過，值得強調的是：即便「照顧任務」成了在勞動市場的有酬工作，但是那些因為職務的關係而站上「照顧者」位置的人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還是一種道德上的責任。⁵

總的來說，家庭外照顧體系的途徑涉及了兩個議題。第一個議題是：家庭外的照顧體系究竟是走向「市場化」、還是「國家化」？第二個議題則關乎照顧任務移轉至家庭外部的極限。先來看「市場化」或國家化」議題。

⁴ 就某種程度來說，這裡是用「主觀傷害」原則來證立「照顧者」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是道德上的責任。根據「主觀傷害」原則，一個對其他人的道德責任主要是取決於對方「主觀的傷害」(subjective hurts)。簡單地說就是：倘若我的某項作為或不作為將導致某個人受到傷害，那麼我就有責任盡量避免那個人受到我的作為或不作為的傷害(Cf. Kymlica, 1990: 276-286)。

⁵ 比方說，幼稚園提供的托育服務往往有八小時的限制。但是常見的狀況卻是：許多家長因為工作而耽誤了接送小孩回家的時間。雖然幼稚園老師早已事先跟家長約定小孩放學接送的時間，但是她們並不能因為有這樣的約定，就在家長違背約定後直接下班走人。在找不到其他人來替代她們作為小孩「照顧者」的角色之前，她們只能一直留守在小孩身邊。儘管這樣的留守可能打亂掉她們下班後的作息安排或活動計畫。

（一）議題一：市場化或國家化？

照顧任務逐漸轉化成家庭外的受薪勞動，除了緩解女性成為「受薪勞動」之後「照顧任務」所受到的衝擊，這樣的轉化也具備應然層次意涵。首先，它排除掉照顧任務對女性作為受薪勞動所造成的阻礙，讓女性可以跟男性一樣毫無後顧之憂地透過勞動市場發展她們的生涯。其次，我認為意義更深遠的是：這樣的轉化也有助於「照顧者」處境的改善。

在「男性養家模式」的社會協定底下，女性作為「照顧者」的處境純粹是家庭內部的私人事務，完全取決於：她的另一半是否善盡他作為「養家者」的責任。然而隨著照顧任務被移轉到家庭的外部，照顧任務成了勞動市場的有酬工作，任何一個站到這個位置的人的處境不再是家庭內部的私人事務，而是公共事務：他的工作條件與工作報酬都得受國家勞動法規的規範。然而，照顧者作為受薪勞動的處境獲得改善的程度除了取決於：國家是否勞動法規對其工作條件作規範。就照顧任務作為一種勞務商品，它還受制於市場邏輯。Fraser(1997: 65, n.28)認為：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逐漸由家庭內部移轉到家庭外部，移轉的結果究竟是「市場化」、還是「國家化」，將對照顧任務作為有酬工作的處境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市場化」下，國家對勞動條件的管制只提供基本程度的保障，照顧者作為受薪勞動在基本保障之外的處境，完全取決於雇主的對待方式。就像所有進入勞動市場賺錢謀生的人，照顧者作為受薪勞動，她們的處境必須取決於雇主願意提供給他們的薪資水準和勞動條件。

Glenn(2000)以她所在的美國社會為例，指出：「照顧服務」作為有酬勞動在美國社會一直被歸類成那種職業聲望不高、報酬偏低、勞動處境惡劣的工作機會。所以從事這類有酬工作的人大半都是社會上處境比較弱勢的人——女人、有色人種、和移民。Esping-Andersen(1999: 56)引用Baumol(1967)的「成本弊病說」，試圖解釋：為什麼在許多社會，照顧服務被商品化後從事這項勞務的人的薪資會偏低？他指出：就長期趨勢來說，勞動市場對一項工作的薪資水準訂定會反映該工作的生產力。服務業是透過人際間互動來提供勞務商

品，勞務商品的品質取決於人力的投入。因此它比較沒辦法像製造業那樣，透過生產設備的改善與創新來提高單位勞動的生產力。在這樣的限制之下，服務業的薪資會普遍低於製造業。除非該項服務可以透過創意來提升勞務商品的附加價值，或者它是那種專業知識與技術門檻相當高的「生產者服務」(producer service)，否則那種以一般人作為服務對象、又難以創造附加價值的社會服務業，包括零售業的銷售人員、以及照顧服務的從業人員，薪資水準都偏低。Esping-Andersen (1999: 56) 認為：照顧服務從業人員的薪資偏低將對照顧服務的供給面造成影響。因為勞動處境惡劣，而且從事這項工作所賺得的薪資無法維持就業者的基本支出，因此一般人不願從事這類的工作，到最後這些工作只好「流放給」(be relegated to) 給社會上最弱勢的人 (Glenn, 2000: 84)。

如果太過惡劣的薪資水準與勞動條件會對照顧服務的供給面產生負面影響，那麼反過來說，人們是否可以透過國家的公權力來對照顧服務的勞動市場進行管制，要求雇主必須以較高規格的標準來對待照顧者？純粹就保障「照顧者」作為受僱者的經濟與勞動處境的效果來論，這種作法當然可行。然而，Esping-Andersen (1999: 56) 以歐陸福利國家的經驗，提醒我們：照顧服務作為一項勞務商品，它的價格不只會影響勞動者的處境，它同時也影響到人們購買照顧服務的意願。當國家只透過公權力對照顧者的勞動條件進行管制，它勢必會提高照顧服務作為一項勞務商品的價格，對照顧服務的需求面造成負面效果。

很現實的問題是：並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負擔得起價格相對昂貴的照顧服務。中上階級的家庭或許沒問題。但是對那些收入有限的中下階級家庭來說，他們可能很因為承受不起相對昂貴的購買成本，而壓抑他們對家庭之外照顧服務的需求。那些購買不起昂貴照顧服務的家庭只能向親友這類的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絡尋求協助。假使連這種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都不存在的話，那麼最後就是女性家庭成員被迫放棄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來看，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趨勢，與家庭之外照顧服務體系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Jaumotte (2004: 60-64) 在對各國女性勞參率的差異進行分析時，就引用經驗性資料指

出：家庭外托育服務成本的降低確實有助於女性勞動力供給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在看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趨勢時，我們不能只天真地以為這些女性對勞動市場的參與全是出於自由意志。二十世紀後半葉，越來越多工業化國家的女性在進入婚姻、與生兒育女後仍舊積極投入職場，一部分除了是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外。另一部分也是出於現實的考量。這些現實考量當中有些跟在經濟全球化底下工人階級處境的日益兩極化有關。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大多數受僱者的就業模式是所謂「福特主義黃金年代」那種「全時且終其一生」投入工作的模式。但是七〇年代之後，為了回應經濟全球化，這種穩定的就業模式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生產與勞動組織都講究彈性的就業模式。在這樣的趨勢之下，勞動市場逐漸分裂成兩個極端：一端是先進科技部門，它提供的是高專業知識與技能門檻、以及高報酬的工作機會；另一端則是臨時性與低薪資的工作機會。只有比較少數的人能進入高報酬的先進科技部門。其餘多數被排除在最好工作機會之外的人只好待在失業風險較高、薪資水準較低的勞動市場部門。就業不穩定、薪資偏低的勞動市場處境使得這個部門的受僱者作為「供給者」的養家能力變弱了（Bhalla and Lapeyre, 2004）。Fraser（1997）認為：對中下階層家庭的女性來說，離開家參與勞動市場，其實是經濟壓力下不得不採取的策略。倘若如此，那麼女性因為家庭外照顧服務成本的相對昂貴而退出勞動市場，這樣的後果不單單對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權益造成傷害。它很可能對兒童、或失能者對照顧服務的需要造成威脅，進而危害到他們的生命安全。

當一個家庭迫於經濟壓力、或者家庭組成型態的限制，無法再透過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安排提供依賴者所需的照顧服務，也沒法負擔起購買家庭外照顧服務的成本，同時也缺乏穩定的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絡，協助供應成本較低的照顧服務；這樣的家庭該怎麼解決依賴者的照顧需要呢？

這是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依賴者的照顧需要是他作為「生物存有」不可避免的現實。他們對於照顧服務的需要並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好而受到抑制。對於許多類似處境的家庭，這個問題的解答顯得悲哀，而且殘酷。在所有管道都行不通的情況下，很有可能，這些家庭最後只好採取某種可能會對依賴

者造成嚴重傷害的方式來解決依賴者對照顧服務的需要。包括：把孩子、或失能的家人送到沒有立案、但價格相對便宜的照顧機構，委託不適任的人來照顧他們，或者乾脆對孩子、失能老人的照顧服務需要置之不理，讓他們獨處，甚至將他們遺棄。

簡言之，在「市場化」底下，照顧者作為受薪勞動的「勞動成本」與她所提供的照顧服務作為商品的「價格」之間是連動的。這意味著：在改善有酬照顧者的薪資水準和工作條件這個議題上，與照顧服務的消費者——也就是依賴者及依賴者的家人——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對立關係。⁶

相較之下，若家庭外的照顧體系走向「國家化」，國家可以透過公共財源的挹注補貼照顧者作為受薪勞動的勞動成本，因此面對照顧服務的「勞動成本/價格」所採取的策略，人們不用在「壓低勞動成本、但犧牲照顧者勞動處境」、或者「保障照顧者基本工作條件，但增加依賴者家庭財務負擔」這兩個選項之間痛苦地作抉擇。

嚴格講起來，在「國家化」下，國家補貼照顧者作為受薪勞動的勞動成本，由政府直接出資建立一套公共照顧體系，只是其中一種方式。⁷ 雖然和「市場

⁶ 台灣社會目前對於失能老人、以及重度身心障礙的家庭外照顧體系幾乎倚靠來自東南亞的移工。這些移工的勞動處境普遍不佳。尤其是那些以依賴者所在的家庭作為工作場所的移工，在欠缺「勞動基準法」的保障下，處境更顯弱勢。二〇〇三年國策顧問劉俠遭心神喪失的印尼籍監護移工攻擊致死的事件後，受僱於家庭雇主的監護移工的勞動處境開始受到社福團體、勞工團體與移工關懷團體的注意。移工處於惡劣的勞動處境，並不只是外籍監護工的基本人權受到侵害問題。無論是站在依賴者立場的身障團體、老人團體、和家屬團體，或是站在移工立場的勞工團體與移工關懷團體，他們都從劉俠事件中深切地體認到：監護移工的惡劣勞動處境同樣會傷害到「照顧服務」的品質，進而對依賴者的健康與生命安全造成威脅。儘管存在這種共識，但是當勞工團體與移工關懷團體自二〇〇三年起為了保障解決家庭雇主僱用的外籍監護工的基本工作條件問題而推動「家事服務法」立法，以及行政院勞委會在二〇〇六年開始研擬重將家事勞動服務者納入「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期望能透過要求家庭雇主以符合勞基法的標準來對待監護移工，以達到改善其勞動處境的目標；這些行動仍舊引起身障、老人與家屬團體的反彈。這種反彈反映了照顧作為勞務商品後勞動成本與價格之間的連動。保障監護移工的基本工作條件，絕對有助於「照顧服務」品質的提升。但這些保障措施並不是**完全**憑家庭雇主的良心就說了算。它們並不全是「無本生意」。無論是工時限制、加班費、休假權益都會增加僱用監護移工的勞動成本，導致依賴者家庭的財務負擔加重。

⁷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謂的「公共照顧體系」並不侷限於由政府直接經營的公營照顧機構。只要政府有透過公共性財源來對該照顧機構運作所需要的資金進行相當程度的補助，確保這個機構改善有酬照顧者的薪資水準和勞動條件所損耗的勞動成本，不會直接反映在服務的價格上。這樣的機構就是我們所定義的「公共照顧體系」。因此由政府出資委託非營利組織經營的

化」一樣，公共照顧體系的運作必須仰賴大量的照顧者作為受薪勞動。不過，因為它的運作財源有相當大的比例來自政府稅收，因此，它可以透過對照顧者作為受薪勞動的薪資水準和工作條件的改善，來確保「照顧服務」的品質，但同時這些改善措施所損耗的勞動成本，並不會直接反映在服務的價格上。根據 Esping-Andersen（1999: 111-114）的分析，北歐國家最偏好用這種方式。公共照顧體系在北歐國家被視作社會福利服務的一部分。

另一種補貼照顧者作為受薪勞動的勞動成本方式是傳統福利國家作法：政府透過移轉性支付對養家者所得作補充，以增強家庭購買家庭外照顧服務的能力。它對於家庭外照顧體系應該由市場上的營利組織來經營、或由國家主導、甚至由第三部門出面，並沒有任何預設。儘管兩種補貼方式對於未來家庭外照顧體系的發展，可能有不同的效果，但兩者都是透過國家扮演「財務分擔者」的角色，打破照顧作為勞務商品的「勞動成本」與「價格」的連動。

（二）議題二：照顧任務移轉至家庭外部的極限

Fraser（1997: 53-54）在分析男性養家模式鬆動後，女性作為「養家者」的處境時曾經指出：在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社會變遷下，人們雖然可以透過家庭外的照顧體系來替代女性原先在家庭內部的無酬照顧服務，然而，無論照顧任務再怎麼樣地向家庭外部移轉，它不可能**徹底到**將家庭本身對「依賴者」的照顧責任祛除掉。

Fraser（1997）認為：除非一個社會決定採取「代理孕母」與「集體公社」如此基進的照顧制度安排完全取代「家庭制度」的功能；只要「家庭制度」還存在著，那麼就算市場或國家所提供的替代性照顧服務如何地周延，必然有某些照顧服務沒法從家庭內部移轉出去。懷孕生產以及家中緊急事故的回應與處理都是很好的例子。像懷孕生產這種事，或者家中有人突然生病或發生意外，都得家人親自出面承受或作回應，無法假手旁人。而且，即便某些照顧任務可以順利地透過市售服務的買賣、或者公共服務的利用而移轉到家庭外部，但是

照顧機構也是「公共照顧體系」的一部分。

當它們被移轉出去，也會衍生新的協調工作（coordination）。這些協調工作相當瑣碎與繁雜，例如為孩子找尋合適的保姆、托兒所或幼稚園，替失能家人接洽合適的看護工，持續掌控孩子與失能家人是否得到適當的照顧服務，以及接送孩子上下課等等。它們雖然不是困難的工作，但一樣會消耗人們的心力與時間。

Beck-Gernsheim（1998: 60）甚至主張：不只使用家庭外的照顧服務會衍生新的協調工作。當妻子與丈夫雙雙進入勞動市場，連帶地導致孩子、或其他的失能家人必須在家庭外的照顧體系接受照顧，家庭生活的時間與空間被丈夫及妻子各自的職場節奏、孩子的托育機構、或者失能家人的看護的作息切割得零碎而片斷。比起從前，家庭成員得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協調各自的作息，才能讓家庭生活被整合。總之，就像 Fraser（1997: 54）強調的，將男性養家模式鬆動後的家庭制度想像成一種「真空狀態」，從此徹底擺脫掉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是不切實際的設想。

即便有家庭外的照顧體系，仍免不了有某些「照顧任務」必須由家庭內部自行承受，那麼這可能造成兩種後果。

1. 第一個後果是女性受薪勞動者的時間貧窮困境。

最後那些沒法被移轉出去的照顧工作、或者新衍生的協調工作，主要還是由女性來承擔。事實上，Creighton（1999）分析男性養家模式在英國社會式微所造成的後果時，就強調：「男性養家模式」雖然隨著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社會變遷而鬆動，但是它的鬆動只是局部的，而非全面性的。傳統性別分工安排中男性不被期待分擔照顧任務的那個部分，並沒有隨著越來越多女性透過受薪勞動承擔起養家的任務，而被打破。

這意味著：勞動被商品化後，勞動意識中關於「工作/非工作」時間、或者「勞動/休閒」時間的二分，是具性別差異的。基本上，它只適用於男性受薪勞動者。在傳統性別分工安排尚未全面地鬆動下，女性受薪勞動者在「非工作」時間，並沒法像男性那樣去追求休閒娛樂（Seymour, 1992）。她必須利用「非工作」時間來從事那些還被留在家庭內的照顧任務。這使得她們普遍處在

「一根蠟燭兩頭燒」的時間貧窮困境。

2. 第二個後果是女性被迫採取不同於男性的就業型態。

女性作為受薪勞動還得額外兼顧那些還被留在家庭內的照顧任務，除了讓她們容易陷入時間貧窮的困境之外，也迫使她們必須採取不同於男性那種「全時且終其一生」的勞動市場參與模式（full time and life long）——也就是每週的勞動時間至少三十五小時以上；而且工作歷程相當穩定，一旦投入就業後即持續工作到退休，其間鮮少有工作中斷的狀況出現。

在觀察工業化國家女性——尤其是已婚、或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趨勢時，不能只著重「量」上面的成長，我們還必須注意到「質」上面的變化。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經驗在「質」上面的變化，一是表現在女性對勞動時間的安排時較偏好「部分工時」型態，另一則表現在女性工作歷程的不連續性上頭。就勞動時間安排上，根據 OECD（2002），所有 OECD 國家的女性就業人口中採取「部分工時」就業型態的比例為 25.8%；男性的比例只佔 6.5%。而就工作歷程來說，Waite（1980）在分析家庭生命歷程和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歷程間的關聯性時，認為女性結婚後在勞動市場反覆進出的時間點大多集中在家庭生命歷程的「前期」。包括：階段一，結婚之後到第一個小孩出生之前；階段二，第一個小孩出生後到最後一個小孩出生後；階段三，所有的小孩都出生後到他們離開家之前。另一個同樣具代表性的學者 Sorensen（1983）也有類似的看法，只不過他的分段更細，而且更集中在較前面的階段。Sorensen（1983）認為女性步入婚姻之後退出與重返勞動市場的時間點大致集中在以下幾個階段，階段數則視女性育有的子女數：結婚後與第一個小孩出生前；第一個小孩出生後到第二個小孩出生前；第二個小孩出生後到第三個小孩出生前；如此類推，最後一個階段則是最後一個小孩出生之後。儘管 Waite（1980）與 Sorensen（1983）對家庭生命歷程中可能對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歷程造成影響的時間點的界定不全然一致，但就某種程度來說，他們所指出的時間點都跟對未成年子女的「照顧任務」出現、或者告一段落的時間點有密切的關聯。

面對女性工作者在勞動時間安排與工作歷程連續上與男性工作者間的落

差，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觀看。**純粹就後果來看**，女性必須透過部分工時、與暫時中斷就業來兼顧「受薪勞動」與家庭內部的「照顧任務」，這代表：不同性別的受薪勞動者對「工作者」這個角色有不同界定方式。男性走的是「傳統養家者」的軌道：工作者全時而且終其一生地投入有酬工作。而女性走的則是「媽媽軌道」(mommy track)：工作者無法全時地、也無法終其一生都不間斷地投入有酬工作(Fraser, 1997: 57)。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女性採取「媽媽軌道」就業型態的考量。然而很現實的是，這種「媽媽軌道」的「工作者」角色扮演方式偏離了雇主或企業對「工作者」的理想形式——像 Beck 夫妻(1990/1995)在前面說的，那種完全行動自如、並隨時準備捨棄那些加諸他身上的社會承諾的彈性工作單位——這必然會對她們在勞動市場的報酬水準與升遷機會產生影響，並連帶地威脅到她們離婚後、與老年後的經濟安全。

也就是說，女性即便有機會進入勞動市場，但相較於男性，她們在勞動市場還是處於較邊陲的位置。過去「男性養家者模式」社會協定底下男性養家者與女性照顧者之間的性別不平等依舊在，只不過隨著越來越多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它是以勞動市場內的性別不平等形式呈現出來。

不過，**換個角度從應然的立場來看**，媽媽軌道的就業型態或許具備「解放意涵」。女性之所以無法像男性那樣採取全時且終其一生的就業型態，是因為她們是帶著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進入勞動市場。然而，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並不只是女性在傳統性別分工安排尚未全盤崩解前的處境。它應當是人類作為「生物存有」與「社會存有」的真實處境。

在資本主義社會，雇主與企業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期待所有的受薪勞動者成為那種把「工作」奉為唯一目標、沒有任何家庭照顧任務會妨礙他全時、並且終其一生投入「工作」的人。這種對「工作者」的想像完全忽略了人類作為「生物存有」與「社會存有」的真實處境。作為「生物存有」，每個人都會累、會生病，需要充分的休息與他人的照顧。作為「社會存有」，每個人也都擁有某些倚靠他來維繫生命的「依賴者」：他尚未長大成人的孩子、他年華老去的雙親、他生病的家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女性因為帶著「照顧任務」進入

勞動市場，而對「工作者」角色扮演方式所作的調整，反而較貼近人類作為「生物存有」、與「社會存有」的真實處境。這意味著：女性那種獨特於男性的「媽媽軌道」就業型態，並不只是女性作為「照顧者」而受到壓迫的經驗而已。它也可以被看待成女性為了兼顧「照顧任務」而對「工作者」角色所作的調整與改革：透過部分工時的勞動時間安排、與暫時中斷就業的決策，讓人們在參與勞動市場之際仍舊不用完全放棄他們對於家中依賴者的照顧任務。

當然，這種調整與改革是一種**私人策略**。由於是私人策略，所以女性對「工作者」角色所作的調整與改革可能衍生的成本，例如因為縮短工作時間、或暫時中斷就業而導致的所得損失，是由她們自行吸收的。因此，如何將這種私人策略轉換成「公共性的制度」，是女性作為「照顧者」所發展出的獨特勞動市場參與模式從受壓迫的經驗轉化為「具解方性意涵」的策略的關鍵所在。

這個關鍵跟接下來我要討論的第二種緩解「受薪勞動」與「照顧任務」間衝突的途徑有關。

二、 途徑二：對資本主義底下「受薪勞動」規範進行改革

倘若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是人類作為「生物存有」與「社會存有」的真實處境，那麼一個理想社會絕對不該只是將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盡可能地移轉到家庭外部，讓所有人都可以像男性那樣「全時且終其一生地」投入工作。它也應當反過來，重新檢視資本主義底下雇主與企業對「受薪勞動」的角色規範，甚至對這套角色進行改革，讓所有人在進入勞動市場之後，無論性別，還能夠同時保有他們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

我必須強調：對受薪勞動進行批判與改革的策略同前一個策略，也就是將照顧任務轉化為受薪勞動的策略，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二擇一的問題。Williams (2001) 在討論美國女性主義陣營關於性別平等策略的路線轉折時，將這兩個

路線之間的互補關係說得相當清楚。Williams指出：美國女性主義對於性別平等的傳統策略是將女性徹底整合進勞動市場。美國女權運動大將Betty Friedan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The Feminine Mystique*⁸一書中的論點正是這個路線最重要的代表。Williams(2001: 40)引用經濟學家Barbara Bergmann的用語，將Friedan當年所訴求的性別平等策略稱之為「完全商品化」策略(full commodification)。Fridan當時主張：所有的女人都該像男人那樣去工作。然而Fridan作成這項主張的理據卻是建立在對「家務勞動」的貶抑。Fridan在*The Feminine Mystique*一書中不斷地強調：家庭主婦的角色只會讓女性喪失自我與人格。女人被要求留在家中從事無酬的家事服務與照顧工作，無疑對女性人權的侵害。我們當然可以理解：Fridan對家庭主婦角色、與照顧工作的負面概念並不純粹是她個人的偏見。她的偏見相當程度反映了：整個美國社會——或者應該說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以一個人在勞動市場的表現來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價值體系。

「完全商品化」策略到後來，被訴諸改革「理想工作者」規範(ideal worker)的「再建構」策略(reconstructive feminism)所取代。不過，Williams(2001: 47)強調：這並不表示女性主義否定了「完全商品化」策略對於女性公平參與勞動市場的理想。而是女性主義察覺到：資本主義社會對「工作者」的角色規範對於那些參與勞動市場的女性來說，並不是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Williams(2001: 64-84)以女性在不同部門的勞動市場的真實處境作為例子，說明勞動市場中那套將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排除在外的「工作者」與規範，並不是性別中立的，完全是依照男人的生活型態與身體形象而打造。這使得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後，尤其是那些以男性白領居多數的專業性工作、或者以男性藍領為主的體力工作，她們在晉用與升遷上飽受歧視。而且一旦結婚生子後，她們不僅得在工作者與照顧者之間的角色衝突痛苦地掙扎；即便將工作者擺在優先的位置上，她們仍得遭受雇主與同事不相信她們會投入全心在工作上的質疑。

Williams(2001: 64-84)指出：女性在職場上所受到的性別歧視，與勞動

⁸ 不過，從Fridan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The Second Stage*當中的訴求，顯然她後來已經超越了她當年在*The Feminine Mystique*的論點而趨向下文所謂的「再建構」策略。

市場中普遍存在的性別隔離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她認為：由於在以男性工作者居多的勞動市場部門感受到強烈的歧視與敵意，那些女性就業者佔多數的「女性工作」便成了大多數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後躲避那套專為男性打造的「工作者」規範的避風港（“women’s work” as the refugee from masculine norms）（Williams, 2001: 81）。雖然在「女性工作」的避風港中，女性可以不用按照所謂「理想工作者」的方式參與勞動市場，但是Williams認為：這對女性來說，並不是沒代價。相較所謂的「男性工作」，「女性工作」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多屬於低薪、低職位、而且沒有什麼升遷可能性的工作。當然「女性工作」中也有專業性的就業機會，例如護士、社會工作、或者圖書館員等等。但是這些工作的薪資率明顯落後於同性質的男性工作。無論是職場上的性別歧視、或性別隔離，它都代表著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後在男性所主導遊戲規則底下被邊緣化的處境。從這個角度看來，Fridan當年提出的那套「完全商品化」策略要落實，只透過家庭外的照顧服務體系將女性原先承擔的照顧任務轉化為受薪勞動，還不足夠。⁹ 若不改變遊戲規則，徹底顛覆掉那套完全不考慮受僱者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的「理想工作者」概念，女人即便進入勞動市場，仍舊無法取得和男性公平競爭的機會。

如果要對勞動市場中那套依主流男性的生活型態與身體形象而打造成的「工作者」角色規範進行改革，那麼就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後為兼顧照顧任務而私下採取的「媽媽軌道」就業策略來看，關鍵顯然在：對工作時間的安排。檢視各工業國家近年來陸續實施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work-family reconciliation），對工作時間安排的改革策略¹⁰ 除了減少工作時間之外，還包括更彈性化的工作時間安排。這兩項改革策略的目的皆在解決就業與照顧在時間上的衝突，讓受薪勞動者得以相當程度地兼顧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不過兩

⁹ 事實上，如果檢視各工業化國家的公共照顧體系回應人們家庭照顧需要的能力——包括公共托育體系、以及針對失能者的長期照顧體系——恐怕第一個策略也未竟其功。

¹⁰ 請注意：雖然本文僅從「工作時間安排的改革」來討論「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大多數國家所推行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並不限於減少工作時間或彈性化措施，像本文在途徑一所討論的「家庭外照顧體系」也涵蓋在內。

者的效果與意涵仍存在差異。下文將分析它們的差異。

（一）策略一：減少工作時間

除非是自僱者，大多數的受薪勞動者在家庭與工作場所二分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像傳統小農社會那樣在投入生產性工作的同時，亦親自履行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對受薪勞動者來說，有酬工作與對依賴者的照顧在時間上是相互排擠的。因此當工作時間被縮減，受薪勞動者自然有更多的時間親自履行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減少工作時間的具體作法主要兩種。一種作法是「帶狀式」，也就是每日工時的縮減。工時的縮減有可能是小幅度。例如「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僱用規模達三十人的雇主，受僱者若育有三歲以下子女，可以要求每日減少工作時間一個小時。但也有可能是更大幅度的，就像我們在前頭討論的部分工時就業。另一種作法則是「塊狀式」。也就是針對那些家中有需要較密集照顧的極端依賴者的受薪勞動者，提供長時間的休假。目前不少工業化國家都針對育有年幼子女的受僱者，提供為期三年至十二週不等的親職假或育嬰假，就是最好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檢視歐美國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底下關於減少工作時間的改革策略，它們對於照顧任務的設想主要限定在對年幼子女的照顧。然而，人們想要親自履行照顧任務的依賴者並不限於三歲以下或者年紀更小的兒童。對於那些中重度身障兒童的父母來說，他們的孩子很可能終其一生都處在一種需要密集照顧的極端依賴狀態。除了孩子之外，人們或許也想親自陪伴因病重而失去自理能力的年老父母走完人生最後的階段。不過，就像 Moss(1996: 24) 所說的，現階段「工作家庭平衡政策」雖致力於解決工作與家庭責任間的衝突，但是它對於家庭責任的定義卻侷限在因兒童養育而來的家庭責任。

另外，「減少工作時間」作為一種公共性策略，它跟女性私下採取的「媽媽軌道」就業策略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它必須透過公共政策去解決受薪勞動者減少工作時間後衍生的成本，而不是任由受薪勞動者個人承擔。就勞動時間作為商品來說，減少工作時間必然的結果就是「所得損失」。雖然 Goodin(2001:

28) 主張在評估一個人的「自主性」時 (autonomy)，不能只著重於「所得充裕的程度」(income adequacy) 這個面向，一個人對時間的自由支配程度 (time adequacy)，也是評估自主性很重要的面向之一。如果一個人在清醒之後的每一分鐘都得投入工作，才能賺取到足夠維持基本生計的所得，那麼光從直覺的角度來看，他絕對稱不上是一個有自主性的人。一個人對時間的自由支配程度 (discretionary time) 關乎著：這個人最後能否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被商品化的趨勢下，「所得的充裕程度」與「對時間的自由支配程度」之間存在某種競合關係 (trade-off)。減少工時之後，受薪勞動者儘管擁有較多的自由支配時間，可以用來親自履行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但是他們同時必須為這些多出來的自由支配時間，犧牲掉他們從受薪勞動中賺取充裕所得的機會。就「時間貧窮」與「所得貧窮」之間的競合關係而言，顯然不是每個人都承受得起減少工作時間後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事實上，那些私下採取部分工時、與非持續性就業型態的女性之所以承受得起減少工時的代價，原因在於：她們並不是家裡唯一負擔養家責任的人。她們其實是在家裡面另一半的經濟支援之下，才有機會循「媽媽軌道」來參與勞動市場。但是這種經濟支援其實是傳統性別分工安排的延續。此外，就算撇開部分工時就業型態與女性受薪勞動者間的連結，這種靠另一半的所得作為經濟支援的方式，也代表著：只有夫妻俱在的核心家庭才有能力承擔夫或妻任何一方採取部分工時、與非持續性就業型態的代價；單親媽媽或者單親爸爸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倘若像我在途徑一的最後所作之分析，女性作為擔負照顧任務的受薪勞動者，她們進入勞動市場後對工時所作的調整是一種具備解放意涵的調整，那麼整個社會就不應該完全由受薪勞動者及其家庭來承擔減少工作時間後的所得損失問題。國家應該透過移轉性支付來解決減少工時這項策略所涉及的時間貧窮與所得貧窮間競合關係。

除了所得損失外，減少工作時間的另一個成本是：受薪勞動者可能因此被排除在傳統那套針對「全時且終其一生」投入工作的受僱者而設計的就業保險

體系之外。社會保險體系對受僱者的定義必須跟著調整，不應該再執著於傳統男性養家者的就業型態。雖然實際上，不少採取部分工時、與非持續就業的受薪勞動不是一個家唯一、與最主要的養家者，但是作為一個受薪勞動者，她們可能遭遇的勞動市場風險與全時且終於一生的受薪勞動者沒有太大的差別(她們的機率或許更高)。因此，整個社會也必須用相同的方式，來回應她們在勞動市場中可能遭遇的失業、疾病、失業與年老風險。而且也唯有如此，這才能確保部分工時、非持續性的就業型態不是一種被邊緣化的就業型態，而是人們為了保有親身參與照顧任務的機會而自願採取的就業型態。

(二) 策略二：彈性的工作時間安排

第一項策略是透過工作時間的帶狀或塊狀縮減來增加受薪勞動者親自履行的照顧任務的時間。第二項關於工作時間安排改革的策略則是：在不縮減工作時間的情況下，讓受薪勞動者可以在工作時間內以家庭照顧需要作為理由，暫時離開工作崗位，親身投入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具體的作法包括：工作時間的彈性調整、與臨時性家庭照顧休假的提供。

有不少文獻將第一項和第二項策略歸為同類，均將之等同為對受僱者家庭照顧需要的「彈性政策」(Cf. Williams, 2001)。不過，我認為：這兩項策略的效果並不全然一致。首先，第一項策略主要在處理受僱者那些「可被預期」的家庭照顧需要。人們對照顧服務需求會隨著生命歷程的階段轉變而改變。同理，受僱者的家庭照顧需要，當然也會隨著家庭生命歷程的階段轉變而上下起伏。女性婚後在勞動市場反覆進出的時間點，即相當程度地反映了不同家庭生命階段的照顧需要變化。從已婚女性退出勞動市場的時間點往往集中在家庭生命歷程的「前期」來看，很顯然地，受僱者的家庭照顧需要普遍在未成年子女出生之後的那幾年達到高峰。就某種程度來說，像育嬰假或親職假這類塊狀的縮短工時安排，目的即在回應受僱者這因家庭生命歷程階段轉變而增加的家庭照顧需要。然而，並不是所有家庭照顧需要的出現和增加，都是可以被預期的。受僱者的家庭照顧需要除了會因為進入某個家庭生命階段而大幅度地增加

外，突發的疾病或者意外災害也可能對受僱者的家庭照顧需要程度造成影響。但是這些影響都不是事前可以預期的。就這樣的可能性，我們還需要第二項訴求彈性化工作時間安排的策略，讓受薪勞動者可以因為那些突然、無法事前被預期到的家庭照顧需要而暫時地脫離工作崗位。

其次，減少工作時間的策略除了在解決受薪勞動者在有酬工作與家庭照顧間的時間排擠外；從照顧安排的角度，它也讓受薪勞動者解決家中依賴者的照顧問題時多了一種「選項」：除了透過家庭之外照顧體系，受薪勞動者也可以選擇親自投入照顧活動來回應依賴者的照顧需要。對許多長年投入照顧議題的女性主義倫理學家來說，照顧服務不只有回應依賴者在生理上的脆弱性；它還具備更豐富的社會意涵。Ruddick（1998: 14）認為：「照顧這項勞動是在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當中，並透過這樣的關係而被完成的。」「照顧者」與「依賴者」在照顧任務履行過程中而累積出的這段關係，它意義不僅在於：它讓「照顧者」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得以可能、得以延續。更重要的意義還包括：這段關係對「照顧者」、與「依賴者」來說，都是生命當中一種**獨一無二**的經歷：不僅是其他好處無法取代的，它也是人生中其他同樣獨一無二的關係所無法取代的。因此當一個人決定放棄、或者基於某種原因無法留在家中親自提供依賴者需要的照顧服務，這裡頭牽扯到的問題除了依賴者生命維繫的問題外，也代表了：他將無法繼續透過照顧服務的提供來培養、和維繫他與依賴者間那獨一無二的情感連結。我認為，照顧者與依賴者間那種獨一無二的情感連結是照顧作為一項社會活動的「內在好處」（internal goods）。

每項社會活動都有它的正向效果或者好處。MacIntyre（1984）認為這些正向效果、或好處可以區分成「內在」與「外在」（external /internal）。他（1984: 188）用教導孩子下棋的例子來說明兩者的差別。倘若要教導一個對下棋並沒有強烈學習動機的孩子玩棋，大多數人在開始時往往會以糖果或者餅乾作為獎勵，用它們來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孩子最初可能是純粹出於想吃糖果或餅乾的理由才願意陪大人玩棋。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後，孩子或許能夠從下棋這項活動本身體驗到某些樂趣，包括：與他人對奕時的戰略分析和想象、以及競

爭所帶來的刺激感，因而想在棋技上不斷鑽研以達到卓越的狀態。MacIntyre（1984）強調：對孩子來說，糖果或餅乾終究只是他玩棋的「外在好處」。只要他有足夠的零用錢，他可以自己買來吃。但下棋本身的樂趣才是他玩棋的「內在好處」。這種「內在好處」是零用錢換不來的，只有他自己透過對下棋這項活動的參與才能獲得。

把 MacIntyre 的說法套用到照顧任務。依賴者的生命維繫顯然是一種「外在好處」的問題。依賴者雖然必須倚靠他人的照顧服務才能活下去，但是這個人不一定非得是依賴者的媽媽、妻子、女兒、媳婦、或其他跟依賴者有家屬關係的女性不可。他可以是男的。也可以像家庭外照顧體系的策略那樣，是直接或間接受僱於國家的專業照顧工作者。總之，「外在好處」的問題是可以透過「（照顧）資源重分配」的方式來解決。然而，照顧者與依賴者間那份獨一無二的情感連結則是一種「內在好處」的問題。我認為它無法透過資源重分配的途徑來解決：因為照顧任務作為社會活動的「內在好處」，唯有當事人實地投入這項社會活動裡頭才能體會。

不過，儘管照顧任務有其「內在好處」，然而在多元的社會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渴求它的「內在好處」。因此減少工作時間的策略作為一種照顧安排，只能是人們對於如何回應其依賴者照顧需要的一種「選項」而已。它絕對不能作為唯一的答案。相對照下，彈性化工作安排的策略主要在回應那些突然性的家庭照顧需要，它比較不涉及照顧安排的選擇。受薪勞動者即便選擇利用家庭外的照顧體系來解決他的家庭照顧問題，但是就像Fraser（1997）在前面說的，照顧任務向家庭外部的移轉是有極限的。在照顧任務無法被徹底移轉至家庭外部而受薪勞動者得分身處理那些被留在家庭內的照顧任務的情況下，受薪勞動者不能期待依賴者在展現那些重大、非得他或她親自回應的照顧需要，能夠配合他或她在工作組織中的作息——例如，千萬不要在他或她工作負擔相當大與急迫時生重病。依賴者對照顧服務的需要有**相當大成份**是基於生理上的需

要。¹¹ 人類生理需要的出現是聽命於生物時間的。它沒有晝夜之分，也無法配合受薪勞動者的作息。彈性化的工作時間安排，讓受薪勞動者在依賴者突然出現重大的照顧需要時，得以暫時地脫離工作組織交付的任務，親自回應依賴者的需要。

（三）對「工作優先」價值的挑戰？

暫且不論可行性。相較於減少工作時間策略，彈性化的工作時間安排策略對於資本主義下那套幾乎不顧慮受薪勞動者照顧任務的「工作者」角色規範所作的批判，更加徹底。在資本主義下，雇主與企業對「工作者」的角色規範就是建立在「工作永遠優先」的價值體系上頭：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下，受薪勞動被設想成完全行動自如，隨時可以因為工作組織的需要而拋下一切，包括自己的健康、以及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就這點而言，「暫時脫離工作」的策略透過工作時間的彈性調整、或臨時性家庭照顧休假的提供，讓受薪勞動者可以因為照顧任務而暫時離開工作組織交付的任務，它的效果顯然不僅止於對受薪勞動中既有的工作時間安排作改革而已。我認為：它還試圖去挑戰「工作永遠優先」的價值體系。

就受薪勞動者作為生物存有與社會存有的真實處境來說，「工作永遠優先」的價值體系固然不妥當。不過，這**絕對不**意味著：我們就該將這套價值體系徹底反轉，用「照顧永遠優先於工作」的價值體系取而代之。在分工日益複雜的現代社會，每個人都得倚靠陌生人的有酬勞動。有些倚靠同樣攸關人命。病患對醫生的倚靠，就是最好的例子。設想有個急診醫生正在為病患開刀，他被通知孩子生病發高燒。在「工作永遠優先」的價值體系底下，他理當把他的工作、

¹¹ 由於照顧服務必須回應人作為生物的生理需要，因此 Mellor(1992)宣稱照顧活動是聽命於生物時間。Levitas(1995)認為 Mellor(1992)的說法儘管掌握到照顧活動很根本的特性，但這樣的說法卻忽略了照顧服務作為一種社會性活動的社會建構成份。事實上，就現實的狀況來說，照顧者在提供照顧服務時不可能只處理被照顧者的生理需要。照顧者在回應被照顧者的生理需要的同時，連帶地，她也會去關照被照顧者屬於社會性需要的部分。比方說，用輪椅推著嚴重不良於行的老人到公園去散步、跟外界互動。這類的照顧服務項目顯然與被照顧者的生理需要無關，但是我們卻經常見照顧者提供這類的照顧服務給被照顧者。基於這樣的考量，我在這裡並不將照顧服務的內含量限縮在回應人類的生理需要。

也就病人的安危放在第一順位。現在作個反事實的想像。如果在「照顧永遠優先」的價值體系之下，他很可能選擇丟下手術檯上的病人，而回家探視自己的孩子。光憑道德直覺，這樣的作法顯然站不住腳。此外就算不是那麼極端的倚靠，如幼稚園園童對幼稚園老師的倚靠。假使下班時間到了，幼稚園老師爲了趕著到保姆家接回身體不適的孩子，在家長還沒來接走園童之前，逕自把園童單獨留在園所而下班。即便這樣的舉動不見得對園童的生命安全造成立即的威脅。但是從直覺來說，它同樣在道德上站不住腳。

顯然在每個人都倚靠陌生人的有酬勞動的現代社會中，家庭照顧任務的「優先性」必須是**有條件的**。用更具體的話來說，就是受薪勞動者要以家庭照顧需要作爲理由而暫時離開工作崗位之前，他必須確認他的離開不會導致那些對自己受薪勞動有所倚靠的人的基本利益不致受到嚴重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受薪勞動者能否擁有照顧任務優先性的「條件」，並不全然取決於他的職務性質。不可否認地，如果他的職務具備強烈的救急與救難性質，例如前述的急診醫師、或者消防隊員、救難人員等，他要以家庭照顧任務爲由而暫時離開職務的可能性恐怕比其他受薪勞動者低。

然而我認爲：除了職務的性質之外，工作組織的結構同樣也是一位受薪勞動者能否爲了回應家人照顧需要而暫時脫離工作崗位的關聯。無論是那一類型的受薪勞動，當人們設計工作組織時，在人力配置上，不只考量到受僱者對工作負荷的生理與心理限制，還能將受僱者的家庭照顧需要一併考量進來——比方說，讓更多人一起輪值相同的班，或者把代班人力也視同正常的人事成本——那麼當上述那種攸關人命的職務發生時，它對照顧任務的優先性所造成影響雖然不可能完全消失，但至少會比較小。以前述的幼稚園老師爲例。當那位幼稚園老師因爲家裡有事急著下班時，假使園所僱有充足的人力，那麼在有其他老師可以代替其職務的情況下，她的照顧任務優先性並不會對園童安全造成影響。換言之，要讓彈性化的工作時間安排策略發揮改變「工作永遠優先」價值體系的效果，必須有相應的工作組織結構作爲社會基礎。否則，它將成爲一種看得著、卻用不到的政令宣導。

不過也因為對既有價值體系的挑戰涉及更深刻的文化議題，彈性化的工作時間安排策略在執行上遭遇到很大的瓶頸。以工作時間的彈性調整為例。Wharton（1994）以女性房地產銷售員作為研究對象的經驗性研究即指出：在工作量相當大、而且工作壓力極大的情況下，所謂的「工作時間彈性化」往往被用來解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用在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上。另外，根據Wharton（1994）研究對象的經驗分享，雖然在工作時間彈性調整的僱用政策底下，受僱者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流程，以配合自己照顧孩子的作息。但是這樣的調整反倒使她們更容易超時工作。

儘管執行上不容易，但這並不表示「工作永遠優先」的價值體系無法被動搖。Holt 與 Thaulow（1996）對彈性化工時策略作分析時，即指出：在工作組織中，彈性政策有正式、也有非正式的。「非正式的彈性政策」是員工與管理階層透過互動而創造出的特殊職場文化。這種職場文化雖然不成文，只存在員工與管理階層的默契中，但是 Holt 與 Thaulow（1996）強調：它的效果與正式的彈性政策不相上下，甚至可以左右後者的執行狀況。

Holt 與 Thaulow（1996: 84-87）發現：工作組織是否會透過職場文化，發展成一套非正式的彈性政策，它跟工作本身的性質是否合適採取彈性的工作時間安排並無太大關聯。工作組織中成員的性別比例反倒是比較重要的影響。在女性成員佔多數的工作組織中，即便不存在正式的彈性政策，員工與管理階層也會透過非正式的調班、或職務代理，來掩護或者容許有人因為照顧任務而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女性成員居多數的工作組織之所以比較容易發展出非正式的彈性政策，其實跟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影響脫離不了干係。在這類的工作組織當中，員工或者管理階層甘願在沒有正式彈性政策的支援下，掩護或包容某些人因為家庭照顧的理由而暫離職務；Holt 與 Thaulow（1996: 87）認為：這是建立在「相互幫助」的基礎上（reciprocity）。簡單地說，就是大家同為女人。同為女人，彼此都理解對方仍被期待承擔主要家庭照顧者角色的苦處，所以當某個人因突發性的家庭照顧需要而急需親自處理，其他人願意透過非正式的方式提供幫助。這樣的幫助代表著一種相互的承諾：因為身為女人，她們同樣有

機會面臨相同的處境；當相同處境發生在自己身上時，她們知道自己也會獲得相同的幫助。

女性透過職場文化而發展出的非正式彈性策略，儘管是一種私人性的策略，但是它的形成意味著：要改變「工作永遠優先」的價值體系並非不可能。而且，女性作為「照顧者」的勞動市場參與經驗顯然是關鍵。

肆、結語

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照顧安排曾經有效地回應大多數依賴者的照顧需要。然而，這樣的效果卻是有代價的：女性不僅被排除在「受薪勞動」之外；而且這樣的排除還嚴重地傷害女性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當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照顧安排因為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社會變遷而陷入危機，它反倒可被視作一個轉機，讓我們的社會有機會對既有的照顧安排進行檢視與反省，並走向更合理的照顧安排。接下來我分別從「應然面」與「實然面」去思索男性養家模式之後照顧安排的未來出路。

一、應然面：什麼樣的照顧安排才合乎公義？

關於男性養家模式鬆動之後整個社會對照顧安排的出路，本文從如何解決「受薪勞動」與「照顧任務」間衝突的立場整理出兩個答案。第一個答案是將「照顧任務」轉化成「受薪勞動」，透過家庭外照顧體系的建立來回應那些在女性成為「受薪勞動」後未被滿足的照顧需要。第二個答案的邏輯正好相反，它認為問題出在「受薪勞動」，因此整個社會應該對資本主義底下的「工作者」角色規範進行改革，讓受薪勞動者有機會親自投入對依賴者的照顧服務。那麼，這兩個答案所設想的照顧安排，那一個比較合乎公義？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釐清：什麼樣的照顧安排才合乎公

義。對這個大哉問，本文沒法提供一個周延與完美的答案。本文僅就跟文旨相關的部分試著提出答案。大多數討論照顧安排的文獻都把焦點放在依賴者身上。依賴者必須仰賴照顧服務才能活命。因此一個社會要建立公義的照顧安排，其前提當然是：它必須確保所有的依賴者獲得維繫生命所需要的照顧服務。但是我認為：除了依賴者的利益之外，一個合乎公義的照顧安排還將「照顧者」的利益考量進來：既然我們的社會一定得有人出來回應依賴者的照顧需要，那麼對於那些出面承擔照顧者角色的人——無論他們是基於什麼的理由承擔下這個角色——其他社會成員應當盡力地確保他們獲得善待。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層次去檢視一個社會的照顧安排是否顧及到「照顧者」的基本利益：

（一）第一個層次是人們選擇「退出」照顧者角色的自由。雖然照顧任務的承擔不全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¹² 但是從自由主義立場，一個公義的照顧安排必須容許人們有「退出」照顧者角色的可能性。在男性養家模式底下的照顧安排，整個社會是以人們的生物性別為依據來指派照顧者角色。在這樣的指派下，照顧者角色被視作女人符合天性的本份；女人幾乎沒有選擇的「退出」這個角色的可能性。這當然不符合公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家庭外照顧體系的存在，讓女性可以在不危及依賴者生命維繫的狀況下，選擇「退出」照顧者的角色，去工作，去追求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二）第二個層次則是人們選擇「進入」照顧者角色的自由。就照顧任務作為一種具備「內在好處」的社會活動而言，一個公義的照顧安排還得容許那些有意願親自參與對特定依賴者照顧活動的人有「進入」照顧者角色的可能性。因此，家庭外照顧體系雖然讓人們有選擇「退出」照顧者角色的自由，但是整個社會並不能因此讓它成為**唯一**的照顧安排方式。我們必須對工作者的角

¹² 或許有人會說：由於生殖科技的進步，人們可以透過事前的生育計畫來決定自己是否要進入「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養育責任。但是人一生當中可能要承擔的照顧責任並不限於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養育責任。像成年子女對年老父母的照顧責任就不是自己意志能左右的。此外人有旦夕禍福，四肢健全的家人也可能因為疾病或意外事故而突然陷入極端的依賴處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對這些失能家人的照顧責任同樣是自己意志無法左右的。

色規範進行改革，讓人們有機會親自投入對依賴者的照顧活動。

（三）最後一個層次則是人們進入照顧者角色之後的處境。很多國內外長期照顧的文獻皆指出：當一個人長時間而且密集地投入對依賴者的照顧活動時，很容易因承受過大的壓力，而陷入身心俱疲的困境。照顧者身心困境的存在，提醒我們：照顧任務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即便具備「內在好處」，但這「內在好處」並不是它**本質上**的好處。照顧者最後能否透過親自投入照顧活動而同依賴者建立起深厚的情感連結、並從這樣的情感連結中體會生命的美好，這不是只取決於照顧者自身的努力與創意而已。它還得有特定的社會條件作基礎。

由於依賴者必須倚靠照顧者的回應與服務才能維繫生命，Frye（1983）發現：依賴者——尤其是那些極端的依賴者——很容易把照顧者「視為另一個接黏在他自己身體上的東西」（to graft the substance of another to one's own）。當一個人把另一個人視為一個接黏在自己身體上的東西時，他不會去承認對方是一個獨立於他之外的個體，有她自己的利益與生命計畫。在這樣的情況下，依賴者對照顧者間的依賴關係將向下沈淪為那種「一方予取予求，另一方精疲力竭」的宰制關係。那些選擇進入「照顧者」角色的人如何才能避免自己和他的依賴者陷入這樣的宰制關係？答案當然不是要求「依賴者」克己復禮。很多極端的依賴者根本沒有足夠的心智能力來控制他要照顧者隨時隨地對他的需要作關注的欲望。剛出生的嬰兒如此；失智老人亦如此。我認為關鍵在於：照顧者是否擁有足夠的人手作支援而「暫時性地脫離」照顧依賴者的情境。讓他在面對依賴者無止盡的要求時，可以暫時地逃避那種令人窒息的情境；或者，讓他至少可以喘口氣，去享受他除了照顧依賴者以外的生命樂趣——比方說，聽音樂，閱讀，或者只是到公園裡透透氣。

事實上，照顧者身心俱疲的困境並不只出現在家庭照顧者身上。家庭外照顧體系中的有酬照顧者與其依賴者雖然是僱用關係，但是他同樣有可能陷入依賴者對自己予取予求的困境。不過，跟家庭照顧者不同的是：家庭外的照顧體系畢竟屬**公領域**的制度。透過法定的勞動條件保障，依賴者或者依賴者的家人

作為雇主必須給予有酬照顧者足夠的休息時間、與固定的休假。工時的限制與休假的提供讓有酬照顧者得以「暫時性地脫離」照顧情境。不過，就像前文提到的，照顧服務作為勞務商品具有「勞動成本」與「價格」連動的特性。因此在這裡，國家的角色顯得重要。國家除了要落實規範者的角色（以貫徹法定的勞動條件保障），它還得承擔起「財務分擔者」的角色，才能確保那些僱用有酬照顧者的依賴者家庭有能力提供合理的勞動條件。¹³

那麼，家庭照顧者在缺乏法定勞動條件的保障下如何「暫時性地脫離」照顧情境來避免自己陷入身心俱疲的困境？許多家庭照顧者會透過自己的親友或人際網絡來讓自己得以暫時脫離照顧情境。比方說，正值產假的新手媽媽往往由自己的母親幫忙作月子，因為有自己的母親作人力支援，所以她可以暫時地脫離那種得隨時回應新生兒哭鬧的情境，偷個空讓自己身心休息。這種由親友相互支援的方式固然有效，但它終於是一種**私人性的**策略。不只成本得由照顧者或其支援者自行承擔；更現實的問題是：不見得所有的家庭照顧者都足夠幸運而能擁有一組甘願而且有能力提供人力支援的親友或人際網絡。若要確保所有進入照顧者角色的人都獲得善待，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將這種私人策略轉化成公共策略。在這裡，我們似乎看到：家庭外照顧體系的另一種意涵。假使家庭外照顧體系能夠透過有酬照顧者作為臨時性的人力支援，讓家庭照顧者得以從照顧情境中抽身獲得喘息，那麼家庭外照顧體系的存在顯然不只促使女性得以卸下性別角色規範所要求的照顧者角色，讓她們有機會追求照顧者以外的人生計畫；對於那些在家庭領域擔任照顧者的人來說，家庭外照顧體系亦有助於其處境的改善。

就上面三個層次的討論，一個顧及照顧者基本利益的照顧安排顯然必須有兩個要件。第一，它必須是多元的。照顧任務的承擔不僅關乎依賴者的生命維繫，它還涉及生活方式的選擇。所以在多元價值的社會裡，人們必須被容許「退

¹³ 雖然照顧任務被轉化成「受薪勞動」，但是我認為：對有酬照顧者而言，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同樣具備「內在好處」。也就是說，他們一樣有可能從有酬勞動當中發展出他與依賴者之間動人、且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不過，這必須建立合理勞動條件的社會基礎之上。

出」與「進入」照顧者角色的自由。第二，它必須善待那些進入照顧者的人。因此一個社會必須透過公共性的策略回應人們進入照顧者角色可能面臨的困境，而不是由照顧者或其家人單獨承受。這不只是爲了照顧者，也是爲依賴者：唯有善待照顧者，依賴者才能獲得有品質的照顧服務。

再回到上文提出的問題：家庭外的照顧體系、以及對「工作者」角色規範的改革這兩個答案所設想的照顧安排，那一個比較合乎公義？就剛才提及的兩個要件，很清楚地，這兩個答案均無法單獨地構成一個合乎公義的照顧安排。

二、 實然面：對「祛商品化」概念的再檢視

雖然一個社會若要建立更理想的照顧安排，無論是家庭外的照顧體系、或者對工作者角色規範的改革，兩者皆不可或缺，但是我們仍舊可以從實然面去檢視：那一個途徑的可行性較高？

答案顯而易見。比起家庭外的照顧體系把問題焦點放在「照顧任務」上，對工作者角色規範的改革將目標對準「受薪勞動」的合理性，直搗資本主義體系的根基，它的可行程度自然困難許多。前文提到：歐美國家近年陸續實施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有不少的措施都有透過減少工作時間、與彈性化工作時間安排的方式，嘗試改變傳統資本主義社會對工作者的角色規範。但是它的執行成效卻一直爲人所詬病。

首先，使用這些措施的人還是以女性受僱者佔多數。換言之，即便「媽媽軌道」的私人性就業策略被轉化成公共策略，但在「女性照顧者」的性別分工尙未全面鬆動之前，這些爲了回應受薪勞動者家庭照顧需要的工時安排改革，仍舊逃脫不了強化傳統性別角色的意涵。面對使用者性別嚴重失衡的問題，瑞典與挪威這些北歐國家的對策是針對像親職假或育嬰假這類塊狀的減少工時措施，設定所謂的「父親額度」(father's quota)，規定一定額度的休假必須由父親來使用，不得轉移給母親。「父親額度」的目的除了在扭轉親職假或育嬰

假使用者性別比例失衡的狀態，指出：它還企圖透過誘導更多男性使用休假親自參與對孩子的照顧，讓父親與母親在子女教養上的角色分工更趨於平等。「父親額度」的措施實施後，無論在瑞典或是挪威，男性使用親職假或育嬰假的比例均有增加的趨勢。挪威的成效尤其明顯（Leira, 1998）。「父親額度」在瑞典與挪威的顯著成效提醒我們：傳統的性別角色規範是可以透過國家的干預政策而被改變。

「工作家庭平衡政策」關於減少工時、與彈性化工時安排的措施的另一個困境則是來自雇主的疑慮與抗拒。在僱用關係底下，受僱者的時間就是金錢，就是成本。因此當受僱者縮短工作時間、或者利用工作時間去回應突發性的家庭照顧需要，這當然意味著雇主的勞動成本將增加。在追求利潤的壓力之下，即便國家已透過立法將相關措施列為受僱者的法定權益，許多的雇主仍會設法逃避相應的責任。比方說，雇主可能會用迂迴的方式拿工作機會、或者日後的升遷機會作為要脅，讓那些有意利用相關措施的員工知難而退。事實上，這正是台灣育嬰假政策目前所遭遇到的困境。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受僱滿一年的員工在子女滿三歲之前，可向雇主要求最長達兩年的育嬰假；而且自二〇〇九年起，育嬰假的申請者還可依新修正的就業保險法向就業保險基金領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額度為投保薪資的 60%，每一子女最長可領取六個月。然而對許多在中小型私人企業工作的勞工來說，由於雇主不願意擔負增加人力支援的成本，因此無論是育嬰假、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都只是「看得到卻吃不到」的牛肉。換言之，在雇主拒絕配合的情況下，那些為了回應受薪勞動者家庭需要的工時安排改革措施，很可能淪為對受僱者的懲罰：受僱者即便利用它們來解決自己的家庭照顧需要，他們卻可能在勞動市場中逐漸被邊緣化。而且，更棘手的是，因為使用者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到最後那些因而被邊緣化的人仍舊以女性居多。工作時間安排改革途徑的執行成效低顯然不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面對雇主的疑慮與抗拒，我們該怎麼辦呢？有不少文獻從管理學的角度對雇主作道德勸說。這些文獻以經驗資料作為根據，試圖說服雇主：工作家庭平

衡政策的相關措施有助於留住優秀的員工，增加員工對企業向心力進而提供其生產力。不過，我認為將希望完全寄於雇主觀念的改變，並不切實際。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體系要持續地運作必須倚靠一代接著一代的受薪勞動者。生產組織爲了追求最大的利潤而拒絕回應受薪勞動者生育與照顧下一代勞動力的需要。這當然是符合理性的決策。然而這只是一種短視的理性決策。當越來越多的受薪勞動者因爲恐懼被邊緣化，而拒絕生養下一代的勞動力，在生育率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維繫勢必受到嚴重威脅。就這樣的可能性來說，生產組織爲了節省勞動成本而懲罰那些生養下一代勞動力的受薪勞動者，其實是一種不符合「長期理性」的決策。但要怎麼樣讓企業與資本家將眼光放遠，從「長期理性」的角度作決策呢？

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變遷似乎是個歷史契機。大多數人都從性別平等、或者依賴者需要的角度來看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底下的工時安排改革。不過，我認為：我們可以將它視作一種「祛商品化」運動的再擴充。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成爲市場上的商品，人們的生計嚴重受制於市場邏輯。二次戰後，西方福利國家主要透過「所得移轉體系」的建立、以及「對勞動市場的管制」這兩個途徑來降低市場邏輯對人們生計的衝擊。¹⁴ 不過，無論所得移轉體系、或是勞動市場管制，兩者的祛商品化效果均著重在「所得面向」：前者主要在補充受薪勞動者失去工作後的所得；後者則透過勞動條件的保障與集體協商機制，確保受薪勞動者的工作機會與勞動條件不致於因爲經濟景氣的波動而有太大的影響。它只處理了受薪勞動者在所得維持上的困境；而沒法處理受薪勞動者在家庭照顧上的困境。在男性養家模式的協定仍穩固之前，這並不構成問題：在家庭內部性別分工安排尚未鬆動之前，許多女性留在家裡頭一肩扛起照顧者角色，讓她們的男人得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勞動市場，用不著分心顧慮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然而隨著越來越多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男性養家模式的協定不再穩固，依賴者對照顧服務的需要無法再全然地透過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安排而加

¹⁴ 一般人比較熟悉的是所得移轉體系的祛商品化效果。至於勞動市場管制措施的祛商品化效果，請參看我在註 1 的討論。或直接參考 Esping-Andersen(2000)對於 Room 的回應。

以解決。有越來越多人——通常是女人——必須帶著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進入勞動市場。在這樣的情況下，福利國家的祛商品化機制若繼續侷限在受薪勞動者所得維持困境的處理，而不去理會他們的家庭照顧問題，這將導致那些必須擔家庭照顧需要的受薪勞動者因為市場邏輯的衝擊而被邊緣化。

面對受薪勞動者可能承擔的家庭照顧需要，我認為我們必須將祛商品化機制從「所得面向」再擴充到「時間面向」：我們可以透過減少工作時間、及彈性化工作時間安排的方式讓受薪勞動者有機會親自投入對其依賴者的照顧活動。事實上，我們的社會並不是不存在「時間面向」的祛商品化機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大多數的受薪勞動者是透過出賣自己的時間來換取維持生計所需要的金錢。假使勞動力被徹底地商品化，人們投入工作的時間對他們的所得有關鍵性的影響。但是二次戰後，各國工業國家陸續透過勞動條件的基本立法，對受薪勞動者的工時作出限制、並要求雇主必須提供病假，讓受僱者得以因生病或身體損傷的理由而暫時離開工作崗位。（許多歐洲國家甚至透過社會安全體系去解決受僱者在病假期間的所得安全問題。）我認為這正是一種「時間面向」的祛商品化：它從「時間面向」去削弱人們投入工作時間和所得的連結性。無論是工時限制、或是病假的提供（以及病假所得來源的維持），它們都代表著：一個社會看見、並回應受薪勞動者作為一個人需要充足的休息時間恢復體力、還會因為疾病、或意外災害而必須暫時離開工作崗位的處境。

現在，我們社會對於受薪勞動者作為人的處境的視野與回應可以再拉高、拉大：我們必須把受僱者對特定依賴者的照顧任務也考量進來，我們必須看到、並試著去解決受僱者作為人家的兒女、或父母有時必須親自回應其年老父母、或年幼子女照顧需要的處境。倘若如此，我們社會對於勞動條件的基本保障還必須涵蓋到跟家庭照顧需回應相關的工作時間安排改革。

回顧歷史，無論是所得面向的祛商品化機制、或是上述那些針對受薪勞動作為生物存有處境的工時限制、與病假保障，都不是建立在雇主的覺醒上。它是由工人階級透過政治壓力、以及國家基於政治上正當性的考量，迫使雇主讓步的結果。隨著越來越多女性（被迫）帶著對依賴者的照顧任務進入勞動市場，

這或許是祛商品化機制擴充至受薪勞動者作為社會存有處境的歷史契機。

參考文獻

- Acker, J. (1990). Hierarchies ,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zations. *Gender and Society*, 4(2), 139-158.
- Baumol, W. J. (1967).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3), 415-425.
- Beck, U and E. Beck-Gernsheim (1995).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M. Ritter and J. Wiebel, Trans.) Cambridge: Polic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0)
- Beck-Gernsheim, E. (1998). On the Way to a Post-Familial Family: From a Community of Need to Elective Affinitie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5(3-4), 53-70.
- Bhalla, A. S. and F. Lapeyre (2004). *Poverty and Exclusion in a Global World*, 2n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Creighton, C. (1999).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Family” in Brita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519-541.
- Crompton, R. (1999). The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Explan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In R. Crompton(ed.), *Restructuring Gender Relations and Employment: The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pp. 1-2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o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sping-Anderson, G.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on, G. (2000). Multi-dimensional Decommodification: a Reply to Graham Room. *Policy and Politics*, 28(3), 353-359.
- Folbre, N. (1993).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raser, N. (1997).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cep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Frye, M. (1983).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Trumansburg, New York: The Crossing Press.
- Glenn, E. N. (2000). Creating a caring socie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1), 84-94.
- Goodin, R. (2001). Work and Welfare: towards a Post-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13-39.
- Hochschild, A. (1990). *The Second Shift*. London: Piatkus.
- Holt, H. and I. Thaulow (1996). Formal and Informal Flexibility in the Workplace. In S. Lewis and J. Lewis(eds.), *The Work-Family Challenge: Rethinking Employment* (pp. 79-92).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Jassens, A. (1997).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Family? An Overview of the Debate. In A. Jassens(e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 42 suppl. 5 (pp. 1-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umotte, F. (2004).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Policy and Other Determinants in OECD Countries. *OECD Economic Studies No. 37*. Retrieved Oct. 12, 2007,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12/39/34562935.pdf>
- Kittay, E. F. (1999). *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Kymlica, W. (1990).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and, H. (1980). The Family Wage. *Feminist Review*, 6, 55-77.
- Leira, A. (1998). Caring as Social Right: Cash for Child Care and Daddy Leave. *Social PoliticsI*, 5(3), 362-378.
- Levitas, R. (1995). We: Problems in Identity, Solidarity and Difference. *History of Human Science*, 8(3), 89-105.
- MacIntyre, A. (1984). *After Virtue*, 2nd editi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University.
- Mellor, M. (1992).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London: Virago.

- Moss, P. (1996). Reconciling Employment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S. Lewis and J. Lewis(eds.), *The Work-Family Challenge: Rethinking Employment* (pp. 20-3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2).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2*. Paris: OECD.
- Pfau-Effinger, B. (1999). The modernization of Family and Motherhood in Western Europe. In R. Crompton(ed.), *Restructuring Gender Relations and Employment: The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pp. 60-79).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fau-Effinger, B. (2004). Socio-historical Paths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Model—An Explanation of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5(3), 377-399.
- Piachaud, D. (1982). Patterns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within Familie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4), 469-482.
- Rawls, J. (1993).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om, G. (2000). Commodification and Decommodification: a Developmental Critique. *Policy and Politics*, 28(3), 331-351.
- Ruddick, S. (1998). Care as Labor and Relationship. In J. G. Harber and M. S. Halfon (eds.), *Norms and Value: Essays on the Work of Virginia Held* (pp. 1-25).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Sainsbury, D. (1996). *Gender, Equality, and Welfare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n, A.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I. Tinker (ed.),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 (pp. 123-149).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ymour, J. (1992). ‘No Time to Call My Own’: Women’s Time as a Household Resourc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5(2), 187-192.
- Sorensen, A. (1983).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s after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2), 311-321.
- Tronto, J. C. (1993).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38, 56-97.

Thompson, L and A. Walker (1989). Gender in Families: Women and Men in Marriage, Work and Paren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845-871.

Waite, L. J. (1980). Working Wives and the Family Life Cyc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2), 272-294.

Williams, J. (2000). *Unbending Gender: Why Families and Work confli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arton, C. (1994). Finding Time for the 'Second Shift': The Impact of Flexible Work Schedules on Women's Double Days. *Gender and Society*, 8(2), 189-205.